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赤都风云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长江出版社
CHANGJIANG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赤都风云 /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22.11

ISBN 978-7-5492-8281-4

I. ①赤…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
党史—武汉 IV. ①D235.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215108 号

赤都风云

CHIDUFENGYUN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责任编辑: 李海振

装帧设计: 刘斯佳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 编: 430010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电 话: 027-82926557 (总编室)

027-82926806 (市场营销部)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武汉市卓源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1000mm

开 本: 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2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2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92-8281-4

定 价: 96.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编辑部

主 编 张学锋 郑水平 田子渝

副主编 王怀卓 宋 健 李福珍
文道贵 张秋实 张 军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玲	王萍丽	刘庆鸿	刘桂芳	孙 勐
李 云	何利平	沈泉晓	张向东	张志宏
陈 磊	周 鹏	周 薇	胡 麟	钟贤超
姚开明	袁 琳	夏伟平	高万娥	曹 波
程 敏	傅 俊	颜昌连	戴定凯	

《赤都风云》

编写组

主 编 文道贵 宋 健 刘桂芳

编写组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钢	王春贺	文道贵
邓正兵	朱蔚青	刘天雨
刘宇洁	刘佳欣	刘勇竞
刘桂芳	许 歌	孙 勳
芮 鹏	李 静	余程春
汪梅梅	张 磊	张翼鸥
陈 磊	周 敏	周 静
周 薇	徐冰娜	徐志刚

目 录

001	共产党主导组建湖北国民党组织	/ 余程春
017	反帝废约怒涛澎湃	/ 刘天雨
027	工潮再起	/ 王 钢
036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 许 歌
050	收回汉口英租界	/ 王 钢
062	赤都武汉风云激荡	/ 李 静
074	讨蒋怒潮	/ 张 磊
091	江汉风雷	/ 徐志刚
106	湖北农民解放的新纪元	/ 刘勇竞
120	都府堤四十一号的灯火	/ 邓正兵 李 静
133	妇女不能解放，则革命不能成功	/ 王春贺 文道贵
145	火红的青春	/ 刘佳欣
165	东征，还是北伐	/ 周 敏
175	在五大召开的日子里	/ 周 敏
192	平定夏斗寅、杨森叛乱	/ 张翼鸥
199	从郑州会议到徐州会议	/ 朱蔚青
208	黄冈烟苗案	/ 陈 磊
215	马日事变的处理	/ 周 静 徐冰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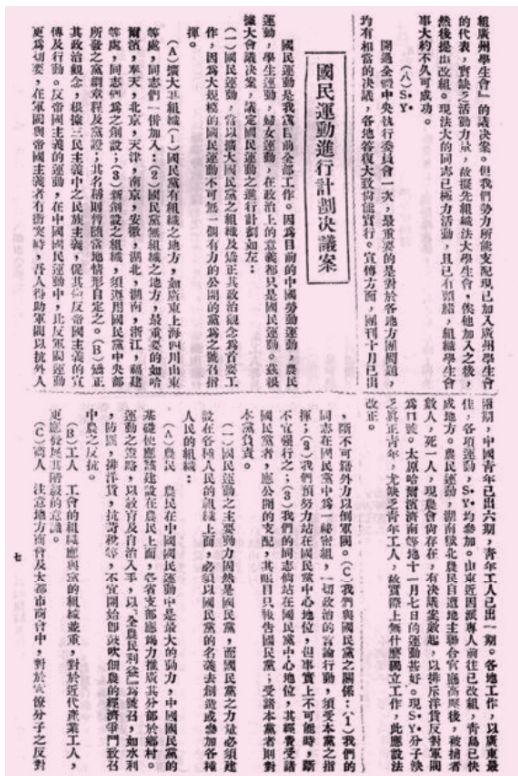
224	赤都卫士——武汉工人纠察队	/ 张翼鸥
232	红色黄埔	/ 朱蔚青
245	“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 陈磊
269	江城惊变	/ 芮鹏
280	五人临时中央临危受命	/ 芮鹏
293	八七会议力挽狂澜	/ 孙劭
303	中央特科的起源	/ 孙劭
312	组织工作有了组织	/ 周薇
323	宣传鼓动谱写新篇	/ 刘宇洁 汪梅梅
336	长风破浪会有时	/ 刘桂芳

共产党主导组建湖北国民党组织

共产党员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

湖北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地，而武汉又是一座拥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革命氛围十分浓厚。国民党中央早就有在湖北设立省党部的意愿，但因北洋军阀黑暗统治，导致国民党在湖北的组织被破坏后一直无法公开活动，加上缺少重建国民党组织的机会和熟悉党务的人才，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湖北共产党人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精神，才帮助国民党在湖北重新建立党组织，有力地推动湖北国共合作局面的实现。

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共召开了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制定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对国共合作做出进一步部署，要求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湖北等地，由共产党员为之创设，规定共产党员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中共武汉区委的同志遵循中共中央的指示，改变了之前不赞成共产党员加



《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



刘伯垂

入国民党的保守态度，通过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开展党内合作这种方式，开始积极地进行武汉地区国民党组织的组建工作。12月30日，共产党员项英和刘伯垂、廖乾五在汉口建立了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筹备处，由刘伯垂担任主任，总理建立党部的各项筹备工作。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在会议上，共产党员刘伯垂作为湖北代表，自信乐观地向与会者作了关于湖北省党务的报告。在听取刘伯垂对湖北省充满信心的党务报告后，国民党中央设立湖

北省党部的想法更加迫切了。会后不久，国民党中央就委任刘伯垂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备委员。4月，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在刘伯垂的不懈努力之下秘密成立了。董必武、刘昌群、刘光国、许鸿等人被任命为临时党部委员。由于这个党部是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身份主导筹建的，因此在委员中，除1人是国民党员外，余者皆为共产党员。

就在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筹建过程中，林伯渠又奉国民党中央之命从广东来到汉口筹建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国民党中央最初本决定委派中央执行委员覃振、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张知本前往主持筹建汉口执行部，就近指导湖南、湖北及陕西三省的党务。但因覃、张既反对国共合作，又畏惧北洋军阀统治下武汉的白色恐怖，故二人都没有来到汉口。这时，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员林伯渠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接受这项任务，不畏艰险，来到汉口。

林刚刚到达汉口时人生地不熟，对开展工作几乎一筹莫展，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革命战友刘伯垂，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刘伯垂在听完林伯渠的求助后，双眉紧锁，脸色严峻，他深知此时的武汉正处于革命的低潮时期，军阀吴佩孚对革命活动正进行着血腥镇压，能建立湖北省临时党部已属不

易，再建立汉口执行部那就是难上加难了，但为了实现“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目标，他毅然决然地答应了林伯渠的请求。在刘伯垂、董必武、项英、李立三、许白昊、林育南等人的协助下，林伯渠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管辖湖北、湖南、陕西三省党务的国民党汉口执行部。该组织也是湖北的中共党、团员为国民党最早创设的正式组织。

可好景不长，林伯渠、刘伯垂在武汉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北洋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的注意。5月14日，位于汉口德润里23号的国民党汉口执行部机关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了这里，他们是吴佩孚、萧耀南手下的军警。只见他们不由分说地冲进房子里，以“煽动工潮”的罪名，逮捕了许白昊等多位执行部核心人员，封闭了汉口执行部机关。与此同时，刘伯垂位于清芬二马路的律师事务所也遭到查抄，刘伯垂惨遭逮捕。此外，中共汉口地方委员会机关亦被查抄，项英被公开通缉，林伯渠因无法立足也被迫离汉返粤。这一逮捕行动致使湖北国民党党务工作一度停顿，白色恐怖笼罩着荆楚大地，湖北的革命工作陷入低谷。

值此危难之际，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陈独秀和秘书毛泽东联合签署了中共中央第14号通告，号召各地方抗议“汉口官厅因反对国民党运动逮捕许白昊”等人，董必武、陈潭秋临危受命，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接过了主持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的重担，继续领导湖北的革命工作。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时局出现转机，董必武领导的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也加紧了革命宣传活动，他本人也在《江声日刊》上发表了对于国民会议的十项主张，在社会引起了“打倒列强，要求民主”的强烈共鸣，临时党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许多共产



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合影



党员、共青团员在此期间加入临时党部开展工作，逐渐在党部中居于主导地位。

在日益好转的革命形势里，董必武在陈潭秋等同志帮助下，开始筹建国民党湖北省正式党部。

1925年7月15日至20日，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县市代表有28人。在这次大会上，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正式成立了。

这次大会宣告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正式成立，选举出10名执行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作为党部成员。其中董必武当选为常务委员兼“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负责人”，这表明实际上是他在主持着省党部的日常工作。周恩来在后来回忆时也曾有过“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的感慨。在这14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1人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他们是：董必武、陈潭秋、钱介磐、吴德峰、蔡以忱、刘季良、徐全直、张培鑫、胡彦彬、李子芬和刘昌绪，另外张国恩、张朗轩和郝绳祖3人为国民党左派。这样的人员构成使得国共两党在组织层面上为构建革命统一战线打下了良好基础，使得湖北与武汉地区成为国民革命深入推进的坚固堡垒。并且大会还完善了省党部的组织结构，细分为组织、宣传、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和秘书处7个部门，还选举了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

1926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湖北已有30多个县建立了国民党组织，且尤其注重吸收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党员人数迅速达到3000多人，其中75%以上的国民党员由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组成。这些成果的取得与湖北省党部组织部部长陈潭秋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1926年2月25日至26日，国民党湖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大会传达了国民党二大的会议精神，总结了一年多来省党部的工作情况，制定了多项工作决议。大会进一步健全了省党部的工作机构，在原有基础上增添了商民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和临时指挥部，并选举出30名委员，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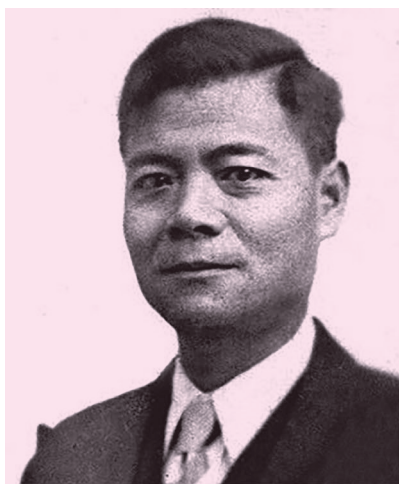
中执行委员 11 人，候补执行委员 7 人，监察委员 7 人和候补监察委员 5 人，董必武仍以国民党中央驻鄂代表、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继续指导湖北党务。

时隔半年之后，国民党湖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于 1926 年 7 月 13 日至 15 日召开，会上推选出的 11 名执行委员中，有陈潭秋、蔡以忱、周延壅、钱介磐、袁溥之 5 名共产党员，7 名候补执行委员中，有陈荫林、吴德峰、陈卫东、刘子谷 4 名共产党员。

毛泽东在谈到国民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建立时，有过“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论断。在 1925 年 10 月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上通过的《湖北报告决议案》中，中共中央就称赞：“湖北党部的国民运动颇能努力进行，在国民党内完全占主持地位，领导群众的政治活动，均有相当的成绩。”同时，共青团武汉地区组织在向共青团中央的报告中，也赞扬董必武创设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工作：“湖北省国民党部均由共产党员一手经营，市县的党部也由共产党员担任。共青团与共产党组织在国民党内‘活动成绩极佳’！”这些评价，既反映了董必武、陈潭秋等共产党员创建的湖北国民党组织的特点和优点，也表现了在湖北国民党省市党部中，共产党员始终牢牢掌控着党部工作的领导权。

真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之争

就在共产党人主持创建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后不久，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们便企图通过“另立党部”的方法，与中共争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领导权。为了巩固革命统一战线，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主张，维护国共合作，董必武、陈潭秋等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创始者们，在依靠湖北的共产党、共青团力量的同时，也紧密团



陈潭秋



结国民党左派人士，领导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同国民党右派分裂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早在1924年12月，湖北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郭聘帛和胡石庵等人就擅自另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筹备处”，胡石庵自任“主任委员”，还以“党部”名义公开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湖北省政府进行交涉，妄图取得“合法”地位。紧接着，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还私发党证，募集资金，大肆开展阴谋活动，欲和中共争夺湖北省党部领导权。在事关国共合作、国民党组织原则的大局面前，董必武、陈潭秋等人毫不让步，他们向以胡石庵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发起了反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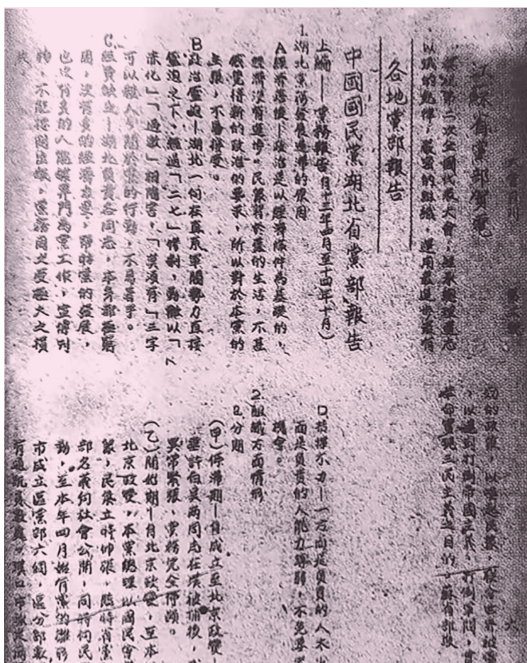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12天后，在湖北省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上，董必武站在主席台上，面色沉重地念完追悼词后，继续说道：“此次追悼孙总理大会上，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宣布，那就是我湖北省的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早已成立了！”停顿片刻后，他又以严厉的语气说道：“郭聘帛等人设立的所谓‘筹备处’是伪组织！是非法组织！”此言一经传出，胡石庵等右派们惊恐不已，不得不迫于形势，取消了伪“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备处”。不久，董必武请示国民党中央，正式委任刘伯垂负责汉口特别市的国民党党务工作。5月21日，刘伯重组建的国民党汉口市临时党部正式成立，郭聘帛等人成立的又一个伪组织“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筹备处”也告破产，董必武等共产党员在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取得初步胜利。

但国民党右派们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派人冒充去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湖北代表，企图进行破坏活动。董必武和陈潭秋得知后，联合各群众团体，正式选出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湖北代表人选，使得右派分子私派的代表被北京方面否认，可郭聘帛等人仍不死心，他们又采取了勾结北洋军阀的方式“借刀杀人”。在直系军阀头目吴佩孚重掌权势之际，郭等人先是公开通电欢迎吴佩孚来鄂，并亲自上门拜谒。紧接着就投入吴佩孚、萧耀南的门下，从事无耻的告密活动。由于郭等人的告密，董必武、陈潭秋等人一直遭受北洋军阀当局通缉，给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党务工作开展造成了极大困难。

除了郭、胡等国民党老右派之外，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又分化出“新右派”。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刺杀身亡。湖北籍国民党右派居正、张知本等人看时机成熟，纷纷粉墨登场。他们一不承认刘伯垂领导的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合法地位，二还公开扬言要取消、解散“由共产党董必武、陈潭秋等人所把持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最后宣布“另委”居正等右派分子“筹办改组”，妄图取而代之。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立即召集战友们共同商议对策。

针对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公开挑衅，董必武和他的战友们立即在报纸上发表了义正词严的宣言和启事，严正指出：“本省党部系受命于本党最高机关广州中央委员会之合法组织，集合革命同志，以领导革命民众，努力于本省之国民运动为职志，只知遵守党纲，服从纪律，刚强淬砺，不惧暴逆。近日报载北京伪会有取消省党部之荒谬言论，除剴切宣言，申罪致讨外，深恐各界人士为所蒙蔽，致乱真伪，用特声明，即希鉴察。”声明一出，给予右派分子们当头棒喝，右派们的叫嚣立刻偃旗息鼓。

针对“戴季陶主义”的攻击，在省党部内部，董必武领导开展了对国民党员的教育活动，进行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他用湖北省党部的名义，做了《共产党员加入本党问题》的报告，不但回答了国民党右派的攻击，而且以大量事实根据，说明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为国民党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才使国民党“枯木逢春”，重新焕发出政党的生机与活力，有理有据地批驳了戴季陶等国民党新右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工作报告

派们对统一战线的攻击。

董必武还指示省党部的秘书处为廖仲恺遇刺事件向党员们发出了特别训诰，通告各级党部要严密组织、加强教育，揭露国民党右派组织“同志俱乐部”分子在湖北的阴谋活动。这些报告和训诰，都从上到下地传达到湖北各县区党部，在湖北省党员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同时，董必武以省党部的名义正式请求国民党中央尽快开除国民党新老右派分子的党籍，用雷霆手段对付叛党的党员及其设立的伪党部组织。

在董必武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的努力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全省范围内对国民党新老右派分子们发起了一场全面的反击战。不仅使得“伪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等组织被迫解散，更是牢牢加固了国共合作和革命统一战线，为维护革命大局稳定、支持北伐军顺利进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董必武：“须使湖北成为革命的湖北”

在北洋军阀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铁蹄蹂躏下的湖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苦难深渊之中，这也为国民革命在湖北爆发积蓄了巨大的力量。湖北仿佛一捆易燃的干柴，只要有人将一粒火种投进来，就能点燃燎原大火。董必武就担任了“点火人”的重要角色。

董必武认为，想要让全湖北都“革命”起来，就要把各个阶层的人都



董必武

发动起来，“若想使湖北成为革命的湖北，则各领域之人都须投身于此洪流之中”。在1923年3月北京政府声明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两地遭到日本无理拒绝之时，董必武立刻通过党团组织，发动武汉学联在内的多个组织，成立了武汉各社团联合外交后援会，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帝爱国活动。为使长江两岸的群众示威活动汇聚成更强大的洪流，董必武又联合轮船公司将武昌的万余名群众运送至汉口参加4月13日

举行的“反对日本侵华国民大会”。

4月13日，汉口的大街上旗帜招展，从长江江面到汉口街道，反对日本侵略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由8个工人团体和42个各界群众团体，以及40多所大中学校的师生们组成的示威游行方队，浩浩荡荡地举行反日侵略游行示威大会。大会上，女共产党员夏之栩慷慨发表反帝演讲，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进行了感人肺腑的发言，令许多与会者潸然泪下。时评《江声日刊》称：“此次游行一改‘二七’失败后的沉郁空气，使武汉人民的革命情绪为之一振。”



夏之栩

国共合作开始后，全国革命形势也进入了新的阶段。1924年8月至9月里，董必武等人以湖北教育界的名义发起成立了反帝国主义运动同盟，亦称“大联盟”。9月5日，大联盟在武昌中华大学里举行了盛大的各团体代表大会，到会的48名代表一致推举董必武担任大联盟临时主席。7日，董必武又马不停蹄地组织50多个团体和几千名群众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九七国耻”纪念大会。董必武作为大会主席站上演讲台，语气沉痛地指出：“23年前，满清政府受八国联军威胁，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是我国外交史上最耻辱之事，也是我国民最痛心疾首之事！”而后他话锋一转，大声疾呼：“同胞们！我们要为废除种种不平等之条约，谋人类之生存，谋国际外交之平等而群起努力！”听闻此语，台下民众群情激愤，喊声震天，董必武等人继续提出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建议，更加得到了参会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热烈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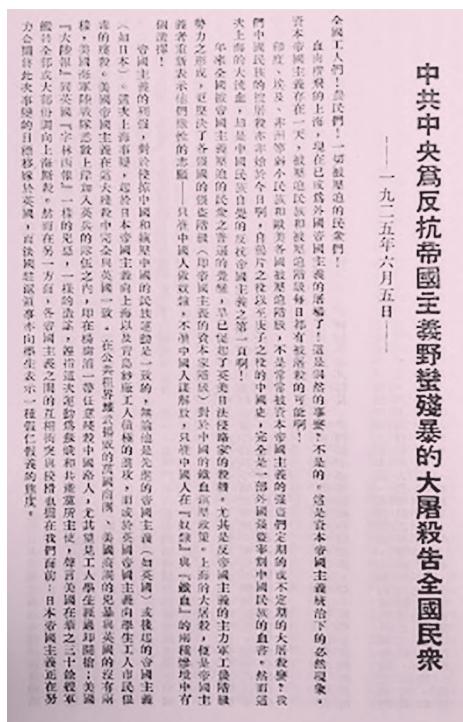
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湖北的中共组织积极声援冯玉祥和孙中山的主张，开展了以工人阶级为骨干的国民会议促成活动。12月21日，国民会议湖北促成会在汉口小关帝庙召开，董必武出席并直接领导了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对戳穿段祺瑞“善后会议”阴谋，揭露军



阅反动面目，传播革命主张，引导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国共两党人化悲愤为力量，联合发起了以追悼孙先生为中心的，广泛的爱国反帝反封建政治宣传。5月，帝国主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惨案一出，董必武就接到上级组织的指示，急忙赶回武汉，领导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组织各群众团体成立了中国工人罢工后援会，不仅发起对上海工人的募捐援助活动，而且号召全省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从6月2日起，武汉的工人、商人、学生相继以罢工、罢市、罢学和进行示威游行的方式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各级学校组织演讲团队深入到民众中，宣讲五卅惨案的经过，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在游行中，示威群众更是提出“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等响亮的口号。

面对武汉全社会各阶层联合参与的斗争，湖北军阀萧耀南用强令武汉各校提前放假的方式进行破坏。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将计就计，马上派在武汉三镇读书的各县青年学生中的党团员提前返回各县活动，开展反帝宣传运动，在广大湖北农村点燃起反帝之火。一时间，湖北各地都在开展反帝爱国运动。董必武还亲自到黄安召开了全县党团员代表会议，出版了《黄安青年》等刊物，夺得了黄安县教育局的领导权；麻城的共产党员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声援各地工人反帝斗争；广济的学生纷纷退学来反抗帝国主义的暴行；郧县组建了沪案后



中共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

援团，积极募捐援助上海工人……革命的火焰已经在湖北各地燃起，更有愈燃愈烈之势。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确定中共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董必武领导的湖北党团组织在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立即行动起来了。在深思熟虑之后，董必武以个人名义写下了“报告湖北省代表大会进行情形”和“在湖北设立政治委员会湖北分会”两个报告，受到国民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采纳。

不仅如此，在当时，湖北全省共拥有200多万农协会员，董必武敏锐地看到了这股强大的革命力量，于是发动湖北各地的农协会员广泛开展农民运动，与邻省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交相辉映。1926年12月，毛泽东来到武汉筹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董必武给予了大力支持。董必武不仅专门为讲习所拨发经费16000元，还将前“湖北省高级商业学校”作为讲习所地址，亲自选送学员进入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应邀到农讲所做专题报告。农讲所为湖北乃至全国的农民运动培养了众多农运人才，营造了强大的革命声势，为两湖地区迎接大革命高潮到来起到了重要作用。

可是，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湖北各地的土豪劣绅们对农会干部进行了越来越残忍的报复，各县连续发生了多起残杀农会干部的事件。董必武在得知“阳新惨案”情况后，怒不可遏，立即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中召开紧急会议，拟定了处理惨案的紧急办法和根本办法，决定派兵镇压土豪劣绅暴乱。在他的主持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制订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这两个条例的颁布，为惩治土豪劣绅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稳定湖北革命基础提供了保障，使得革命的星火在湖北各地生生不息，最后化作燎原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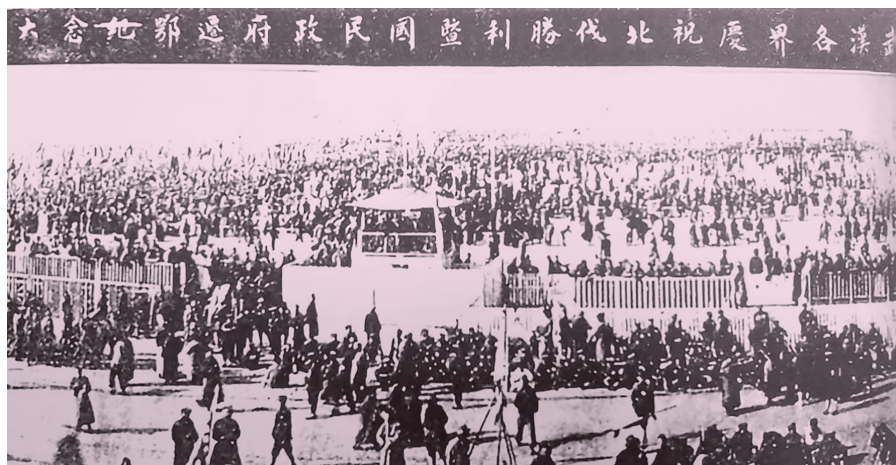
董必武首次提出“打倒蒋介石”

1926年10月10日，伴随着枪炮声和北伐军将士在武昌城头的欢呼声，

武汉三镇完全被北伐军攻占。随着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国民革命的重心从珠江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国民政府迁都一事如约提上日程。湖北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战略位置极佳，武汉三镇有“驾乎津门，直逼沪上”之誉，武昌是“辛亥首义”之地，诸多因素叠加，致使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作出了迁都武汉的决定。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正式迁都武汉，历史进入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

在欣欣向荣的革命形势中，却有一股逆流在暗中涌动。随着北伐战争胜利，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政治野心和军事势力急剧膨胀，他一反之前积极支持迁都武汉的态度，拒不接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还在南昌纠集一些国民党中央要员，隐隐有和武汉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之势。为了维护革命统一战线，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领导人的董必武与蒋介石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早在蒋介石热切推动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之时，董必武就以敏锐的政治嗅觉觉察出蒋介石对迁都武汉“过分热情”背后包藏的祸心了。在1926年11月7日，董必武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政治短文，指出：“革命前途，总算可以乐观。然而民众势力得膨胀，毕竟跟不上军事势力得发展——这里面潜伏着不少的危机。”董必武这里隐晦地用了“军事势力”一词，实际指的就是蒋介石，而“危机”之一，



1927年1月1日，武汉各界庆祝北伐胜利暨国民政府迁汉，并举行阅兵式

就是“迁都”这个问题。“迁都”一事虽是蒋介石最早提出，他也是最大推动者，但蒋介石其人本就是一个惯于为了自身利益出尔反尔的政客，他今日可以为了自身利益积极推动迁都，明日也会消极阻挠迁都。董必武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在12月董必武与詹大悲前往江西庐山参加会议时，曾在九江见了蒋介石，蒋对董、詹二人特别“热情”，一改之前不希望董必武参加湖北政府的消极态度，极力邀请二人参加他组织的湖北政务委员会，还赠送二人每人大洋1000元，企图用高官厚禄拉拢腐蚀这两位湖北政坛中的领军人物。董必武对官职和赠金一一谢绝，并提出要求，希望蒋尽快前往武汉坐镇，蒋见状一下就沉默了起来，只是敷衍地“嗯嗯”两声，便不再回复，董、詹二人只能无功而返。

果然，不出董必武所料，张静江、谭延闿等抵达南昌后，本来只准备停留三四天便西上武汉，但蒋介石却在1927年1月3日突然召开临时会议，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便利起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3月1日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驻在地后，再行迁移”。7日，蒋介石又开会决定：“取消中央联席会议”，“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蒋介石的这些举动，与他之前积极催促迁都武汉截然相反，明目张胆地挑起“迁都”之争，公然与武汉中央联席会议相对抗。蒋介石的这些政治伎俩，毫无疑问地遭到董必武在内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强烈反对。

1月7日，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董必武在开幕式上强调：“我们大会的责任，就是讨论如何使湖北成为革命的湖北。”针对蒋介石提出的更改“建都”武汉，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反动行径，董必武又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在湖北建立民主政治，反对个人独裁！”董必武的讲话，审时度势，充分根据蒋介石越来越明目张胆的反革命倾向，号召全省党员做好与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势力相斗争的准备。

1月11日，蒋介石为了破坏国民党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同时了解武汉的政治态势，从九江乘船抵达武汉。蒋到达武汉后，马不停蹄地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他表面上称赞湖北人民的英勇斗争，但更多地是在指责“工人举动幼稚，没有知识，毛病多”，并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发生激烈冲突。



对于董必武，蒋介石到武汉后，继续使用他“糖衣炮弹”的一贯伎俩，仍寄希望于通过拉拢腐蚀将其拉入自己阵营中，以达到控制湖北的目的。

蒋停留武汉期间，曾派他的副官带着一封信和一张支票来到董必武的住处求见董必武，董必武看过信后，轻蔑一笑，对那副官说：“总司令的信我收下了，至于支票，我断不能要，代我谢谢蒋总司令。”那副官不肯走，非让董必武收下支票并写回函，董必武心头火起，强压怒火道：“我的工作很忙，马上要去开会，没有时间写回信。请你回去报告蒋总司令，只要总司令革命，我董必武是拥护的；我为的是革命，不是个人名利。”说罢拂袖而去。待蒋的副官走后，董必武拍案而起，对身边的同志说道：“简直是个流氓，他怎配领导中国革命！”

1月13日，蒋介石来到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的会场讲话，董必武早就得到了消息，他一边在蒋介石讲话前发出“欢迎中央政府迁鄂”的通电，一边在蒋介石面对全体代表讲话中企图“内定”省执行委员会人选时，当场拒绝蒋介石的人选任命，毫不让步地回应道：“湖北执委人选已向在汉的中央执委会报告，不可变动。”使得蒋介石大为尴尬，愈来愈将董必武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更欲除之而后快”。

蒋介石见自己的阴谋诡计在董必武面前连连受挫，并且还拒绝了自己的收买，心中大为光火，他面露杀意地对副官骂道：“董必武这个共产党，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蒋介石在武汉待了一个星期，自己原先设想的目的是一个都没达到，只得于1月18日灰溜溜地离去。

蒋介石返回南昌后，依旧一意孤行，不愿迁都武汉。董必武见此情景，决定采取“敲山震虎”的方法，将斗争的首要目标对准国民党右派人士代表张静江，以威慑蒋介石。在湖北省党员大会上，他响亮地提出“反对军事独裁”、“打倒张静江”等口号，同时发起了“提高党权运动”、“打倒昏庸老朽分子”运动，一时间革命舆论铺天盖地，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不满之声如海浪般一浪高过一浪。但蒋介石依然顽固不化，他于2月21日在南昌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讲，公开攻击共产党，声称共产党“有许多对于国民党加一种压迫”“我要纠正他们”，不仅大有

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分裂到底之意，而且对共产党也流露出杀机。

看罢蒋介石的讲话，董必武心中产生出一股忧虑和愤怒，他于2月19日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武汉三镇支部的联席会议，要求开展反对独裁运动；两天后，他又在中央临时会议上，提出开展“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拥护三大政策”等活动，来应对蒋介石与革命越走越远的倾向。此后，董必武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投入了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维护革命统一战线的斗争。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正式召开。这个历时一周的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和《中央执委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案》，选举出了新的委员和部长，从制度设计和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诸多方面限制蒋介石的权力，抑制他的个人独裁。二届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一次胜利，从国民党右派手里夺回了部分党权和政权。但羽翼已丰的蒋介石仍然掌握着军权，并保留了相当的政治实力，仅凭纸上的宣言决议，在枪杆子面前自然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就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蒋介石加快了反共步伐，最终升级为血腥屠杀。3月6日，蒋指使手下反动军官倪弼在江西赣州残忍地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15日，正值全会召开之时，他派遣手下军人和帮会成员等，用大洋收买地痞流氓，将九江的国民党党部等机关尽皆捣毁，查封了多家报刊；3月23日，其手下杨虎又策划捣毁了安徽国民党省党部等一系列机关，打死打伤多人。真可谓“到一处、毁一处、杀一处”，一路挥舞屠刀杀向宁、沪。

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董必武在3月12日武汉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大会上，宣读了他起草的“请蒋总司令明白表示态度”公开信，直接揭露蒋介石“违背总理联共政策”的真实面目。3月23日，当蒋介石在江西各地制造反革命事件的消息传到武汉，董必武义愤填膺，他公开向国民党中央发电称要“严正要求钧会执行最高权威，先免蒋总司令本兼各职，再行议处，以儆反侧。”27日，他借《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评，首次喊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从公开呼吁到严正声讨，



董必武一步一步地坚定讨蒋决心，昭示了他与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坚定态度。

4月4日，为讨蒋做好准备，董必武在国民党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进行了以《我们目前的两大斗争》为题的重要演讲，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国民党中有一些人向帝国主义进行妥协退让，而蒋介石就是这些妥协分子的代表”的观点。这个演讲既是董必武对于时局的看法，更是他对于蒋介石分裂统一战线的讨伐宣言。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13日晚，正在出席一个会议中的董必武骤然收到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后，当即召开湖北省党部会议，决定发出讨蒋通电，在13日至22日的不到10天里，董必武连发数封电报，号召国民党中央和社会各界共同制裁蒋介石，在22日的通电里，他还与同在武汉的39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称“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

在董必武的不懈努力之下，“讨蒋风暴”席卷整个武汉和湖北。虽然出兵东征讨蒋最终未能实现，国共合作也随着汪精卫宣布“分共”后正式破裂，革命陷入低谷，但董必武和他的战友们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之后，又投入了新的斗争。

（余程春）

反帝废约怒涛澎湃

武汉成立反帝大联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欺凌，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据不完全统计，从 1840 年到 1949 年近 110 年的时间里，西方列强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 1100 多项条约、协定、章程或换文等，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欺凌，中国官民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和反抗，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其中的一种斗争形式与主张。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响亮地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废约成为反帝斗争的重要象征。1922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主张，第一次以政党名义发表废约主张。1926 年 3 月，中共三大提出“取消帝国主义的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1924 年 5 月 31 日，北洋政府与苏联政府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规定：帝俄政府与中国政府所订一切公约、条约等概行废止，两国重订平等条约；俄国自帝俄政府以来凡与第三者所订之一切条约、协定等，其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苏联政府同意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境内之一切租界、租借地等特权；苏联政府同意放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苏联政府同意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等等。中俄协定的签订，开始瓦解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激励和鼓舞中国人民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斗争。以此为起点，从北京开始，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俄协定签订后，北京政府国会议员、湖北人胡鄂公等 181 人联名致电苏俄政府和人民，庆祝中俄恢复邦交，并认为此举是反帝的胜利。6 月 17 日，胡鄂公等 135 名议员再次联名发表《维持中俄协定宣言》，申言此次协定之订立，是中俄两国人民反抗列强之结果，协定规定中东铁路由中国赎回，自不容第三国无理干涉。7 月 13 日下午，北京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大会在北京中央公园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学生联合会、《政治生活》周刊社、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 50 多个团体代表，还有胡鄂公等国会议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共计 230 余人，胡鄂公担任主席。大会通过了《反帝国主义大联盟宣言》，宣布联盟的宗旨是：（一）扑灭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废除压迫中国弱小民族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二）联络一切愿意参加反帝国主义工作的同志；（三）只从事反帝国主义事业，其他任何事物概不与闻；（四）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汉奸。

同年 8 月 23 日，湖北共产党、青年团组织的重要成员董必武、钱介磐、陈潭秋、刘昌群、任开国和国民党左派张朗轩等人，聚集在武昌中华大学，与校长陈时开会协商，决定以湖北教育界的名义，发起召开武汉反帝国主义大联盟成立大会。会议议决联络武汉所有人民团体一致参加，同北京、上海等地人民团体遥相呼应，开展反帝废约运动。会议决定推选陈时为武汉反帝大联盟筹备会委员长，陈潭秋、钱介磐等人为筹备会委员，并决定当月 30 号邀请武汉新闻界在汉口堤口下段保安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反帝大联盟筹备会的结果。随后，一份份刊登着《武汉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宣言》的《江声日刊》传遍大街小巷。

9 月 3 日，武汉学生联合会、湖北平民教育会、湖北职业教育会等 40 多个团体的代表 200 余人齐聚武昌教育会。在董必武的主持之下，正式成立武汉反帝大联盟。会上，陈时首先报告会议宗旨及反帝大联盟筹备经过。接着，推选大会主席及记录。当场公推董必武为临时主席，钱介磐为记录。大会宣布在两天后召开武汉反帝大联盟代表大会。大会最后向全国发出了通电，通电中说：“我国自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受国际帝国主义者之宰割，国土日蹙，国命日危，瞻念前途，不寒而栗……武汉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

盟业于九月三日正式成立，愿与国内各地同一宗旨之联盟及世界被压迫之弱小民族结成联合战线，消灭国际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政策，共谋中华民族解放，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

9月5日，武汉反帝大联盟召开代表大会。大会选举陈时、董必武、陈潭秋、刘昌群等15人为执行委员。董必武主持了会议，提出：“两天后即9月7日，《辛丑条约》的第23年纪念日，那天之后我国彻底陷入了帝国主义支配之深渊，实乃九七国耻也。我觉得有必要在此日举行九七国耻纪念会，不仅宣传武汉反帝联盟之功效，亦是促国民反帝废约之决心。”

9月7日，武昌阅马场，人头攒动。九七国耻纪念大会如期召开，50余团体数千人齐聚一起。与会者手持白色小旗，上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大会公推董必武为主席，学生代表许鸿为副主席。

董必武上台演讲：“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之不平等条约，有如封豕长蛇，一日不废除，我国则一日不能伸张，而我国人民无享平等幸福之一日。故召武汉民众齐同心协力废除种种不平等之条约及谋人类之生存，谋国际外交之平等！”随后，共产党员许鸿代表武汉学联作辛丑条约签订及其对中国影响的报告，其他13个团体的代表相继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最后大会散发《九七告国民书》，指出：“消灭国耻的方法，只有赶快团结起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会后，民众自发性地分途向各处游行，沿途散发传单，反帝废约情绪格外激烈。

武汉民众的爱国运动，很快传到在直隶指挥作战的吴佩孚耳中。9月28日，吴佩孚给湖北督军萧耀南发了一封电报：“我听闻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搞了一个反帝大联盟，甚是喧嚣，严重违反了治安警察条例，应取缔。”萧耀南收到吴佩孚的消息，立刻派出军警，驱散聚众宣传游行，并宣布武汉反帝大联盟为非法组织。

军阀的压制，并不能消灭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民众开展反帝废约运动的决心与气势。在中共武昌地委和汉口地委的领导下，依然以武汉反帝大联盟的名头艰难地坚持着联合社会各界开展反帝废约运动。



武汉反帝大联盟是一个进步的群众性联合组织，参加的成员比较复杂。共产党员参与了联盟的指导工作，使得它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它公开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突破了以往湖北民众运动单一针对某帝国主义的局限。董必武和陈潭秋还多次提出收回汉口英租界，得到武汉各民众团体的热烈响应。在反帝旗帜下，武汉反帝大联盟把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团体尤其是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联系在一起，扩大了革命的统一战线。

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促成运动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发表了反对军阀割据、要求全国和平统一的政治主张，并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时局宣言》（即《北上宣言》），主张迅速召集一个有各界人民团体和反对曹锟、吴佩孚的各军队及各政党参加的国民会议，以谋中国的统一与建设；在国民会议召开之前，拟先召集一个预备会议。以此为起点，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促成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中国共产党十分赞同孙中山的主张，大力支持孙中山北上。中共中央通告全党，指示各地方组织联络当地人民团体，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开展反军阀的示威运动。中共中央和团中央还要求各地党、团组织发动民众，反对皖系军阀段祺瑞为对抗国民会议而召开的“善后会议”，发展国民会议促成运动。

收到中央指示后，董必武、陈潭秋等人迅即联系中共武汉地委的同志，商议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会议确定了3项具体实施方法：（一）由团武昌地委领导武汉学联发出快邮代电及通电，并通过学联在国民会议促成会中作中坚的团体，来完成我们的政治主张；（二）所有人民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须以所在团体名义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三）凡是会写文章的同志都派去书写指定内容，即关于国民会议的宣传文章，然后在武汉报纸上，或者是10月新创刊的《武汉评论》中发表，进行大规模宣传。

武汉学生联合会负责人许鸿立即带领武汉学生，给全国主要的报馆拍

发电报，全国通电，呼吁“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治安警察条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之自由”“废除罢工刑律，制定保护农工利益之法律”“解除新旧一切国会，惩办穷兵黷武之军阀”“规定最高限度租额”“农工普及教育”“教育机关独立，不得受政治军事的影响和摧残”“实行义务教育，使全国儿童有受平等教育之机会，男女教育平等”等等。

鉴于武汉地区革命形势高涨，共产党人领导的国民党湖北临时省党部决定将党部向社会公开，把正在开展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结合起来，同步进行。11月30日，武昌国民外交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发起国民会议促成会。12月7日，武汉三镇各团体代表39人在汉口召开会议，决定筹备成立湖北国民会议促成会。12月8日，湖北的国共两党组织以武汉学联名义致电孙中山、段祺瑞，强烈反对善后会议，要求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

12月14日，汉口堤口下段保安会热闹非凡。湖北各工会、农会、商会、学生联合会、教职工会、新闻记者协会等数十个团体代表聚集在此，正式召开国民会议湖北促成会成立大会。

大会由共产党员陈潭秋、许鸿、何恐、许之桢、向忠发和国民党左派张国恩等分别代表武汉反帝大联盟、武汉学联、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汉冶萍总工会、轮驳工会、湖北全省自治筹备处等团体主持。会议过程中，室外天凝地闭，屋内同仇敌忾、温暖如春。

大会推举武昌首义后国民自办的第一家革命报纸——《大汉报》社长胡石庵为主席，武汉学生联合会代表许鸿以及汉口《时事白话报》代表马逐尘为副主席。胡石庵恰逢身体抱恙而临时请假，由许鸿报告开会宗旨。

许鸿概述了中国所受的种种痛苦，提出国人若想要解除痛苦、免去迫害，则惟有依据国共两党国民革命的主张，才能有胜利的把握。他比较了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与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的区别，明确表示：“须知孙先生所主张之国民会议预备会为职业团体之人民代表，乃真能代表我们人民利益者。至善后会议，乃各省军阀官僚代表所组成，其代表反动势力之利益而与国民利益冲突，乃显然之事。故我们国民为自身利益计，有赞助孙先生所主张，



国民会议预备会及国民会议之必要。”

大会讨论通过了国民会议湖北促成会组织大纲，并决定对外发出宣言通电。随后，推举胡石庵、陈潭秋、许鸿、汪松如、梅电龙五人为修改通电委员，各加入团体的代表经过审查，认为合格，才能出席下次开会。

12月21日，在董必武和陈潭秋的直接领导下，国民会议湖北促成会召开全体代表大会。120多个团体，230多名代表踏着前日积雪，联袂而来。会议选举钱介磐、许鸿、许之桢、何恐、郭树勋等15人为执行委员。许鸿、郭树勋、何恐、许之桢等被分别选举为总务、文书、交际、调查等各股主任。同时推举共产党员、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秘书何恐为出席次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12月24日、25日两天，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在《江声日报》上发表对于国民会议的10项全面主张：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及治外法权，以增国家地位；否认帝国主义者助长中国内乱的一切借款，以减轻人民外债负担；收回海关权，把协定制改为自定制，并裁撤厘金，以纾商困；无条件收回庚子赔款，作为教育基金及办理平民教育之用；废止治安警察法及惩治盗匪条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罢工等自由权；改变军制，废除巡阅督军等职，改雇军队为工兵制；规定最高限度之租额，取消附加税及各种陋规以减轻农民困苦；制定劳工保护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例假及纪念日停工照常发资，注意工人教育及卫生，规定童工、女工之特别待遇；废止日用必需品（如盐米等）之一切杂税，以充裕平民生计；妇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社会地位上均应与男子享平等权利。这10项主张，鲜明地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实际上成为当时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政治纲领，反映了湖北广大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尤其是“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及治外法权”主张的提出，是武汉人民要求收回英租界的先声。

为加强对湖北国民会议促成运动的组织领导，中共武汉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国民会议湖北促成会中建立了党团组织，并派出部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学生赴往湖北省各地，发表反帝废约的宣言、反帝反封建的纲领。

在共产党人的组织推动下，黄冈、黄梅、大冶、应城等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也如雨后春笋一般相继成立。

由于反动军阀拥有强大武装力量，国民会议促成运动难以取得成功，也不可能促成人民政权成立，但这次运动揭露了反动军阀借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嘴脸，宣传了共产党反帝反封建主张和孙中山革命的民权主义思想，唤醒了广大群众的民主诉求，推动了湖北武汉地区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

武汉学界声援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爱国学生在上海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日资纱厂中国工人顾正红、抓捕学生的残暴行径，遭到租界巡捕的大肆拘捕。民众群情激愤之下，纷纷聚集到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捕头爱伏生竟调集巡捕，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了，并很快席卷全国。运动中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政治口号，使全国反帝废约的爱国运动不断走向高潮。正如瞿秋白1925年8月在《向导》周报撰文指出的：“五卅以后，中国的历史已经开始一个新时期——实行国民革命时期。”

5月31日，汉口《江声日报》首先刊登了全国学联有关五卅惨案的简略电文。6月1日，国民党湖北临时省党部接到上海执行部的电报，当晚即发出紧急通告，令所属各级党部一致动员，造成声势浩大的援助沪案运动。省党部连夜成立了五卅惨案指挥部，在为数不多的指挥部领导成员中，有2名共产党员、4名共青团员。中共武汉党组织就这样点燃了武汉反帝废约运动的烈火，并牢牢地掌握了斗争的领导权。

6月1日至2日，武汉学联召开了30余校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议定6项援助沪案方法，决定各校自3日起一律罢课，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联络工商界一起行动。3日，武昌高师、中华大学等校学生不顾军警阻挠，



进行游行。同时，每校组织 20 个演讲团，在警钟楼、阅马场、抱冰场等地及各街市讲演五卅惨案之经过。据参与者伍修权回忆，演讲团“每至一处，便先用歌声和口号来吸引群众，听众有时多至几百人”，有的听了悲愤万分甚至流泪，有的听了摩拳擦掌。

6 月 4 日，武昌大中学校 15000 余人在阅马场集合，中华大学党支部书记、武汉学联负责人胡彦彬任大会主席，号召青年学生应担起“警告同胞，使之痛苦；唤醒各界，使有觉悟”的责任。会上，共产党员蔡以忱等人愤慨热烈的演讲让听众无不拍手称快。9 日，武汉学界举行声援沪案大游行，参与者有 72 所学校、9 个教育团体的职员和学生，共计 45000 余人。各校、团体推举代表见萧耀南，要求对开枪杀死中国人的巡捕及捕头处以死刑，对死伤者予以厚恤。

赤忱爱国的武汉青年学生，在声援沪案斗争中极其注意发动民众。6 月上旬的武汉，书写“抵制仇货”“经济绝交”“封锁租界”“收回海关租界”等口号的白旗星罗密布；上海工部枪杀学生及日本纱厂工人罢工被杀惨状之传单、宣传画漫天遍地；“快醒醒！快醒醒！日本人同英国人打中国人！听哪！快些起来，组织团体与英日宣战！快些团结起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响彻整个武汉三镇。

广泛深入的宣传，激起了民众的愤怒，激发了他们推翻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决心，使武汉的反帝废约运动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支持。武汉地区的工人、民族资产阶级也纷纷投入反帝废约斗争风暴之中。

为了使分散的罢课、罢工活动成为大规模联合行动，中共汉口、武昌地委决定组织全市性大罢工，同时派各县在武汉读书的学生回县“点火”，以此推动整个湖北省城乡的反帝废约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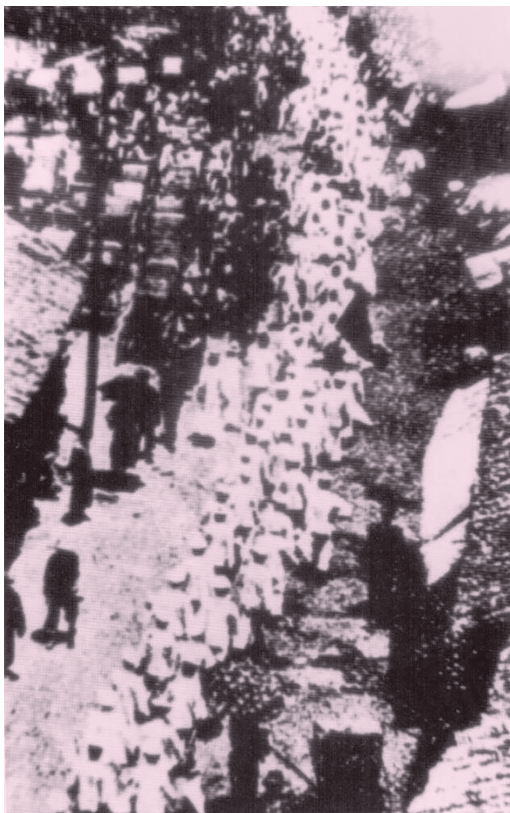
反动军阀、湖北省长萧耀南对两年多之前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心有余悸，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便污蔑武汉学联成员已经“赤化”，是过激党，密令缉拿。同时禁止学联开会，扣留他们往来的电报及信件，派遣军队暗中监督学联骨干，禁止学生进城，禁止武汉各报刊登他们的一切消息。

与此同时，武汉民众的反帝运动也引起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仇视与恐惧。

驻汉英、日领事特召集驻汉各国领事开秘密会议，讨论如何压制武汉日益高涨的民气，平息武汉人民的反帝废约怒潮。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制造了屠杀武汉工人的六一一惨案。

事件发生之后，武汉民众更加群情激愤。12日，武汉各团体召开联席会，武汉各界工人、商人相继罢工、罢市，学生继续罢课。13日，国民党湖北省和汉口特别市两临时党部主持召开武汉各团体人民大会，成立湖北各法团外交后援会，作为领导湖北人民反帝废约斗争的领导机关。14日，武汉工商学界青年计15万人上街游行，高呼“打倒英帝国强盗，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15日，汉口《和文日报》《日日新闻》《楚报》社工人以及安利安、亚细亚洋行工人、职员一律罢工。16日起，武昌烟帮、山货帮，水果帮不买卖英货、日货，不用英、日货币。17日，武汉学界后援会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惩办英国凶手和收回汉口英租界。

7月13日，驻沪英领事派巡洋舰“斯巴希号”，载海军陆战队350人，急驶汉口。驻沪日本领事派旗舰“对马号”载陆战队200多人赴汉口。萧耀南则以顺从民意幌子，假惺惺地派一名普通外交人员向英国驻汉领事交涉，实则助纣为虐，想将这场反帝废约运动拖入政府外交谈判的死胡同。7月22日至8月22日，派出的交涉人员与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柏达进行了8次谈判。最后一次，因柏达公开羞辱外交人员而破裂。



五卅运动中不畏骄阳的武汉民众游行队伍

武汉人民怒不可遏，新一轮反帝废约运动再次兴起。武汉民众多次到省督署请愿，督促政府交涉。同时，他们并没有中止自身的反抗。湖北学界外交后援会、湖北省教育会等众多团体纷纷提出汉案交涉条件，其中大都涉及收回汉口英租界。“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开始深入人心，是汉案斗争中一个极大的突破。

9月初，中共武汉党组织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决定在九七国耻纪念日前后领导群众开展“反帝运动周”活动。萧耀南在与柏达的谈判破裂，受到各地舆论谴责之后，授意由部分旧军官组成的“湖北对英同志会”，发起一次“绅士式的水陆大游行”，故作爱国姿态。中共武汉党组织决定将计就计，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与汉口特别市党部命所属团体一致参加，并派人控制了游行联合指挥部宣传股的领导工作。

9月7日，全称为“国民外交大会”的集会游行活动分别在武昌、汉口、汉阳及水上举行。武昌陆路方面推董必武、蔡以忱等7人为主席，汉口方面推吴德峰等7人为主席。武汉三镇共有20多万人参加“水陆大游行”，抗议英国暴行，抗议反动政府，要求收回英租界。

武汉人民的抗争，迫使英国驻汉口总领事重回谈判桌。10月3日，英国政府决定让柏达离职回国。至此，六一一惨案告一段落。

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说：“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一泻汪洋，于是构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邓中夏所说充分肯定了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这个意义在武汉也尤为明显。1925年武汉人民响应五卅运动而开展的反帝爱国斗争，整整持续了半年之久，显示了武汉人民不可欺凌的英勇气概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坚定决心，它大大提高了武汉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为武汉大革命的蓬勃发展，为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准备了群众基础。

（刘天雨）

工潮再起

汉口人力车夫事件

京汉铁路大罢工高潮过后，武汉工人运动虽转入低谷，但仍不时出现斗争浪潮。潮起潮落间，有一支力量格外引人注目，它掀起二七风暴后武汉第一次罢工狂澜，激发全市工人同仇敌忾向帝国主义者宣战的斗志，这就是汉口人力车工人。

人力车在现代武汉已难以见到，但它曾是近代武汉城市流动不息的街景。为了养家糊口，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力车夫不得不起早贪黑，出卖苦力。每天穿梭于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人力车夫经常目睹达官贵人道遥糜烂、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劳命奔波、跑断双腿的他们却食不果腹，甚至还饱受压榨欺凌，仅在汉口租界发生的人力车夫事件就有吴一狗案、龚银保案等。可以说，武汉大街小巷洒满了人力车夫的血泪。

1925年2月17日，人力车夫徐典拉车经过英租界鄱阳街时，忽然一辆汽车急驶而来，他忙将车子

徐典案的真相

（汉口通信）

若愚

（一）徐案由来 二月十七日，汉口租界车夫徐典，拉车经过鄱阳街，因为避让汽车，误撞英租界巡捕房第一百三十号巡捕，那巡捕登时大发雷霆，对徐典乱打，最后一脚，将徐典踢倒，再加上一脚，以洩其愤，而徐典使人事不省了！徐典受创以后，抬到天主堂医院，不到一刻，大呼数声死了！国际帝国主义走狗，直接是打死车夫徐典，间接是藐视中国国民，特别是残害中国劳动阶级。

（二）英帝国主义之对付方法 英巡捕房得到了这个消息，急忙把那巡捕调回去，不许他外出，以图抵赖，一方则将徐典的尸首运出，打算悄悄的埋掉。不料事不凑巧，单单被几个车夫看见，大家不依，他只得赴地方廳去報驗。檢察官檢驗的結果，在左脅處出致命傷，該傷顯係巡捕皮鞋底上的鐵釘踢，當要求巡捕房調出巡捕，由證人石大貞（車夫）指認，巡捕房第一次調出數名，第二次調出數名，大貞認不出來，第三便調出二十多名出來，大貞一眼看見兇手，遂指定一百三十號巡捕，並出具證人甘結，確係那巡捕打死。檢察官當時要求引渡，英國巡捕不答應，後來聽說車夫要罷工援助，到十八日才承認引渡；但另一方面

1925年4月，《中国工人》第四期刊发的《徐典案的真相》

往旁避让，结果不小心撞到英租界巡捕杨则尔。汉口租界的治安由巡捕房管理，巡捕中既有印度人、安南人，也有中国人。被撞的这个巡捕虽为中国人，但受雇于英租界当局，自视高人一等，养成了无比嚣张的气焰，在外国主子面前是奴才、打手，在自己同胞面前又是凶神恶煞。只见他顿时大发雷霆，对徐典猛踢乱打，无论徐典如何解释误撞的原因并赔礼道歉，杨则尔仍拳脚相向，以致徐典口吐鲜血瘫倒在地，不省人事。另一车夫石大贞在旁目睹了这令人悲愤的一幕。

英租界巡捕房虽然平日里飞扬跋扈，作威作福，但面对人命关天的惨案发生，还是惶惶不安，惟恐事情一发不可收拾，急命杨则尔回巡捕房，严禁外出，又赶紧将奄奄一息的徐典运往医院救治。终因伤势过重，不及片刻，年仅 29 岁的徐典便含冤死去。

夏口检察厅闻讯，随即派检察官前往勘验、查证。面对淋漓的鲜血，确凿的证据，巡捕房竟然矢口否认巡捕踢死徐典，妄图混淆事实，推卸责任。检察官在徐典尸身左肋发现致命伤，伤口入肉较深，皮开肉绽，不堪入目，很明显乃巡捕鞋底上的铁钉所踢。铁证如山，巡捕房再也无法自圆其说，只好让巡捕站出来，由现场目击证人车夫石大贞指认。石大贞一眼便认出凶手杨则尔。此时的杨则尔缩头缩脑，眼光闪躲，先前那大打出手、不可一世的狂态全然了无踪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虽有巡捕房的庇护，但邪恶毕竟战胜不了正义，行恶者终究逃脱不了法网。案件水落石出，检察官当即主张将凶犯交中国法庭审判。巡捕房应允于次日引渡，并将徐典尸体偷偷装棺封钉，企图掩盖罪证。

然而，尽管人力车夫在当时社会地位低下，但他们并非全无反抗之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下，汉口人力车工人是武汉最早觉醒的劳工群体，也是最早团结起来反抗压迫的劳工群体。早在 1921 年 12 月，武汉第一个工会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就宣告成立。在近代武汉历次罢工斗争中，人力车工人始终以高昂的斗志、无畏的勇气站在最前列，谱写了一曲众志成城、不屈不挠的慷慨壮歌，成为武汉工人运动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有生力量。

徐典的惨死，激起汉口全体人力车工人的愤怒。在徐典棺木旁，“数千车夫守尸痛哭”，气氛无比悲怆，场面极其感人。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些平日坚强如钢，忍辱负重，即使遇到再大的苦痛、非难乃至歧视也不轻洒一滴泪的铮铮汉子们，此时此刻，他们的眼泪是那样不可抑制，又是那样感人至深。

为了维护车夫们的人格尊严和生存权利，汉口人力车夫工会当即向英国领事馆提出严正抗议，并发布宣言，呼吁各界同胞和各业工友“本人道正义及被压迫阶级的同情，予以有力的援助”。武汉社会各界反响强烈，纷纷抗议英殖民者的暴行。在中共湖北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人力车夫工会决定向官厅请愿。1925年3月3日，12名车夫代表请愿途经英租界时，又被巡捕房抓走6人。车夫们义愤填膺，愤而罢工，并提出惩办凶手、抚恤死者家属、不许巡捕打车夫、巡捕房对车夫不得任意处罚等5项条件，表示如不满足，誓将罢工进行到底。

工运斗争如火如荼地迅速展开，形成势不可当的反帝怒潮。为阻止事态蔓延，英租界当局召集英商团武装控制与华界相邻的要道，实施紧急警戒，并将罢工首领3人逮捕。然而恫吓阻挡不了奔涌而来的罢工大潮，越来越多的人力车工人加入罢工行列，誓死捍卫劳工尊严。风潮所及，武汉学生联合会、汉阳钢铁厂工会以及湖北外交委员会等起而响应，发表反帝宣言，要求收回英租界，声援车夫抗争之举。

历经无数次斗争的洗礼，汉口人力车工人已不再任人欺凌宰割，他们挺直了腰杆，不为强权所迫，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怒吼。汉口英国领事馆眼见团结起来的人力车工人不可轻侮，经“华官交涉，承认惩凶”，付给徐典家属抚恤金300元，赔偿罢工损失600元，释放被捕工人代表。3月5日，取得了完全胜利的汉口人力车工人宣告复业。

汉口人力车工人的罢工，是二七风暴后武汉工人取得的第一个影响较大的胜利。这次斗争运动历时近20天，显示了人力车工人的力量，捍卫了人力车工人的尊严，保障了人力车工人的生存权，在武汉近代工运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六一一惨案

5月，是一年当中重要纪念日较为集中的一个月份，如众所周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等，因而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红五月”之称。在这个月，自始至终都洋溢着澎湃的激情，昂扬着革命的斗志。当中国民众的情绪因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行径而义愤起来，就如同在辽阔干旱的草原上撒下一丁点火星，一经点燃，顿成燎原之势！

1925年5月，五卅运动如狂飙突进，从上海迅速席卷全国各地。湖北和武汉的国共两党组织下达动员令，发动社会各界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五四运动“湖北之发起响应者”的中华大学又是一马当先，第一个组织沪案后援会，号召武汉各校学生一律罢课。武汉学生联合会派人到各商团、工团游说，请其同时罢工、罢市，并通电全国学联和上海学联进行声援。一场工商学界联合反帝洪流开始涌动江城。

当然，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武汉工人更是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斗争行列。“有许多工人，都抛弃自己的工作，来做这种运动”。6月3日，汉口英美烟草公司的中国工人率先举行罢工。各工会印发传单，宣传并催促他们的领导立即通告一致罢工。6月7日，素受帝国主义经济侵害的武昌商会决定：“7日起与英日经济断交。”8日，武昌商会又组织五六千人举行示威游行。同日，汉口工界各工团召开联席会，为沪案后援，并拟定于6月13日举行大示威运动，14日举行罢工。当时估计罢工人数将达到5万余人。此消息一经传出，工人群众便摩拳擦掌，进入战斗准备。

在日益高涨的反帝浪潮中，基于共同的民族情感，众多的武汉商家也参加进来。6月8日，武昌商界组织了数千人参加的商人游行示威，规模之大，盛况空前。武昌商会会长手举大旗率队前进，行程30余里。6月9日，武汉72所学校和工商界9个团体数万名群众举行联合大游行，向湖北督军署提出包括严惩凶手、收回英租界在内的7项对英交涉条件。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帝风暴，英、日帝国主义极度仇视与恐惧。他们召开各国驻汉领事秘密会议，讨论怎样压制武汉激昂的民气，最后决定

各国水兵做好登陆准备，义勇队全部出动，以制止武汉民众的爱国运动。一时之间，武汉的局势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连空气中都似乎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味。

6月10日下午4时多，英国太古轮船公司货船在汉口一码头卸货时，有一个叫余金山的搬运工人扛着一袋糖，未经过磅手续，管磅员陈兴存便故意寻衅，与看守洋棚的印捕一起殴打余金山，余金山的头部一时血流如注。随后，又有2名苦力工人被打伤。虽然3名工人均被公司管事命人送到仁济医院诊治，但寻衅殴打者没有被处理，工人们因此都愤愤不平。

晚上9时，工人集聚码头，拥到公司质问。公司账房看到这个情景，立马鸣笛报警。六署巡官屠某、巡长蒋泽民当即率领一排警察到场弹压。有的工人看到全副武装的警察前来，就在河边投石，将公司的过磅房、检视房的玻璃等捣毁。公司经理韦买办立即发电报给镇守使署及警察厅。警察厅和镇署派人赶到，对天鸣枪，工人四散逃命，但仍有8人被捕。工人散后，宣布全体罢工。11日早晨，数千工人齐聚汉口码头，树立纸旗，上书“大家起来援助我们苦工罢”字样，随后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要求“严惩凶手”、“释放被捕工人”之声久久不绝。

萧耀南一听，坐不住了，于是派遣宪兵到汉口稽查，协助当地武装军警，弹压码头工人罢工。同时，命令汉口警察厅长周际芸迅速消弭工潮。周际芸和镇署参谋长张木喈、堤口下段保安会正副会长郑慧吾和余选丞等，亲自和太古轮船公司的韦买办等人谈判交涉。谈判以太古公司让步告终——凶手依法惩办、打碎的玻璃既往不咎、公司保证今后不再无故打人。

工人们并不知道政府已经和太古公司谈判，



汉口六一一惨案现场一片狼籍



仍旧聚集在汉口一码头。傍晚 7 时 20 分，英国捕房的两个保正突然带着一个西洋人到太古码头视察，正好看见工人集聚不散，立刻指挥印捕上前干涉。工人群情激愤，自然不肯退去，洋保正只好退至二码头。同时，有两位工人因为发生口角而厮打起来，印捕驱逐他们，旁观者不服，反而将印捕驱逐。

在这个过程中，人越聚越多，直至二码头。退至二码头的洋保正和印捕以为发生了不可控的暴动，狂吹救命笛。晚 7 时 30 分，英驻汉总领事柏达悍然命令海军陆战队全副武装登陆，关闭前后花楼街铁栅栏，用机枪封锁租界和华界的交通，用枪柄和水龙驱赶工人，工人们不得不向大智门退去。而大智门是工人聚居之所，这里的工人看到撤退工人的被动、洋人的不可一世，异常愤怒，纷纷出头。

10 时，萧耀南派出大量军警前去阻拦工人。工人又冲进租界。英国海军陆战队借口工人侵入其义勇军防线内，当即开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一时弹如雨下，血肉横飞。顷刻间，秩序大乱，民众抱头四窜，自相践踏。直至镇署军队驰来，朝天鸣枪数声，形势渐定。英帝国主义为了毁尸灭迹，将租界电灯熄灭，将工人尸首移至他处，沉尸江底。

汉口六一一惨案（即汉案）是继上海五卅惨案后的又一大惨案，引起世界和全中国的震惊。惨案的发生，再次暴露出英帝国主义肆意欺压凌侮中华民族的凶恶本性，这是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是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在强权压迫之下，中国人民没有低头，而是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展现出惊人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向英帝国主义者发出绝不屈服、抗争到底的誓言。

“借力打力”的水陆大游行

六一一惨案发生后，武汉“全埠哀恸，民氛之盛，不可一世。”第二天，激愤不已的武汉学生、工人就冲上街头举行示威活动，在全城掀起一场旷日持久的抗议风暴。

六一一惨案也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激发了全国人民对英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刊载了《汉口屠杀案之真相》《帝

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等文。《中国青年》《工人之路》《热血日报》《申报》《大公报》等报刊发表了有关汉口惨案的报道和评论。北京、上海、南京、济南、广州、天津等地纷纷发出通电，悼唁汉口死难同胞，要求政府对英交涉。上海职工青年会愤而指出：“沪案未了，汉事又起。华胄同胞，杀戮无数。国权何在？人道何在？斯辱可忍，孰不可忍！”北京学生联合会、旅京湖北同乡会、上海学联等团体代表奔赴武汉，汇入反帝斗争洪流。

英帝国主义的倒行逆施不仅是与全体中国人为敌，也不见容于国际公理和正义。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等纷纷发表宣言，强烈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英国共产党公开号召英国工人“截阻载运军火赴华之车轮”，以声援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就连著名的和平主义者罗素也对沪、汉案抱以深切的关注与同情，他发表公正的言论，揭露英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行径。

然而英帝国主义对这些正义的呼声视而不见，相反还严加戒备。英租界内，各主要道路堆满沙袋，架设机枪，密布电网。陆战队、义勇队荷枪站岗，汽车队飞驰巡查。英、美、日等国军舰云集于武汉江面，一时竟达 17 艘之多，耀武扬威，杀气腾腾，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

老谋深算的英领事柏达使用卑劣伎俩，诬称“暴民”攻击租界，英水兵万不得已才开枪。柏达的言论，实属颠倒黑白的强盗逻辑。不过在血写的事实面前，无论他如何玩弄狡辩的谎言，却总也掩盖不了自己的罪责。

但是盘踞湖北的军阀萧耀南不仅不对帝国主义者加以抨击，反而甘愿当其帮凶，为虎作伥。汉口惨案发生当晚，他即下令各中文报纸不得报道，之后又解散武汉学生联合会，查封扬子通讯社，禁止人们游街、演讲及散发传单，以鼓动工潮罪名枪杀汉口人道医院院长肖英等 4 人，通缉李汉俊等 80 余人。

身为武汉军政大员的萧耀南，竟以如此手段对付伸张正义的武汉民众，与帝国主义者沆瀣一气，着实令人心寒与不齿。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为此发电声讨萧耀南：“萧耀南甘心辱国媚外，故将汉案真相湮灭，不使外传，一面以流氓暴动厚诬被惨杀之同胞，一面以高压手段压迫群众爱国运动。”

英领事歪曲事实，萧耀南助纣为虐。面对他们的淫威，武汉人民誓死

抗争到底。为了揭开事实真相，中共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组织了汉口惨案调查团，调查团前往阳逻等地实地调查长江浮尸，结果查明从阳逻捞起被枪杀的尸体就有 20 多具。英帝国主义者践踏公理、违背人道的罪行，在铁的事实面前昭然若揭。

1925 年 6 月 23 日，英、法等帝国主义又在广州制造了沙基惨案，酿成继沪、汉案之后又一血案。同胞的鲜血进一步唤醒了国人。6 月 30 日，武汉各界 6 万余人在武昌阅马场为沪汉粤死难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并示威游行。游行每人手持写有抗争口号的小旗，千万面旗帜汇成反帝的澎湃



1925 年 6 月 30 日，武汉数万群众聚集于武昌阅马厂，举行五卅惨案周年纪念大会，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

海洋。反动当局派出全副武装军警千余名包围会场，董必武带领武汉中学学生到达会场时遭到军警阻拦。面对军警枪口和刺刀，董必武指挥学生向军警开展爱国宣传，军警自知理亏，终于让出了通道。董必武、陈潭秋主持大会，

通过了六项反帝决议，并与群众一起举行大游行。这天骄阳似火，在烈日炙烤之下，游行民众无不汗流浹背，但依然热情不减，精神抖擞。

7 月 11 日，武汉各界又举行纪念汉案周年追悼大会，5 万人参会。场内设演讲台，演讲者川流不息，先后不下 600 余人。年近七旬的老翁万正卿登台大呼“同胞齐起救国”，言罢老泪纵横，台下听众热泪盈眶，场面悲壮感人。

面对激昂的民气，遭到社会舆论唾骂的萧耀南不得不改换卖国求荣的嘴脸。他致书英国驻汉总领事柏达提出谈判条件，要求撤退租界水兵，解除义勇队武装，抚恤汉案死难家属等。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谈判，依然毫无结果。为了掩人耳目，萧耀南故作爱国姿态，指使由石星川等湖北将军团

成员组成的“湖北对英同志会”发起一次“绅士式的水陆大游行”。时值“九七”国耻纪念日（《辛丑条约》签订日）到来，中共武汉党组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决定抓住这一契机，“借力打力”，将之变成发动民众力量进行的一场彻底反帝、反军阀的爱国运动。

9月7日，以水陆大游行形式举行的湖北省国民外交大会在武汉三镇同时举行。但见龟山下、蛇山边、紫阳湖畔、阅马场、六渡桥等地，到处是浩荡的人流，到处是激愤的呐喊，到处散发着言辞犀利的反帝传单，气氛之热烈，空前未有。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游行大军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媚外军阀！”“拥护国民政府！”等口号，犹如滚滚巨浪，不可阻挡。这一天，天气晴朗，但“微降黄沙，日光暗淡，游行之时，愈显悲壮”。游行队伍所经之处，各商铺均燃放鞭炮表示欢迎。有的店家还表演舞狮，他们把狮子舞得生龙活虎，“以示睡狮已醒之意”。

从汉黄码头到徐家棚宽广的江面上，20余艘小轮、40余只帆船参加水面游行，汽笛鸣响，声震长空。江岸水面，人潮涌动，千帆竞发，蔚为壮观，充分显示出武汉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和团结力量。同日，沙市8万人、鄂城3万余人也分别举行了水陆大游行，以示声援。武汉九七水陆大游行，是本地区五卅反帝浪潮中一朵最为绚丽夺目的浪花。

汉口六一惨案与上海五卅惨案、广州沙基惨案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三大惨案，由汉案引发的武汉人民反帝怒潮势不可当，一扫长期笼罩在武汉城市上空的政治阴霾，极大地促进了民众的觉醒，表现出中国人民不可凌辱的英雄气概和反帝斗争的爱国热忱，给予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以当头棒喝，在历史舞台上演了一幕波澜壮阔的活剧。

山雨欲来风满楼。从“徐典事件”中汉口人力车工人的同仇敌忾，到六一惨案中武汉各界的万众一心，更多的人觉醒起来投入到反帝爱国运动中去。这不仅标志着武汉工人运动走出低谷步入高潮，更预示着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风暴的即将来临。

（王 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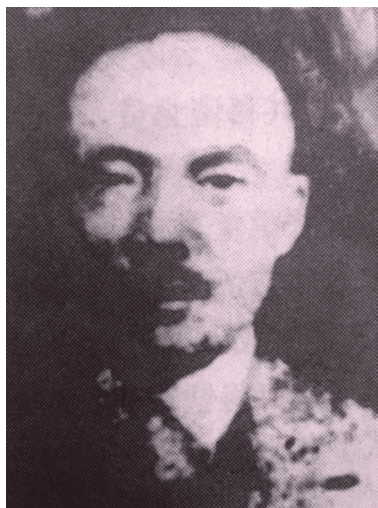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潘怡如乔装察敌情

“投笔从戎为自由，帝王军阀是君仇”，这是董必武在1944年3月为潘怡如所作挽诗《哭潘怡如》其中一句，这句诗不仅寄托了他对潘怡如深深的怀念，更凸显了潘怡如坚定的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立场。

潘怡如又名潘康时，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潘怡如与董必武不仅是少小同乡，同生同长在民不聊生、时局变革的年代，共同的向往与追求还使他们一同走上革命之路。与董必武一样，潘怡如早年也参加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俩忧愤交加，因找不到革命出路而深感痛苦，于是先后远赴日本求学，探寻救国之路。在日本，他们先后谒见了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孙中山坚持革命的态度深表推崇和拥护，因而同时加入

中华革命党，共同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斗争。



潘怡如

1922年6月，潘怡如出任何成濬部队参谋长，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斗争。9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国民党右派多次拉拢潘怡如反对国共合作，均遭潘怡如拒绝。1924年，潘怡如到广州与詹大悲一同谒见孙中山，孙中山对他们说：“我所定之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之三大政策，本党同志多不深晓，怀疑者有之，捣乱者有之。我将不顾一切，

执行党纪。已令廖仲恺组织农民军，军官学校亦正在筹办。”潘怡如听了十分振奋，他将孙中山的谈话遍告同志，并更加坚定地从事革命工作。由于积劳成疾，次年他不得不离开军队，借住武昌潘正道家，后迁居抱冰堂。潘怡如养病期间，经济十分困难，医药费用一半由董必武、张国恩筹措，何成濬、詹大悲也多方相助，才得以渡过难关。

1926年2月，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确定中国共产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斗，必须在北伐必经之路湘鄂豫等省加紧开展群众工作”。3月底，董必武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的身份，由武汉秘密前往长沙，与国民党湖南省部商讨策应北伐军和争取唐生智参加国民革命的工作。

7月11日，北伐军攻占长沙。同一天，湖北特种委员会在武汉成立，董必武担任委员会主席，刘孝澄、潘怡如任委员（刘、潘二人未到汉前由张国恩、吴德峰暂代）。“特种委员会”的任务是：（一）破坏敌人军纪；（二）特别宣传；（三）侦探军事、政治消息。董必武、潘怡如利用汉口的中共秘密联络机关——吉庆街德润里27号周新记电刻铜器店，以给店主周宇笙（襄阳人，地委秘密联络员）的小女儿过10岁生日的名义，召开干部会议，对策应北伐的各项工作进行了统一部署。

武汉的党员干部们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先是将工作重点放在北伐宣传方面，组织动员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配合前线作战。董必武首先从湖北省农民协会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下属机构军事委员会中组



北伐军挖掘战壕，准备攻打武昌城

织一批机关干部，深入工农内部从事宣传工作。后又命陈荫林、吴光浩、石炳乾和张培鑫等人分别率队前往武汉周边的广大农村和铁路沿线，动员工农群众筹备物资，以迎接北伐军的到来。

湖北各界民众得知北伐军要来的消息，无不欢欣雀跃，予以应援。人民群众将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口粮纷纷捐献出来，并且为北伐军制作担架。一些热血青年踊跃报名组织担架队，决心要为拼杀于战争前线的将士们做好一切后勤保障工作，成为北伐军的坚强后盾。

董必武为了扩大北伐军在武汉乃至全国的影响力，召集湖北省农委和妇委筹备创办了《湖北农民》和《湖北妇女》两份刊物，为群众播报前线战况，宣传革命，宣扬北伐军的胜利进军，鼓舞人民斗志，号召有为青年加入到大革命的浪潮中来。

不仅仅是青年、农民和妇女们积极地参与到国民大革命的浪潮之中，武昌、汉阳和汉口的工人们也加入进来。码头工人们负责炸毁吴佩孚撤退时必经的桥梁，船工负责击沉撤退船只，人力车夫们负责阻断交通线，各方配合默契，不给吴佩孚等反动军阀一丝卷土重来的机会。

为能实时掌握吴佩孚作战动态，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们也积极响应革命，组成特种委员会，秘密地将吴佩孚的作战部署及时汇报。这样，湖北地区以武汉三镇作为核心，最大程度地组织了起来。工、农、商、学、兵等各界人士互相配合，灵活调动，以饱满的热情迎接北伐军的胜利到来。



北伐军进入武昌城

为了给北伐军提供准确情报，董必武和潘怡如商定，由潘怡如以治病为名，叫人用轿子抬着他到武汉三镇，特别是外围，察看敌人兵力的具体部署。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潘怡如悄悄出发了，他发现敌

人将重兵设在通湘门，将重武器置于洪山、蛇山和龟山等地，企图固守武昌，并凭借长江天险控制汉口、汉阳。根据侦察情报，董必武和潘怡如商议认为：北伐军的进军路线宜首要围困武昌，再渡江先取汉阳、汉口，最后围歼武昌守敌。潘怡如按照两人讨论意见，将敌军部署和北伐军进军方案绘成地图，再交给董必武。

此时，在鄂南一带国共两党地方组织和工农群众的配合支援下，进入湖北境内的北伐军以风卷残云之势，迅速占领通城、崇阳、蒲圻各地，接连攻下汀泗桥、贺胜桥，打开了通向武昌的南大门，乘胜直逼武昌城下。当北伐军还在进击鄂南敌军的时候，董必武就冒着生命危险，将潘怡如所拟攻取武汉的方案送到咸宁叶挺独立团驻地，为北伐军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可靠依据。返回武汉后，董必武和潘怡如、刘孝澄趁北伐军兵临城下的有利时机，加紧对敌军的策反工作，终于争取刘佐龙、陈尧鉴两部临阵倒戈，为北伐军相继占领汉口、汉阳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6年8月至12月，在短短4个月时间内，北伐军在湖北战场上连战皆捷，歼灭和收编了吴佩孚、孙传芳盘踞于湖北各地的直系军队以及其从北方南调的增援部队，占领了湖北全境，取得北伐战争最重大的胜利。而这与董必武、潘怡如等湖北特种委员会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10月10日，北伐军以特种委员会“围歼武昌守敌”的方案，在城内部分投诚部队的策应下，一举攻占被整整围困了40天的武昌城，歼灭北洋军阀吴佩孚部万余人，创造了北伐战史上最辉煌的战绩。

北伐先锋叶挺独立团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新四军军歌》中所唱的“光荣北伐武昌城下”和“铁的新四军”，与北伐战争中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密切相关。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最早起源于1924年11月成立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是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时，以保护大元帅府安全和铁路安全为由，经孙中山批准成立的一支由中共广东区

委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1925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由共产党员叶挺任团长。1926年1月，该团改称第四军独立团，仍然由叶挺任团长，叶挺独立团由此得名。全团约2100人，下辖3个营和1个直属队，设有党支部与党小组，连以上干部基本为共产党员。

北伐战争开始后，作为北伐先锋的叶挺独立团在1926年5月即奉命挥师北上，首战涪田，直取醴陵，一路势如破竹，攻入平江，奇袭汀泗桥，激战贺胜桥，兵锋直指武汉三镇，战无不胜，屡建奇功，声威大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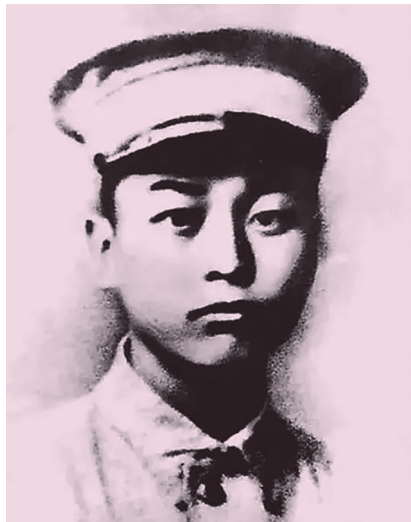
9月6日，北伐军攻占汉阳，次日占领汉口，武昌处于北伐军包围之中，沦为孤城。武昌城地势险要，北依长江天险，四周护城河环绕，城墙高大坚固，城内蛇山耸立，居高可俯瞰城门要隘，易守难攻。9月3日，北伐军攻城首战失利。9月5日凌晨3时，第二次总攻打响。独立团担任武昌宾阳门至通湘门一线攻坚任务。

共产党员、第一营营长曹渊身先士卒，带领奋勇队冒着炮火奋勇出击，越过城壕直达城脚，架起云梯奋力攀登。守军居高临下，以猛烈火力扫射。奋勇队舍生忘死，轮番强攻。曹渊见奋勇队伤亡惨重，当即向叶挺作书面报告，未及写完，一架梯子靠上城垣，曹渊跃起攀登，不幸头部中弹，壮

烈牺牲。叶挺悲痛之余，称赞曹渊是“模范的革命军人，且是我最好的同志”。

10月10日，在城内投诚部队策应下，北伐军再次发起总攻。叶挺独立团将士又一次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率先攀上城头攻入城内，与负隅顽抗之敌展开巷战，并攻占制高点蛇山。武昌守军主将刘玉春、陈嘉谟见大势已去，易服藏匿，被独立团士兵搜获。历经40天围城血战，北伐军终于光复武昌城。

随着北伐军攻克武汉，革命洪流从



曹渊

珠江流域席卷到长江流域。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促成革命重心的北移。1926年底，国民政府由广州迁移至武汉。国民政府定都武汉后，中共中央也由上海迁至武汉，国共两党领袖汇集于此，工农运动空前高涨，武汉成为闻名于世的红色首都，风雷激荡的大革命中心。

作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为国民革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付出巨大牺牲，共有380余名官兵血洒北伐沙场，仅武昌一役就有191名官兵倒在武昌城下。据《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追悼阵亡将士大会特刊》记载：“入湘以来，叶团每战皆列先锋，其作战之勇，军纪之佳，牺牲之巨，为各军冠。”

由于叶挺独立团等第四军所属各部不怕牺牲，骁勇善战，1927年1月，武汉粤侨联谊社赠予第四军“铁军”盾牌，“铁军”称号从此名扬天下。正如叶挺所言：“我们为什么能够建立这样的伟大的战功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独立团是共产党的军队，因为有了共产党，我们才能成为铁军。”叶挺独立团以勇往直前的斗志，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风采；以浴血奋战的革命精神，铸就了铁军的威名！

在武汉期间，叶挺独立团经过整编扩编，实力剧增，曾参加平定夏斗寅叛乱，并成为南昌起义的主力军，起义军余部由朱德、陈毅等率领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会师。另有部分铁军将士参加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为人民军队建军立下不朽功勋。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北伐攻城阵亡官兵诸烈士墓



陈定一血染火巷口

现今繁华的武昌解放路，在 90 多年前却是北伐军与北洋军阀激烈厮杀的战场。在这条长街的火巷口，曾有一位风华正茂的共产党员“誓将颈血洗乾坤，只顾工农不顾身”，牺牲在这里。这位共产党员就是陈定一。

陈定一，本名陈学灏，1905 年出生在汉口易家墩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7 岁时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到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那时，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中共湖北党组织的活动据点，也是培养陈学灏成为革命者的摇篮。1924 年，董必武担任省立一师训育主任。陈学灏在董必武的指导下，参加了改革学校教育的革命活动。为此，他联络同学李镜唐、艾子良等十余人，秘密商议改革事宜，不料事情泄露，他与李镜唐、艾子良被校方开除学籍。艾子良悲愤成疾，死于学校。此事激起全校师生的极大愤慨，迫使校长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陈学灏进一步发动全校学生，赶走了校长周之翰。这次斗争的胜利凸显出他的组织与领导能力，同年他被推选为湖北省学生联合会主席，但也遭到军阀当局的通缉。为了继续从事革命活动，陈学灏冒名顶替本校一位业已退学的同学的名字，从此改名陈定一。1925 年春天，陈定一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 年 5 月 30 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组织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反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此时，陈定一受党组织的委托，领导了武汉的学生运动。6 月 4 日，在他的组织推动下，武昌 50 余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两万余人冲出校门，上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集会演讲，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揭开了武汉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

经过革命斗争的锤炼，陈定一革命热情更高，思想进步很快，逐渐成为武汉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8 月，陈定一当选为湖北省学生联合会代表，赴北京出席了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很快，他由一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变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年，他年仅 20 岁。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陈定一先后担任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监察委员，

汉口特别市党部第一届执行委员、组织部长，从事统战工作。自此，他彻底结束了学生生活，成为了一名职业革命者。

1925年12月25日，陈定一在声势浩大的“反吴”国民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公开揭露吴佩孚为了筹款养兵，在湖北滥发军需券，任意提高盐价，敲诈勒索湖北人民的罪行。他呼吁武汉各界团结一心，驱逐反动军阀吴佩孚。此次大会对推动湖北全省的群众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把湖北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引向了深入。

为了团结民众，运用民众的力量推翻军阀统治者，赶走列强，陈定一在武汉三镇忘我地奔波。斗争越深入，陈定一的危险就越大。为了革命，他完全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曾两次被捕，反动军阀动用多种酷刑，百般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绝不背叛。获释后，他继续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正如他所说的：“牢狱是革命党人的休息之所，出狱后，应当更加努力地工作。”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也充分表达了一个年轻共产党员为革命事业而勇于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1926年5月，陈定一先后领导硚口英美香烟厂、泰安纱厂、申新纱厂等万余工人举行联合罢工斗争，可又一次被捕，获释后依然从事群众运动。5月底，他在汉口主持了纪念五卅惨案周年群众大示威和六一一惨案周年纪念活动。反动军警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心惊胆战，当时却不敢公开镇压。

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誓师北伐，陈定一奉命进行策反工作。为了迎接北伐军挺进武汉，他秘密奔走于武汉三镇，发动百万市民反对军阀统治。此时，盘踞在武汉的



陈定一烈士就义纪念碑

北洋军阀极度恐惧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千方百计镇压革命，一方面派“稽查”四处活动，探查革命党的领导机关；另一方面派巡查队捕杀革命党人。党组织考虑到陈定一经常公开从事革命活动，处境异常危险，指示他昼伏夜出，改头换面。同志们也劝他注意安全。由于迎接北伐军的工作十分繁重，他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仍然不分昼夜奔波于长江两岸，并深入军阀部队内部做宣传策反工作。

8月13日，陈定一被其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国家主义派分子出卖，在武昌新市场附近被事先埋伏的敌探逮捕入狱。尽管敌人严刑审讯，可陈定一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董必武等发动党组织成员想方设法营救，但均未成功。

27日深夜，敌人对他下了毒手。临刑时，陈定一高呼革命口号，高唱着《国际歌》，昂首挺胸走上刑场，壮烈牺牲。丧心病狂的北洋军阀将其头颅悬挂在武昌长街（今解放路）火巷口，“示众”多日！直到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后，才缝合了他的身首，并在陈定一就义的火巷口竖碑纪念，以昭英烈！

12月17日，董必武在武昌首义公园主持召开了追悼陈定一烈士大会，《汉声周报》也发表了悼念他的文章。追悼会后，陈定一烈士被安葬于武昌洪山东南麓。解放后，武汉市人民政府将烈士墓迁葬于武昌石门峰公墓。

陈定一烈士的生命是那样的短暂，他没有留下任何豪言壮语，但是他却用自己年仅20岁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埋葬旧世界的战歌！

策反刘佐龙

1926年8月，北伐军开始进攻武汉。当时控制湖北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电令陈嘉谟、刘玉春固守待援。因刘佐龙所部第二师为鄂籍，举足轻重，吴佩孚对其大加笼络，委任刘佐龙为湖北省省长兼汉阳防守司令，所部驻防汉阳及襄河一线。

国民革命军为攻占武汉三镇，决定寻找突破口，策反刘佐龙。

策反刘佐龙，中共党员耿丹和龚培元发挥了关键作用，功不可没。北伐军攻占长沙后，董必武、耿丹等率湖北民众组织代表团前去慰问。时任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得知耿丹在辛亥革命时与刘佐龙相识，并受到刘佐龙的敬佩，便与恽代英、陈声煜商量，派耿丹回武汉策动刘佐龙起义，同时派黄埔军校毕业的营级干部龚培元（时任政治部军事特派员）同往武汉，配合这一策反工作。

在刘佐龙部杜邦俊团长的安排下，耿丹与刘佐龙得以见面会谈。耿丹将邓演达的亲笔信交给刘佐龙，阐明形势，晓以利害，并答应起义后晋升刘佐龙为



耿丹

军长，刘佐龙当即表态愿意起义。而此时，龚培元在汉阳秘密会见刘佐龙部第八团团团长严敬，他俩曾是汉阳晴川中学同学。龚培元将邓演达的亲笔信递交给严敬，两人彻夜长谈，当即拟出阵前起义方案。与此同时，耿丹的代表郑重又与刘佐龙的四弟刘鼎甲（时任刘佐龙部炮兵团团长）取得了联系。

龚培元与严敬约刘鼎甲正式谈判，商议起义后该师的编制番号问题。龚培元以刘佐龙部拥兵近万人，答应向国民革命军建议给刘佐龙1个军辖3个师的番号。

1926年9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二师进军汉阳新滩口时，龚培元由严敬、刘鼎甲陪同，直接与刘佐龙晤谈。刘佐龙说：“一切按龚特派员之命是从，现在不是防南而是防北了。”

9月3日，北伐军抵进汉阳郊外15公里处。晚上9时，刘佐龙召集营级以上军官会议，介绍龚培元的国民革命军军事特派员身份，并请龚培元讲话。龚培元历数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指明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的大势所趋，号召刘佐龙所部官兵起义，参加革命。与会军官一致同意随刘佐龙起义。刘佐龙当即部署了接应北伐军的方案，宣布阵前起义。

9月5日早10点，北伐军第八军第二师何键部开始向汉阳进攻，刘佐



龙立即命令防区右翼占领梅子山，严敬率第八团掩护刘鼎甲炮兵团占领汉阳怀善堂、河舶所、晴川阁、铁门关等处阵地，掉转炮口，轰击吴佩孚部高汝桐师设在龟山顶禹王宫的指挥所，配合支援北伐军的攻势。

与此同时，刘鼎甲炮兵团隔着汉江向吴佩孚所在的汉口查家墩司令部开炮。炮弹落在司令部门前，震得吴佩孚惊慌失措，立即打电话质问刘佐龙。刘佐龙却平静地回答：“北伐军向汉阳发起攻击，炮兵部队赶紧应战，士兵一时惊慌，炮弹偏离了方向。”放下电话，吴佩孚自言自语，骂了一通。正当他惊魂未定之时，又一发炮弹不偏不倚地落在司令部门前。吴佩孚余怒未消，新火又起。他再次拿起电话，准备向刘佐龙兴师问罪，可电话通了，对方半天没有回音。吴佩孚把电话狠狠地摔在桌上，心知大事不妙，仓皇地率卫队徒步赶往江岸车站，乘车北逃。

6日清晨，北伐军攻下龟山，万众欢腾。武汉群众同心协力将刘鼎甲炮兵团的大炮运上龟山阵地，以防北洋军阀反扑。晚间，刘佐龙部配合北伐军第八军第二师，将北洋军阀靳云鹗守备部队（时称铁帽子军）击溃，7日晨攻克汉口。汉阳、汉口光复后，国民政府立即委任刘佐龙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及湖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对于刘佐龙的起义，时人有诗赞曰：“南国惊雷动地鸣，楚天风雨撼江城。将军一怒龟山定，三户亡秦信有征。”

不幸的是策反刘佐龙的两位功臣——耿丹和龚培元，却同时将生命永远定格在1927年8月，其中耿丹更是牺牲在刘佐龙的枪口之下。北伐军攻下武昌城后一个月，在董必武介绍下，耿丹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为了让耿丹控制住刘佐龙，安排他担任刘佐龙部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的副军长。1927年4月、7月，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8月11日，立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耿丹被刘佐龙残忍杀害于司令部门内。而早在董必武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训育主任时就追随他从事革命活动的龚培元，更是在克复汉阳、汉口后，立刻投入到北伐军叶挺独立团进攻武昌城的战斗中，并立下汗马功劳。1927年8月南昌起义后，随起义军南下，在5日进攻会昌城的战斗中，龚培元不幸中弹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

在如今繁华的武昌街道口，静静地伫立着一座牌坊，匾额上是邓小平同志题写的“独立团烈士陵园”。往里走，道路两旁直至高高耸立的纪念碑周围，栽种着 191 颗水杉，昭示着叶挺独立团在攻打武昌城战役中牺牲的 191 名官兵永垂不朽。

这里就是叶挺在 1927 年初主持修建的独立团烈士墓，1956 年被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1980 年，武昌区政府将其扩建为陵园，1989 年被列为“武汉市重点烈士纪念建筑保护单位”，1995 年升级为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高 12 米的烈士纪念碑正面，镌刻着徐向前题字“北伐战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碑座铭刻有大理石碑记，记载了叶挺独立团的赫赫战功。

回到 1926 年 9 月 3 日凌晨的武昌城，负隅顽抗的守城敌人炮火极其猛烈，北伐军强攻城垣，牺牲较大，被迫撤出第一次攻城战斗。9 月 3 日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抵达武昌余家湾车站，翌日召开攻城会议。蒋介石未详细分析局势，就断然命令：“武昌限于四十八小时内攻下。乘敌人立足未稳，一定要攻下！”对于他的不顾现实、蛮干的命令，与会将领面面相觑，未发一言，明知强攻不妥，也只得服从命令。

第二次攻城开始前，共产党员曹渊指挥的第一营全营将士都报名参加奋勇队。官兵们在战前纷纷给亲人留下遗书，其中一位共产党员班长在给母亲的遗书中写道：“为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战死，虽死犹生。



北伐独立团烈士陵园纪念碑



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着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而战死，是光荣的。儿的躯体虽然死了，但精神是不死的，儿是永生在母亲面前的。恳求母亲保重，勿过悲哀……”

9月5日凌晨3点，设在小龟山、洪山、武建营的北伐军炮兵一齐向武昌城开火，第二次攻城战斗拉开序幕，各部攻城奋勇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总攻。第四军独立团在共产党员、团长叶挺指挥下，冒着敌军密集炮火，在枪林弹雨中架起云梯，奋勇攻城。其中第一营营长曹渊带领奋勇队率先潜至城垣脚下，架起云梯数架，将士们争先恐后奋勇登梯翻越城墙。此时，墙头守敌以猛烈火力居高临下扫射，炮弹、子弹、手榴弹密如雨下。第一营官兵轮番强攻，前仆后继，死伤惨重。中共党员、营长曹渊身先士卒，奋勇攀梯，不幸头部中弹，献出年仅24岁的宝贵生命。一连连长莫奇标、三连连长高超等共产党员冲锋在前，也先后中弹牺牲，血染武昌城下。

经此一役，独立团第一营将士伤亡殆尽，并肩作战的第十师、第十二师奋勇队也伤亡过半，第二次攻城战被迫终止。

鉴于两次强攻武昌城未果，北伐军从敌我双方的兵力、地形、给养等实际情况出发，总结了攻城作战的教训，为避免过重伤亡，决定改变单纯进攻的战略方针，以围代攻，对武昌城的陆路、水路、通讯等实行全面封锁围困。

通过40天的持续围困，武昌城守军弹尽粮绝，军心涣散，四面楚歌。10月10日凌晨，北伐军再次发起总攻，趁着里应外合之势，一举拿下武昌城，活捉守军将领陈嘉谟、刘玉春，俘虏敌人官兵万余人。就在汉口10万民众集会庆祝辛亥革命十五周年的这天，北伐军完全占领武汉三镇。

武昌城攻坚战是北伐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一次血战，仅第四军就伤亡官兵1157人，叶挺独立团牺牲官兵191人。1927年1月，叶挺为独立团修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北伐攻城阵亡官兵诸烈士墓”，墓碑上不仅镌刻着中共党员、独立团一营营长曹渊等191名牺牲官兵的姓名，还刻有“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精神不死”、“先烈之血”、“主义之花”、“无产阶级的牺牲者”等标语，而这些标语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叶

挺独立团全体官兵的英勇无畏、团结守纪、意志坚强，以及坚决打倒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决心。

第四军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勇当先锋、战无不胜的出色表现，以及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英勇无畏、浴血奋战建立的赫赫功勋，为这支部队赢得了“铁军”荣誉。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和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们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与英勇奋斗的先锋模范作用，则铸就了这支铁军的红色基因和不朽军魂。

（许 歌）



收回汉口英租界

英帝国主义制造一三惨案

1926 年底，大革命洪流从珠江流域席卷到长江流域，武汉成为全国革命中心。武汉这个首义之区在时隔 15 年之后，又一次站上了时代潮头。

1927 年 1 月 1 日，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发布命令：“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这一天适逢元旦，喜迎新年的愉悦、北伐战争的胜利，以及武汉成为一国之都的荣耀感，都深深感染着武汉人民，整个三镇沸腾起来了。人们倾城而出，阅兵式，演讲会，提灯游行，玩龙舞狮，连续三日狂欢不已。

1 月 3 日，“今天是隆重庆祝国民政府迁鄂和反帝国主义斗争取得胜利的最后一天。整天都是人山人海的庆祝游行队伍，武汉全城真是达到万人空巷的程度了。到 12 点时，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与英租界毗连的中国地界上。”最引人关注的是，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 30 余名学生组成的宣传队在汉口一码头（今苗家码头）江汉关前演讲。他们顶着刺骨的江风，慷慨陈词，从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开始，引用了大量最近中国遭受的屈辱。听众大多为码头工人、人力车夫和海员，“肩颈相接”，但井然有序。随着讲演气氛日趋热烈，人潮也越聚越多。

英租界当局十分恐慌，如临大敌，急请驻汉英国海军长江分舰队司令卡梅伦调兵上岸支援。卡梅伦派遣大批英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登陆，并授予指挥官根据需要开火的权力。英国士兵在江汉关附近安置电网，堆积沙包，架设机枪，“取作战姿势，放空枪威吓”。群众知其有意挑衅，不为所惧，处之泰然，演讲继续进行。

下午3时,全副武装的英水兵突然从租界冲出,扑向手无寸铁的听讲群众,强行驱逐。码头工人们毫不畏惧,上前正言道: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地方上演讲,与你们有何相干。”殊不料英水兵凶暴成性,挥舞枪托乱打,拔出刺



愤怒的武汉群众冲击汉口英租界

刀乱捅,当场刺穿工人李大生和10岁儿童方汉山的肚肠,重伤数人,轻伤30多人,酿成骇人听闻的一三惨案。江汉关,这座见证近代武汉开埠通商的标志性建筑,亲历了西方列强殖民掠夺中国的屈辱和苦痛,这一次又目睹了英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血腥暴行。

面对英帝国主义的兴风作浪,武汉群众义愤填膺,他们奋勇向前,把英国水兵包围起来齐声喊打。有的赤手空拳与英兵展开搏斗,有的把手中的旗杆当作武器,有的用扁担、杠棒与英兵枪杆相击,打得英兵仓皇逃却。英勇的武汉群众紧追不舍,越过铁丝网,推倒沙包街垒,冲向英租界。在数处主要路口,群众与英方巡捕、水兵对峙相抗,英兵端枪随时准备开火,流血冲突一触即发。

紧急时刻,武汉国民政府派临时联席会议主席兼司法部长徐谦、联席会议委员蒋作宾赶赴现场,向英方提出严正抗议,要求英兵放下武器,停止挑衅,以息事端。正在主持湖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李立三、刘少奇等人也闻讯赶来。徐谦背对英水兵的枪口,一边高高地挥动手臂,一边面向群众呼喊:政府必定会采取办法保护人民,防止此后再有此事件发生,为人民报仇雪耻。他要求群众保持克制,以避免更大伤亡,由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刘少奇也力劝群众“暂停前进,避免流血”。



然而群众早已被英水兵暴行所激怒，群情鼎沸，坚决要求英军先撤，“收回英租界”、“打倒英帝国主义”的怒吼如万钧雷霆，震撼天地。这种浩大的声势、磅礴的力量，使英国驻汉领事葛福和卡梅伦等人惶恐不安，深感已处于中

英国水兵用路障、刺刀和水枪对付抗议游行的武汉民众 国人民强大的革命风暴之中。经过再三劝说，群众才离开英租界，紧张局面暂时平息下来。

当晚，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约见英国驻汉领事葛福，就英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一三惨案，向葛福提出口头抗议，限其 24 小时内撤掉水兵及义勇队，解除武装，由中国军警接防英租界，否则不负任何责任。一贯盛气凌人的葛福却用挑衅的口吻说：“如果你们的政府是文明的政府，你们就应该能够为武汉的英国人的生命财产提供保护。”生长在海外的陈友仁不谙华语，却是一位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与正义感的外交官，他当即针锋相对地驳斥：“我们的政府是文明的政府，是中国人民的政府。至于



一三惨案发生时，英水兵与中国群众冲突现场

说到保护，你们不是已经用你们的炮舰和陆战队实行了保护吗？中国国民政府再来参与此事是不合适的，你们杀了我们手无寸铁的人民，你们使用了极其野蛮的方式。”陈友仁义正词严的回答，令葛福大吃一惊，无言以对。

英兵在汉口施暴的消息不胫而走。深夜，愤怒的群众如潮涌来，很快包围了英租界。慑于中国民众之愤慨、中国政府抗议之严厉，英方不得已采取退让措施，于4日清晨将水兵和义勇队撤回江边的军舰，不少英侨携眷悄悄登上外轮暂避。英兵撤离后，中国军警立即进驻江汉关一码头等处，接管防务。

湖北全省总工会提“六项要求”

所谓租界，是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权限之外的“国中之国”。今天，汉口江汉路以北、麻阳街以南、中山大道东南的滨江区域，呈现的是一派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景象。而在历史上，这里却是五国租界所在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西方殖民势力得以深入中国内陆腹地。1861年3月21日，湖北布政使唐训方与英国参赞巴夏礼签订《汉口租界条款》，规定江汉关下首约458亩土地划为英租界，界内一切事务由英国驻汉口领事管理。英国首开租界后，德、俄、法、日等国也把觊觎的目光投向汉口，纷至沓来，划定租界。

汉口租界的设立虽然引入近代西方文明，但更是各国列强寄生在江汉大地上的一颗毒瘤，是烙印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难以磨灭的一道伤痕。1925年5月30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6月11日和6月23日，又先后在汉口和广州制造六一一惨案与沙基惨案。饱受殖民者经济掠夺、政治压迫乃至人格歧视之苦的武汉人民，从流血的惨痛中逐渐觉醒过来，反帝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汉口六一一惨案发生后，武汉学界致电北洋政府，提出收回英租界主张。当国民革命的烈火在武汉熊熊燃起时，武汉群众运动更以空前未有的声势蓬勃开展起来。1926年12月26日，在李立三、刘少奇、董必武等主持下，武汉各界群众分别在武昌和汉口召开反英大会，要求中国政府对英经济绝交，立即收回妨碍革命工作的租界。

因此，当一三惨案消息传来，立即激起武汉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当此之时，五卅惨案大仇未报，六一一惨案血迹未干，作为侵略中国历史最久、猎获最丰的西方列强，英帝国主义不仅毫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屠杀我民众之暴行，层出不穷，长此以往，吾民真无活命之余地！”英帝国主义的肆虐激起长期郁积于武汉人民心中的怒火，一场新的反帝革命风暴呼啸而起。

一三惨案当天晚上，在李立三、刘少奇的主持下，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通过了《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表示：“本大会誓领导我全省有组织之三十万工人，与英帝国主义奋斗到底！”通电提出六项要求：一、请国民政府收回英国租界；二、在未收回之前，租界当局应撤除电网、沙包等军事设施；三、由公安局派警察进驻租界；四、抚恤死伤者；五、英国政府应向我道歉；六、杀人凶手移交国民政府惩办。并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起，以最大之努力，扑灭此人类公敌世界恶魔之英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复仇，为全国同胞争生命之保障”。

1927年1月4日上午11时，武汉农、工、商、学各界200多个团体500名代表在汉口总商会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刘少奇阐述了湖北全省总工会提出的六项条件，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会议决议以六项条件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对英方针为基础，补充为八项条件：一、严重抗议；二、赔偿损失；三、惩办肇事凶手；四、撤退英舰及电网沙袋；五、撤销内河航运权；六、向我政府道歉；七、解除义勇队武装；八、由政府管理英租界。同时决定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全省总工会和武汉学联等团体组成“武汉市民对英外交委员会”，定于5日举行反英示威群众大会，声讨英帝国主义的暴行。



1927年1月5日，武汉市民举行追悼一三惨案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

带着会议达成的共识，李立三、刘少奇、林育南等到武汉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据此向英方交涉，限其 72 小时内答复。如不答复，即请政府封锁并收回英租界，收回关税，不负责在华英人的治安。受到广大群众革命热情激励的武汉国民政府，在关键时刻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一反帝爱国行动，宣布政府完全接受八项条件，表示“此次对英交涉，政府与人民完全一致，当取强硬办法，以慰人民之愿”。交通部长孙科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革命最后之目的，在打倒帝国主义而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为打倒帝国主义必须之权序。”

为了顺应革命形势发展，武汉国民政府派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张群到英租界巡捕房主持工作，并令武汉卫戍司令部派遣三个连的兵力，整队鸣号，全副武装进驻英租界。湖北全省总工会也抽调工人纠察队 300 人进入租界，配合中国军队维持秩序，许多民众和商店鸣放鞭炮以示欢迎。英侨民义务队百余名队员见势不妙，全部放下武器，在中国军队监视下登上江边的外轮。

武汉国民政府及湖北全省总工会的支持，使武汉人民备受鼓舞，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英浪潮。下午 3 时，许多工人群众拥入英租界，拔除电网、沙包等路障，张贴标语，捣毁英国义勇队司令部，拆除欧战纪念碑，封锁英国人商店，扯掉许多英国米字旗，“除了领事馆房顶上那面旗之外，英国旗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英国海军陆战队再次离舰登陆，但未敢进入租界街道，仅在江边岸上拉开戒备架势，枪口对准中国民众。面对群众炽烈的革命热情，驻汉外侨不知所措，纷纷躲避，以至于“在租界街道上连一个外国人的影子也看不见，只是在窗户口才有一些欧洲人带着吃惊的面孔探出头来”。

武汉各界妇女巾帼不让须眉，也积极投入反英斗争。当时中英双方对峙严重，租界一带气氛分外紧张，停泊在长江上的英舰卸下炮衣，炫耀武力。这时，湖北省妇协执行委员徐全直带领几名青年，划着木船靠近英舰，把写有英文的抗议传单裹在布球里，奋力扔上英舰，表明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决心。这一壮举被武汉人民传为佳话，如同战斗的号角一样，鼓舞着民众的爱国热忱和反帝斗志。



当天晚上，武汉民众更是高举火把涌进租界，直到深夜十一二点才逐渐散去。这时的英租界就像是经过一场战斗夺下的堡垒，荷枪实弹的中国军警在租界入口处警戒，“民众力量的象征”——工人纠察队持棍在街道巡逻，篝火在燃烧，照亮了夜空。

1月4日晚，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英斗争的方针策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对此次汉口英兵惨杀华人事件的态度》，明确提出“收回英租界”的战斗口号，并对5日反英示威大会会后群众游行是否进入租界的问题进行激烈地讨论，最后决定游行队伍进入租界。收回英租界的战斗即将打响。

民众反帝怒火大爆发

美国著名战地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全世界都知道，1927年5月的汉口是‘红色的汉口’，是左翼国民政府的所在地。”“这个城市在国外被广泛地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的首都。”红色的汉口上演了许多激荡风云、永载史册的革命史话，其中最激荡人心的篇章无疑是收回英租界了。

其实，武汉人民在历次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时，就曾不断地为收回英租界而抗争。早在1925年初的徐典事件中，武汉各界就提出收回汉口英租界的主张。1926年12月26日，大革命的巨浪汹涌澎湃，武汉市民20余万人举行盛大的反英大会，“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一三惨案的发生，更是引燃了收回英租界的导火索。

1927年1月5日上午，在湖北全省总工会的组织下，各业工会发动全市人民举行抗英同盟罢工、罢市、罢教一天，一时凝重的气氛充斥着三镇大街小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早上，工人纠察队隆重列队通过租界大小街道。中国士兵的岗哨很稀少。英美法三国兵舰在泊位上做好戒备……英租界的一切工商业活动都停止了。所有的墙上都贴满这样的标语和传单：“打倒英国帝国主义”，“不要租界，友好团结万岁”，等等。银行大门和领事馆围墙上也贴满了传单，一堆一堆的人群在那里围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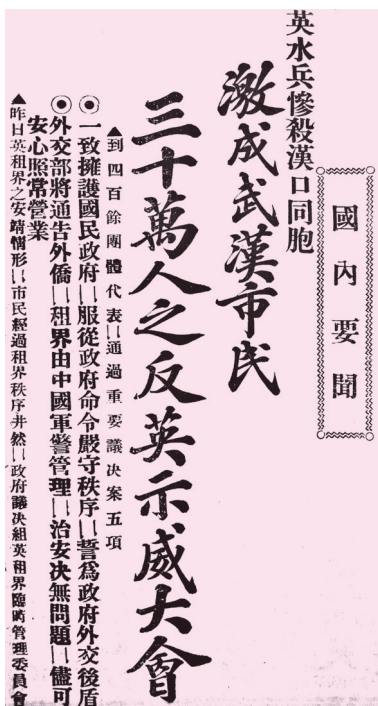
在画着英国人狼狈逃窜的漫画周围，哄笑声四起。”

追悼一三惨案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原定下午2时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广场举行，但一早就有湖北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和汉口一些团体的万余名会员、群众列队进入会场，足见武汉民众反帝决心之热烈、行动之迫切。

中午，乌云翻滚，天色阴暗，一场大暴雨即将袭来。会议正式举行时，广场上已聚满30万民众，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李国暄担任大会主席，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主席团成员。开会不久，便下起滂沱大雨。雨水淋湿了人们的头发

和衣服，时值隆冬，天气严寒，风雨交加，人们却是热血沸腾，斗志昂扬。整个会场秩序井然，自始至终洋溢着激昂奋进的氛围。当大会主席报告惨案经过，讲到同胞惨遭英国水兵残杀时，“打倒英帝国主义！”“坚决收回英租界！”的怒吼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大会强烈谴责英帝国主义杀戮中国同胞的罪行，并向全国人民大声疾呼：“事关民族存亡，望全国同胞一致声援，与英帝国主义决一死战。”与会群众一致要求为死难同胞报仇，将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大革命时期的武汉，一直处于疾风暴雨般的激越高亢之中，而每一次狂澜巨浪的掀起，都离不开李立三、刘少奇等一批共产党人中的弄潮儿。作为大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李立三、刘少奇迎着瓢泼的大雨，始终与群众一起站立在会场上。在会后的反英示威大游行中，他们又身先士卒，带领工人纠察队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与队员们并肩而战，沿途散发传单，振臂高呼“收回海关”“撤消领事裁判权”“行凶英水兵交国民政府惩办”



1927年1月6日，《汉口民国日报》“三十万人之反英示威大会”新闻



等口号。排山倒海的呼喊声，令帝国主义者闻之丧胆。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不惧风雨一路挺进。尽管李立三因收到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张国焘有关“游行不进入租界，以免引起帝国主义干涉”内容的便条，早在会议结束宣布游行路线时，就没有布置群众队伍进入英租界，但当游行队伍行经英租界附近时，群众再也抑制不住满腔愤怒，呐喊着直冲英租界。

顷刻间，英租界陷于愤怒群众的包围之中。为了阻止游行队伍进入租界，英租界当局关闭了铁栅门，设置了沙包电网，严阵以待。然而这一切并不能阻挡群众奋勇前行的脚步，工人纠察队海员区队队长周何亮带领队员乘着几只木划，由汉江口顺流而下，绕到江汉关旁，一跃登上租界趸船上岸，抢占了江汉关大楼。码头工人纠察队扛来跳板，用肩膀架起数条跨越铁栅门的冲锋之路，人群如洪流般越过沙包工事，越过一道道铁丝网，涌进了英租界。

英租界巡捕房见势不好，派出巡捕们妄图负隅顽抗。巡捕手持棍棒，殴打围观助威的群众，打伤 10 余人。工人纠察队火速赶到，当场制服逞凶的巡捕。怒不可遏的群众包围英国巡捕房，要捉拿幕后指使者，吓得巡捕们逃之夭夭。

作为汉口英租界的最高统治机关，英国领事馆也被群众重重包围。当时江面上有数艘英舰，可登陆作战的水兵达百余人，目睹英领馆被围，可是慑于民众的力量，也不敢轻举妄动。英国总领事葛福虽然留在馆内，但身处重围之中，昔日威风已荡然无存，不得不打电话请求国民政府派兵保护。

群众冲上英领馆的屋顶，一把扯下最后一面米字旗，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国旗，造成占领英租界的既成事实。望着自己的国旗在空中猎猎招展，在场群众莫不热泪涕下，欢声雷动，这是武汉人民第一次在外国租界发出扬眉吐气的欢呼。鲜血、热泪、呐喊，在如磐的风雨中交织着。

各路游行队伍以不可阻挡之势，从四面八方涌进英租界胜利会师，一时之间，整个租界万头攒动，反英口号响彻云霄。“平素阴森有鬼气之英租界，一时充满革命空气。”英租界内侨民惶惶不安，纷纷携带家眷撤往英商怡和、太古两轮船公司的商轮，来不及登船的英侨则暂避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货

栈内。“工人纠察队实际上控制了英租界，中国群众成为租界的实际主人。”

当时一名苏联驻华顾问团的译员深有感触地写道：我和别的同志一道去看夺回的租界。英国哨兵已撤除，在十字路口站岗的是工人纠察队。当看见我们时，他们脸上流露出胜利的微笑，把手中的棍棒摆向一边，学着军人的样子行礼。帝国主义分子不敢再在街上露面。武汉人民群众的民族尊严感迅速苏醒，猛然勃发出来。过去，外国人拒不付工钱、动辄打骂的现象屡见不鲜，而身受者自知外国人不好惹，只有忍气吞声。现在，一切都变了。中国人警告外国人不要忘记：在中国谁是主人，谁是客人？李立三也感慨道：“汉口收回英租界是群众在革命高潮时自发的行动。”

武汉人民收回英租界

1月5日下午4时，武汉国民政府借30万民众反英大游行之声势，宣布成立“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从即日起接管租界内一切治安、市政事宜。英国巡捕房、江汉关等地也高挂起中国国旗。这样，被英帝国主义霸占长达66年之久的汉口英租界，实际上已处于武汉国民政府管辖之下。

1月7日，在董必武主持下，以工人为主体的民众在武昌继续举行反英示威大会，以巩固战果，乘胜追击，迫使英方接受租界谈判。1月8日，“武汉市民对英外交委员会”为汉口惨案通电国际社会，表示“誓为死难之同胞一雪国耻”。

工人纠察队和各界群众一举夺回汉口英租界的喜讯，引起九江数万工人群众的一片欢腾。1月6日，九江各界数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喊出“收回九江英租界”的响亮口号，并冲入九江英租界。1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负责主持租界一切事务。九江英租界继汉口之后，事实上也收回了。

武汉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得到国内外的有力支持。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汉口事件宣言》，号召全国同胞一致行动起来，打倒英帝国主义！中华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界联合会、天津总工会等团体的声援通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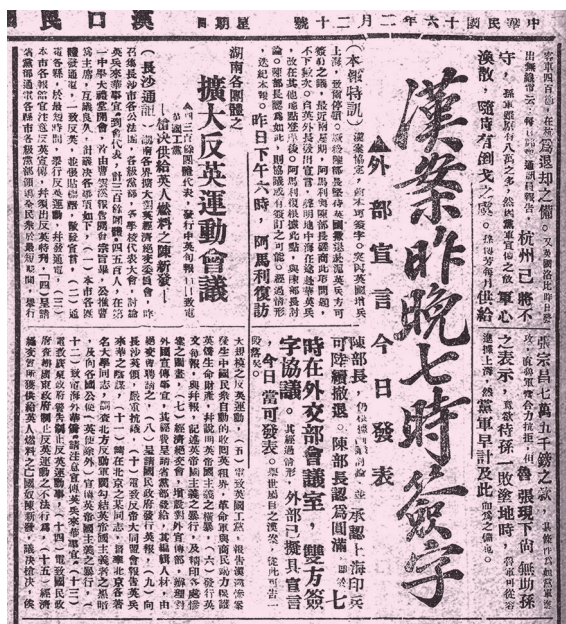
或宣言，如雪片一般飞来，更坚定了武汉人民的反帝决心。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保卫和支援中国革命。

英国在租界攫取了丰厚的利益，自然不肯轻言放弃。1月11日，英国驻华使馆参赞欧马利在军舰护卫下到达武汉，谈判解决汉口、九江英租界问题。甫一抵汉，欧马利就于次日迫不及待地要求国民政府“退还英租界，恢复以前状态”。这一荒唐无理的主张，遭到有“铁腕外交”之誉的陈友仁的严词拒绝。

1月15日，中英双方正式开始谈判。英国通过侵略手段攫夺了设立租界的特权，这次企图故技重施，再度凭借武力挽回败局。1月15日至20日，英方不远万里，从英国本土和印度调来大批军队开往上海，又派36艘军舰在长江沿线游弋，其中在汉口港停泊8艘舰艇，进行武力恫吓。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武汉国民政府没有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于1月22日对外发表宣言，阐明维护中国主权的立场，决不在炮舰的威胁下与英方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谈判遂告中止。

于英国国内施压，2月3日英方向国民政府表示愿意继续谈判。2月7日，双方谈判进入第二阶段。英方拒不执行从上海等地撤兵的先决条件，又使谈判陷入僵局。陈友仁为此提出书面抗议，揭示英国外相张伯伦所谓英兵驻华是为保护英国侨民的谎言。武汉国民政府坚持谈判的先决条件，终于迫使英方从上海撤军。



1927年2月20日，《汉口民国日报》报道中英双方签订《关于汉口英租界之协定》的情况

经过16次针锋相对的

谈判，欧马利越发理屈词穷，节节败退；陈友仁则据理力争，愈战愈勇。迫于中国人民的反帝浪潮和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2月19日，欧马利不得不与陈友仁签订《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次日又签署《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协定》。1927年3月15日，中英双方举行移交手续，中国正式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是大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被侵夺的主权，一洗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丧权割地的屈辱，在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武汉人民满怀战斗胜利的喜悦，迎来了英租界重返祖国怀抱的第一个初升的太阳。

（王 钢）



赤都武汉风云激荡

汉口特别会议的“特别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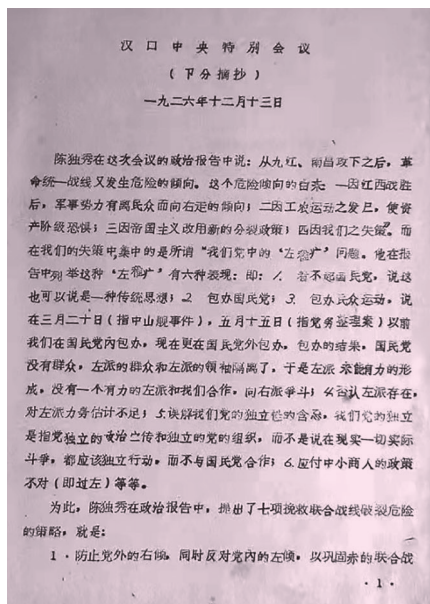
伴随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凯歌声，全国各地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在革命形势如火如荼之际，北伐军和革命阵营内部矛盾逐渐显露，国共两党的分歧冲突也潜滋暗长。

面对风云变幻的形势，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注意到，革命阵营中已经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方面是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日渐向左，一方面是军事政权由于恐惧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日渐向右。此种现象如不加以解决，只会导致革命阵营最终破裂，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因此有必要

对当前局势进行深入讨论，制定出符合时局发展的新策略。

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特别联席会议，出席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项英、李立三、董必武以及以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参会的毛泽东、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在当前革命形势下，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即两党之间的联合战线问题。

擅长演讲的陈独秀在会上滔滔不绝地作了《政治报告》。他根据形势



汉口特别会议内容摘抄

的发展演变，指出“最近九江、南昌攻下之后，这个赤色的联合战线又有发生危险的倾向”，并认为危险倾向产生的原因有四：一是帝国主义的分离政策；二是在统一战线内部，军事势力有离民众而往右走之倾向；三是大小商人对工人运动恐慌；四是共产党内存在“左（倾幼）稚病”。陈独秀认为国共两党统一战线中国国民党存在右倾分裂倾向，但他却并未刻意揭露国民党军事力量右倾的问题，反而强调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左稚病”，将国共矛盾的出现归结于共产党开展的工农运动和群众运动。

在讲到共产党的“左稚病”时，陈独秀情绪稍许激动地说：“国民党一些游移分子自湘鄂工农运动突起，即因恐怖而表现右倾”，并详加列举了“左稚病”的多种表现，如“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一切民众运动”，等等。

陈独秀批评共产党过度“包办”国民党，称“许多好的国民党分子说：‘我不反对 C.P. 赤的政策，所反对的是 C.P. 处处把持国民党工作，这就是我们同志包办的反响’”，指出正是由于共产党的包办，而割裂了革命联合阵营。

工农运动问题成了会议的争论焦点。报告中，陈独秀忽视农民运动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陈独秀主张将国民党的党政大权全部交由汪精卫控制，甚至连对共产党最为重要的群众运动工作也交由汪精卫来掌管。

陈独秀此话一出，在场成员纷纷窃窃私语，不知如何回应。这时，久未做声的毛泽东突然起身，发表不同意见。因为在会前，湖南区委曾经讨论湖南的农民运动，认为从湖南农运的发展趋势看，应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认为不仅不能压制工农运动，反而需要进一步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此时，身为中央执行委员兼湖南区委书记的李维汉起身附议，表示十分赞成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观点。

陈独秀却完全听不进去他们的意见，反而劈头盖脸地斥责湖南的农民运动进展已经十分“过火”，“妨碍统一战线”“动摇北伐军心”，再继续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势必导致国共统一战线受到损害，进而影响北



毛泽东

伐战争的进程。就在两方争论之时，苏联顾问鲍罗廷说道：马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条件不成熟，目前主要是要满足农民的减租减息、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等迫切要求。陈独秀随即说道：“农民晓得什么土地问题，就是晓得土地菩萨。”陈独秀和鲍罗廷都提出，不应以赞成不赞成解决土地问题作为是否左派的标准。

也许是因为曾经有过当兵的经历，与陈独秀一样习惯于拿笔杆子的毛泽东不仅重视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而且对枪杆子的重要性也有清醒认识。他已经隐隐意识到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的分裂危机和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危险，因此他在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可惜他的警告并未引起中共中央重视。

由于陈独秀、鲍罗廷等人意见占据了主导地位，最终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还是按照陈独秀的观点通过了《政治报告议决案》《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关于三省国民党工作议决案》等。《政治报告议决案》中表示：“仲甫同志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之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各种危险倾向，都是事实”，呼吁共产党各党政机关和个人都要严格执行陈独秀关于挽救危亡所提出的各项策略。“共产党只有防止自己的‘左’，才能搞好与国民党的关系，才能避免‘左’、右倾距离日远的危险”。总之，这次会议中所提出的各项挽救危机的措施之中，中心观点就是要“防止党外右倾，反对党内‘左’倾”。一方面限制工农运动，一方面试图在国民党内扶植汪精卫、唐生智等所谓“左派”、抑制蒋介石等右派，大搞所谓“国民党首领势力之均衡”。

特别会议通过的“特别”政策，实际上就是以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压制工农运动为代价向国民党进行妥协，借以维持已经危机四伏的革命统

一战线。瞿秋白在会后不久便撰文写到这次会议：“决定了一个杂凑的政策：一方面还要造成左派，别方面又认为现在已有‘非理想’的左派（伍廷康），总之，没有决定我们挺身领导。并且认为政府右倾，群众左倾，所以主张同时拉住些群众使之略略右倾，又推动些政府，使之略略左倾，没有下攻打右派之决心。”汉口特别会议召开后，其右倾错误方针随即开始在湖南、浙江和江苏等省落实。有些地方甚至针对工农运动的“左稚病”问题，对许多工会、农会进行清洗和限制，严重制约了工农运动的开展。



瞿秋白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召开。1927年1月底，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传回中国，陈独秀也匆匆忙忙赶回上海。当他从谭平山手中接过决议案时，内容却使他大吃一惊。斯大林不仅没有肯定他的想法，反而对其不重视土地革命的观点大加批评，并指出目前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

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就像一场及时雨，推动全国各地的工农运动继续发展高涨。

“首义之区”成为“京兆区”

武汉在历史上一直是我国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由于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和汉江的交汇之地，遂成汉口、武昌、汉阳三镇鼎立，隔江分治的格局。1927年，国民革命席卷长江流域，为武汉三镇第一次在行政区划上实现统一埋下了伏笔。

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武汉各界为北伐军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欢迎会。大会在武昌公共体育场召开，400余个群众团体、数万民众齐聚会场。只见会场内红旗摇曳，武汉三镇人民的脸上无不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所有人

都沉浸在革命胜利的喜悦之中。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华中重镇武汉已成为革命力量聚集地，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呼声随之日益高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 1926 年 11 月中旬作出了迁都武汉的原则决定，并于 11 月 26 日作出了迁都武汉的正式决定。11 月 16 日，由交通部长孙科、外交部长陈友仁、司法部长徐谦、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宋庆龄以及国民政府首席顾问鲍罗廷等 60 余人组成的调查团以调查党务、政务名义，先行从广州出发前往武汉。

此时，身处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湖北省政府主要领导人董必武在得到调查团来汉的消息后十分激动，马上开始着手筹备欢迎活动，派人将湖北省党部办公大楼清扫得一尘不染。考虑到调查团人员众多，董必武还命人将部分办公室整理出来，供调查团成员下榻。

12 月 10 日，董必武早早地来到汉口码头，等待着宋庆龄和鲍罗廷等

一行人的到来。随着轮船的鸣笛声由远及近，董必武张目眺望，终于看到了徐徐驶来的轮船。待船靠岸后，宋庆龄等人从船上缓缓走下，董必武激动地上前与宋庆龄握手，在短暂的寒暄之后，便引领舟车劳顿的众人先到住处休息。

12 月 12 日，宋庆龄、徐谦、吴玉章、孙科、蒋作宾、陈友仁、鲍罗廷等人紧急举行谈话会。会上，参会成员讨论十分热烈，鲍罗廷建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之前，国民政府最高职权



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现南洋大楼）

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代行。与会成员也纷纷表示自广州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停止办公以来，没有中央机关统揽全局，诸多党政事务无法有效办理，均表示赞同组成临时联席会议。

12月13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昌国民党湖北党部（今阅马场红楼，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宣布成立。联席会议成员有徐谦、孙科、宋子文、邓演达、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董必武、王法勤等。徐谦为主席，叶楚傖为秘书长，鲍罗廷仍为总顾问。管辖的地区有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贵州、四川、绥远、甘肃、陕西等11省。会后，由邓演达致电蒋介石，说明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系应付革命需要与时局之发展”，蒋介石迟至20日才复电表示赞成。

12月11日，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第二批北上人员百余人在谭延闿、顾孟余和何香凝等人的带领下，从广州出发，计划所有人员到达韶关后，中央各部部长由赣州前往南昌，职员则由湖南前往南昌，最后到达武汉。但经由南昌到汉人员却在南昌被蒋介石截留。第三批北上人员则走水路乘船经上海中转后至武汉。

经过国共两党人士之间不懈地斗争与努力，1927年1月1日，联席会议宣布国民政府正式开始在汉口办公，并发布命令：“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

“首义之区”成为“京兆区”，武汉三镇第一次在行政区划上融于一体。从1日开始，武汉市民连续3天举办了大型狂欢活动，有阅兵仪式、提灯会、舞狮子、唱大戏等庆祝节目，热烈庆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中华全国总工会：从羊城到江城

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其前身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召开，宣告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自成立之日起，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号召工人阶级为实现自身解放，实现民族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谱写下一曲曲中国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壮美华章。



刘少奇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全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湖北已逐渐成为“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心”。

1926年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为适应局势变化，决定派遣刘少奇和李立三前往武汉，领导工人运动。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在友益街2号正式成立，由李立三任办事处主任，刘少奇任秘书长，项英任宣传部主任，刘文松为组织部主任。办事处直接领导武汉国民政府管辖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人运动，

实际上代行了全国总工会的职权。

10月10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的指导下，湖北省总工会筹委会在宁波会馆召开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向忠发为委员长，李立三、刘少奇、项英为副委员长，分任总务、组织、宣传处长，许白昊为秘书长。省总工会下设武昌、汉阳、硚口三个办事处。

随着湖北省总工会的成立，武汉各工会像雨后春笋般地迅速恢复和建立起来。工人运动的全面高涨，工人地位的迅速提高也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度恐慌和不满。英国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轰轰烈烈的工潮问题。日本也针对工运问题，通过官方报刊对中国当局表示“警告”。

11月26日，驻武汉的各国领事团联合向武汉国民政府表示抗议，要求政府当局镇压工人运动。英帝国主义首先指使英属工厂关闭，迫使工人失业，还强制查封在上海英租界内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并强制关闭天津英租界内的国民党天津市党部。针对这些暴行，12月26日，汉口和武昌的人民群众分别组织策划了30余万人参加的反英群众大会。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摇旗呐喊，抗议英帝国主义暴行，要求国民政府与英断交。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武汉人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活动。3日，群众团体走上街头，发表演讲。英国水兵突然从英租界内冲出，

用刺刀刺向正在游行的群众，制造了一三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湖北区委、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和湖北省总工会紧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带领各界人民群众开展对英坚决斗争，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并进入汉口英租界。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武汉国民政府与英国严正交涉后收回了汉口英租界。

1月9日，湖北省总工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促进工人运动发展的措施。大会公开发布了由刘少奇起草的《大会宣言》，在总结工人阶级英勇斗争光辉历史的基础上，宣告：“工人阶级之奋斗，无一不是直接间接为民众争自由和为民族争独立”，并提出：“湖北工人阶级自‘二七’起，即已有其奋斗之光荣历史，最近之迅速进步，更使工人阶级对整个革命之责任日见重要。工人阶级自身亦明了其责任与地位。”

在大革命浪潮中，工人运动得到了快速发展，工人阶级得到了锻炼，思想觉悟普遍得到提高。到5月，全省计有产业工会59个，分部38个，支部1797个；职业工会63个，分部55个，支部593个；各县市工会62个。会员人数总计512727人，大约占全省80万工人总数的63%，占全国280万会员总数的1/6，成为全国工会会员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

为了适应北伐后国民革命的新形势，针对武汉已成为大革命中心的实际，为了更好地指导工人运动，1927年1月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通知湖北省总工会：全总准备由广州迁到汉口。李立三带领湖北省总工会立即回电，



中华总工会暨湖北省总工会旧址

表示热烈欢迎，并积极准备全总的迁鄂工作。

2月1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由广州迁至武汉，并在汉口正式开始办公。2月13日，全总向全国发表迁驻武汉通电，指出：“现以革命重心，转至武汉。长江各省工人之一切奋斗，影响中国革命前途，至为巨大。本会为欲指挥灵便，使工人阶级更勇敢参加革命而表现其更伟大的努力，特由广州迁来武汉，自后更当领导全国工人与全国各界同胞努力奋斗，以求革命之速成与民族的阶级的永远解放。”

刘少奇为欢迎中华全国总工会迁至武汉，特别起草《湖北省总工会告全体工人书》，指出：“全国总工会随革命环境的需要而迁至湖北，这是



项英

与国民政府迁鄂的意义一样，表示革命的势力已到中国的中心，革命势力已成为全国的中心势力了”。

鉴于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尚在广州，遂由朱少连、项英、刘少奇、李立三等人组织全总临时常务委员会，并选举由李立三代理委员长，秘书长刘少奇，组织部长袁大时，宣传部长邓中夏。3月30日，已被任命为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长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陪同在华南考察工人运动的国际工人代表团到达

武汉，受到武汉各界群众热烈欢迎。

全国总工会迁至武汉后，很快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大会上，工人代表纷纷建言献策，通过决议案30余个，并通过《全国工人阶级目前行动总纲》，主要内容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支持配合北伐战争，彻底完成国民革命，等等。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顺利完成了从“羊城”到“江城”的迁移。这时的全国总工会已在苏兆征和刘少奇的带领下，发展会员达289万人，并积极与国际工会组织联系，共同开展工人运动。这预示着

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仅有了完备的全国性组织，更会凭借不断的革命斗争，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中央执委电促陈独秀到汉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驻上海的中共中央从1926年9月起，就陆续调集党内精兵强将前往武汉，指导开展革命工作。从9月到12月间，中共中央先后调派彭泽湘、项英、林育南、罗章龙、陆沉、汪泽楷、聂荣臻、蔡畅、李硕勋等充实湖北区委领导力量，并调派张国焘、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吴玉章、恽代英、张太雷等先后前往武汉，领导开展工农运动、统战工作和军校工作等。加之早在湖北区委工作的董必武、陈潭秋、蔡以忱、许白昊、陈荫林、李求实、吴德峰等人，中国共产党内重要领导干部齐聚武汉，可谓众星云集，各项革命工作也因此开展得风生水起。

此时，中共中央机关迁汉不仅势在必行，而且事实上也正在进行之中。党中央机关由上海迁至武汉，不仅可以在革命中心就地指挥当地革命工作，应对时局变换，还可以及时指导周围湖南、江西、河南和广东等地党的工作。

但中共中央机关由沪迁汉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早在1926年2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就曾有过“中央选址问题”之议。会议认为中央机关“应在何地须视什么是目前党最主要的责任，何处是革命的中心，须视何地能更便利的执行党在最近将来之重要使命，能顾及党的全部工作，能建立党的中央完密坚固的组织”。会议还认为，中央已不适宜在上海；如北方国民军地位稳定，则中央决移北京，而上海设交通局，广州设临委；如国民军在北方失败，中央决移广州，后因故未迁。

北伐军攻占汉口、汉阳后，陈独秀不顾在汉部分中央委员提出的中央机关



陈独秀

由上海迁往武汉的多次建议，仍以上海是全国的中枢为理由，迟迟不愿将中央机关迁往武汉。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正式在汉办公。中共中央也一改往日立场，决定支持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这就加速了中共中央机关迁汉的进程。

由毛泽东担任书记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是首批迁汉的中共中央机构。1926年11月底毛泽东抵汉后，迅速成立中央农委办事处，指挥领导农民运动顺利开展。1927年5月14日，中共五大召开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农委改组为谭平山和毛泽东等10人组成，最初办事机构设于武昌三道街旧道尹公署，后将办公地点迁至武昌抚院街慈善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迁汉行动也开始较早。早在1926年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就在汉口成立了办事处，由李立三担任主任，刘少奇为秘书长，但全总在1927年2月才正式开始在汉口办公。1927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工人部和工委也在武汉成立，李立三为部长，工委由李立三、刘少奇、项英和林育南等7人组成，先期于汉口友益街2号办公，后改在华商总会办公。

1927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瞿秋白由沪抵汉。4月1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彭述之到达江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蔡和森也早已从国外动身，并比彭述之提前一个星期从广州出发，途经长沙抵达武汉。再加上早已受中央派遣到湖北兼任省委书记，为中共中央驻汉全权代表领导党务工作的张国焘，中共中央主持工作的5名中央局委员中，除陈独秀外均已到汉指导党的各项工作。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取得成功后，陈独秀又想依托上海稳住国民革命的大局，于是将中共中央迁汉问题继续搁置。他多次给吴稚晖去信，企图通过共产党自身的让步，稳住国民党左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抗国民党右派，以维护和巩固革命统一战线。

3月24日，蒋介石由安庆启程，前往上海。3月26日，中共上海区委会议召开，陈独秀在会上说道：“蒋在江西赣州杀工会委员长，打市党部，

打六军政治部，被杀害的都是 C.P.，在下关英美打死中国人一二千人，所以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我们把这问题联合起来看，所以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会后不久，陈独秀便得到了蒋介石来沪的消息，并察觉到了蒋介石的杀气。他在上海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说：“蒋来别有用心。”

4月4日，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和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共湖北区委成员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中央执行委员、湖北区委与共产国际代表组成联席会议常务委员会，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委，宣布中共中央汉口临时委员会解散。会后，常务委员会致电陈独秀，催请陈迅速来武汉主持中央工作。在陈未来武汉之前，这个委员会事实上行使中央的最高职权。

蒋介石到上海后不久，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中国共产党各领导机关遭受严重破坏，上海被白色恐怖所笼罩。陈独秀也惊险地在血腥风降临前夕下定了决心，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秘书厅主任王若飞于4月10日左右到汉，并在现胜利街163号、165号建立了中共中央办公处。中央组织部、中央妇女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工委及中央军委等部门也相继迁汉。

中共中央的整个迁汉过程以陈独秀于4月16日前后到达武汉为标志，以5月下旬周恩来率军委部分人员离沪来汉才告结束。武汉作为“赤都”，已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中枢、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在此带领和组织工农群众将革命斗争和反帝运动推向了高潮。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在大革命失败后召开八七会议。共产党人在武汉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内经历大革命由高潮走向失败，再转向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全过程。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征程。

（李 静）



讨蒋怒潮

蒋介石出尔反尔挑起迁都之争

1927 年元旦刚刚过去，正值武汉人民热烈庆祝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之际，一封从江西南昌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发来的电报，顿时给沉浸在喜悦狂欢中的大武汉笼罩上了一片阴云。

这封来电是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精心策划、一手炮制的产物。他勾结国民党老右派、中央常委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将由广州经南昌准备转道赴武汉的第二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滞留在南昌，并于 1 月 3 日在南昌召开所谓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不顾许多委员反对，借口“为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擅自改变原定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汉决定，提出让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在“东南底定”后再迁都南京。他还盗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名义致电武汉，蛮横地“命令”立即取消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改设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政治分会，公然挑起迁都之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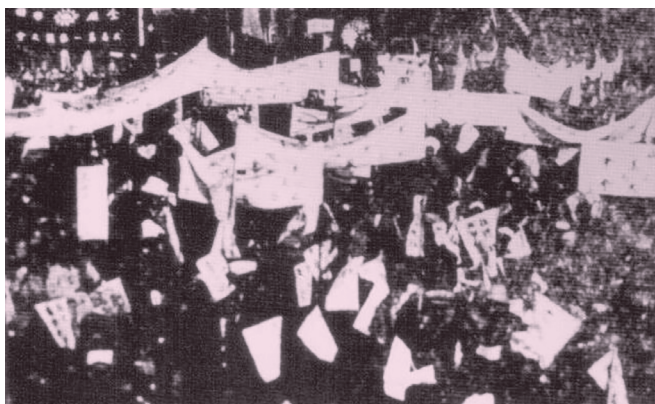
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让武汉三镇一片哗然，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成员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最早主张迁都武汉的也是蒋介石。早在 1926 年 9 月 9 日，也就是北伐军占领汉口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就急忙致电给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要求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到武汉主持工作。9 月 18 日，蒋介石再次给广州方面发电报催促此事。对于蒋介石迁都武汉的要求，广州方面并未立即答复，直至北伐军攻下武昌后才开会研究。10 月 15 日，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和各省区联席会议否定了立即迁都武汉的意见。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在 22 日第三次给广州方面发电报，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往武汉。

蒋介石这样再三地急切电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其真实意图有三，一是当时要求汪精卫回国与蒋介石分权的呼声很高，蒋有意把政治中枢迁汉，以防汪回国后在广州轻而易举地取得国民党领袖的地位。二是便于他亲自控制武汉政权，压制日益坐大的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三是还可以摆脱共产党领导下强大的广州工农革命力量影响。真可谓“一石三鸟”机关算尽，其核心是为了实现他遏制共产党和其他派系力量、实现其个人集权的目的。

1926 年 11 月，北伐军歼灭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占领了九江和南昌。至此，北伐前盘踞中国大部分土地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势力已基本消灭了两股，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政府北迁武汉的条件成熟。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为迁都问题，于 11 月 16 日派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徐谦、陈友仁及顾问鲍罗廷以调查党务、政务的名义，自广州启程北上，经江西赴武汉，筹备迁都。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兴奋异常，于 11 月 19 日致电张静江、谭延闿，表示“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与此同时，邓演达、张发奎于 11 月 23 日由武汉乘飞机到广州，催促中央迅速迁都。11 月 26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作出迁都武汉的正式决定。会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批北上。

12 月 2 日上午，蒋介石电请谭延闿尽快赶到南昌。同



武汉民众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日，受蒋介石之邀，于11月去武汉先行考察的迁都调查委员会宋庆龄一行到达南昌。加伦、邓演达、徐谦等也应邀到达。6日晚，宋庆龄、徐谦、鲍罗廷等人同蒋介石在庐山举行会议。蒋介石报告党务、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7日，继续讨论外交、财政、军事各方面的问题。会议中，有人提出取消主席制，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这是针对自己的，但他只能表示附议，蒋介石试探着提出请汪精卫回国，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散会之际，蒋介石像突然想起什么，起身问大家：“武汉的工人运动有点过火，国民政府在那里建都是不是没有南昌安全？”戴季陶等人立即附和起来，其他委员面面相觑。蒋介石的突然发难，给迁都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

12月10日，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徐谦、陈友仁、鲍罗廷等一行到达武汉，受到武汉民众的热烈欢迎。13日，为了不致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权力中断，已抵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各部长等举行谈话会，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鄂开会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会后，邓演达致电蒋介石报告此事，说明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系应付革命需要与时局之发展”，蒋介石迟至20日才复电表示赞成。对于联席会议的成立，蒋介石显然是持抵触态度的，认为是鲍罗廷利用张静江、谭延闿两主席不在汉的“间隙”而擅自成立的。由此可见，蒋介石对迁都武汉已心怀贰意，由提议、支持转为抵制、反对。

从提出迁都之议起，蒋介石就兴冲冲地准备到武汉执掌大权。现在临时联席会议居然没有他的位置，并且先斩后奏，这使他很不高兴。加上在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迁往武汉时，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武汉地区工农力量的增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团结合作，使蒋介石无法插手，个人集权独裁的目的无法达到。而在军事上，两湖已为唐生智所控制，其他军队也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无法控制。所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到江西去，不要两湖了”。由于想要两湖要不了，就改变主意，要把国民政府迁往南昌。因为南昌已在他的嫡系部队管辖之下，也是他的总司令部所在地，

如果定都南昌，自己就可以完全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

1926年12月31日，由粤赴汉的第二批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抵达南昌。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闻讯，一面着手欢迎，一面宣布国民政府于1927年1月1日在汉办公。同时决定，3月1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这样，历时一月左右的迁都工作已接近完成。然而，蒋介石公然出尔反尔，无视国民党中央多次决议和自己以往的主张，利用手中的军权，不让到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前往武汉办公。他还非法召集会议并发出电报，挑起迁都之争。



国民政府委员到武昌登岸时受到各界欢迎，这是当时最隆重的欢迎仪式

迁都武汉还是南昌，这并不是单纯的地域之争，而是国民党内集体领导与蒋介石个人专权军事独裁之争，也是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围绕迁都，在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右派势力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较量。

1927年1月6日，在汉的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致电南昌，针锋相对地表示：“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照已定策略来鄂。”以董必武、钱介磐等共产党员为中坚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国民党湖北全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也发出通电，表示对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深滋疑虑”，要求蒋介石“根据前议，定鼎鄂渚”。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也发表《国民政府迁移问题》，说明迁都武汉是有理有据、合理合法的必要之举和必然选择。湖北和武汉党、政、军各部门及各界民众都强烈呼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

府早日迁移来汉。

面对武汉方面在迁都问题上的强烈反应和据理力争，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前往武汉进行游说并一探虚实。

恢复党权运动

1927年1月9日，蒋介石亲自从南昌前往武汉，解释中央暂设南昌的理由，并敦促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立即迁往南昌。但他1月12日到达武汉后，发现他不仅要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氛围和要求迁都武汉的强烈呼声，还要面对方兴未艾的提高党权运动的冲击。

自北伐兴起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一直进行着“恢复党权”的酝酿和努力。从1926年底开始，国民党左派提出了打倒新军阀，提高党权的要求，形成了以发扬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遗教，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为中心内容的恢复党权运动。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试图将自己凌驾于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之上，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迅速予以还击，旨在重建国民党中央权威，限制、打击乃至剥夺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权力。这不仅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剧烈分化，而且对当时时局之后的国共关系演进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

在迁都之争中，蒋介石专横跋扈、出尔反尔的品性暴露无遗。但是，他的军队仍然需要武汉政府财政的维持，这迫使他不敢贸然行事。蒋介石来到武汉后，不仅迁都南昌的要求未被通过，鲍罗廷、邓演达等人的质问更使其倍感难堪，武汉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和提高党权的呼声也让他如坐针毡。他匆匆结束了武汉之行返回南昌后，随即提出驱逐鲍罗廷，并多次以中央名义电令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毋庸继续。

徐谦接到蒋介石要求撤销鲍罗廷顾问职务的电报后，非常紧张，立即电邀在宜昌工作的吴玉章回武昌商议，吴玉章表示：“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宋子文暂扣了蒋介石的军费，武汉方面还特地说明：“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办事不动。”

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南昌方面理屈词穷处境被动，而武汉方面则理直气壮，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广泛支持。同时，武汉方面又派人去南昌向一些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进行了解释说服工作，使他们对这种党内对立状态深感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南昌方面不得不重议迁都地点。2月8日，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581次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汉。这场迁都之争至此暂告一段落。但是，被蒋介石扣押在南昌的党政要员却仍然迟迟未能动身来汉。

2月9日，部分在武汉的国民党要员召开会议，推举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及顾孟余五人组成指导同蒋介石斗争的行动委员会，强调“从事党权集中”“军队在党指挥下统一起来，并准备与某系武装斗争”，发表“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等宣言。随后进行了一系列反对独裁、恢复党权的政治宣传工作。2月11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信，要使我们的党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关，真正能领导一切实际工作。”13日，宛希俨提出，国民党已经出现了一种“危机”，“失去民主集中制性质，而具有一种独裁的趋势。这种现象，我们如果再让他继续下去，将来势必会使党和个人两败俱伤。”15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邓演达、顾孟余、张太雷等30余人与会，由顾孟余报告党务宣传情形。会议通过《党务宣传要点》：一、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二、统一党的指挥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四、促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五、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六、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七、军队在党的指挥之下统一起来，准备与奉系的武装决斗。在此前后，安徽临时省党部代表团、第七军政治部等纷纷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一时舆论沸腾，群情激昂。

在恢复党权运动中，孙科、邓演达、徐谦尤为活跃。孙科曾激愤地对陈公博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他于2月19日发表文章，指责二届二中全会变更党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差



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邓演达也撰文指出：“国民革命的成功，总是工农的力量作主，不应再把政权操到其他反革命人们手上。”他要求大家认识目前斗争的性质，是封建与民主之争，革命与妥协之争，成功与失败之争。孙科、邓演达的文章反映出武汉国民党左派们的普遍情绪。2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候补监察委员扩大联席会议在武汉召开，决定即日起结束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汉正式办公，并决定3月1日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2月17日至26日，《汉口民国日报》连载邓演达的文章《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要求树立起党的权威，军事指挥必须服从党的领导。23日，《汉口民国日报》全文登载了邓演达主导制订的《中国国民党党务宣传大纲》，罗列了蒋的六大罪状：“第一是违背党章，第二是把持中央，第三是操纵党务，第四是妄用职权，第五是袒护反动，第六是反对决议。以致负有指导全国党务重责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能行使职权。”该《宣传大纲》无异于一篇讨蒋檄文。24日，邓演达主持了有五万人参加的党员大会并发表演讲，表示“要打倒个人独裁及一切封建思想的势力”，同时要求军事上也要“绝对服从党的指挥”。

尽管武汉的恢复党权运动如火如荼，国民党左派们也义愤满腔，但是对蒋介石仍然留有余地，期望他勒马回头。2月5日，根据邓演达的提议，武汉方面派陈铭枢、谢晋2人，携带26人的联名信件和拟在二届三中全会上讨论的各种提案前往南昌，和蒋介石商量。

蒋介石对国民党左派恢复党权的宣传极为恼怒。2月19日，他在南昌发表演讲，自称是“本党的忠实党员”“总理忠实的信徒”。2月21日在南昌行营总理纪念周作演讲公开批驳恢复党权运动，辩解说“党权本来是最高的，党权本是集中的”“党权无所谓提高”，又说：“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如果要提高党权，就要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在谈到左派反对其独裁倾向时，蒋介石声称总司令的职权“是中央党部和政府授予他的”，无所谓独裁，还指责“徐谦是独裁制的，他以没有根据的汉口联席会议，

自居主席……这才是独裁制”，更扬言“要制裁左派”。这些讲话，透露了他心中隐藏的杀机，预告了他要采取背叛革命的行动。但此时蒋介石的财政问题还未解决，不具备和武汉方面彻底决裂的条件。因此，在谢晋等人到达南昌后，他的态度不得不作某种“转变”。在听取陈公博的汇报后，蒋介石即命陈替他起草拥护中央的通电。2月27日，他发表《对党务宣传大纲宣言》，虽然语中含刺“个人之左右，固须严防；党团之操纵，尤须注意”，但还是表示，希望各同志“一致接受”。28日，蒋致电宋子文、孙科，声称“各同志所拟提案，皆中正夙昔主张，完全同意，深望党中同志共体党之存亡，一致团结”。

对于将在3月1日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也是尽其所能地敷衍塞责。2月25日，武汉方面派陈铭枢和谢晋前往南昌催请蒋介石及被扣留在赣的中央委员参加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要求二届三中全会延期一星期召开。武汉方面接受蒋介石的意见，随即决定将会议延至3月7日。蒋介石答应他与全体委员将于3月6日全部赴汉，但临行时又以自己要检阅军队为由让谭延闿等人先行。5日，在为谭延闿等人饯行时，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党部、政府迁鄂，南昌同志誓拥护到底。”但又说“能等我到3月12日开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否则“虚伪可知”。蒋介石一再迁延来汉，一方面是他认为“倘到武汉，必遭共产党扣留”，另一方面，他已下定决心要经营东南，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把恢复党权运动推向了高潮。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内容多集中于恢复和提高党权，取消主席制，采取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政的集体领导制；改组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和各部部长，推选汪精卫任中央常委、组织部长、国民政府委员等要职。蒋介石虽还位列委员，但已从权力巅峰跌落。蒋介石挑起的迁都之争，终以失败而告终。但迁都之争所引起的政治风波远未平息，国民党和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更为激烈。

南洋大楼的新决策

经过迁都之争和提高党权运动几番较量，蒋介石再也没有理由和借口将第二批迁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继续扣留在南昌。3月7日，谭延闿、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终于在千呼万唤、几经周折后到达武汉，随即被直接送入汉口南洋大楼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场，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不料会议尚未开始，却又节外生枝。谭延闿称，蒋介石、朱培德11日可到鄂，要求稍等一两天开会，“候其亲来，则两方意思可以调和”。李烈钧则表示：“希望国民革命早日成功，同志捐除意见。”徐谦报告了联席会议的成立经过，说明中山舰事件以来，党出现了迁就军事的不正常现象，他说：“为今之计，须赶紧纠正。此非对人问题，乃改正制度，使革命得最后之胜利而已。”会议就是否等候蒋、朱二人，延期至11日召开进行讨论。彭泽民、吴玉章、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顾孟余等认为到会人数已足，不能再延，一致要求当日正式开会。彭泽民说：“现在口号打倒独裁，打倒个人专政，因蒋、朱又不能来，而再展期开会，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吗？”吴玉章说：“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若一展再展，诚属非计。”恽代英也认为会议延展了两次，已经尊重了蒋介石的意见，开会日期已经公开宣布，如再推迟，则在报上发表似不好说。大家都感到党权有提高的必要，不能因蒋介石个人未来便改会期。随后，会议就是否已足法定人数进行讨论。谭延闿与吴玉章针锋相对，会议气氛顿时紧张。在主席询问是否付表决时，李烈钧宣布退席，致使会议气氛更形紧张。大会最终采纳了徐谦的建议，将当日会议作为预备会。

1927年3月10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汉口南洋大楼正式召开。出席大会的中央执监委员共计33人，其中，中央执行委员18人：谭延闿、孙科、徐谦、宋子文、陈友仁、陈公博、顾孟余、宋庆龄、何香凝、经亨颐、丁惟汾、王法勤、柏文蔚、彭泽民、于

树德、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候补执行委员 11 人：毛泽东、许甦魂、周启刚、夏曦、邓演达、詹大悲、陈其瑗、丁超五、董用威、朱霁青、王乐平；候补监察委员 4 人：谢晋、李宗仁、邓懋修、江浩。大会以谭延闿、徐谦、孙科、宋庆龄、顾孟余五人组成主席团，除谭延闿外，其余四人均为左派。谭延闿也在大会上表示：“此次为党的胜利，巩固党力使一切皆党的精神贯彻之表现。”

徐谦在会上作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经过情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

“试问现在是党的决议有效，是个人的意思有效？如认不能服从个人，就应该一致的拥护党。”在徐谦作完临时

联席会议报告后，大会通过决议，确认临时联席会议是适合革命利益、应付革命时机、代表中央权力之必要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所有议决案均有效。针对蒋介石一向指责临时联席会议是非法的、是没有依据的，二届三中全会以党的最高决议形式，充分肯定了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合法性。

3 月 16 日，大会通过了《对全体党员训令案》，指出北伐军兴后，权力集中于个人，军事不惟不受党之指挥，相反，党务、政务皆受军事机关之支配。党内昏庸老朽分子盘踞于内，官僚市侩乘虚而入，致使酿成了个人独裁军事专政的谬误，形成腐化投机的倾向，严重破坏了国民党的权威。在中央全会上，这种深刻揭露和严厉批判是对前期党权运动的继续和深化，并且是很有必要的。大会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判蒋介石，但其中所指不言而喻，而且言辞锋利，一针见血。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社会团体纷纷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盖的南洋大楼，武汉国民政府曾在此办公

呼吁“恢复党权”、“提高党权”、“一切权力属于党”、“反对军事独裁”，一时间口号、通电、决议此起彼伏，交相辉映，共同将“恢复党权”运动推向了高潮。

在深刻揭露和严厉抨击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同时，全会通过一系列党的决议案，从根本上恢复党权的至高无上。二届三中全会共计通过决议案二十项，其中包括《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中执会军委会组织大纲案》《统一革命势力案》《修正政治委员会及分会组织条例案》《军委会总政治部组织大纲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统一财政决议案》《统一外交决议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对全体党员训令案》等重要决议案。通过这些决议案，“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这些议案，“乃为适合中国革命之需要，将借此以防止党内投机腐化与个人独裁军事专政之倾向”。这些决议案处处彰显着党治的根本原则，恢复并确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最高权力地位。

在《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中，明文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每年开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权力机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每三个月开全体会议一次；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两会之间，由全体会议互选常务委员九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对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决议权。”同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都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进一步明确了党对政治、军事的领导。同时，决议案还废除了主席制，实行集体领导，实际上是解除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职务。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中，明确规定：“军事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所决议之重要议案及办法，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生效。”军事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军事工作，并且只成立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不设立军事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无形中取消了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3月15日，吴玉章提议“军人部无庸设立，应予裁撤”，获得了大会表决通过。为了进一步加强国民党对军

队的领导，防止军事将领个人独裁，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明确规定：“主席团之决议及发布命令，须有主席团委员四人签名，方生效力。”“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军长等职，由军事委员会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任免之。”“师长至团长及其同等级军官，由军事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通过任免之。”

在《统一革命势力案》中，提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组织两党联席会议，共同负担政治责任——应由共产党派同志加入国民政府及省政府。国共合作之初，共产党势力弱小，国共两党地位不对等，国民党是把与共产党的合作称为“容共”。中山舰事件后，尤其在北伐兴起后，在共同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斗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紧密团结在一起，结成了亲密的盟友关系，再加上共产党在领导工农运动、扩大革命宣传方面显示出了巨大能量，所以“容共”自然上升成了“联共”。同时，积极吸纳共产党人参与政权，也是对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排斥共产党人的否定。

针对蒋介石在进军东南的过程中，擅自与帝国主义列强私下接触的危险倾向，《统一外交决议案》明确规定：“本党党员对于外交方面，有擅自发表变更本党外交政策之主张，或直接间接向帝国主义列强接洽任何条件者，以违背党纪论，应予除名处分。”“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地区，所有外交人员，均由外交部直接任免，地方政府及军事长官，不得再有任外交涉员之事。”

针对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培植私人势力，大会决议将政治军事学校一律由校长制改为委员制，并加强党的领导。同时，针对蒋介石利用组织黄埔学生会、同乡会来发展封建依附关系，毛泽东



1927年3月10日，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开幕

提议：“黄埔学生皆党员，似不必有同志会之设立。凡同学会、同志会皆封建思想之嬗递，已不适宜于今日。故应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不应有同学会、同志会设立之条文。”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大会一致通过：“凡党立各学校不得有同志、同学、同乡会之设立。”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中，规定战时设总司令于军事委员会委员中，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之，并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出征动员令，须由军事委员会决议，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交由总司令执行之。北伐前夕，总司令权力极大，“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承其意旨办理各事”，总司令一人总揽党政军大权。新出台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将总司令牢牢置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管辖之下，总司令只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意志的执行者，而没有单独的决策能力。实际上，为了分割蒋介石的军权，徐谦曾在会上明确提出，总司令只战时设立，平时无设立之必要，总司令设多设少，尚未一定，“仅一总司令是不行的”。

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第二天，就对国民党中央权力机构进行了改选，推翻了中山舰事件后逐渐建立起的军事独裁体制，并完成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新建立起的国民党中央权力体制中，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是废除主席制，代以委员制，实行集体领导；其二是凸显了汪精卫的特殊地位，汪精卫在各项选举中，均以最高票当选，被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其三是蒋介石的权力失落较为明显。北伐前后，蒋介石一人身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军人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等显赫要职，权力之大，近乎于享有独裁权的“总理”。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对国民党中央权力进行了改组，形成了新的权力格局。新的权力安排致力于重建“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政治体制，并通过执掌最高党权的汪精卫，来实现国民党党、政、军权力系统新的整合。汪精卫在众人瞩目中重回权力中枢执掌大权，蒋介石受到贬抑，党政军权都被削弱裁抑。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掌控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坚持了孙中山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强国共合作，支持正在兴起的农民革命运动。并且实际上已剥夺了蒋介石所窃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从而大大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势力。3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举行就职宣誓。至此，新的一届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4月5日，武汉政府决定废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建立集团军，任命蒋介石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朱培德为预备队总指挥，杨树庄为海军总司令，这是武汉政府削弱蒋介石军权的重大措施。但是，蒋介石羽翼已丰，一周之后，蒋介石就利用他掌握的军权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总理信徒”变叛徒，反蒋怒潮涌大江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它使中国政治风云突变，造成革命统一阵线内部的巨大变动与分化。它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开始走向失败。

蒋介石的叛变行径激起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的强烈反对。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组织领导下，武汉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武汉民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

早在这年3月，蒋介石制造“赣州惨案”和“南浔惨案”，公开屠杀工农领袖的时候，就引起了统一战线内的公开反对。3月15日，中央农讲所赣籍学员为陈赞贤被杀害事件到汉口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严惩凶手！”的口号。3月17日，刘少奇发表《论陈赞贤同志在赣被杀害事》一文，指出：“江西这件事的发生是摧残革命，是革命战线内反革命的开始。”呼吁：“大



陈赞贤

家应一致起来奋斗，督促政府及党部肃清一切反动派并竭力援助江西革命群众，务必达到国民革命之完全成功。”20日，湖北省党部决议“去电责问蒋介石，并呈请中央严重处分及通电全国党部一致注意”。23日，省党部呈请中央党部“先免蒋总司令本兼各职”。后省党部再申前请，并要求“宣布罪状，开除其党籍”。3月20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议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一、请查办南浔惨案之祸首；二、请废除本校校长制，实行委员制；三、请抚恤南浔死难烈士。当日，武汉各界群众40余万人举行追悼鄂赣死难农工领袖大会，大会发出责问蒋介石的通电。孝感、蕲春也分别召开了倒蒋大会。

26日上午，中央农讲所召开讨蒋大会，会后全体学生上街游行，要求依法惩办蒋介石。当天下午，农讲所举行死难烈士追悼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的演出惨杀农工的事实，由此可证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准备着秣马厉兵，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

30日，董必武通过省党部呈文中央党部要求给蒋以严厉处分。4月4日省党部再次呈文，要求迅予免去蒋介石本兼各职，并宣布罪状，开除其党籍。在九江、安庆直接了解暴行真相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于4月9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长文，在列举事实后写道：“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在国民党内比党外的敌人还要危险。”“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地区广大群众掀起了反蒋斗争的新高潮。4月13日，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推动下，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为上海工人纠察队被缴械一事致电蒋介石和白崇禧，追查责任。14日，湖北省党部发表讨蒋通电，要求国民党中央“当机立断，命令免职，并调遣军队严加制裁”。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免去蒋介石本兼各职。16日，湖北省总工会发出讨蒋通电，表示“湖北五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誓死为诸同志之后盾，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打倒反革命派，打倒叛党国、

杀工人之新军阀蒋介石”。同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将领张发奎等通电表示要“下大决心，一致声讨，在中央惩办命令未下以前，更宜拒绝一切乱命，使无所施其诡计奸谋”。

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国民革命，决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宣布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的第一、二、三、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统归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辖。1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向全体党员发布训令，号召“对于蒋中正及类似蒋中正之一切反动派，严行肃清”。

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22日，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毛泽东、董必武等联合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名义，联名通电讨蒋，痛斥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指责蒋是“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反蒋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23日，在武汉军事学校的倡议下，军校全体学员和各界团体的革命群众30万人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武汉地区的反蒋斗争进入高潮。大会愤怒谴责蒋介石“视党国为可欺，视民众为可侮，视国人等更为己之工具。今者，结群小踞东南，偪仇敌而抗中央”，号召革命同志对蒋不容有“丝毫之姑息”，应与蒋“作百倍之奋斗”。大会主席蒋先云以其亲身经历，历数了蒋介石自中山舰事件以来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揭露了蒋介石一贯伪装革命的丑恶嘴脸，表示军校学生决心与之战斗到底。在此前后，《汉口民国日报》接连发表题为《不能再迟疑了！》等社论，指导反蒋斗争。武汉三镇，“打倒蒋介石”、“镇压反革命”的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大江两岸到处弥漫着浓烈的讨蒋气氛。

5月初，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蒋介石反革命罪状13条。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惩办反动分子案，决议开除胡汉民、吴

敬恒、古应芬等7人党籍，并决议重组政治委员会广东分会和北京分会。

反蒋怒潮也席卷了广大农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冈县属团风，回龙山、贾庙等地举行了约1万人的倒蒋大会和游行示威。5月1日，黄陂县举行了3万人的反蒋大示威，并罢工、罢市一天。黄安县举行了反蒋运动周。其他部分市县农村反蒋运动也有所开展。

6月19日至2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主席苏兆征致开幕词，指出了大会的任务是：“第一便要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第二要反对蒋介石屠杀民众；第三要与国民政府同生死；第四要帮助农民打倒封建势力。”在大会期间，各地代表在发言中提出了许多挽救革命的意见，主要内容包括反对白色恐怖，组织上海工人准备第四次大暴动，打倒蒋介石，并请国民政府明令讨伐等要求。

以武汉地区为中心的反蒋怒潮也席卷到了长江流域其他一些省份。在湖南，4月24日，湖南省总工会印发了《为什么要打倒蒋介石》（即《蒋介石的八十条罪状》）一文，该文全面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一系列罪行，并且得出结论说：“蒋介石从前是假革命，现在是反革命。”“蒋介石是总理的罪人。”“蒋介石是工人的死对头。”文章号召：“工人阶级一齐起来打倒反革命的蒋介石。”不久，长沙举行讨伐蒋介石及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示威大会，会后群众出发游行，各商店均停止营业，工厂、学校亦一律罢工、罢课。同时，湖南人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大同盟发出长篇宣言，指出：“我们应该认清我们的敌人，不仅是帝国主义和奉鲁军阀，尤其要打倒帝国主义的新工具蒋逆介石。”湘潭、湘乡、祁阳、安化、攸县、茶陵、益阳、南县、宝庆、汝城等县纷纷召开讨蒋示威大会。

轰轰烈烈的反蒋斗争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却未能打倒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这场斗争为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深刻的反思和沉痛的教训。

（张磊）

汉口宁波会馆欢声雷动

1926年9月，一位28岁的湖南青年风尘仆仆地从上海来到武汉，他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李立三。对于武汉，李立三并不陌生。早在1923年3月，他就受党中央派遣，在二七惨案后的白色恐怖下受命于危难之际，从安源来到汉口，担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他与秘书许白昊在汉口租了一间房子，挂上“湖南布庄”的招牌做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和领导工人运动。这次他来武汉，同上次一样也是肩负重任，负责在武汉筹建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以适应全国工人运动发展需要和配合北伐战争，推动长江流域革命形势发展。

李立三到汉口后，经过一番忙碌，顺利完成了有关筹备工作。1926年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在友益街2号正式设立，负责指导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川、江西等省的工人运动。

9月21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主任李立三召集下，94名武汉各工会代表聚集一堂，讨论工会组织原则和工会工作方针，并决定成立湖北全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这个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全总汉口办事处2人，武汉总工会4人，陈春和、朱菊和等基层工会成员9人。当天下午，省总工会筹委会讨论工作方针，并通过加强宣传工作等六项决议案，决定出版《工人导报》。

10月10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北伐军攻克武昌城的喜讯引起武汉各界万众欢腾，在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中，湖北全省总工会在



汉口宁波会馆召开成立大会。代表着武汉 80 多个工会组织、10 万会员的 5000 多名代表和来宾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华全国总工会，总指挥部，十五军政治部，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商会，国民党江苏、南京、湖北、汉口、武昌等党部，武汉各军政机关等均派代表莅会。

成立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拉开了帷幕。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执行委员的许白昊报告了湖北省总工会筹备经过。他开诚布公，希望各界指导工会工作，并呼吁给予援助。

大会最震撼人心的是发表《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宣言》。宣言回顾了湖北工会运动的历史，提出了今后湖北工人阶级的任务，即“本会成立，集中我湖北十余万工人之组织与力量，此后当更加奋勉，以拥护我湖北工人群众切身之利益与必要之自由，同时努力参加革命的政治斗争，造成革命的武汉，拥护革命的中心。”怀着激动的心情，郭沫若、耿丹、李立三等十余人分别代表国共两党相关党、政、军机关和各人民团体上台，或献词祝贺，或训勉鼓劲，发言酣畅淋漓，振奋人心。

在这次大会上，向忠发当选为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许白昊为秘书长（不久由刘少奇继任），刘文松任庶务部主任，吴明任宣传部主任，朱宝廷任交际部主任，刘少白任指导部主任，周兆秋任组织部主任。新成立的湖北省总工会下设武昌、汉阳、硚口三个办事处，以便就近指导工人运动。

湖北全省总工会的成立，使与会代表热情高涨。散会时，代表们高呼口号，并结队举旗游行。一时间，掌声、口号声经久不息，旗帜飞扬、欢声雷动的场面蔚为壮观，武汉工人运动复兴大潮汹涌澎湃。

伴随着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武汉各工会像雨后春笋般地迅速恢复和建立起来。这年 11 月，正式宣布建立的工会有 158 个，会员达 20 万人。不仅武汉工会组织蓬勃发展，湖北各大中城市也建立了统一的工会，而且大部分县也陆续成立了县工会。各地工人有了工会领导，斗争风起云涌。

1927 年 1 月，为统一、整顿、巩固工会组织，制定新的工人运动策略，中国共产党湖北区委和湖北全省总工会决定召开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车工、纺织、铁路、海员等 15 个湖北各业工会代表团的 588

名代表，代表全省 341 个工会的 30 万会员，齐聚汉口华商总会场，共商湖北工会发展大事。项英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大会上作《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李立三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和修改工会章程的报告，许白昊作工会经济问题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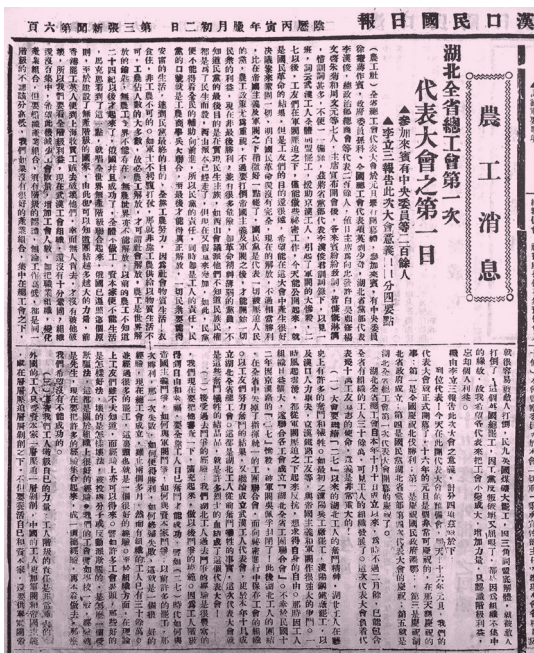
大会选举李立三、刘少奇、林育南、项英、许白昊等 35 人为省总工会执行委员。向忠发任委员长，李立三任外交主任，林育南任宣传主任，项英任组织主任，刘少奇任

秘书长，朱菊和任纠察队长，许白昊任经济斗争委员会委员长；通过了《全省总工会章程》《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以及执行委员会会务报告、组织问题、工会经济问题、宣传及教育问题、女工童工问题、纠察队、工农联合等 27 项决议案，总结了总工会成立以后全省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提出了新形势下工会工作的方针、任务，极大鼓舞了湖北工人的斗志。

会议闭幕后，湖北全省工会组织发展更为迅猛。当年 5 月，全省各产业、行业和县市工会组织发展到 376 个，工会会员发展到 51 万多人。湖北成为全国工会会员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

湖北全省工人运动讲习所名师云集

湖北各地工会组织的普遍建立和湖北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工运干部以充实革命领导力量。为适应工人运动新局面，湖



1927 年 1 月 5 日，《汉口国民日报》刊载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报道

北省总工会于1926年底创办了自己的干部学校——工人运动讲习所。

工人运动讲习所前后办了两期，开设有干部训练班、速成班、工人纠察队训练班等多个培训班型，报考的学员必须是“有从事工人运动的决心；有高等小学毕业以上的文化水平或常识较优者；身体强健无疾病能吃苦耐劳者”。

12月12日，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在武昌开班。学员120名，学期为一个月。林育南兼任讲习所所长，许之桢具体负责讲习所培训工作。速成班学员于1927年1月11日结业后，60名学员被分配到湖北各县和武汉三镇从事工运工作，另外60名学员则转到汉口举办的工人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培训班继续深造。

1927年1月21日，在刘少奇、林育南等人积极筹备推动下，工人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培训班在汉口宁波会馆正式开班，新招收的学员为120人，加上武昌速成班留下深造的60名学员，共有学员180人。培训班每周上课36个学时，为期一个月。培训班开课两周后，学员被转移到汉口球场路的德华中学内继续学习，直到2月24日第一期学员结业。在4周培训时间里，学员们进行着紧张而又充实的学习。每周七天，从上午9时到下午5时，他们不仅要学习《国民党农工政策》《劳工运动史》《中国民族运动史》《工会应用文》《国际政治经济状况》《社会主义浅说》等20多门课程，而且还要参加讲习所安排的每日2~3小时的军事技术、集会演讲、作文习字等实践课程。



湖北全省工人运动讲习所开学式

来给学员上课的，都是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袖。刘少奇、董必武、林育南、李立三、陈潭秋、恽代英、项英、许白昊、秦怡君、董锄平、袁达时、徐特立……讲习所请来的这些授课者，或曾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或领导参加过安源路矿罢工、省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不仅政治素质高，理论知识渊博，而且工运经验丰富。

讲习所安排刘少奇讲授《工会组织工作》《工会经济问题》等课程。为了让学员们了解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意义及如何从事工人运动，他费尽心思。带着自己深入基层调研后编写的《工会代表会》《工会基本组织》《工会经济问题》三本小册子，刘少奇走上讲台，有针对性地对武汉各工会实际存在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中国民族运动史》这门课由陈潭秋讲授。他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特别是在湖北武汉所犯下的侵略罪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课堂上，他教育学员明确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国现阶段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要求大家为完成此项艰巨任务而努力奋斗。

秦怡君是讲习所教员中少有的女性。她讲授《女工问题》课程。参加过英美烟厂罢工、在安源路矿教过书，作为中国代表出席远东劳动妇女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介绍中国劳动妇女斗争情况的经历，让这位时任湖北省总工会的女工部长讲起“女工问题”课来，更是得心应手。

除此之外，讲习所还安排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李立三讲授《罢工战术》《五卅运动》《苏俄状况》《国民革命与工人阶级》《湖北职工运动的状况及其趋势》《国际职工运动》等课程；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许白昊讲授《湖北工人生活状况及经济斗争问题》《湖北职工运动史》《湖北工人目前的经济斗争》等课程。

在汉口球场路德华中学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西式建筑里，在刘少奇、董必武、林育南、李立三、陈潭秋等人的精心指导和培养下，学员们明确了开展工人运动的目的、意义，也掌握了从事工人运动的实际本领。他们的思想觉悟、军事技术、文化水平均大有提高。学员们毕业后，大部分人被派往各地从事工运工作，并成为了当地工会的骨干，有的日后甚至还成

为杰出的领导人。

办学经费紧张一直是困扰讲习所发展的问题。第一期速成班学员毕业后，工人运动讲习所因经济原因而停止招生，以至于不少地区工会组织来函询问缘由，并要求继续办学。讲习所办学经费问题也引起国民党湖北省、汉口特别市两党部的关注。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上，办学经费紧张问题多次被作为议题进行讨论。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第二十五次会议上，詹大悲认为：“汉口方面工会今增至三万余，工人有三十余万人，纠纷时起，工人运动人才非常紧要。”会议明确汉口工人运动讲习所办学经费七千元由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预算拨给。

在国民党湖北省、汉口特别市两党部的重视下，工人运动讲习所决定继续招考第二期学生。3月13日，经湖北省党部工人部部长周廷墉、汉口市党部丁觉群、总工会许之桢等人会商，明确了讲习所办学经费、学校设施，经费支配等事项，同时还呈请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放枪支250杆、子弹2500排，以便学员开展军事训练。在各地不断高涨的继续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的呼声中，第二期招录学生的名额也由原先设定的80名扩大为240名，而且招生名额由国民党湖北省、汉口特别市两党部按照全省各地工运发展需要，分配给各级党部择优录取。讲习所办学经费也增加到两万元。

4月中旬，迁至汉口同兴里的工人运动讲习所第二期培训班开学。讲习所原定这一期工人培训时间为3个月，但因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各地国民党反动派以“清党”为名，查封、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武汉工人运动也受到压制。鉴于武汉革命形势日趋恶化，工人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不得不提前结业，历时4个多月的工人运动讲习所就此停办。

风起云涌的武汉工运潮

大革命的洪流，将武汉工人运动推向新的高峰。1926年秋，武汉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湖北全省总工会三个工会组织的相继成

立，以及武汉各行各业工会组织迅速恢复和建立，极大地促进了武汉工人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李立三、刘少奇、项英、林育南、许白昊、邓中夏、郭亮等一大批全国著名的工运领袖也相继来到武汉。他们在这里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巩固发展工会组织，团结工人恢复生产，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他们的领导下，各级工会纷纷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维护工人的利益，支持工人的合理经济要求，为增加工人工资、改良劳动条件进行斗争。1926年12月，在湖北省总工会的倡议下，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发起组织汉口劳资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久，该委员会对汉口工人工资、待遇、工时及学徒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决议了一个仲裁工资的标准：“五元以内者加八成至一倍，十元以内者加六成至八成，十五元以内者加四成至五成，二十元以内者加三成至四成，三十元以内者加二成至三成，三十元以上者酌量增加。”

工资标准的出台，令无数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为之欢呼雀跃。在各级工会组织的领导下，要求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的工人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如“夏水之暴涨”。汉口日租界洋务工会，武汉印刷、石印、铅印三个工会，汉口英、日轮船公司驳船工人，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工人，和记蛋厂工人，武汉店员总工会，湖北布、纱、丝、麻工会，机械工会，武汉装订木刷工会等都为增加工资、改良劳动条件进行了经济斗争。通过这些经济斗争，武汉工人的工资普遍得到增加，工作时间缩短，劳动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从1926年底至1927年7月，武汉大多数工人工资每人每月增加10元左右，劳动时间一般也缩短到10小时以下，部分工厂还实行8小时工作制，废除了资本家、雇主任意打骂和开除工人的特权，争得工人自由参加工会和革命活动等权利。

除进行经济斗争以外，武汉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也十分激烈。1926年11月，英美烟厂硚口新厂大班威斯克·布路克无故开除童工，引起工人不满。工人代表多次与厂方交涉，遭到英资本家拒绝。英方宣布停产，全厂3800多名工人面临失业。愤怒的工人纷纷来到厂工会门前，要求工会领导工人进行斗争。在湖北省总工会刘少奇、许白昊的领导下，英美烟厂汉口老厂



许自昊

工人成立罢工委员会，提出恢复工人工作、改良工人待遇等条件。英方厂主不仅不答应工人条件，还叫来七辆满载士兵的汽车，扬言要镇压工人。英方厂主的嚣张气焰点燃工人们的怒火。烟厂罢工委员会当即宣布罢工，并得到武汉人民的声援。全市 50 多个团体捐款救济烟厂罢工工人，市民们也纷纷开展“抵烟抵货”、拒用英钞、不为英国人服务等行动。经过两个月不屈不挠的罢工斗争，英方厂主最终同意接受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待遇和开除工人需

工会同意等 18 项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

工会组织更加巩固，工会数量进一步增加，工人战斗力进一步增强，让帝国主义分子如芒在背，想方设法予以破坏。1926 年底，英人控制的邮务当局以“借故开除普通职工、重要工会成员调离武汉”等手段，企图破坏湖北邮务总工会。在多次与英方厂主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工人们成立罢工委员会，发出《罢工宣言》，以致全武汉邮路中断，邮件堆积如山。邮务工人的罢工使邮务当局大为恐慌，后经过谈判，同意接受罢工委员会提出的条件。

(版二第)

(日三初月一十年寅丙曆陰)

報 聞 新

●漢口英美烟廠工潮之擴大

[illegible]

1926 年 12 月 7 日,《新闻报》有关汉口英美烟厂工潮的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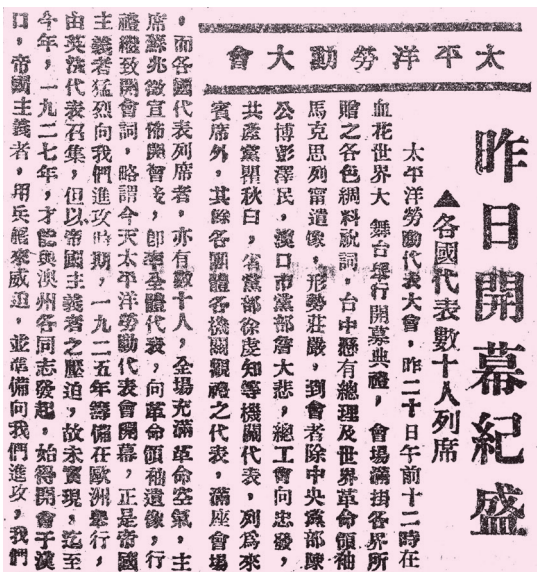
在大革命处于高潮的形势下，武汉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仅1926年10月至12月，湖北全省总工会指导了150个工会以上的经济斗争。特别是收回汉口英租界的伟大斗争和抗议英帝国主义派兵来华干涉中国革命的总罢工，更把武汉工人运动推向高潮。此时的武汉工人运动，已从单纯的筹建、整顿工会组织，发展到参与掌握政权；从单纯要求改善经济待遇，发展到参加生产管理；从一般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发展到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正义斗争。武汉工人用斗争火种引发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焰，为中国革命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血花世界响彻“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呼声

1927年5月20日中午，武汉最大的综合性文化游乐中心——汉口血花世界大舞台布置一新。舞台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和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庄严肃穆；会场内，张贴着社会各界发来的祝贺标语，鼓动人心。在浓烈的革命气氛中，太平洋劳动会议在这里举行了开幕典礼。

太平洋劳动会议是太平洋沿岸各国无产阶级与工会组织为反对战争，

支援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发起的联络会议。会议原定于1926年7月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但由于这次会议事先准备不周，加以各国政府干涉和路途遥远等原因，到会的仅有新西兰、澳大利亚、苏联、英国几个国家的工会代表，他们当即决定改开预备会议。鉴于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后表现出巨大的革命力量，以及中国工人运动在世界职工运动中日益重要的地



1927年5月21日，《汉口民国日报》报道太平洋劳动会议开幕盛况（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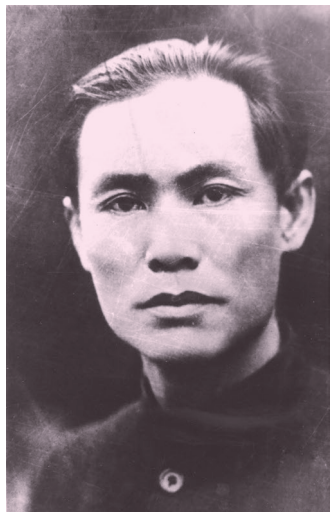
位，预备会议决议 1927 年 5 月在中国广州召开太平洋劳动会议。

1927 年 4 月中国政治局势骤变，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太平洋劳动会议举办地由广州改为革命力量集中的汉口，会议时间延迟到 1927 年 5 月 20 日。

这是一次凝聚太平洋地区 1450 万有组织工人力量和心声的国际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密切东西方工人阶级的联系与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殖民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开展本地区工人争取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的斗争。33 名来自苏联、美国、日本、爪哇（印尼）、朝鲜、法国、美国、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会议。其中中国代表有向忠发、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林育南等 15 人。此外，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党部也派出陈公博、彭泽民、詹大悲等人列席会议。

苏兆征主持大会开幕典礼。他报告了太平洋劳动会议筹备经过，阐明了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和任务，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如能早日成功，世界各帝国主义的崩溃自在目前，故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与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其利害是分不开的。”

中国代表团推出 2 名代表，各国代表团各推 1 名代表，组成大会主席团。



苏兆征

会议从 5 月 21 日起，由各国代表相继作报告。大家围绕世界有关工运的重大问题，报告了本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和问题，引起热烈讨论。中共代表瞿秋白说，在西欧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处于低落、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稳定之时，中国的上海工人却在五卅运动中向帝国主义宣战，并且发展为全国工人阶级的运动，“于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就把这种资本主义的稳定打破了”。他坚信只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作战，“一定可以打倒蒋介石和一切反革命的”。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刘少

奇在会上明言，中国工人阶级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生力军。他以湖北应城矿工好几个月不能出洞，工资少得可怜为例，指出中国工人的生活的痛苦，号召中国无产阶级觉悟起来、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进攻，联合起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太平洋各国的无产阶级，把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

会上，苏联代表蔡米洛夫发表演讲《世界职工运动与中国革命》，法国代表拉克门报告法国职工运动状况，朝鲜代表、爪哇代表也进行了慷慨激昂的发言。赤色职工国际委员会委员长罗佐夫斯基发表题为《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职工运动》的报告，他说：“中国的革命与俄国的革命相似，相信中国革命力量一定可以战胜反动势力，一定能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对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轰击，为真理而斗争，成了与会代表的共识。

帝国主义在远东争夺殖民地问题，也是会议关注的一个焦点。代表们认为争夺殖民地冲突日益激化，造成了太平洋战争的严重危险，而这种战争的爆发只会给世界工人阶级带来巨大的牺牲和无限的痛苦。因此，会议决定动员“太平洋各国的工人阶级一致来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会历时7天，共通过《反对英、日、美等帝国主义者酝酿第二次世界大战》《联合世界各工会，对中国革命加以援助，并将帝国主义之势力逐出中国之外》《赞助中国革命事业，并祝其早日成功》《组织超越国境、种族之职工国际，以期统一全世界之劳动运动》等20个决议案。特别是《经济



汉口普海春饭店——武汉方面在此欢宴太平洋劳动者大会代表



计划》决议案对太平洋沿岸各国的劳动运动和劳动状况作了一系列的判断，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施行工人保险”“禁止妇女做夜工”“禁止雇用十四岁以下之童工”“集会、结社、出版、罢工之自由权”等 10 项经济纲要，并号召太平洋沿岸国家、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工人阶级以此为奋斗目标，通过广泛地向劳动群众宣传，让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进行有决断、有计划、持续不断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接受条件，以改善太平洋地区工人的劳动待遇。

会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近几年来中国职工运动异军突起，其组织程度和斗争的坚决，“比西方各国的革命势力还要进步些”。同时，还决定在上海设立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作为该会的常设机构，选举苏兆征为首任秘书处主席，负责召集会议，研究有关问题，并发行《太平洋工人》和《太平洋劳动大会公报》为机关报。

5 月 26 日，大会举行了闭幕式。赤色职工国际委员会委员长罗佐夫斯基在闭幕词中说：“以前太平洋各国无产阶级，均各自为战，此后既有了统一指挥机关，当会一致的团结起来，对着我们的敌人共同进攻。我们的决议案是很光明正大的，我们要努力去实行！”

太平洋劳动会议闭幕后，各国代表还深入到粤汉铁路总工会，震寰、裕华、申新、泰安等纱厂，福新面粉厂等工厂工会参观访问，调查了解工人的工作生活情况。为支援英美烟厂失业工人的斗争，代表们还两度访问英美烟厂，并通过太平洋劳动大会秘书处电告全世界，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

太平洋劳动会议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下成功举办，不仅鼓舞了正在为挽救革命危机而进行艰苦斗争的武汉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无产阶级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且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展工人运动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它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所承办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更是中国共产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一个里程碑。

迟到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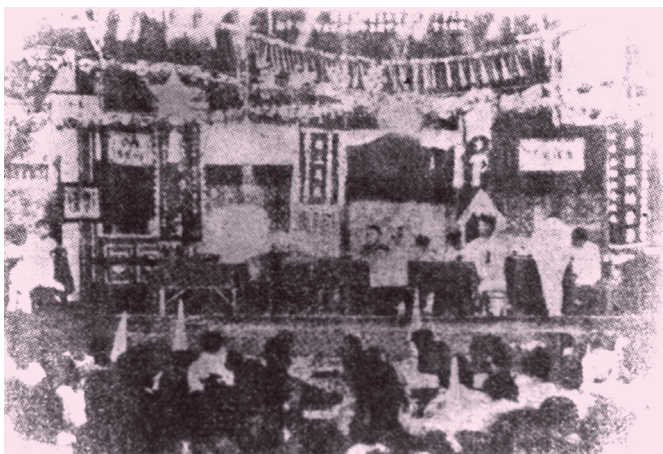
1927 年春天，本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但刺骨的寒意仍阵阵袭来。反革

命势力与革命势力短兵相接，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工会被破坏；大革命高潮中发展起来的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被镇压；共产国际错判形势、中共中央右倾机会主义者幻想以妥协求得联合；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经济利益冲突日益尖锐……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为挽救中国革命，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

全国劳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后，原拟1923年五一节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但因二七惨案发生，白色恐怖下武汉工运陷入低潮，因此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都在广州举办。武汉成为大革命中心后，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原定于1927年5月1日在汉口举行，又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各地反动派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工运骨干，加上要在武汉筹备召开中共五大和太平洋劳动会议，因此，“好事多磨”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就延期到省港大罢工两周年纪念日——6月19日在汉口举行。

在汉口血花世界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邀请了全国各地的工人代表、各党派、武汉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赤色国际及美、英、日、印度、苏联等国代表420名出席，代表全国有组织的工人290余万，同时武汉2000多名工人代表列席旁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致大会的信中，分析了革命发展的严重形势和中国革命运动出现的深刻危机，向大会提出了战斗任务：工人阶级要领导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向共同的敌人作战。

6月19日下午3点，在工人代表的关注目光下，大会主席苏兆征宣布第四次劳动大会开幕。他阐述了大会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盛况



召开的意义,揭露蒋介石集团与帝国主义者勾结破坏中国革命的罪恶行径,号召工人群众要紧密团结,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武力干涉中国,反对蒋介石集团屠杀民众,要全力帮助农民打倒封建势力。

中共中央向大会发出贺信,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会上发表了演讲,李立三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赤色职工国际委员会委员长罗佐夫斯基作世界工人运动的报告,苏兆征作海员总工会报告,刘少奇作中华全国总工会报告,罗珠作香港总工会报告,向忠发作湖北工人运动报告。

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中总结: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届执委会带领、指导全国工人阶级进行了政治、经济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如组织工人支援北伐战争,领导省港大罢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全国工人一小时总罢工,指示各地工会通过斗争不断改善工人生活等;如有组织的工人数量由第三次劳动大会时的120万,增加到现在的290万等。全国工会会员队伍空前壮大,工人运动空前发展。同时也指出,由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兼职过多,不能集中力量主持总工作,因此建议第四次“劳大”能够选出优秀的同志,加强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中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这份数据真实、观点鲜明的报告,得到与会代表的肯定。

面对当时严峻而恶化的革命斗争形势,广东、四川、江西、湖南、北方、大连、上海以及铁路工会、电报工会、邮务工会等代表围绕如何挽救中国革命的中心议题,纷纷建言献策。“反对白色恐怖;上海工人正准备第四次武装暴动,以打倒蒋介石,并请武汉国民政府明令挥师讨蒋;要求在上海召开第五次劳动大会;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没收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产业;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国民政府不要对反革命优容,要求国民政府举行第三次北伐;请总工会派代表到北方去领导工人运动;共产党是真正为工农谋利益的,国民革命没有共产党的参加是不会成功的。”这些建言多被大会采纳。此外,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共产党代表蔡和森、共青团代表徐伟、国民军总政治部代表郭沫若也先后发表演说。

在这次大会上,已决心“分共”的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仍然装模作样、言不由衷进行欺骗性表演。6月22日,汪精卫在大会作报告时阳奉

阴违地表示：“我们的革命势力本来就是以工农为中心，同时也要顾虑到同盟者。现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在这一点上努力，外面的离间不足听，我们的工友农民也不会受其愚弄。”“反对帝国主义，使革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路上去，这是国民党左派依总理的遗嘱实行的。”“最后，我还要竭诚告诉大家：每个国民党同志都是始终与工农同生死、共患难、共甘苦的。”在会场上“慷慨陈词”的汪精卫，实际上却对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极端恐惧和仇视。他一再诬蔑工农运动“幼稚”“过火”，以武汉国民政府名义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禁令，并刚刚与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达成“分共”协议。

这次在危机四伏中召开的大会一共进行了10天，讨论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反法西斯主义及对法西斯工会斗争决议案》《湖北工会运动决议案》等13个决议案，特别是《政治报告决议案》提出：作为“中国革命的先锋”的工人阶级“当前在政治上最大的责任是：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及一切革命人士，向反革命的中心英勇进攻，务于短期内将其彻底消灭”，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洗礼中的觉醒；大会选举苏兆征、李立三、邓中夏、林育南、刘少奇、项英等35人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6月28日，李立三代表主席团致闭幕词，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胜利闭幕。6月30日，新选出的执行委员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苏兆征为委员长，林育南任秘书长。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是在国民革命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召开的，由于共产国际的决策失误及党内右倾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为挽救革命而制定的一些正确方针策略并未得以执行，也没有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有效反击，会后不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但这次大会的召开犹如隆隆敲响的战鼓，极大地振奋了处于革命低潮中的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的信心，动员和组织起中国工人阶级为中国革命团结战斗，在中国工运史上留下光辉一页。

（徐志刚）



湖北农民解放的新纪元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城的硝烟还未散尽，汉口《楚光日报》就登载了一则启事告知社会各界：“湖北省农民协会于1926年10月15日迁往武昌三道街旧道尹公署。”这则并不起眼的启事，犹如一声惊雷，宣告湖北农民协会结束了秘密活动时期，正式挂牌转入公开办公，大革命时期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在荆楚大地上翻开了新的篇章。

武昌三道街旧道尹公署成了湖北省农民协会

湖北农民运动是在1925年反帝运动的深入中兴起的。“五卅惨案”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汉三镇举行了罢工、罢市和罢课的全市大游行。因湖北督军萧耀南对群众运动进行残酷镇压，中共湖北地区负责人陈潭秋遂决定把运动扩大到农村，组织在武汉念书的进步学生回乡开展平民教育，组织农民夜校和群众性的革命团体，在农村中扩大影响，发动群众。这些学生回乡后，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反帝外交援助会等，进行反



湖北省农民协会告农民

帝斗争。当时，在黄陂、黄冈、黄梅、沔阳、天门等县市的革命群众团体和平民学校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随着革命思想的深入宣传，黄冈、黄安等县先后建立了党组织，这为农民运动的开展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925年12月，共产党员

陈荫林召集黄冈、黄安、黄梅等 10 余县的农民协会代表召开会议，筹建全省统一的农民协会组织——湖北省农民协会。1926 年 1 月 2 日，湖北省临时农民协会在武昌抱冰堂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湖北省农协临时执委会，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部合署办公；规定了当前农运的主要任务除领导农民为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奋斗外，还应参加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同年春，陈潭秋委派陈荫林、王平章、刘子谷三人成立了湖北农民运动委员会，负责全省农民运动，其秘密机关设在汉口堤街巷 3 号。

这一年，湖北遭遇严重旱灾，69 个县中有 64 个县受灾，农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地主恶霸反而积谷居奇，不肯减轻地租，逼得农民只能靠草根、树皮、观音土充饥。农民们对地主恶霸积怨已久，反抗火焰一触即发。于是，回乡的学生党员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成立农民协会。

湖北农民运动委员会和国民党湖北省农运机构的组建，直接促进了湖北农民运动的发展。北伐军进军湖北，推翻了北洋军阀在湖北的统治，推翻了湖北地主豪绅的靠山，扫除了农民运动最大的障碍，为湖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湖北农民协会就于 1926 年 10 月 15 日迁往武昌三道街旧道尹公署，正式挂牌办公。

公开时期的湖北农民协会与秘密活动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在这一时期，湖北省农运特派员来到农村后，一般会先成立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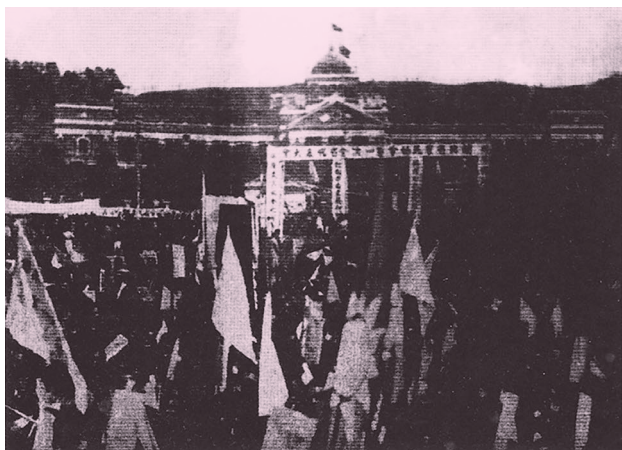
夏口县农协代表合影

组织党员、农运干部和进步学生等到各地发动和组织农民，成立当地农民协会，也就是公开自上而下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其次，这时期除了党员、农运干部和进步学生深入农村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外，农协还充分利用戏剧、演讲和联合各革命团体召开集会等形式，向农民广泛宣传反帝反封建，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这与秘密时期农协主要靠个别串联方式发动农民相比，方式更加多样化。

“一切权力归农会”

随着北伐军节节胜利和湖北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在短短几个月内，湖北农协会员就扩大到 40 余万人，农民协会的发展，使农村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为了迎接农村大革命风暴的到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部决定召开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于 1926 年底开始着手筹备，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部推定陈荫林、陆沉、郭树勋（郭述申）、符向一等 11 人为委员，组成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大会的准备工作。

1927 年 3 月 4 日上午，湖北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湖北省党部大会堂隆重召开。大会的会场布置得庄重热烈，门口扎有一座大牌楼，会场四周悬挂着“保障农民势力”“打倒土豪劣绅、实行乡村自治”“速开国民会议、省民会议”等标语。旁边装有红绿色电灯，夜间灯火辉煌，极



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为夺目。大门两旁各横挂有长十余米的标语，明确指出了在农村大革命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阶级路线和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

大会主席台正中，悬挂着孙中山遗像，四周为各团体祝词。

其中有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农工联合万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革命基础”，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谁是革命的创造者”和中国济难会湖北省总会的“用我们的锄头，开我们的路”等，还有一些描写农民苦难生活的油画。

大会到会代表 169 人，农运特派员 34 人。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北伐军总政治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等 60 余团体派代表参会。由陆沉、陈耀寰、刘子谷、吴运中、何耀祖、张眉宣、高以山、王平章、程建勋、张佑金、董华缓等 11 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徐谦、毛泽东、李汉俊、林祖涵等 8 人为名誉主席。

大会由陆沉致开幕词，开幕词对湖北省的农民运动作了充分的肯定和颂扬。相继发言的有董必武、李汉俊等。发言针对一些人攻击农民运动过火的言论，指出农民运动不是过火，而是远远不够。农民应紧密团结在农协会周围，向土豪劣绅更加勇敢地进行斗争，铲除一切封建势力，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

李立三代表全国总工会发言，孙科、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武汉国民政府发言，邓演达代表北伐军总政治部发言。夏口、武昌、汉阳三县农协代表分别在大会上介绍了本县农协组织建立、发展的经过和农民运动的情况，并向大会提出了拨款修堤、组织农民自卫军、请政府拨田给农民耕种、惩办土豪劣绅、建农民子弟学校、办农民银行等要求。大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乡政、武装、工农商学兵联合、地租、雇工、土地、农协组织等 35 个问题的议决案，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和省农民运动委员会。

4 日下午，武汉各界几十万群众在武昌阅马场举行集会，热烈庆祝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顺利召开。5 日出版的《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日刊》第二期记载了这次集会的盛况：“到会农民及其他各界同



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纪念章

胞 50 余万人。武汉三县农民多从数十里至数百里之外赶来，乡村为空，农友均手持县农小旗，上书“拥护我们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打倒土豪劣绅”等字样，情形极为壮观。一时群龙舞动，鼓乐喧天，欢声震耳，炮声震天，是武汉空前未有之盛举。散会之后，复有各区农友源源而来，计来赶到开会者有数万人之多，未能与会之农友，大为扫兴，晚间复演电影，观者人山人海，至深夜始散。”

大会闭幕后，湖北省农民协会整顿内部各项工作，于 3 月 24 日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决定湖北省农民协会下设组织、宣传、教育、自卫、建设、调查各部，推举陆沉为省农协委员长，陈荫林为副委员长，蔡以忱为组织部长，张学武为宣传部长，郭树勋为教育部长，邓演达为自卫部长，张眉宣为建设部长，符向一为调查部长，邓雅声为秘书长。

湖北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对农民运动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使湖北农运出现空前高涨。这次大会成为“湖北农民解放的新纪元”，大会以后，在各级农民协会组织和领导之下，湖北地区的农民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仅 3 个月，农协会员就由 80 余万猛增至 284 万，土豪劣绅的气焰遭到了沉重打击。随着运动日渐深入，湖北农民在广大农村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威风扫地殆尽，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

湘鄂赣农民运动的发展

北伐战争的胜利，扫荡了北洋军阀在南方的封建势力，北伐军所到之处，军阀统治被推翻，工农群众运动立刻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表现得更为显著，其中首先高涨起来的就是农民运动。从北伐军进入湖南到第二年初，湖南农民协会会员从 40 万人激增到 200 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 1000 万人，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在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平江、衡阳等县，几乎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民协会的组织中。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由北伐前夕的 7 万余人激增到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 80 余万人，出现了农民

协会组织大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与此同时，党组织也在农民运动基础比较好的黄冈、黄梅、黄安、汉川、咸宁等县领导农民开展了政治、经济的斗争，并取得了很大胜利。江西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926年10月间也有5万多人。第二年初，会员发展到30多万人，几个月内发展了5倍多。在农民运动大发展的基础上，1927年2月，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农民协会宣告正式成立。省农民协会成立后，在全省农村掀起了政治、武装斗争的大风暴，农民运动达到高潮。

1926年11月，在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主持下，中央农委拟订了《目前农运计划》，强调发展农民运动应采取集中的原则。《计划》指出全国除广东以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为了便于集中指导湘、鄂、赣等省的农民运动，还应在汉口设立农委办事处，在武昌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接着，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武汉并亲自赴江西、湖北、湖南，同三省国民党省党部商议在武昌开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经费、选派学员等问题。

毛泽东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国民党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党部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1927年1月17日，湘鄂赣农讲所筹备处委员会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内。正当农讲所筹备工作即将就绪的时候，隐藏在统一战线内部代表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首领蒋介石在南昌造谣说“农讲所不办了”，并扣留了江西省提供的农讲所办学经费，阻止江西学员来武汉入学。以毛泽东、董必武、邓演达为代表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不顾蒋介石的阻拦，仍抓紧筹备。不久，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紧急会议，为了挫败蒋介石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年的大门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的反革命阴谋，适应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决定将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改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由 600 人扩大为 800 人。

在以董必武、钱亦石等为主要领导人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湘、

赣两省同志的努力下，经过几个月的积极筹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于 3 月 7 日在武昌都府堤正式开学。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湘鄂赣三省培养了大批农运干部，学员结业后奔赴农村从事农运工作，促进了三省农民运动的发展，也成为武昌撒向湘鄂赣乃至全国各地的革命火种。学员桂步蟾、李骏、陈振文等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奋不顾身，冲锋陷阵；戴克敏、汪奠川、刘文蔚参与领导黄麻起义，对鄂豫皖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作出积极贡献；程伯谦回到家乡江西横峰县农村，在方志敏的领导下，组织发展了 36 个农民革命团，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葛源暴动；三湾改编时，学员陈慕平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再次见到“毛泽东老师”，后来他积极穿针引线，促成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落脚，为创建党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残酷的斗争中始终高举武装斗争旗帜，英勇奋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土地会议没能解决土地问题

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在湖北的某些县，农民自发起来没收地主的土地，并进行分配。湖北黄安牌坊店，农民协会没收大地主的九石良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黄梅县独山农民已做了丈量地亩的工作。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必须要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方针与措施，提出一些适当的解决办法，以便把农民自发的土地斗争引向健康

的发展道路。

1927年4月2日，在毛泽东、邓演达等人的努力下，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土地委员会，毛泽东、谭平山等5人被指定为委员，中共中央农委委员彭湃、易礼容等共产党员也参加了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邓演达、毛泽东、易礼容、陆沉和苏联顾问岳尔克被推选为起草《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五人委员会委员。



谭平山

从4月初到5月初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土地委员会在武汉连续多次召开会议，进行了紧张的工作。身为国民党中央农委常委的毛泽东对土地委员会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热情，提出了许多关于土地问题的见解。4月12日，在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土地政策问题指出：“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的不纳租了，自动的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19日，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解决土地问题应有一个纲领，内容包括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土地没收的标准和分配的方法；农民以什么政权机关来没收和分配土地等。”关于农民政权问题，他指出：“有两个阶段：一是革命时期，农民政权集中在农民协会；二是革命过后，农民政权在国民政府系统之下，颁布区乡自治条例。现在我们须要承认农民的政权，并且促进农民的政权。”彭湃、易礼容、夏曦等共产党员积极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彭湃提出：“要彻底解决农民痛苦，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夏曦说：“如果土地问题不解决，无从解决一切农民问题。现在土地问题应该马上解决，其余财政问题，非解决土地问题亦无出路。”

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会议上多次发言，他从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推动革命发展的高度，强调没

收土地是土地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革命必须分政治和经济两步走，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实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办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仅批驳了少数与会者对土地革命的怀疑，坚决主张从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且具体阐述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原则、方法和步骤，还参加了部分提案的起草工作。但毛泽东和中央农委的正确主张遭到国民党右派和国民革命军许多高级军官的反对，土地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央递交的七个决议案最后只通过并公布了《佃农保护法》和《处分逆产条例》。正如毛泽东和另一位参加土地委员会工作的中共党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到的：

“这个谈话最能说明国民党领导用空洞的大话掩饰自己不愿也不想满足农民的要求。……土地委员会的工作始末证明，国民党在真正伟大的、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面前是软弱无力的，国民党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全部软弱性，它完全张惶失措了。”而中共党内陈独秀等人也不支持其主张，最终，土地委员会和土地会议没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查办阳新惨案和麻城惨案

随着农民运动的猛烈开展，农村中广大农民同土豪劣绅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在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中，农村的反动势力进行了顽固的反抗，他们制造各种谣言，捣毁农会，残杀农会干部，各地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阳新惨案烈士墓

1927年2月27日，以阳新县商会会长朱仲忻为首的反动势力，将湖北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阳新县农协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谭民治等9人捕去，五花大绑，浇上煤油，推进燃烧的大火中，9名同志

被活活烧死。这就是震动全省的阳新二二七事件，又称阳新惨案。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中共阳新县委、国民党县党部与群团的主要负责人罗伟、曹大骏、刘熙等在革命群众的掩护下，机智地冲破敌人封锁线，星夜赶往武汉向国民政府和省农民协会汇报情况。3月1日，毛泽东、董必武在武昌听取了关于阳新惨案的情况汇报后，要求严惩凶手。毛泽东说：“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置之，必须有适应革命环境之法庭。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和平办法是不能推翻土豪劣绅的。”他建议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查办凶手，声援阳新人民的革命斗争。

3月2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由董必武、钱亦石等主持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派专员会同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前往阳新调查，设法解决；召开市民大会，追悼死难烈士；组成惩办土豪劣绅条例起草委员会，制订惩办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呈请国民政府司法部批准施行。

3月6日黄昏，董必武指派“阳新惨案”查办小组率省警备一团一个连的武装到达阳新查办该案。但因掌握军队实权的张连长与土豪劣绅暗中勾结，从中百般阻挠，致使重要人犯除县商会会长朱仲炘外，大都逍遥法外，首次查处草草收场。

3月中旬，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将他们拟定的《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提交全会审议。董必武在会上报告说：“湖北省惩治条例，原根据湖南已行之惩治条例，足以保护农民运动。因为土豪劣绅之犯罪，为普遍法律之所不能及，应从速颁布。”会议经过讨论，批准了上述条例，为阳新人民镇压反革命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一个广泛声援阳新人民，坚决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湖北各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为了严惩凶手，毛泽东和邓演达等人主持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协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湖北省农民协会于3月31日指令：湖北省农协组织部长蔡以忱，会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专员黄书亮、北伐军某团党代表刘镜清、第十一军叶挺师所属的刘绪福营长及两个连的官兵，再赴阳新彻查此案。

蔡以忱临危受命连夜赴阳新，一边明察暗访，一边重组“阳新县查办



蔡以忱

二二七惨案委员会”，查找人证、物证。抵达阳新后，蔡以忱会同黄书亮，根据《惩办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主持召开了阳新县查办二二七惨案委员会联席会议，当即决定撤销张鹏翊的县长职务，拘捕公安局长艾道生，逮捕凶犯并组织法庭进行公审等，并征求和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从3月31日到4月5日，查办委员会先后在阳新乡间、武穴等地缉获涉案分子20余人。4月6日，由查办委员会对凶犯进行了预审，第二天开庭正式公审。最后审判决定将伍修举等首犯判处

死刑，其他从犯依法判处有期徒刑或保释。

“七尺之躯，一炉而冶；千秋不朽，九根灵芝。”这是蔡以忱为阳新县城关举行的追悼死难烈士大会所题写的挽联。审判结束的当天下午，六万余名来自全县各界人士参加了“阳新惨案”受害烈士的追悼会。蔡以忱代表湖北省农民协会致悼词，县党部与各界代表亦纷纷致哀。随后，与会干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结束后，将9名烈士在天主教堂后面的一座向阳坡上入土为安。

镇压阳新反革命斗争的胜利，极大推动了该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正如1927年5月6日出版的《湖北农民》旬刊上一篇通讯所载：“阳新自从被土豪劣绅烧死9个农友以后，农民运动不但没有被打下去，反而发展得更快了，农友们都起来为死难烈士报仇，把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现在会员已经有300000人，要算是全省第一。”

1927年春，当湖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被骤起的农运风暴惊吓而跑的麻城土豪劣绅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无时不在做着伺机反攻倒算的准备。一些土豪劣绅跑到与鄂东北毗连的河南光山县一带，以当地民团、红枪会为主力，纠集各种反动武装共1万余人，由河南南下，气势汹汹地向麻城县乘马岗、顺河集等地猖狂进攻，他们沿途焚烧房屋，抢劫财物，

破坏生产，捣毁农会，残杀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制造了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惨案。原本生机勃勃的麻城北乡一时间变得阴风凄凄，遍地是焦黑的灰烬，到处是悲惨的哭声。

为了击退反动红枪会的进攻，麻城县党部派王树声星夜赶赴武昌报告情况，请求支援。时任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的董必武听了麻城的情况报告后十分愤慨，立即在当时的湖北省国民党省党部召开了省政府、省农协联席会议，并于4月22日组成了查办麻城惨案委员会，湖北省农协代表郭树勋及调查委员会其他成员在王树声的陪同下前往麻城查办。



王树声

这时候，麻城形势进一步恶化。匪徒们从乘马岗南犯，经过一路烧杀，于4月底包围了麻城县城。由于当地驻军的姑息纵容，麻城反动势力愈加猖獗，纠集会匪2000余人，于5月初对县城发动了疯狂进攻。在此紧急情况下，查办麻城惨案委员会成员同中共麻城县党组织、县农协的领导蔡济璜、王树声等一起登上城头，率领县城的武装农民、城内工人和店员等英勇抗击。敌人一接近城墙，守城的群众立刻用步枪、石块、瓦片、石灰罐等武器狠狠打击敌人，杀伤了许多所谓“刀枪不入”的红枪会会徒，带头围攻西门的“王九聋子”也被击毙了。头目被打死，反动红枪会会匪们仓皇后退，不敢攻城了。

首战告捷，人们欢欣鼓舞。不过，围攻麻城的会匪们虽然暂时被吓退了，但是并没有撤走。如果敌人长期围困，必然会给守城的军民带来极大威胁。查办麻城惨案委员会和中共麻城特支、县农协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讨下一步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敌人绝不会善罢甘休，由于农民武装人数很少，目前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再赴省城，请求援兵。

大家都自告奋勇赶赴武汉，关键时刻，王树声当仁不让，主动请缨：“武

昌我熟悉,董必武同志我认识,他们一定会支援的。”望着他那被激红的脸庞,大家从心底里信任他,但同时又为他捏着一把汗。

午夜时分,王树声经过简单乔装后,从县城北门的一个偏僻处吊下城墙,悄悄摸进敌人的住处,点上一把火。等火烧起来后,他再一边跑一边大喊救火,冲破敌人的包围。与此同时,城里的人组织侧翼出击,吸引敌人,掩护他安全出境。

军情如火急。王树声一口气赶到武昌,向董必武汇报了麻城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董必武在与各方面联系后,又同毛泽东一起商定,派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军驰援麻城,同时以国民党省党部及省政府名义,急令正在黄安剿匪的省警备团一个营前往麻城协同学生军作战,共同镇压地主武装。

5月14日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副武装的学生军250余人由武汉汉阳门登船顺江东下,湖北省警备团一个营也前往麻城。王树声与学生军同船出发,在他的皮箱里,还带回了12杆新买的驳壳枪。

第二天学生军一行到了团风,当晚在黄冈围剿会匪,打死当地匪徒十余人,17日上午与省警备团一个营一起到达麻城县城。

消息快如风。当学生军和省警卫团向麻城疾进途中,围城的会匪就闻风丧胆,惊恐万状。“神兵学生军来了!”“武汉的军队来了!”“快跑——快跑——快跑!”匪徒们仓皇北撤,缩回罗家河、方家垵、熊家冲等反动据点去了。就这样,在革命武装的威慑下,一枪未发,麻城解围了。

17日下午,麻城全城内外一片欢腾,学生军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战歌从南门进入麻城县城,城关人民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麻城解围后,中共麻城县委、县农协成立了以蔡济璜、王树声等为首的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并依靠学生军的支持,于18日在杨基塘召开了群众斗争大会。在王树声的主持下,大会公审了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丁枕鱼、王子厉等反动分子并当场枪决。

随后,革命武装分兵数路,乘胜追击,先后打垮了罗家河、方家垵、熊家冲的反动红枪会,沿途解救了无数被关押的革命干部、群众及家属。

学生军、警备团驰援麻城共进行战斗 20 余次，总计处决和击毙土豪劣绅、会匪头目及匪徒约 200 余人。学生军的到来，虽然没有直接消灭大量敌人，但沉重打击了反革命势力，挽救了黄麻地区的革命力量，在黄麻人民心目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中国共产党人也从与地主武装真枪实弹的战斗中，获得了运用武装力量开展革命战争的宝贵经验。

黄安、麻城两县农民反击反动红枪会的英勇斗争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和坚定了农民群众的革命信心和决心。这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黄麻两县几百名农民组成的自卫军，后来更成为了黄麻起义的骨干力量。

（刘勇竞）



都府堤四十一号的灯火

“农王”毛泽东

1926年11月底，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风尘仆仆地从南昌来到武汉，刚在汉口设立了中共中央农委办事处，就接到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来电邀请，电文称：“先生对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禱！”

作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和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出身湖南农家的毛泽东对农民运动有着深刻的见解和极大的热情，被誉为“农王”。早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提出要关注农民运动。不过，此时中共全党上下包括毛泽东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工人运动和国共合作上，农民运动实际上还没有大规模开展。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全国上下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新局面。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主张，给予农民运动以充分重视，并于国民党中央设立农民部，由林祖涵任部长、彭湃担任秘书长，中国各地的农民运动由此崭露头角。

中国共产党为了进一步培养农运骨干，经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决定自1924年7月起正式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富有农运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主持，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量农运骨干力量。掌握丰富理论知识的农运精英们奔赴全国各地，凭借着内心坚定的信仰，奋力为中国农民运动发展播撒下星星火种。

五卅运动时，上海工人阶级由于没有取得农民的支持陷入孤立无援境地，而广东的工人阶级却在与农民的合作中得以坚持下来，这使中国共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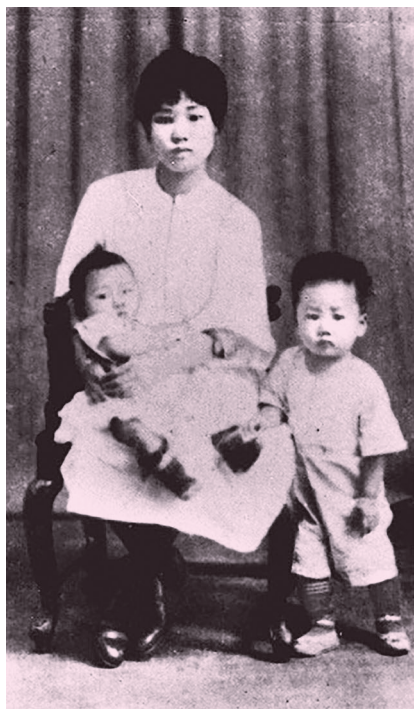
党受到感悟启发，深深意识到农民的重要性以及工农联盟的强大力量。张太雷表示：“五卅运动没有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及人民的大多数——农民没有参加，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加，没有不失败的。”

正因如此，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开始投入精力研究和开展农民运动，毛泽东也在此时将革命的目光转向农民运动。后来毛泽东回忆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1924年冬，毛泽东因病偕夫人杨开慧，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以及三弟毛泽覃返回家乡韶山，这是毛泽东自父母去世后第一次回到故乡。毛泽东回到韶山，一边养病，一边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他采取探亲访友的方式，走家串户拜访农民，询问当地的生活情况，并耐心细致地向农民讲授革命道理。

此时，湖南军阀赵恒惕为粉饰门面，号召开展平民教育，毛泽东抓住时机，先后在韶山冲、郭家亭和银田寺等地组织创办平民夜校，教授农民读书认字。由于毛泽东事务繁忙，韶山的农民夜校由杨开慧和毛福轩具体负责，农民群众在毛泽东等人的悉心教导下，思想觉悟有了极大提高。

1925年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皎洁的月光驱散了夜的黑暗，毛泽东为韶山的4个农民主持入党仪式，带领他们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宣誓后，毛泽东宣布：



杨开慧与幼儿时的毛岸英、毛岸青合影

中国共产党韶山党支部正式成立！

7月，毛泽东带领韶山农民成立雪耻会，并举行了颇具声势的游行，喊出了“打倒列强，洗雪国耻”的口号。毛泽东还带领农民展开平粜阻禁谷米的斗争，阻止地主豪绅高价倒卖谷米出境，迫使他们平价把稻谷卖给当地农民度过饥荒。

毛泽东在韶山点燃的农民运动之火，很快在湖南形成燎原之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湖南有组织之农民运动始于1925年冬季”。1926年12月20日出版的《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农运活动：“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功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冬回乡养病，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经毛泽东的领导，截至1926年12月，湘潭县正式成立农民协会14个、区农协筹备处4个、乡农协达450余个、乡农协筹备处20余个，协会会员有12万余人，湖南省农民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毛泽东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取得的一系列卓越成果，是他开展农民运动迈出的第一步，这也使他更加坚信中国革命只有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参加进来，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1926年2月5日，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和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3月16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决定由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地点设于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广州附近的番禺学宫，来自全国20多个地区的327名学员将在此接受系统的农运工作培训。

在此之前，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已经开办5期，由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先后担任所长，已为

全国各地培养农运干部 450 余名。尤以广东的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农会会员多达 62 万余人。其中，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最为成绩斐然，盛况空前。

毛泽东为了方便给学员们授课，就住在农讲所的一间小屋内，房内陈设简陋。广州天气炎热潮湿，又多蚊虫，毛泽东晚上只能睡在连蚊帐都没有的硬板床上，但他丝毫不觉得苦，心怀革命热情，每天精力充沛，不知疲倦。

在毛泽东床边的书桌上，还摆放着他在湖南开展农运期间所做的笔记。他亲自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等课程，并引导学员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看问题。为使农民更为直观地学习农民运动的斗争经验，毛泽东还组织学员 50 人前往韶山考察，后又带全体学员到海丰学习两周，并邀请彭湃亲自讲授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

1926 年 9 月 1 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一著名论断，并在文中严肃地批评党内的一些同志忽视农民问题，只知道开展城市工作，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中国共产党真正需要做的是“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之晒着酷热的太阳，冬之冒着严寒的风雪，挽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带领着广大的农民群众勇敢地同土豪劣绅展开斗争，和工人、学生等社会各界人士建立统一战线，加入到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洪流中去。

毛泽东以满腔的革命热情于 9 月 11 日完成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全部的教学工作。除 9 人退学外，剩余 318 名学员如期毕业。毕业的学员们犹如一颗颗火种，播撒向全国各地，农民运动如疾风暴雨般顺势而起，震碎了土豪劣绅们的酣梦。

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革命中心由珠江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武汉很快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北伐军所到之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此时的毛泽东已是享誉全国的“农民运动权威”，被湖南等地民众称为“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来到武汉后，不仅成功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更写成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在读过这篇报告后不禁感叹，毛泽东真乃“农民运动的王”。

“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大革命高潮中急风暴雨般的农民运动，把统治中国乡村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打得狼狈不堪。其中尤以湖南省为最，堪称“农民运动的中心”。在短短一年里，湖南就已成立 462 个区农民协会，28 个县农民协会，其中 19 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筹备处，乡农民协会更是多达 6867 个，农民协会会员总数 136.7 万余人。农民协会将农民组织起来，针对土豪劣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清算和罚款等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

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地主豪绅惊慌失措。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纷纷造谣煽动，诬称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土匪运动”，污蔑农民们为“痞子”、“惰农”，并进一步宣称农民造反严重干扰前方北伐战争，造成后方混乱，破坏社会秩序。反动阶级对农民运动的攻击以及舆论造谣，使一些左右摇摆的中间分子更加动摇，纷纷应声附和，站出来说农民运动“越轨”“过火”，更有甚者竟然宣称应“取缔农民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一部分人受到这些舆论的蛊惑，对农民运动发出质疑。1926 年 12 月，中共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错误地认为当前阶段的主要困难是：农民运动的勃起且日益“左”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因恐惧农民运动而日益右倾，严重威胁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陈独秀对农民运动提出批评，认为农民运动“过火”、“破坏统一战线”、“动摇北伐军军心”，是一种极为幼稚的行为。

毛泽东在会上认为应该继续开展土地革命，但遭到多方反对，会议的决定并不支持土地革命，反而要防止农运“过火”。陈独秀还要毛泽东参加了与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的谈话，当场指令回湘后要立刻纠正农民运动“过左”。毛泽东没有争辩，后来他在八七会议上回忆说：“我素以为领

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作为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尽管他不赞同陈独秀关于湖南农民运动“过火”的提法，但苦于手中没有湖南农民运动的一手资料，也就没有充分理由坚持自己的意见。

汉口特别会议结束后，心情郁闷的毛泽东暗下决心要尽快回到湖南，对农民运动进行实地了解。恰在这时，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给毛泽东发来邀请电，于是他欣然应约，于1926年12月17日由武汉返回长沙。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正式开始了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之旅。他考察的第一站便是湘潭县。毛泽东身穿蓝色长衫，脚踩草鞋，乘船从长沙出发前往湘潭县。一到湘潭，他就马不停蹄地联系当地农民召开座谈会，了解全县农运的开展情况。

5日，毛泽东徒步从湘潭县前往银田寺考察第一区的农民运动。这天晚间，他和第一区的农民们围坐一圈，召开座谈会。会上欢声笑语，毛泽东拿出准备好的笔记本，默默地将农民们的汇报一笔一笔记录下来。

6日中午，毛泽东结束了银田寺一带的考察后，怀着满心的期许直奔韶山冲，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家乡最近的变化。韶山冲的村民们知道毛泽东要来，纷纷涌上村头，不一会儿就汇聚起一支几百人的队伍，敲锣打鼓地走出五六里路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在韶山，为了获得农运的一手资料，先后前往坝子头、坪里冲、徐家湾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前往湘乡县城。毛泽东不顾辛劳，马上召集湘乡相关人员开座谈会。县农民协会负责人谭天民率先进行发言，他先后介绍了农会的发展情况和农民平粜阻禁的情况。在讲到农民们与土豪劣绅开展的斗争时，他带着稍许自豪的神情说：“宋塘有个姓朱的地主婆对抗农会，农民用纸扎了个猪头的假面具，勒令她戴着去示众，把地主的体面威风都扫尽了。”

毛泽东一听到这里，不禁高兴地站了起来，大声说道：“好得很！”后又继续说：“农民运动的兴起，这是几十年乃至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奇迹。农民的举动，完全的对的嘛！他们的行动，好得很嘛！”

在湘乡，毛泽东还了解了农民协会禁止牌赌、抽鸦片等恶习以及发展农民武装的情况。湘乡考察告一段落后，毛泽东为进一步考察农民运动中妇女斗争的情况，又来到邻近的白果镇芳山公祠，召集当地妇女召开了一个妇女座谈会。大会一开始，到场的女同志争先恐后地举手发言，向毛泽东讲她们的斗争经历。她们不仅成立了女界联合会，还参与了反对豪强的斗争，更掀起了一番“放脚和反对公婆及丈夫虐待媳妇的斗争”。毛泽东边听边兴奋地连连夸妇女们：“做得好，做得好！”

在白果、福田铺和宋桥一带考察完当地的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情况后，毛泽东于24日返回长沙，将这一段时间的考察情况向湖南区委进行汇报。27日，毛泽东又启程开始了对醴陵的考察。

在醴陵，毛泽东向农民详细地询问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况。当听说农民有组织、有纪律地分别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与豪绅地主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时，毛泽东面带欣慰的笑容感叹道：“对！对！做得好！做得好！”毛泽东综合前段时间的考察情况，由衷地对农民运动给予赞扬说：“哪里愈‘糟’就愈好，哪里愈‘糟’就证明哪里的农运搞起来了。”

截至2月5日，毛泽东正式结束了他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之旅，获得了充分的农运第一手材料，这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农民运动好得很！”

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住进了武昌都府堤41号。2月下

旬，他在妻子杨开慧协助下，在住所的油灯下，奋笔疾书，满怀激情地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报告中，毛泽东驳斥了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污蔑，总结了农民运动的经验，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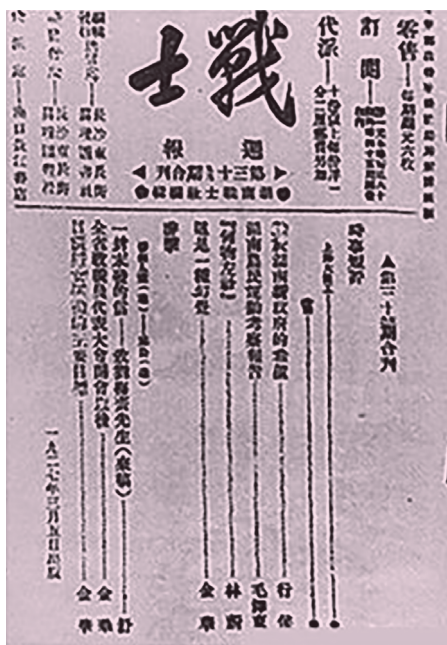


国内报刊刊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刻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用火一般的文字、诗一般的激情，热烈赞颂大革命中的农民群众推翻乡村封建统治势力的革命行动和历史功绩，尖锐地批评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中国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

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他明确地提出，一切革命的党派和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摧毁封建武装，重组农村政权。

1927年3月5日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连载。当时主管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非常重视这个报告，他于3月间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前两章。鉴于陈独秀等不同意连载，汉口长江书店于4月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单行本出版发行。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热情洋溢地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



《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报告的部分章节



书。”后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也先后转载了《向导》刊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编者评价该《报告》：

“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也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在湖南、湖北两省，广大农民群众从要求掌管乡政权发展为要求掌管县政权，从要求减租减息发展为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公平分配土地，农民群众夺取地主武装、扩大农民武装的斗争也进一步开展起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在随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的极为险恶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工农群众，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中成功地转向土地革命战争。

“农民革命的大本营”

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国共合作以后开办的一所大规模的培养年轻优秀农民运动骨干的学校。截至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农讲所共创办六届，毕业学员们纷纷返回自己的家乡宣传、动员、组织农民创办农村党组织，创建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逐步成长为农运的“推进机”和“主持各重要农民协会区域的战斗员”，并有力地配合前方北伐军，将国民大革命推向高潮。

1926年11月中旬，毛泽东受命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农民运动委员会迅速制定出一份《目前农运计划》呈送中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全国农民运动进入高潮，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农民运动尤为汹涌。武汉作为大革命的中心，农民运动的发展更是至关重要。各方都认为应该尽快成立培训学校，培养农民运动骨干。毛泽东率先提出创办农讲所，并为此亲自前往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党部联系，建议三省在武昌合办农讲所，三省党部均表示赞同和支持。

1927年1月16日，湖南省党部最先提出，推举毛泽东、陈克文和周以栗3人担任湖南省代表，湖北省由李汉俊、陈荫林和张眉宣3人为代表，

江西代表则由龚式农和王礼锡担任，8人共同组成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筹备处办公地点设于湖北省农民协会里。筹备处一经创建，便召开多次会议商讨农讲所的创办问题。2月中旬，三省联合筹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

2月18日，农民问题讨论会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主持下召开，大会决定由毛泽东、恽代英、李达等10余人担任委员，由毛泽东和苏联顾问作为代表登台作报告。毛泽东在《中国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中提出：“农民运动已席卷湘鄂赣粤，波及黄河流域。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民运动，急需继续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大力培养农运人才。”

岂料正当农讲所的筹备宣告完成之际，蒋介石却在江西做出阻止工农运动，限制农讲所创办的残暴行径，导致大量江西农讲所学员不能按时到武昌就学。

迫于严峻形势，国民党中央党部迅速召开第76次会议商讨应对之策。会上争论激烈，为维护农民运动的顺利发展，会议最终还是决定：“将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交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管理。”

3月上旬，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经过与会成员推选，决定由邓演达、毛泽东和陈克文3人担任农讲所常务委员，主持农讲所各项事宜。大会规定农讲所第一期的教学时长为4个月，并决定将原计划招收学员400人扩展到600人，为更多有志的青年、农民提供学习机会。农讲所每月经费5100元，由中央常务委员会拨发。



陈克文与家人在汉口

出身于师范生的毛泽东对于



办学非常内行，面对全国各地踊跃前来的学员和筹备过程中的各种困难，他大胆打破常规，让来自全国 17 个省的 739 名学员于 3 月 7 日先行开课，然后才于 4 月 4 日补办开学典礼。

3 月 7 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红巷 13 号正式开学，这里原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举办的北路学堂，后改为湖北省甲种商业学校、湖北省高等商业学校。4 月 4 日，农讲所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开学典礼。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发表开学宣言：“当这继续二次北伐的革命高潮中，举行开学典礼，这实在有非常的意义，其意义之重大，简直等于第二次北伐誓师。”宣言还向众人宣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和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农民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

就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的同一天，毛泽东迎来了双喜临门，他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在武昌出生。但忙得不可开交的毛泽东直到第四天才见到自己的新生儿。作为新上任的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负责主持工作的常委，毛泽东专门为农讲所学员制定一部《规约》，要求同学们严格遵守，《规约》指出：“我们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研究革命的理论 and 行动，我们的责任，是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领导他们起来，打倒我们的敌人，解除农民群众的痛苦。”并要求学员们必须加强自我的思想改造，抱着随时准备牺牲的决心，与凶狠的敌人斗争到底。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设《共产党宣言》《农民问题》《农民教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多门课程。中共领导人恽代英、瞿秋白、彭湃、方志敏、李汉俊、李达等分别讲授主要课程。毛泽东主讲《农民问题》和《农民教育》，并作了关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专题报告。还专门聘请李达为学生们讲授《辩证法》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

学员们十分喜欢毛泽东的课程，每次到毛泽东上课，农讲所总是挤满

了人。在讲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毛泽东看着一个个充满青春活力，好学上进的学员们，讲得也十分起劲，边讲边配合手势说：“农民在乡里造反，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几千年来，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在乡里称王称霸，横行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要推翻封建权势。”他看了看讲台下的学生，又接着说：“可是，土豪劣绅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我们说好得很；他们说农会会员是流氓地痞，我们说是革命先锋！……”说到这里，学生们掌声雷动。坐在教室最后面的杨开慧、许冰和郑家钧也兴奋地站了起来，给予热烈掌声。

农讲所不仅注重学生的理论学习，更注重领导学生进行实践。为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农讲所专门成立农民问题讨论会，由农讲所内的教员带领学生有针对性地探讨当时农运的主要问题。比如农民武装问题、土地问题以及教育问题等等，使学员在学习过后，在具体实践中也能得心应手。农讲所为使更多人都能学习先进的农运知识，还组织编纂刊发《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方便全国各地农民运动工作者学习。

身为书生而又深知枪杆子重要性的毛泽东，对发展农民武装极度重视。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中，白纸黑字地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他利用自己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便利，向武汉国民党当局争取，为每个学员配发了一件武汉特产——汉阳造步枪。全体学员按照军队编制组织起来，每天军事训练两个小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军训时间每天增加到四个小时。每周到野外举行一次军事演习，搞实战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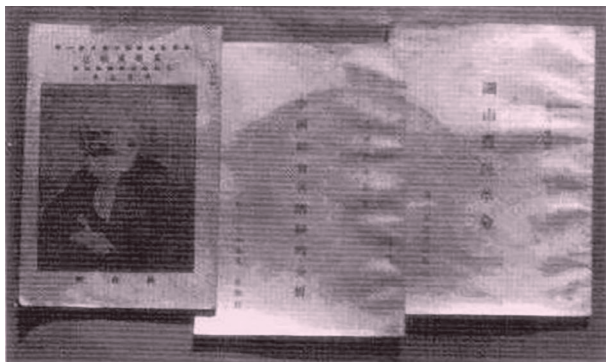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这些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红色种子，在半年后基本上成为了各地农民自卫军的领导人和土地革命的骨干。其中有一个叫陈慕平的学员，后来到宁冈搞农民运动，成了地方武装首领袁文才的军事教官。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后，就是陈慕平和龙超清担任联络员，联络毛泽东与袁文才会面，迎接起义军上井冈山。

就在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之时，一些反动势力与土豪劣绅等封建残

余不甘心被打倒，暗地里谋划对农民革命进行凶猛地反扑。2月27日，湖北阳新县政府的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勾结红门会匪徒残忍杀害多名农协和工会干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

为解决这一惨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毛泽东在会上神情凝重地发言强调：“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处置之，……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和平办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们也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团结起来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严惩阳新惨案凶手，并为死难烈士召开追悼大会。毛泽东呼吁学员们一定要下定决心进行反攻，保护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确保革命的顺利完成。



农讲所学员当年学习的书籍

继阳新惨案后，湖北麻城又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毛泽东调派农讲所学员200人，在大队长傅杰率领下全副武装前往麻城平定暴乱。毛泽东亲自来到汉阳门码头，为出征的学生军送

行。随后，农讲所学员又参加了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斗争。在白色恐怖考验和血雨腥风洗礼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们经过为期3个月的理论、实践和军事技能学习，已经成长为农民运动的精英和骨干。

1927年6月18日，农讲所举行毕业典礼。毛泽东为学员们一一颁发刻有“农民革命”字样的五星奖章，并鼓励他们继续奋勇向前。大多数学生被委任为农民协会特派员，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农讲所许多师生参加和领导了各地的武装起义，为中国农村大革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邓正兵 李 静）

妇女不能解放，则革命不能成功

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

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发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办报刊、学堂等方式传播妇女解放思想，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秋瑾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勉女权歌》，发出“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的呐喊，号召妇女们勇敢地摆脱封建压迫的精神枷锁，投身到自身解放的革命运动中去，在当时曾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但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可能使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

中国妇女解放的突破口，作为个体女性的现实诉求就是反对包办婚姻，要求婚姻自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脱离封建家庭的牢笼羁绊，而作为社会群体的诉求则是在政治层面上要求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1924年纪念三八妇女节活动是第一次展现中国妇女追求解放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是妇女社会群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建立，男女平等、促进女权发展的有关提案写进了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宣言》。此后，为了开展妇女运动，国民党中央设立妇女部。接着，在上海、北京、汉口三个特别区执行部中设立妇女



秋瑾

部，以后国民党各级党部大多都设立了妇女部，成为国共合作妇女联合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坚决贯彻执行统一战线的精神，帮助建立各级党部，并利用这些组织形式开展妇女运动，推动妇女运动快速发展。

3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策划和组织下，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在广州倡导和具体筹备组织了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这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参加三八纪念活动。当天，广州20余所公立学校女学生、女界联合会等妇女团体成员约1000余人参加，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等人先后在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阐明纪念三八节意义，痛斥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对妇女的双重压迫，号召妇女奋起革命。纪念大会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取妇女解放，要求妇女的劳动、教育、工值、工作、参政等方面的平等权利；要求保护童工、孕妇；要求制定革除童养媳、多妻制，禁止蓄婢纳妾，废除娼妓制度等口号。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这次纪念活动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从此以后，每逢三八妇女节开展纪念活动逐渐普及到全国各大城市。

1925年3月8日，武汉妇女界借用男青年会的场地举行三八节纪念会活动，湖北女师及部分小学师生近100人参加，这是武汉妇女界第一次举



女师学潮骨干成员。前排坐者从左至右为杨子烈、陈碧兰；中间站立者从左至右分别为徐全直、夏之栩、袁震之；后排坐在大石头上者左为袁溥之、右为庄有义

办纪念活动。会议还邀请法科大学教务长邓初民教授为与会者讲解妇女解放问题，听众很受鼓舞与教育。

5月，为了便于统一领导湖北的妇女运动，在董必武、陈潭秋等的支持和帮助下，由共产党员徐全直、秦怡君

等发起筹备武汉妇女协会，并创办《武汉妇女》旬刊。8月，武汉妇女协会改为湖北省妇女协会，《武汉妇女》旬刊也相应改为《湖北妇女》旬刊。

8月，湖北省妇女协会正式成立，徐全直、秦怡君、袁溥之、袁震之等共产党员担任协会领导职务。协会机关秘密设在武昌三道街8号。协会根据党的四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要求，拟定了湖北妇女协会的简章、宣言。

《湖北妇女协会简章》规定：本会定名为湖北妇女协会。本会的宗旨是以团结全省妇女同志力争经济上政治上及社会上的平等地位，并参加一切被压迫弱小民众的战队中从事民族革命。《湖北妇女协会成立宣言》指出，妇女协会的使命是：一、团结全省各界妇女形成巩固强大的组织，为全省妇女运动的大本营；二、领导全省的女界参加到民族革命的群众里面去做民族解放运动同时解放自身；三、推翻现社会中政治上、经济上、职业上一切男性中心的畸形现象；四、本会成立于各地大惨杀的血潮中，对于横暴的帝国主义及媚外军阀决以全力联合全国工农商学各界从事积极的奋斗。到11月，湖北妇女协会会员达到600余人，许多县市也成立了分会。

1926年3月8日，湖北省妇女协会破天荒地发起组织武汉妇女召开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这是湖北妇女协会的第一次纪念活动。活动分别在武昌、汉口、硚口等三地举行。其中，武昌的纪念活动影响最大。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妇女部部长袁溥之介绍她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时了解到的广东妇女运动的做法与经验，听众很受鼓舞。三个地方的女性，包括知识分子、教师、学生、纱厂女工等纷纷参加集会。会场的标语口号和活动诉求基本相同。比如要求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地



中国妇女首次举行纪念“国际妇女节活动”



位，八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婚姻自由等。

夏秋之际，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后，专设妇女运动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在此前后，袁溥之、李哲时先后当选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部长。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国民政府由广州搬迁到武汉，武汉成为国民党中央、中共中央所在地和国民革命中心。全国各地的妇女运动精英纷纷聚集于此。蔡畅、邓颖超、宋庆龄、何香凝等国共两党妇女运动领袖先后来到武汉指导工作，湖北妇女协会也由秘密转为公开。蔡畅担任中共湖北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直接领导湖北妇女协会的工作。邓颖超与何香凝共同拟定妇女运动章程，大力倡导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婚姻自由、保护母亲及童工。宋庆龄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妇女党务训练主任，积极主办妇女训练班，她亲自聘请共产党人恽代英、于树德、张太雷担任教员。

11月25日，湖北省妇女协会召开武汉三镇会员大会。会议修改了省妇女协会总章，改选了省妇女协会执委会。李哲时、徐全直、袁溥之、谭芝仙、秦怡君、余育德、张笃和、何葆珍等一批共产党员当选为妇女协会的领导人。蔡畅还把刘清扬、褚松雪、王亚璋、赵君陶、李之良、朱端绶、彭淑兰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妇女工作精兵强将介绍到湖北妇女协会工作，充实了各方面工作的骨干力量。由于国共两党对妇女运动的推动，武汉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妇女运动的指挥中心，妇女运动由此蓬勃发展。

1927年3月，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团组织，扩大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活动规模，以显示妇女工作的成果。中共湖北区委妇委书记蔡畅亲自到省妇女协会部署筹备工作，除决定3月8日在汉口专门召开纪念大会外，还将湖北省妇女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也选定在这一天。

3月8日这一天，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在汉口举行，参加人数达到20万人，其中，妇女占到会人数的一半以上。会场上，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女工纠察队员英姿飒爽，守卫会场入口。会后几万名妇女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列队到武汉国民政府请愿，推举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妇女部部长、市妇女协会秘书黄慕兰等4位妇女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请愿书，提

出了湖北妇女解放的总要求。内容涉及制定男女平等法律，根据离婚、结婚绝对自由之原则制定婚姻法，保护被压迫而逃婚的妇女，严禁抢亲恶习，严禁买卖人口及蓄婢纳妾；废除娼妓，并设立娼妓收容所，废止敬节堂，改为女子职业练习所，严令各地官吏禁止缠足；切实提高并普及女子教育，要求女子有财产继承权；各行政及各职业机关完全开放；筹设儿童公育院，设立劳动妇女公共优生医院等诉求。

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使武汉地区各阶层妇女的革命意识和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她们热切地盼望革命，欢迎革命，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参加革命。无论是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里，还是在争取妇女平等解放的激烈斗争中，武汉妇女都竭尽全力，拼命向前，妇女运动的规模和组织程度都代表了当时中国妇女运动的方向与水平。

妇女有了“娘家”

妇女协会是广大妇女自求解放的组织，代表妇女的利益，被誉为妇女的“娘家”。

湖北省妇女协会成立后，积极推动各级妇女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到1927年6月，全省已有49个县、市建立了妇女协会。

1927年3月8日至15日，湖北省第一次全省妇女代表大会在武昌开幕。全省50多个县的妇女代表、第三国际妇女部的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及省党部和市党部的代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代表、全国学联等各机关团体的代表以及自由参加者共500余人参加了大会。

大会推举李哲时、蓝淑文、赵君陶等3人组成会议主席团。湖北省妇联主席、会议主席团总主席李哲时向大会作全省妇女工作报告。她指出：“今天本会开幕同时纪念国际‘三八’节，意义非常重大，在此大会中就是检阅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定以后革命工作方针，谋我们妇女解放，进而全世界妇女解放。目前最迫切的工作，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铲除封建势力及一切吃人的旧礼教。……使我们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而得到真正解放……”此外，各县妇女代表报告了本县妇女协会的情况；

总工会代表李立三演讲女工运动；省总工会代表王亚璋作湖北妇女运动概况的报告。

蔡畅以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长的身份作了《中国妇女运动状况》的报告。她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妇女运动的起源，论述了妇女解放的伟大意义，讲解了中国妇女运动的进程，指出了以后妇女运动的方向。她特别强调要注意开展下层妇女工作，严密妇女组织，使妇女协会成为以工农劳动妇女为主体，广泛团结各阶层妇女参加国民革命的群众团体。

与会各方面来宾也纷纷发表演讲。第三国际的代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表恽代英、湖北省党部代表李汉俊、共产党代表蔡以忱以及农民代表相继发言。第三国际的代表还向大会赠送了书写有列宁语录“妇女不能解放，则革命不能成功”的红绶锦旗。

会议通过了《湖北妇女总要求决议案》《宣传问题决议案》《教育问题决议案》《放足运动决议案》等一系列决议案，并通电要求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召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会议制定了以后的工作方针，强调要建立



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宣言封面

和健全全省妇女组织，争取妇女自身解放，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会议改选了省妇女协会的领导班子，选举蔡畅、李哲时、赵君陶、蓝淑文、刘清扬、徐全直等17人为正式执行委员，莫愚、庄有义、褚松雪等9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3月26日，湖北省妇女协会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根据协会总章的要求，讨论、研究了妇女协会内部机构设置及领导分工问题。李哲时担任总务部主任、赵君陶担任宣传部主任、刘清扬担任组织部主

任、兰淑文担任调查部主任、褚松雪担任交际部主任、余育德担任游艺部主任、蔡畅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李之良担任妇女问题评判委员会主任。各部除主任以外，还任命一名副主任协助工作。

湖北省妇女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大革命时期妇女运动迅速发展的产物，它又推动了妇女运动更深入地发展。大会结束后，各妇女团体迅即从放足运动和妇女文化学习入手，掀起了大规模的妇女解放热潮。



李哲时

放足、剪发运动与妇女学习热潮

中国共产党为了发动妇女投身国民革命，十分关心妇女的切身利益，注意解除妇女的痛苦。妇女们依靠在党领导和支持下的妇协、农协组织，纷纷砸碎束缚自己身心的封建枷锁，争取婚姻自主和自身解放。

妇女自身解放程度，是衡量革命发展程度的一个客观标志。妇女自己解放自己，首先是从身体解放开始的象征——放足开始的。湖北各级妇女协会在国共两党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在城乡大力宣传、倡导女性开展放足运动。1927年1月14日，来自武汉三镇的妇女协会代表及部分工厂女工代表1000余人集会，欢迎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莅临武汉。在大会上，省妇协执行委员赵君陶呼吁国民政府下令禁止女子缠足，得到积极的回应。

3月23日，根据全省各界妇女的一再要求，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正式公布了《取缔女子缠足条例》。《条例》规定：一、取缔缠足以3个月为劝导期；二、在劝导期内，责成各县县长会同各县党部妇女部及妇协设法进行劝导；三、未及15岁之幼女如已缠足须立即解放，未缠足者不得再缠；四、15岁以上40岁以下之缠足者，责令解放，不加限期……。这个带有法律性质的条例，还具体规定了违例罚金的数目以及其他严重处罚的内容，为大规模的

放足运动提供了法律依据。

4月19日，湖北省妇女协会、武汉市妇女协会与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共同组成了湖北放足委员会，发布告示，规定了6项放足具体办法。明确规定5月19日至25日为妇女放足宣传周。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都积极投入放足运动中，报纸也经常报道放足的消息。在开展放足运动的过程中，妇女协会组织宣传队、调查队进行宣传和调查，看到缠足者就劝导放足，超过劝导期后见到缠足者的裹足布就没收。队员们不辞劳苦，深入到工厂、农村，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宣传放足的好处，指出缠足的危害；教妇女学唱《放足歌》《妇女解放歌》；发现有尚未放足的妇女，便亲手帮助解下裹脚布，放火烧掉；对于一些拒不给幼女放足的家长则给予批评甚至严厉处罚，令其不得再给幼女缠足。当时，有一首在湖北城乡流行很广的放足歌中唱道：

“姐妹们，快听着，大家快快来放脚，包了脚，身体弱，走不得远路，干不得重活，自然要靠男子过，自然要受人折磨，怪不得男子打骂我。放了脚，多快乐，走得远路，干得重活，自然不靠男子过，你看快乐不快乐。”一些妇女群众每当听到这些放足歌谣，就激动不已，纷纷参与到活动之中。

放足运动猛烈地冲击了残害妇女身体的封建思想与落后习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在青年妇女群体中成绩显著。对于那些拒不愿意放足的妇女及其家庭，妇女协会不辞辛苦，登门进行劝导。据当时媒体报道：“武昌县妇女协会，昨监街某号8岁女孩因缠足痛苦声闻于外，该会宣传入内，将裹布解去，勒令不得再缠，如果再缠，一经查出，决当重罚。又都府堤6岁女孩被母缠足，扶棍外出，该会宣传瞥见，即携该孩入内，立解其缚，严斥其母，如查出再缠，罚洋20元以上。”汉口市妇女协会队员们在华清街宣传放足运动时，果断处理了阻挠放足活动的事件：“汉景街花园巷十号彭福顺五金店女子，年约10岁，不但不放足，反斥宣传队多事。该队同志闻之，不惜唇敝舌焦，前来劝告，既不遵从，反以恶言相加”，“将彭福顺带回质问理由，并脱去其裹脚布，赤足拖鞋，提至妇女协会。”据1927年5月28日《汉口民国日报》报道：武汉妇女“接受宣传实行放足者，每日不下千人”，“放足者日多一日，未缠者决不再缠”。“湖北妇女放

足委员会，前已通告武汉三镇妇女，凡30岁以下者限阳历5月16日前一律放足，据确实调查，现遵照实行放足者，约计十分之九”。

武汉以外的湖北城乡，放足活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黄安县署向放足妇女发放“放足牌”予以鼓励；通山县制定了严禁缠足的条例，分别对不同年龄女子作了相应的放足政策，并对违者处以一元以上千元以下的罚款；京山县妇女成立天足会时秉承以“我们女界同胞，被数千年专制之压迫，沦为奴隶牛马，其最残酷最痛苦者莫于缠足，今国民革命政府成立，解放妇女一切束缚，首先以促进天足，唤醒城市农村之女界，已缠足，积极解放，未缠足，严禁复缠”云。“环绕城内各街道，大呼口号，张贴标语，取发传单，说明缠足之束缚痛苦”；松滋县妇女协会也积极响应放足剪发运动，自成立不数日，接受宣传放足剪发者60余人。各地参加放足宣传、调查的队员们每日都要由各乡村拿回十余双裹脚布，各乡村均充满放足气氛。由此可见妇女协会对放足运动之热心与认真，湖北的妇女越来越多地走出缠足的阴影，摒弃缠足的陋习，获得放足的自由。

除了放足运动，妇女协会还领导妇女开展了剪发、争取婚姻自由等斗争。

长期以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传统封建思想束缚着广大女性。梳髻也和缠足一样，成为中国妇女代代因循的社会习俗。但是，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妇女剪发也与放足一样被看成是解放妇女的象征。

“剪发放足也是革命”成为极为普遍的社会心理。据黄慕兰回忆，她参加革命的标志就是剪掉了长发。当时，妇女剪发放足运动呈现出各级妇女协会有组织地动员与民间自发推动、上下结合的特点。

湖北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后，5月5日，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妇女部向省党部提出发起剪发运动案，推动更多的女性剪发。5月17日，省妇女协会在汉口召开“放足剪发大会”，武汉各级妇女协会、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代表、政府机关的妇女代表、社会团体的代表100余人参加集会。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也加入宣传剪发行列。武汉新闻界人士詹大悲公开呼吁：要解放妇女就必须解除妇女身上的锁链，因为缠足残废了妇女同胞的身体，而蓄发后则因为每天梳头照镜，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他希望大家立即行



动起来，开展剪发放足运动，这样才能使广大妇女求得解放，得到真正幸福。

“剪发”与“放足”由此成为各级妇女协会的工作中心，也进一步成为一些革命者的自觉行动。受妇女代表大会、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大会的影响，汉口泰安纱厂工会干事张金保就带领汉口工人武装训练班的女工剪去了长发。据史料记载，在大革命中心的武汉，“走在马路上所见的女子十之七八是剪了的”。

争取婚姻自由也是这一时期妇女运动的重要内容。各级妇女协会在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支持下，主动为妇女撑腰，伸张正义。例如，“汉阳陶家巷下首油漆店倪某之女梅英，由于反对包办婚姻，被夫家父子带流氓 20 余人，到倪家抢亲，强迫成婚并禁止一切自由，加以种种压迫。区妇协开会发出通知予以救援。梅英脱逃到妇协，哭诉惨苦情形，要求离婚。夫家勾结流氓包围妇协，声势凶狠，要绑，要杀。妇协决定由梅英自己依照党国离婚自由条例与喻某离异”。

妇女要真正获得解放，还必须提高自身思想文化水平。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认识到必须加强妇女的智识和能力的培养，提高妇女的文化素质。强调：“女性者运动最终的胜利，是与男性者一切平等。但是智识和能力相差太远，也难达到真正平等的地位，因为在分工的社会底下，须尽同等的义务，才能得平等的权利，不然只是形式上的平等罢了。”

早在 1921 年底，在董必武、陈潭秋等的支持下，武汉就成立了第一个妇女组织——武汉妇女读书会。组织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女性读书，学习、了解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想。中国共产党还努力倡导通过开办“女工夜校”、“平民女校”、“妇女运动训练班”等形式对妇女进行教育培训。国共合作建立后，国共两党都对妇女的学习教育予以重视，掀起了妇女学习的热潮。

首先，重视妇女干部的培养。根据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1926 年 12 月，宋庆龄到武汉后，在武汉举办了妇女党务训练班，邀请刘清扬担任训练班主任。1927 年 2 月，训练班正式开班。共录取学员 103 人。学员课程学习广泛，要求非常严格。举凡政治、历史、经济、国际形势、国民党党务、

工农妇女青年运动等都在学习之列，每四个星期考试一次，缺课较多的不准毕业。学员在学习的同时，还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4月，湖北省总工会开办了工人纠察队训练班，其中设立女生队，招生200余人接受军事训练。此外，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湖北省党部妇女部、汉口市妇女协会都先后举办过妇女短期训练班、妇女运动讲习班之类的训练班，“造就妇女干部人才，灌输革命道理，以备参加实际工作需要”。国共两党群众运动领导及湖北省、汉口市妇女协会干部亲自授课。综合这些训练班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国际妇女运动史略》《中国妇女运动经过》《苏俄的妇女怎样做女工运动》《妇女职业问题》《妇女劳动问题》《妇女主义批评》《妇女与社会主义》《中国妇女的地位及解放的途径》等，涉及面广。

其次，湖北省妇女协会通过国民政府、省市党部等各方面的推动，办学校、办识字班，组织社会妇女学文化，提高妇女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社会认知能力。全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后，省妇女协会就迅速做出决议，要求各县市建立“妇女学校”；同时，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措施，设立大规模妇女工读学校。

为了使更多的失学女性有机会参加学习活动，通常，妇女协会采取三种办学的途径。一是采取募捐等形式创办妇女补习学校。学校的教师大多是请湖北女师毕业的学生担任，因为她们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愿意进行义务教学，而且教学效果也比较好。例如，1925年下半年，湖北省妇女协会在武昌创办妇女学校，由袁溥之担任校长，范明洁作教员，袁穆具体负责管理；二是选择一些有条件的小学开办补习班。补习班的教师由各校的教员分担，大部分教员的 teaching 是义务劳动，只给那些生活困难的教员予以生活津贴。当时，在武汉的七所小学里开设了补习班，其中第五小学效果最好；三是通过武汉国民政府要求在各县市设立妇女补习学校。当时，国民政府设立大规模妇女工读学校，在湖北补习学校里就设有妇女补习学校，开办普通班和职业班。普通班学习的内容，包括妇女常识、妇女运动、妇女协会组织法、国民党关于妇女问题决议案等等；职业班学习内容大多是关于妇女劳动技能的，如缝纫、针织、刺绣、编织等，也有儿童教养方法、

妇女运动常识等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

此外，为了提高妇女的文化，湖北省妇女协会还成立了识字运动委员会，由李哲时担任主任。

在妇女学习热潮中，特别要谈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为了适应大革命形势快速发展的需要，武汉分校决定在学员中招收 100 名女生。消息传开后，各地女青年踊跃报名，最终录取 183 人。这些女生年龄在 15~20 岁，入校前一般都受过中等以上教育。她们大部分参加过学生运动或妇女运动等革命斗争，其中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的和理想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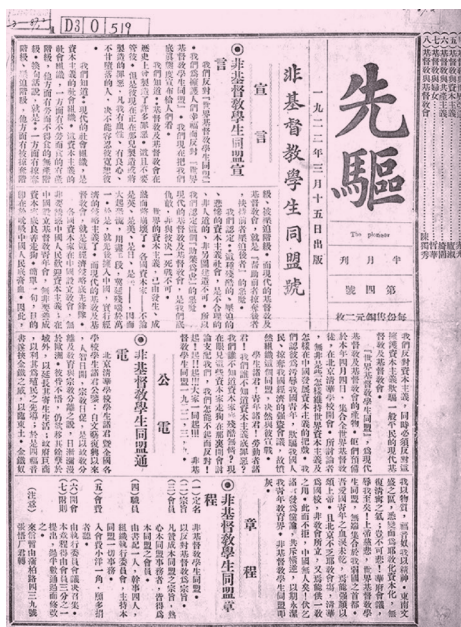
军校女生日常实行军事化管理，剪短发，着戎装，同男生一样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体能训练。由于队员主要是为军队培养政治工作人员，所以学习课程以政治类为主。恽代英、许德珩、施存统等教官负责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以及关于妇女解放等课程。女生队学员中还配备有军事教练和政治思想工作指导员。学员们除了在军校的理论学习、军事训练外，还经常深入到武汉三镇工厂、街头，作演讲、演话剧，刷标语、贴传单，进行革命宣传，并参加省市妇女协会的各项活动。女生队中的许多学员在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和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经受了考验，磨炼了意志，成长为优秀的革命战士，被政治总教官恽代英誉为妇女解放的先锋和榜样。

（王春贺 文道贵）

教会学校的“非基督教运动”

基督教，一个中国人都不陌生的西方宗教。但它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却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漂洋过海而来。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汉口开埠以来，大批传教士进入武汉，建造教堂、医院和学校，传教布道。这些传教士中不乏虔诚的信徒，为传播宗教福音而来，也有人为传播近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做了有益的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还有相当多的传教士在宗教面纱的遮掩下，做着损害中国主权、进行文化侵略、抢夺经济利益、欺压中国百姓等不法勾当，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爱国情绪日益高涨，一场致力于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开始产生。1922年初，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于4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一届大会，以进一步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消息传出，首先引起中国青年学生的激烈反对。3月，上海青年学生率先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发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声讨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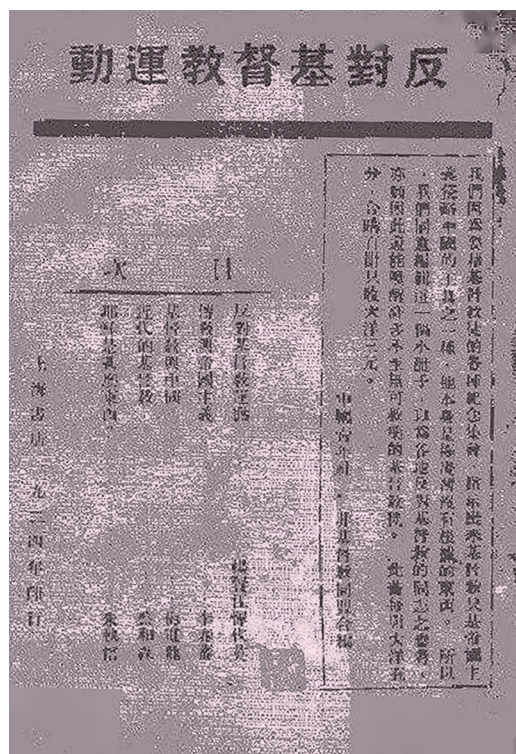


1922，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发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



的罪行。1924年，上海学生成立“非基督教大同盟”。这场运动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腹地武汉的非基督教运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

1925年5月16日，湖北反基督教同盟正式成立。在该组织的大力宣传下，教会学校学生的觉悟得到迅速提高。5月30日，上海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反帝浪潮很快席卷全国。武汉各教会学校的学生再也无法安心祷告了，纷纷冲破学校禁令，投入到支援五卅运动的反帝斗争中。这一天，文学书院的学生段继李如往常一样进行礼拜祷告，学习功课。就在他翻阅报纸时，一则新闻让他心脏骤紧：“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英帝国主义巡捕公然向群众开枪，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一个个残酷的数字，让段继李再也按捺不住对帝国主义的愤怒之情。放下报纸，他立即找到自己的好友曹文汉、范治稣等同学，讨论惨案的事情。



反基督教运动文书

此时，武汉市学联正积极联系各校学生会，发动各校学生参加支援五卅运动的反帝活动。但当时文学书院并没有学生会组织，段继李和几位好友商量着，便主张不经学校同意，而先行联系各班学生成立临时学生会，其中曹、范两同学被推选为正、副主席，段则被推举为各校和省、市学联的联络员。6月2日，他们代表出席了武汉市学联举行的各校学生代表大会。会后，他们积极响应武汉市学联的号召，发动文学书院的学生参加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反帝活动，同学们也

都积极地参与，每天都有队伍出去游行宣传。

在教会学校中，学生是不被允许参与政治的，有的教会甚至勾结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镇压革命活动。文学书院的校监戴成龙和院监艾神父见学生爱国热情高涨，多次发布通告禁止学生上街进行反帝宣传。但在段继李、曹文汉、范治稣等学生会成员的周密组织下，宣传活动照常进行。学校眼看禁止不住，便采用记过、扣分，甚至不准食堂补开饭食的办法，来对付学生的爱国行动。学生纷纷表示抗议，他们开始在书院内张贴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罢工工人、打倒帝国主义、反对教会统治学校等标语口号，一些进步教师也趁机提出中外教师待遇不平等的问题，一时间，学校氛围十分紧张。

由于曹文汉、范治稣个人品质很好，一向为全校学生所爱戴，学校当局感到对他们无法制服，便采用杀鸡儆猴的办法，开除段继李的学籍，这更加激起了全院师生的公愤。随后，学生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邀请了许多教师参加。会上，曹文汉和范治稣以主席身份提出了教会统治学校、中外教师待遇不平等以及书院开除段继李学籍的问题。经大会讨论决定，由曹文汉、范治稣代表学生会向学校提出抗议。经过反复交涉，学校当局仍不答应收回开除段继李学籍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临时学生会又召开了第二次全体学生大会，与会的学生和教师对学校干涉爱国运动的行径都感到极为愤怒，他们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一致决定从第二天起实行全体罢课。

在罢课期间，学校为瓦解学生的爱国斗志，采取封闭图书馆、阅报室、教室和医院等恶劣方式。对此，学生表示坚决抵抗，每天组织学生巡查队进行监察。他们将教会和书院的外籍神父、教士等限制在花园山上的教堂、宿舍等范围以内，不准自由外出。这场文学书院的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一直坚持到9月，最后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省市学联的大力支持下，湖北省教育厅关闭了武昌文学书院，并把全体师生转入武昌中华大学继续学习，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1926年，随着大革命运动的发展，武汉的“非基督教运动”进入高潮。起因是教会学校侮辱学生人格、限制自由。武昌华中师范是一所英国人开



办的教会学校，素来对学生实行高压政策。这里的学生除了每天读《圣经》、做礼拜外，根本学不到什么知识。他们的言行稍有不慎，便会被校方以“赤化”、“过激”等罪名开除。北伐军占领武昌后，该校对学生的压迫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其中一名叫梅戈登的英籍教员仗着自己是洋人，总是歧视中国学生。

10月的一天，梅戈登在课堂上当着学生的面，竟说中国学生为奴隶，并持续谩骂了数十分钟。作为中国人，哪能受得了这般侮辱，学生们当即退出教室罢课，以表抗议。梅戈登见此更为恼羞成怒，竟动手殴打学生，教室瞬间一片混乱。中文教员夏明如听到动静后，立马赶到教室维持秩序。这位中国教员可是学校出了名的洋奴，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他与英籍校长贾蒲荫相互勾结，摧残学生，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夏明如见这位洋大人发了气，不顾梅戈登辱骂中国学生在先的事实，强令学生写忏悔书给梅戈登道歉。校长贾蒲荫了解此事后，不仅命令开除得罪梅戈登的杨君之学籍，而且还向学生提出了七条无理条件。

面对种种的迫害侮辱，学生们忍无可忍，坚决起来罢课。他们向学校提出改良待遇、革新教务等要求，表示学校不接受要求就决不复课。斗争持续了数天，后来经武昌学生联合会调停，学校答应了学生提出的条件。但复课后，贾蒲荫出尔反尔，答应学生的条件非但没有实行，反而以学生不应参加陈定一烈士的追悼会为借口，掏出手枪威逼全校学生在1小时内退出学校，并把学生的行李抛出校外。全校的学生被驱逐出校，落得流离失学、无处可归的境地。

对此，湖北省学联在创办的《湖北学生》杂志第十二期中，专门发表《基督教铁蹄下的武汉学生》一文，披露了基督教势力下武汉学生的痛苦现状，文中疾呼“救世吗？博爱吗？仁慈吗？那都是骗人的假话啊！他们的‘慈’，他们的‘爱’，我们都受够了。若要长此的‘慈’‘爱’下去，恐怕不弄到国亡种灭不止呀！”人们更加认清了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真实面目，一场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1926年12月，武汉地区各级学联和其他群众团体联合成立了武汉“反

基督教大同盟”，准备领导群众开展更大的反帝斗争。在该组织的指导下，自22日起，武汉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各个街头散发传单。整个街道、教堂和教会学校里均贴满了“反对文化侵



武昌某教会大学教堂

略”、“革新教会教育”、“严禁教会学校强迫学生读圣经做礼拜”等标语，各报纸载满各团体反对基督教的宣言和通电。

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反基督教大同盟在武昌、汉阳、汉口三镇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基督教群众大会。与会群众以学生为主体，多达数万余人，现场群情激愤，盛况空前，各界代表纷纷发表演说。会上通过了《反基督教决案》，要求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和帝国主义合谋侵略中国，要求收回教育权，号召人们为本国民族自由而战。大会结束后，学生们分队沿街做大规模演讲，揭露教会势力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教会中人恐起众怒，均不敢外出。以往各教会为庆祝圣诞节，必张灯结彩，举行宴会，然而这一天却十分冷清，各教堂都被迫取消了圣诞节的庆祝仪式，教会学校也自动停止了学生的祷告诵经活动。

面对学生高涨的反教情绪，帝国主义者和一些基督教势力感到非常惧怕。路德中学当局宣称：“学生中有共产党控制”，“凡参加过反基督教运动的师生永不录用”。对此，华中大学、训女中学、博文中学等教会学校学生相继发表声明要求退学。为了使这些退学的学生能够继续读书学习，经武汉地区各学联和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教育科的帮助，这些学生大部分都转入了其他学校。

为了收回教育权，在武汉青年的推动下，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于1927年1月颁布了《湖北省取缔外人设立学校条例》，迫使湖北省的教会学校改

组董事，选任国人充任校长，取消圣经礼拜等课。“非基督教运动”的高涨，同时也提高了一些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觉悟。1927年1月，武汉基督教徒发表《武汉基督徒革新宣言》，表示愿意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封建军阀。

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力，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非基督教运动”，在武汉青年的英勇斗争下，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武昌长街 119 号的年轻人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武汉一时成为举世瞩目的国民革命的中心。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赤都武汉，加入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中。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得当时位于上海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深感有迁汉的必要。

1927年春，全国学联总会在上海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该会常委唐鉴先行入鄂，调查湖北学生运动情况，再决定总会是否迁鄂。

唐鉴，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宁远县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积极从事革命



唐鉴

活动，曾组织参加湖南省三师驱逐反动校长刘志远的学潮，取得了胜利。在大革命期间，他多次在《中国学生》等刊物上发表文章，鼓舞广大学生投入到国民革命中。因过人的胆识和出色的成绩，唐鉴深受组织信任，于1926年夏被选为全国学联总干事。1926年，唐鉴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第八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做了关于学生运动的报告。其报告观点鲜明，见解精辟，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拥护。在这次大会上，唐鉴当选为全国学联编辑部常委。

1927年2月20日，唐鉴风尘仆仆地从

上海赶到武汉，此时武汉已是国民政府所在地，青年运动风起云涌。唐鉴一下船，便受到了武汉各革命团体的热烈欢迎，《汉口民国日报》接连两天刊登他赴鄂的消息。当天，唐鉴就被安排在位于武昌新河街的平安旅社，休息了一会儿，便立马投入到工作中。他首先前往武昌、汉口、汉阳学联和大、中学校学生会视察，详细了解武汉学生运动的情况，征求总会迁鄂的意见。第二天，他分别拜访了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湖北省党部、武汉市党部、市总工会等团体，向他们介绍了上海工人罢工反对英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传芳的情况，同时敦促各革命团体声援上海工人运动。

2月25日，湖北省学联专门召开大会，欢迎唐鉴来到武汉视察，武昌、汉阳、汉口三学联所属的各个学校均派代表参加。会中，代表们都纷纷表达了希望全国学联能尽快迁到武汉，直接领导全国青年运动的强烈愿望。经过连续几天的考察，唐鉴深深感受到武汉浓厚的革命气氛以及广大青年的革命热情。会后，他向上海汇报了在武汉的考察结果，全国学联总会当即复电，指出：“鄂省为全国中心，实有迁鄂之必要，只因此时上海正举行反英反孙的罢工，需要学联总会的领导，加上路途遥远，学联迁鄂亦难立即到汉……为兼顾两方工作起见，决定在鄂设立办事处，就近指导湘鄂川赣等省学生运动及参加武汉各种运动，即推在鄂的常务委员唐鉴负责进行筹备。”

唐鉴接到指示后，立即开始着手筹备。3月10日，全国学联总会驻鄂办事处在武昌大朝街武昌学联内正式建立，唐鉴任总务主任，陈冶璞为交际主任。第二天，湖北省学联在武昌首义公园召集武汉学生大会，热烈庆祝全国学联办事处开始办公。唐鉴在会中告诫各位同学既要努力学习，又要积极投入国民革命运动。

就在大革命蓬勃发展之际，国民党内部的反动势力在蠢蠢欲动，特别是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后，蒋介石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1927年3月16日，蒋介石强制解散国民党南昌市党部，解散江西省学联。17日，又在九江纠合流氓捣毁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总工会。消息传到武汉，唐鉴立即以省学联和武昌学联等学联的名义，通电质问蒋介石，表示“誓与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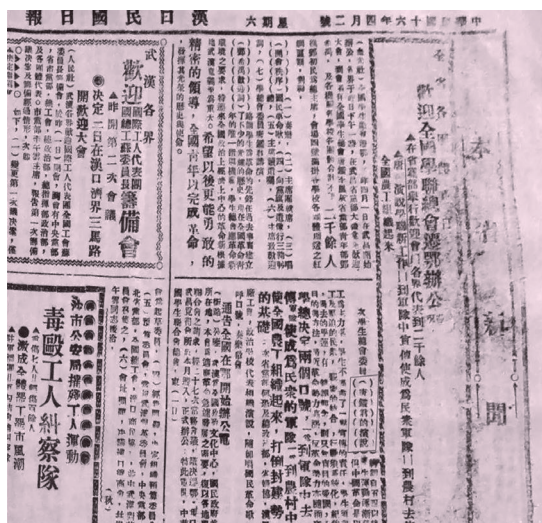
对工农运动而危及革命的蒋总司令奋斗，以保障革命的胜利”。面对革命局势的急剧变化，仅靠办事处是无法决策一些重大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学联于3月18日召开第二十七次常务会议，决定将总会迁到武汉。会后，学联的青年工作人员携带着相关文件行李陆续启程，3月下旬，他们全部到达武汉。

3月31日，全国学联在武昌召开第二十九次常务会议，出席者有唐鉴、郑鼎勋等委员及干事等十余人。首先由郑鼎勋报告结束上海工作经过情形，唐鉴报告来鄂准备经过，提出了新形势下学联的任务，并决定全国学联于4月1日在武昌正式办公，机关设在武昌长街119号。

4月1日下午，武汉各团体代表为庆祝全国学联总会迁鄂，在省党部举行欢迎会。会场四周悬挂着由各学校各团体赠送的红绸匾额，革命气氛十分浓烈。到会的有全国学生总会唐鉴等代表、省党部青年部邓初民及学校各团体合计二千余人。1时许，大会正式开始，首先推举邓初民为总主席，接着雄壮激昂的国民革命歌在会场响起，全体代表起立向党旗和孙先生的遗像行三鞠躬。奏乐毕，总主席邓初民致欢迎词，他指出：“学生为革命的先锋，在过去建立了不少光耀的历史”，“学生总会应革命环境之要求，

特迁来全国政治上经济上中心的革命新根据地武汉，立意至为重大”“希望以后更能勇敢的精密的领导全国青年以完成革命，发挥其光荣的历史与使命”。

随后，全国学生总会委员唐鉴发表演说，提出了学联的新任务：“一，到军队去，宣传军队，使之成为民众的军队；二，到农村去，使全国工农组织起来，打倒封建



1927年4月1日，全国学联迁到武汉。

图为《汉口民国日报》的报道

势力的基础。”接着，湖北省党部何恐及总政治部、省妇协、汉口烟厂工会、政治学校代表相继演说。最后，大会在激昂的歌声和口号声中结束。

当时，全国学联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革命热情很高。总会迁到武汉后，他们每天聚集在武昌长街的办公机关内，热烈讨论着如何带领青年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问题。在他们的领导下，湖北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学生会组织也得到整顿和壮大。到1927年5月，湖北省有40余个学生会，参加学生会的学生达五万多人，成为湖北地区团委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得力助手。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学生运动同其他革命活动一样，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学联总会在武昌长街119号的机关内举行了一次常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唐鉴、郑鼎勋、萧日华、郭学宗、李正德、王为国、金绍文等人员。大家分析当前形势，议决了令北方学生捣乱敌人后方、组织反帝国主义武力干涉中国大同盟等事项。为了更好地完成以后学生工作任务，会议上对委员的工作进行了重新分配，决定唐鉴为总务部常务委员，包泽英、郑鼎勋、胡业崇等分别为组织部、宣传部、编辑部常务委员。

全国学生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中。5月中下旬，反动军阀夏斗寅、许克祥等相继叛乱，武汉局势危急。全国学联总会当即发出通电进行声讨，指出：“南蒋北张，同为民众的仇人，若不一律铲除，终成巨患，深望痛加挞伐，鸣鼓而攻”。同时，学联还积极发动广大学生进行反叛变宣传和慰问伤员活动。当叶挺部和中央独立师的伤员撤到武汉时，唐鉴带领全国学联总会的同志们和湖北省学联一起，携带饼干、毛毯、毛巾、茶壶等慰问品，赶到医院慰问伤员。针对湖北学生中存在的闭门读书回避革命和借口参加革命荒废学业的问题，5月26日，全国学联专门发出致湖北省学联的通告，要求学生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纠正了湖北学生运动中的两种错误倾向。

6月底，武汉国民政府内的反动势力也在蠢蠢欲动，准备公开叛变。为了取得广大学生的支持，6月28日，全国学联总会在武汉召开第八届常

务委员会，萧日华、金绍文、徐祥霖、胡业崇、林隶夫、郑鼎勋、唐鉴等人参加会议，讨论了关于第九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的筹备事项，最后决定由林隶夫为筹备处主任，负责筹备第九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的各项工作。为了筹备好这次大会，全国学联的每一个年轻人在这革命危急的时刻，四处奔波，兢兢业业地工作。7月初，当参加代表大会的各省学联代表陆续到达武汉时，唐鉴代表全国学联亲自主持召开欢迎大会，介绍湖北学生运动情况，阐述反帝反蒋的意义。为了营造大会的革命气氛，自9日起，全国学联接连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刊登大幅广告，并发表“学生总会反蒋通电”的文字，宣传大会的主张。

经过精心筹备，7月15日，第九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湖北省党部成功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北京、上海、广东、湖南、湖北、山东、四川、江西、河南、安徽、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奉天、吉林、贵州、云南等地学联代表51人。大会总主席刘荣简首先致词，指出了本次大会的任务：“拥护革命的国民政府；拥护国民政府消灭蒋介石、张作霖；反对帝国主义；检阅过去的工作；坚固本身组织，决定今后的工作方针。”郭沫若出席大会，他谈道：“现在时局已到了一个很严重很困难时期……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联合向革命势力的壁垒进攻……同时国内一切反动势力，亦联合起来向革命的壁垒进攻，使革命势力，在四面楚歌之中，此刻我们应当团结我们的力量，打出一条生路来。”大会检讨了过去的工作，决定了以后的工作方针，号召全国学生到农村去，到军队中去，到群众中去。

这次会议正值武汉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的危急时刻，但在工作人员的团结努力下，学联战胜了种种阻力，大会顺利进行，前后总共开了6天，最后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改进学生本身利益、农村工作问题等决议案和讨伐蒋介石的宣言，为即将到来的残酷斗争做了准备。全国学联带领着广大学生投入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全国及湖北的青年学生运动由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红红火火的劳动童子团

在大革命时期的武汉街头，曾活跃着这样的一个儿童群体，他们身穿草绿上衣，脖系红领巾，肩扛红色木棍，年纪不大，但每个人宛若一个小战士一般，洋溢着坚定的革命意志。他们英勇奋斗，不畏艰难，在国民革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劳动童子团。

在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许多贫穷子女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备受苦难，小小年纪就辍学去工厂当童工，去商店当学徒，每天工作起码 12 个小时，工资极少，勉强度日。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干活，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什么休息、玩耍了，而且常常受到老板的欺凌虐待，饱受煎熬。这些儿童迫切想要参加革命，获得解放。

中共在领导工农运动的同时，也开始注重发挥少年儿童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作用。1926 年 7 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扩大会议专门为儿童运动拟写了决议案——《儿童运动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明确指出：“现今正在生长的青年男女儿童，即是三五年后社会上活动的中心力量。教育这些儿童，养成他们勇敢牺牲的精神和团体生活的习惯，经过他们去影响现代社会的生活，训练他们成为将来继承斗争的战士，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极重要的使命。”会后不久，团中央正式发布了劳动童子团章程，促



纱厂的童工

进了各地劳动童子团组织的普遍建立。

随着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在李立三、刘少奇领导下，10月10日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不到两个月，工会会员就发展到30万人。武汉广大童工热情高涨，纷纷要求组织起来，参加革命斗争。从11月开始，总工会下属各产业工会，如火柴工会、美孚工会、香烟工会等，先后成立劳动童子团，规定凡是12至16岁的男女童工都可参加。由于当时童工们踊跃参与，实际上一些团员的年龄超过了16岁，最小的仅8岁。

童子团一经成立，就积极投身于火热的革命中。1927年1月3日下午，为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宣传队来到汉口江汉关与英租界相邻的广场上作演讲。英帝国主义趁机挑起事端，调集大批水兵登陆，企图驱散听讲群众，群众当场被刺伤三十多人，从而激起武汉各界的极大愤慨。5日，在省总工会的指挥下，武汉各界群众举行了大规模反英示威大会。武汉的童子团作为一支骨干力量，也出现在群众的游行示威活动中。他们不怕危险，积极配合工人纠察队的工作，维持着现场秩序。会后，在总工会带领下，这些童子团跟随着广大群众冲进英租界，愤怒地高喊着：“英帝国主义滚出去！”面对帝国主义生火冒烟的军舰、脱去炮衣的大炮，这些少年儿童毫无惧色，并肩战斗，为收回英租界坚持到最后胜利。

随着劳动童子团的不断壮大，湖北省总工会决定成立劳动童子团总队，统一领导全市的劳动童子团组织。1927年2月26日，湖北省总工会劳动



劳动童子团联合会合影

童子团总队举行成立大会，汉口、武昌、汉阳等劳动童子团的各区队长和指导员均出席，到会者约140人。他们整队出发，来到跑马场会操。只见这群童子团员身穿草绿上装、

短裤，腰扎黄色皮带，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列队行进时，右手将一根红色木棍托在肩上，左手整齐地摆动着，雄赳赳，气昂昂，十分威武。他们一面前进，一面高唱团歌《少年先锋歌》，歌声嘹亮，红旗飘扬，沿途观者，人山人海。会操后，省总工会负责人向忠发、项英、林育南等到会发表讲话，讲述了童子团以后的发展和任务，鼓励大家争做好团员，一时革命空气充满会场。最后，总队长曹策和副总队长方德俊宣誓就职，童子团员们齐呼口号：“时刻准备，一致团结，努力工作，勇敢向前。”一时间军乐齐鸣，歌声此起彼伏，整个会场沸腾起来。



童子团袖章（湖北黄石档案馆藏）

总部的设立，使得劳动童子团的组织更加健全了。劳动童子团总部设在总工会，以各个产业工会为单位来设立大队，大队以下依次是分队、支队、小队。每十人为一小队，合三小队为一支队，由若干支队组成分队，然后集各分队为一个大队。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全省童子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至1927年5月，武汉的劳动童子团由1.2万人发展到4万人。

为了提高童子团员的觉悟，在湖北区团委指导下，劳动童子团总部还特意开办训练班。在训练班内，这些少年儿童聚起来学习革命的理论，进行着热烈的讨论。他们还时常在一起唱歌、做游戏。经过学习和教育，大多数童子团员均能讲解打倒帝国主义军阀以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意义和他们与工农之间的关系。有的团员还能在大街上向民众作演讲，鼓动人民起来革命。在执行任务时，童子团经常高唱《时刻准备着》，牢牢记住团歌告诉自己的：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要在斗争中发挥先锋作用；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

革命觉悟得到空前提高的童子团成员首先拉开了反对资本家剥削的斗争序幕。这些成员大部分是店员和学徒，每天工作甚至长达16小时，动辄



就要受到打骂，几乎被当作店东的奴隶来使唤。为了取得人身自由，童子团成员团结起来向资本家展开了罢工斗争。在党的领导支持下，这些店东面对充满革命斗志的童工学徒，终于屈服下来，同意了8小时工作制，过去店员和店东之间的奴仆关系几乎被冲破。

对此，湖北省工会同武汉市商民协会举行联席会议，作出了关于《童工问题执行条例》的决议案，规定：童工学徒每日工作8小时；童工学徒在店工作，须依其工艺能力之高低给予工资，最低限度的工资，第一年每月一元，第二年每月二元；店东还要负担童工学徒的童子团服装费，每人每年六~七元……这对于长期受到剥削压迫的童工来说，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关向应在《中国青年》上撰写的《武汉童工争得8小时工作制以后应有之努力》一文中指出“这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这一胜利“是童工血汗的积累，是童工在革命过程中勇敢牺牲争得的结果，是值得我们庆祝的”。从此，童工们扬眉吐气，革命热情更加高涨。

1927年4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后，立即引起群众的愤慨。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等纷纷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的种种罪行，并号召各界群众进行反蒋斗争。4月下旬，劳动童子团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蒋大会，到会的有近一万名童子团员。这一天，童子团员着统一团服，“时刻准备着”的歌声格外嘹亮，东征讨蒋的口号激愤有力。他们宛若一个雄壮的蛟龙，发出铿锵的怒吼声，整个会场激情澎湃，声势雄壮。刘少奇、贺昌等领导都参加了大会，他们和童子团员一同声讨蒋介石，鼓励团员英勇奋斗，最后大会发了讨伐蒋介石的通电。此次由武汉儿童单独召开的一次反蒋大会，在中国革命史上还算是第一次，显示出了劳动童子团的巨大革命力量。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东湖誓师，开始第二次北伐，大批军队相继开赴河南前线。此时城内军事力量薄弱，反动军官夏斗寅趁机于5月13日发动叛乱，向武汉疯狂进攻。一时间，武汉城内人心浮动，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獗，秩序极为混乱。在这紧急关头，劳动童子团勇敢地站出来，担负起维持武汉秩序的任务。他们配合工人纠察队，在武汉各个街头昼夜

站岗放哨。他们尽心尽责，只要没人接班就绝不撤岗，凡是遇到可疑行人便要上前盘问，抓获了不少反革命分子，成为武汉卫戍部队的得力助手。武汉三镇大街小巷到处都闪现着鲜艳的红领巾，他们为保卫武汉贡献了力量。

与此同时，河南前线源源不断送来伤员，护理人员十分缺乏，共青团把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劳动童子团。团员们组织起了各类担架队和救护队，救护从前线下来的伤员。童子团虽然年龄小，但十分耐心负责。他们轮流给这些伤员换药、洗衣服，还给他们唱歌、讲故事，以减轻伤员的痛苦。劳动童子团员悉心服务的精神，受到伤员们的齐声赞扬，他们纷纷给上级写信表扬童子团。

6月9日，叛军侵袭大冶。童子团配合着工人纠察队，勇敢地投入战斗。他们冒着战火运送弹药、送情报、照护伤员，虽然年幼，但仍手执大刀参加战斗。在战斗中，年仅15岁的左宏运在运送弹药途中不幸中弹牺牲，先后有200名劳动童子团员献出了年幼的生命。

1927年5月8日，武汉劳动童子团在德国球场（今武汉六中内，原德华学堂）举行了第一次大检阅，到会的有劳动童子团、农村童子团等2万余人。会上，劳动童子团总部发表宣言，指出“现在儿童群众就是将来新社会的主人，将来良好的、健全的、进步的新社会，完全要等待现在这班儿童群众去建设”，他们的责任就是“教育训练这广大的儿童，脱离旧社会的种种束缚，扫除一切不合现时代的种种思想，养成他们活泼、勇敢、牺牲、为群众谋利益的精神，去创造完美的未来新社会”。最后，大会还通过致苏联赤色童子团书，提出“携手同进，埋葬帝国主义”。大会鼓舞着广大童子团员继续前进。

红红火火的武汉劳动童子团，诞生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中，他们以自己年幼的身躯和英勇的斗争而名震江城，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将永远载入湖北革命史册。

武昌第一小学的青春之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武汉革命形势逐渐恶化，广大革命青年陷入迷茫彷徨之中，急需新的指导。

1927年4月中旬，在莫斯科参加少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在会议结束后就急忙回到祖国，赶往武汉。此时，武汉街头到处贴着反蒋标语，时常响起革命歌声和口号，北伐军、工人纠察队的队伍不时在街头穿街而过。但这看似红红火火的革命氛围中，却隐隐潜伏着危机。



陆定一

任弼时一下车，便赶往黄陂路青年会，这里是共青团中央临时的办公地址。陆定一、李求实、刘昌群等青年工作者都已到达武汉。阔别半年，大家彼此都倍感亲切。在青年会隔壁的一幢西式楼房里，共青团宣传部长李求实、秘书长杨善南正向任弼时汇报着四一二政变以后团组织被摧残的情况：上海8000名团员只剩下3000名，童子团几乎完全瓦解；广州四一五大屠杀后，6000名团员损失了一半。无数革命青年惨死于蒋介石等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这一

一刻，任弼时不禁心情沉重，思绪万千，如何指导接下来的青年工作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4月27日，任弼时参加了在武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参与了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批评。5月9日中共五大闭幕后，任弼时立即着手准备第二天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前，在武汉地区共青团的协助下，大会各项议程都已准备妥当，会址就设在中共五大举行开幕式的武昌第一小学风雨操场旁边的小礼堂内。

5月1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60多名代表，分别来自豫、陕、鲁、浙、粤、川、湘、鄂等各个地区及东京支部、旅欧支部，受着全国五万团员的委托与数万青年工农的热烈渴望。此外，第三国际、少年共产国际、苏联共青团、法国共青团、美国共青团、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全国总工会、湖北劳动童子团总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武昌中山大学、湖北省和市的学联等革命团体也都纷纷派代表出席。开幕式当天参加人员达3000多人。

进入会场内，只见正中间高悬着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孙中山的画像，四周张贴着“我们的旗帜——列宁，我们的武器——列宁主义，我们的任务——世界革命”等革命标语。武汉地区省、市学联和童子团同其他团体一起，向大会赠送了各式标语、旗帜、匾额、对联等，布置于会场周围，整个会场庄严肃穆，充满革命气息。从会场外面的大门到会场门口，排列着头裹红巾、手持木棒、身穿劳动制服的童子团员，他们雄赳赳地站立在会场周围，维持着会场的秩序。《汉口民国日报》对此次大会报道称：“革命空气之紧张浓厚，空前未有”。

上午大会开始后，首先由湖南区代表提议推举任弼时、萧子璋、贺昌、徐纬、杨善南、欧夏民、关向应、吴振鹏、田波扬等9人组成主席团，代表们鼓掌表示通过。随后全体起立，静默三分钟，以哀悼各地死去的同志和青年战士。团的四大是在革命危急关头召开的。就在大会召开前不久，著名的青年领袖萧楚女和中共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毕磊被国民党反动派装入麻袋，沉溺于珠江；紧接



1927年，任弼时（后中）与妻子陈琮英等在武汉合影

着，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等二十余人惨死于军阀张作霖的绞架下。随着激越雄壮的《国际歌》响起，对敌人的仇恨、愤怒和力图挽救革命的使命感共同汇合成大会悲壮的基调。任弼时后来这样写道：“虽然大会的四周充满了反动的空气，会议时，每天得到各地电信，报告我们最勇敢忠实的同志被新旧军阀张作霖、张宗昌、蒋介石、李济深枪毙、腰斩、火烧的消息，但是这不独没有引起大会的恐慌心理，反而使各地代表在悲愤之后更加团结精神，解决各种重要议程”。

担任大会主席的任弼时致开幕词。他悲愤地回顾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白色恐怖的情形，并谈到此次代表大会责任重大。简略地说，就是三个方面：一、集中全国青年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反对世界未来的战争；二、依据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为打倒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创造非资本主义的革命前途而奋斗；三、代表青年工农及一般被压迫青年的利益，继续为改良青年生活而斗争。接着，英国共产党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部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代表、全国总工会代表和武汉的童子团代表等都先后致词，对今后中国革命和斗争方针提出了问题和意见。

下午3时半左右，共产党代表恽代英和蔡和森匆匆赶到会场。他们昨天刚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今天就带着五大的精神来向团



中国共青团四大会址——武昌都府堤20号

传达党的决议报告。恽代英指出五大对于政治问题的重要精神“在于创造非资本主义的革命前途，建设民主独裁的政权”，“而青年代表大会应在党的指导之下，为此种革命政策而奋斗，消灭一切反革命势力”。蔡和森则谈到“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精神，即在指出目前的革命潮流并非低落，全国工人农民须目前加紧争斗，为创造本党的前途而奋斗，希望大会的团员同志一致向此目标奋斗”。代表们一致赞同党的五大决议，表示要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

这次大会前后进行六天时间，虽然大会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和汪精卫集团日益右倾动摇之时召开的，但大会还是开得很成功。代表们分组认真讨论了关于经济斗争、农村工作及军事工作等相关问题，并确定以后的工作方针。

12日，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电贺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四大召开。贺电强调：“在武汉政府所属省域以内组织广大劳动青年群众，积极发展军事和农村工作，是你们极重大的任务。”13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赫达洛夫作报告，指出中国共青团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一个有力的支部”，今后应坚固内部的组织，极力培植青年工人为团的中心，使每个团员都明了他的任务。

就在大家热烈的讨论中，突然传来武汉政府所辖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的消息，突然恶化的革命形势使大会笼罩在更加紧张严肃的气息中。5月16日夜，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式在武昌第一小学的礼堂内举行。任弼时站在主席台上，庄严宣布：“革命运动已经转入一个极严重的时刻，大会号召全体团员在党的领导之下，偕同被压迫的青年群众，在工会、农会、学生会的旗帜下，进行更加系统更加勇敢的战斗！”“到工人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我们高擎列宁主义的红旗，为着中国革命而踏着烈士的血路前进！”

中國共產青年團第四次全國大會宣言

一九二七年五月，正值革命轉入一極嚴重局面的時期，中國共產青年團在武漢舉行了第四次全國大會。對於中國革命之前途與勞苦青年羣衆本身的諸問題，以及本過去與今移的工作，均有周詳的討論，爲謀革命青年羣衆與本團同志之了解及其努力，大會特發佈下列宣言：

從「打倒帝國主義」的呼聲喊出之後，經過五卅流血鬭爭和十五個月省港罷工的吼，再由北伐軍而湘而鄂而贛而江浙的傳喚，反帝國主義運動便這樣掩蓋了東南部帝國主義者的兇惡。歐戰以來，帝國主義者全靠剝削殖民地而苟延殘喘，中國革命運動飛突猛進，實給帝國主義者以致命的打擊；是以在驚惶萬狀之下，砲艦雲集在滬濱漢了，經濟封鎖開始了！野蠻地向蘇聯挑戰，集重兵於太平洋東岸，準備造成因惡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

其次，在英日帝國主義者卵翼指縱之下的奉魯軍閥，雖屬日薄西山，却更厲行自恐怖，奮其困獸之最後死鬪。

而嚴重中之尤嚴重者，則爲蔣介石所代表之大資產階級的叛變！資產階級之欲叛革命，醞釀原在五卅以前。五卅運動開始，無產階級獲得了革命的領導權，上海資產階級已試其端；戴季陶高唱其「仁愛性能」的騙局而後，蔣介石再試於廣州三月

刊登在《中国青年》上的《中国共青团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



团四大通过的《中国少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规定了关于组织建设和工农、学生、儿童等方面的工作方针。最后大会选举任弼时、李求实、杨善南等组成新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任弼时为团中央总书记。

在激越的国际歌和少年先锋歌声中，“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共产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少年共产国际万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的口号响彻整个会场。各位代表带着大会的精神和决议奔赴全国各地，将武昌第一小学的青春之歌播撒大地。当时的主席团成员杨善南后来谈到此次大会时写道：“我们可以说这次大会所得着的东西，最宝贵的，就是从实际工作的经验中得出来以后行动的方针。”在革命的危急关头，真正的革命青年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重新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刘佳欣）

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宣言指出：“青年是站在最前线！迫切地要求革命，不顾一切地参加斗争，在全国革命大队之中，是没有比青年更甚的！”宣言训令全体团员一致动员，“在农村中努力推翻封建地主的政治经济的统治，实施土地革命，以求革命的深入，踊跃参加肃清封建余孽的北伐战争，以求革命的扩展；尤应彻底反对中途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力谋改进工人生活，为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而奋斗！”同时，会中还规

东征，还是北伐

1927年4月18日，汉口南洋大楼内外洋溢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紧张气氛。楼外，哨兵警惕地关注着繁华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楼内，国共两党代表和苏联顾问在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上展开空前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辩，他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究竟是东征还是北伐。对于这一直接关系大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会议最终做出了怎样的决策呢？

血案迭出，周恩来等联名致信中央呼吁讨蒋

1927年3月，北伐军在各大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羽翼渐丰的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也日益显露。他唆使爪牙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捣毁了九江、安庆、芜湖、南京等地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党部、总工会和群众团体。3月2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打败北洋军阀部队，占领上海，迎接北伐军进城。3月26日，蒋介石进入上海。

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与帝国主义、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勾结起来，紧锣密鼓地密谋策划反共“清党”。4月1日，上海商界、银行界给予了蒋介石筹划政变所需的第一笔资助——300万大洋。江浙财阀还专门成立了军事、外交两个委员会，为蒋争取英美日等列强的支持。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将大批帮会分子武装起来，供蒋介石驱使。蒋介石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做好了充分准备。

4月12日，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他指使上海青帮流氓冒充工人突袭上海市总工会，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借调解之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对第二天游行示威的工人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

死 100 多人。在事变后 3 天中，上海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300 多人，被捕者 500 多人，失踪者 5000 多人（大多数也被杀害），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牺牲。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反动派相继以“清党”名义，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平绞杀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屠杀如此惨烈，鲁迅说：“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

其实，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他的反革命面目已经暴露，有关蒋介石政变的消息已广为流传，甚至见诸中外报章。但是，从海外回来的汪精卫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于 4 月 5 日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宣言，散布和缓空气，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对即将到来的反革命政变放松了警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党中央在武汉也举行了讨论上海问题的会议。会后，党中央立即派李立三、陈延年、维经斯基去上海传达党中央会议精神，并要求李立三、陈延年、维经斯基会合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五人特务委员会，执行解决上海问题的任务。可是李立三、陈延年、维经斯基刚到南京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发生了。他们赶到上海后，又接到了陈独秀的电报，电报仍然反对在军事上打击蒋介石。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党内右倾退让的错误，1927 年 4 月 16 日至 18 日，在上海召开的特委会议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慷慨激昂地陈述了他们的主张，强调不能再对蒋介石妥协退让，应当举行武装暴动，并要求武汉国民政府迅速出兵讨蒋。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我们在此次屠杀中（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缓和，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以致在民众中有不良影响……致使此次大受其亏。国共联合宣言（指汪陈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周恩来又指出：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

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

周恩来的发言引起了参会同志的共鸣和赞同，会上决定以个人联合签名的形式向武汉党中央发电，即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陈延年、罗亦农、尹宽以个人名义签名。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电文。于是，周恩来撰写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文：

……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左倾军队日益惶惧。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周恩来起草的这封电文，是一篇颇具远见卓识的出师讨蒋革命檄文，对于时局的判断和东征讨蒋的必要性、可能性都进行了充分论述。然而，这些党内有识之士的大声疾呼，并没有得到在武汉的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采纳。

决定命运的4月18日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4月16日中共上海特委会开会的同一天，在汉口南洋大楼国共两党也举行了三天的联席会议。国民党方面出席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等人，共产党方面出席的有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人，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就是北伐还是东征。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人面临的局势异常严峻险恶。武汉国民政府只控制湖南、湖北和江西部分地区，兵力约10万人，不仅财政困难，而且面临来自新军阀蒋介石、旧军阀张作霖和跟随蒋介石的广东军阀李济深以及长江上游四川军阀的军事威胁，大有“四面楚歌”之势。



在这四面八方的军事威胁中，最主要、最严重的威胁还是来自北方奉系军阀和东南方蒋介石反革命集团。新军阀蒋介石拥兵 15 万，控制着福建、浙江两省全境及江苏、安徽两省部分地区，并得到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拥兵 20 万，占有东北地区和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并且兵分两路南下，直逼武汉、南京。是东征讨伐新军阀蒋介石，还是按原定计划继续北伐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这是摆在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一个亟待决定的问题。

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意见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中共中央内部，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主张北伐。蔡和森主张消灭两湖地区反革命，实行土地革命，巩固两湖根据地，然后再北伐。张国焘、谭平山则主张南伐广东，取得海港以打通国际联系，解决财经危机和军事上被包围的困境，而且南方敌人力量较弱，群众基础好，士兵南伐的积极性高，易于取胜。瞿秋白则主张先打南京再北伐，避免在上海与蒋介石决战。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坚决主张东征讨蒋，他们已从上海致电中共中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第一种以汪精卫、徐谦、顾孟余、孙科等文官为代表，主张先北伐。其理由一是蒋介石正高喊北伐，在群众中有欺骗性，加上得到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的支持，故东征未必能胜，还可能因此过早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而且武汉大军一旦东下，奉军必乘虚而入过武胜关直取武汉，使武汉腹背受敌；二是蒋介石此时无力攻击武汉，北伐无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北伐可以把冯玉祥的国民军从陕西接应出来在河南会师，然后共同北上。第二种意见以唐生智、张发奎等军人为代表，主张先东征。其理由为蒋介石是对革命的最大威胁，如不讨伐，则党纪不申，内战亦随在后，应趁其基础未固之时，迅速出击。

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方面，苏联驻武汉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和共产国际驻中国首席代表罗易围绕东征还是北伐问题，也争论得面红耳赤。

夜深人静的汉口，位于一元路的鲍公馆依然灯火通明，鲍罗廷与其他几位共产国际代表滔滔不绝地展开激烈争论。

“同志们，目前的形势是严峻的，武汉政府已经面临着敌人的严重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中。所以，如何保卫武汉革命政权，这不仅是个必须立即给予回答的问题，且还必须立即付诸于行动。”有些



鲍罗廷及其任命书

秃顶、蓄着厚厚胡须的鲍罗廷从椅子上站起来说。他激动时总是坐不住，一下从椅子上蹿起来。

“我认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军队应立即继续北伐。”鲍罗廷接着说，他讲了应立即北伐的六条理由：第一，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势力太强大，东南各省不适宜建立革命根据地。第二，帝国主义在西北的统治薄弱，且靠近苏联，宜建立革命根据地。第三，东南是中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中心，蒋介石叛变后，他们对武汉地区实行经济封锁，如不迅速北伐，去经营西北，武汉地区的经济将自行崩溃，故不能坐以待毙。第四，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迫在眉睫，停泊在长江水面上的30多艘军舰已卸下炮衣，天天有陆战队士兵上岸的传闻，若不迅速北伐，是没有出路的。第五，唐生智已经靠不住了，非迅速北伐与冯玉祥会师，不足以牵制唐生智。第六，北伐可以壮大武汉政府的声色，给彷徨动摇的小资产阶级以希望和出路。

鲍罗廷这个继续北伐到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被罗易称之为“西北学说”。

“我不同意鲍罗廷同志的提议，我认为现在不能急于进行二期北伐。”罗易也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说。

这时的鲍罗廷和罗易是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们掌握着国民党和中

国共产党的行动决定权。罗易反对进行二期北伐的理由有三条：第一，现在北伐对革命明显有害，因为它的动机是逃避革命的责任。一旦进行北伐，武汉政府便会以军队在前线打仗为借口，为了后方的安宁而压制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第二，果真北伐，我们须认真对待，把我们所有的军队布置于京汉路，这会使武汉处于毫无防卫的地位，从而给蒋介石或北洋军阀从南京方面进攻武汉以可乘之机。第三，北伐的计划是以冯玉祥或阎锡山将和武汉联合的假想为基础的，但他们的可靠程度并不很大。

罗易极力反对北伐的同时，对东征也不置可否。他认为在两湖地区有强大的共产党和工农组织，进行土地革命有着良好的基础，主张应立即进行土地革命。

中共中央开始是倾向于罗易的意见。4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目前情况下，立即北伐去占领京津等地，不仅不符合革命的需要，而且害于革命”，要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作出向北进军的决定之前，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应予考虑”。

鲍罗廷对中共中央这一态度大为不满。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上，鲍罗廷就曾发表声明：如果作出反对北伐的决定，他就马上辞去在国民党中担任的职务，因为他不能执行这个决定，更不能从事他以后要反对的工作。

罗易当然予以反驳：“鲍罗廷的声明等于提出最后通牒，这是采取‘炮舰政策’。如同举着手枪对准我们的脑袋来强迫我们接受他的主张。我认为，鲍罗廷没有任何理由提出最后通牒。”

4月16日开始的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一连持续了三天时间。到底是北伐还是东征？4月18日，这是一个决定命运的日子。

就在会议进行到这一天，位于南京丁家桥的江苏省议会大楼一片喧闹，蒋介石和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邓泽如、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伫立于门楼前，举行与武汉国民政府抗衡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典。南京政府的成立，使中国形成北京北洋军阀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汉口南洋大楼内的争论依然激烈。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一度决定东征，但鲍罗廷仍强烈要求北伐。鲍罗廷的主张得到了武汉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赞同，认为北上讨奉才是当务之急。在鲍罗廷、加伦、邓演达的共同说服下，国共两党又彻底改变态度，支持北伐。

关于这个改变的曲折过程，鲍罗廷事后回忆说：早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在我的住宅里开会，会上决定进攻南京。就在这一天，也在进行着取消这一决定的工作。主张实行第二方案（即北伐）的那些人，没有丧失争取改变这一决定的希望。邓演达同志也在这里，这一天他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他被加伦说服了，认为第二个方案是最佳方案，他一个一个将军、一个一个政治委员会委员地做工作，使他们相信第二个方案最好。所以，晚上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另行决定选择第二个方案。

鲍罗廷的解释，说明国共联席会议在白天确实同意东征讨蒋，但晚上彻底发生了大反转。

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继续北伐而不东征的决策，是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屈服于帝国主义威胁，并受到鲍罗廷“西北学说”的影响，与蒋方妥协的结果。企图放弃东征，通过北伐避开帝国主义对武汉的威胁，依靠冯玉祥在西北打开一条出路。

这一天，中共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中共中央撤销了4月16日通过的决议，同意武汉国民政府立即北伐的决定。中共中央为什么否决了4月16日的决议呢？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和苏联也同意鲍罗廷关于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设想，把经营西北的希望寄托在与冯玉祥会师中原上，“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从而失去了一次挽救大革命的机会。至此，鲍罗廷的“西北学说”占了上风。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南湖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5月13日，下达总攻击令。5月底至6月初，北伐军先后占领许昌、洛阳、郑州、开封等地，以伤亡1.4万人的巨大代价，击溃奉军在河南的主力，把奉军全部赶出河南，使东出潼关的冯玉祥部得以占领郑州。北伐军与冯玉祥国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

民军在郑州会师后，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河南和西北的军政大权交给冯玉祥，北伐军全部撤回武汉。

冯玉祥的国民军来自甘肃、陕西一带贫穷地区，军费严重不足，希望武汉国民政府给予帮助，所以

表示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可是，冯玉祥一到郑州，立刻看出武汉方面处境窘困，不能给予强大的军费支持，相反控制江浙的蒋介石的经济实力要强得多。他的态度随即变化，由支持武汉国民政府转而倒向南京国民政府。西北没能成为通往苏联的根据地的事实，宣告了鲍罗廷“西北学说”的破产。

北伐讨奉以后，武汉的形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恶劣。由于受到南京和上海方面的经济封锁，武汉的经济面临危机，失业人数急剧增加，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极其糟糕。武汉方面最终为这一决策付出了沉重代价。

深入还是广出

与是否支持第二次北伐交织在一起的还有鲍罗廷和罗易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的争论，即“深入”和“广出”之争。

所谓革命的“深入”和“广出”的问题，是革命的发展方向问题，也是在危急关头革命的出路问题，罗易和鲍罗廷在这个问题上也是针锋相对，各执一词。

4月13日至16日，罗易在讨论即将召开的中共五大政治报告等文件时，就与鲍罗廷、陈独秀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鲍、陈主张先行北伐，攻下北京再搞土地革命。他们担心先搞土地革命会使统一战线破裂；罗易则主

张先进行土地革命，巩固两湖根据地，再进行北伐。他担心先北伐会没有群众基础。

争论一直延续到中共五大上。当讨论革命的发展方向时，鲍罗廷主张革命“向西北发展，首先打通西北国际路线，将来经过地方自治，减租减息，再解决土地问题，即先“广出”后“深入”。其理论依据是：在革命只有初步发展的那些地方，不可能巩固革命政权；不扩大革命，我们就不能生存。

罗易主张在两湖搞土地革命，即革命先“深入”后“广出”。他认为现在“革命应深入，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既得革命之根据地”。只有发展工农力量，才是“确保革命前途的唯一措施”；只有先进行土地革命，才能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分析，革命只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建立牢固的红色根据地，才有强大的后盾，才有发展的基础，革命才能向前推进。缺乏革命基地，革命向前推进就受到制约、限制。

罗易是土地革命的坚决拥护者、倡议者，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就是根据他的提议而制定的。他认为土地问题是“目前一切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就意味着我们在整个战线中放弃自己的阵地。”

罗易全程参加了中共五大。他在中共五大上先后作了5次发言，既批评陈独秀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与组织报告》，又批评鲍罗廷的观点。罗易的这5次讲话，所谈问题十分广泛，重点是农民问题。他认为，中共首先考虑的根本问题是：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保卫胜利果实；组织农村自治政府；建立国家机构，实现民主专政；建立革命军队。为此，必须发挥农民的积极性，摧毁农村的反动基础。

围绕下一步先做什么的问题，罗易与鲍罗廷展开了公开的、激烈的辩论。鲍主张密切同武汉政府的联系，在土地革命方面作出让步，先继续北伐，广泛出击，打下北京后再进行土地革命；罗则主张先开展土地革命，巩固两湖，不能迁就武汉政府，然后在革命深入的基础上举行北伐，以免伐来伐去，毫无成果。鲍、罗二人都以共产国际的决议为依据，都说是为挽救

中国革命，在会上争论得不可开交，各不相让。

罗易和鲍罗廷的政见冲突，从马列主义原则来衡量，罗易从理论上是正确的，但罗易对无产阶级如何实现领导权，如何有步骤地开展土地革命等问题，都没有提出具体办法，对统一战线中的严重斗争也缺乏应有的认识。毕竟他从4月2日到达武汉不久，就面对严重的革命危机，他成天泡在会议桌上，根本没有时间到城市、农村去调查研究，因此对中国的实际，对中国的阶级状况、阶级特点、经济特点、环境状态等了解很少，只有空洞的理论，而没有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

出席中共五大的蔡和森对于罗、鲍的争论有过一段入木三分的评论。他说：“……以我看，老鲍是有办法无原则，罗易是有原则无办法。”毛泽东也认为罗易“能说会道，而且说的太多，却提不出任何现实的办法。”

罗、鲍之间的矛盾，除政见不同外，也有意气之争的因素，两个人互不服气。他们一起出席中共中央会议时，往往是由罗易大发一番议论，之后便是鲍罗廷反驳，常常把陈独秀、瞿秋白、维经斯基等卷进来，使会议流于冗长的理论争辩，使很多紧迫而重要的问题在争论中议而不决。直到1927年5月，共产国际针对“深入与广出”之争，作出深入与广出并举的决定，才算是调和了罗、鲍在中国革命策略问题上的分歧。

（周 敏）

在五大召开的日子里

1927年4月下旬，正是草长莺飞、春意盎然的时节，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雨腥风洗礼的上海，却宛如龙潭虎穴。军警密布街头，码头上戒备森严。就在这白色恐怖阴霾下，一艘英商怡和公司轮船鸣响汽笛，溯江而上驶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号称“赤都”的武汉。船票虽然异常昂贵，但船上客人却装得满满的，其中有许多风华正茂的青年，有穿西装的、穿中装的、穿学生装的，问起来都是“卖水果的”“做茶叶生意的”“坐庄的”或“贩瓷器的”。奇怪的是，当船行驶通过九江后，许多乘客都活跃起来，开始高谈阔论。他们的政治水平都超乎寻常，有人对时局简直了如指掌。

这些乔装改扮的乘客，就是前往武汉出席党的五大的上海（江浙）区委代表团和共青团代表团成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那些在上海街头巷尾疯狂搜捕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军警和租界巡捕们压根儿没有想到，从他们眼皮底下开往武汉的这条英商客船上，居然满载着出席中共五大的上海代表团和共青团代表团成员，其中就包括他们要追捕的“共党要犯”和著名“赤色分子”，如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罗亦农，中华全国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兼中共上海特委会负责人李立三和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王荷波，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杨培森，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无锡地方执委会书记张佐臣等，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可谓群英荟萃。

在他们奔赴武汉的前后，通往武汉的各条交通线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也各显神通，纷纷启程赶往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紧锣密鼓筹备中共五大

中共五大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势力激烈搏斗的紧急时刻召开的。

而召开五大的提议，则早在整整一年前就有了。

那是1926年4月27日，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办公大楼一间会议室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正在进行。主持会议的是远东书记处负责人维经斯基。参加会议的有一位中国人，他就是远东书记处成员、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

蔡和森向与会者通报了日前中国的形势，建议：“鉴于我们党政治领导很薄弱，共产国际应加强对我们党的领导，尽快成立远东局，尽快召开中共五大。五大应该立即召开，而不是在8月。”显然，此前有人提出在1926年8月召开中共五大。

对于蔡和森的建议，与会者进行了热烈讨论，不少人表示赞同，维经斯基却明确予以否定。他说：“至于蔡同志的建议，我认为，现在不能召开代表大会。因为我们找不到能集合代表一两万名党员的两三百名代表的合适地点。在广州，也不能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因为它不是在中国的中心地区，代表大会的条件会很困难。”他说需要最近在5月中或5月底召开有50~60人参加的党的代表会议。

最后，会议决定暂时不召开中共五大，先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以解决一些迫切问题。

蔡和森关于“尽快召开中共五大”的建议虽然被否决了，但“尽快成立远东局”的建议却受到了共产国际的重视。1926年6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上海成立，以加强对中国、日本、朝鲜革命和共产党的领导，就近解决有关问题。

9月18日至21日，远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第一次就五大的召开作出决定，确定不晚于1927年1月召开中共五大，提出“通过党代会的筹备工作，集中精力加强对党的政治领导”。这项决定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实际

领导者斯大林的认可。

对于中共五大的筹备，共产国际颇费心血。从确定召开会议，到确定开会时间、开会地点、参加人数、议事日程，再到大会纲领的起草、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原则的确定，事无巨细，共产国际都积极参与并提供指导。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革命问题成为中心议题，会议还成立了中国委员会。11月30日，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上发表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12月16日，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案》后闭幕。斯大林的演说和全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从理论和策略上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这些论述为后来中共五大形成的各项决议案定下了基调。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以后，中共五大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作为远东局主席的维经斯基便成为筹备召开中共五大的关键人物。

1927年1月21日，维经斯基在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信中专门汇报中共五大的筹备工作。他说：“中央委员会拟于3月15日在汉口或长沙举行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100多人为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近50人为列席代表。”他建议：“代表大会将半公开举行。目前党员人数已达25000人，因此，每300名党员选出一名代表。”

尽管维经斯基积极筹备中共五大，但此时的斯大林却已经对维经斯基失去信任，加上维经斯基与鲍罗廷不和，更引起信任鲍罗廷的斯大林对维经斯基不悦。1927年4月初，根据莫斯科方面的指示，新派到中国的罗易、多里奥与维经斯基共同组成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这一组织实际上取代了远东局，成为共产国际又一个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机构。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易是1927年2月初取道海参崴抵达广州的。1927年4月2日，罗易一行抵达武汉。

罗易一到武汉，就抓紧进行中共五大的筹备工作。为指导中共五大，落实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的精神，罗易可谓殚精竭虑。中共五大通过的一系列重要决议案，都是在罗易等共产国际代



五大会场场景

表的指导和参与下完成的。

1927年的春天，中共中央各机关陆续从上海迁到武汉。4月初的时候，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李维汉、谭平山、项英、罗章龙、张太雷等中央执行

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先后来到武汉。此时，第四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除李大钊和邓培已被捕入狱以外，只剩陈独秀一人在上海，其余全部到了武汉。

4月4日，为迅速推进中共五大的筹备工作，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和共产国际代表在汉口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迁至武汉前，由联席会议作为党的临时领导机构，由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任常务委员。会议确定五大于4月25日开幕，4月20日召开中央全会，具体落实大会有关事宜。会议决定成立三个委员会担负大会具体筹备工作，这就是由瞿秋白、毛泽东主持的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由李立三主持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和由张国焘主持的组织委员会。

4月上中旬，陈独秀从上海抵达武汉。4月22日至26日，陈独秀在汉口主持召开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确定了五大议事日程、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报告和其他事项。会议确定的中共五大议程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中国问题、中央政治报告、组织问题、农民工作问题、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革命政府、党在青年方面的任务、军队工作、妇女工作，一共九项。

曾提议“尽快召开中共五大”的蔡和森在这次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共五大主席团成员、秘书长和农民土地委员会成员。作为大会秘书长，他带领

秘书处工作人员寻找会址，布置会场，制作文件，安排食宿，为中共五大的召开进行着大量具体的准备工作。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插曲。由于中共中央和一些地方党组织对过去革命方针正确与否发生激烈争论，陈独秀要求推迟召开中共五大。以罗易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了干预，要求中共五大在4月25日如期举行。陈独秀据理力争，最后还是勉强同意了。当然，后来中共五大开幕的时间并不是25日，而是27日。

史无前例：五大开幕式嘉宾云集

武昌蛇山脚下，有一条名为都府堤的街道。街上的武昌第一小学，是中共五大开幕式的会址。

武昌一小为典型的清末民初学堂建筑，全部砖木结构。临街的两层楼房坐北朝南，为教职员办公室。大门开在楼房中间，门内右侧有呈马蹄形的三栋八间平房，是教学用房。楼房与平房均有红漆木栏走廊。门内左侧是大操场，场边是晴雨操场，人们习惯叫风雨操场。中共五大开幕式就在风雨操场举行。风雨操场是在遇到雨雪时，学生上体育课和做体操及其他运动的场所。

1927年4月27日，武昌第一小学热闹非凡。学生们像往日一样上课、唱歌、做游戏。校长王觉新穿着笔挺的西装，春风满面地站在校门口迎接一批批客人的到来。

客人是一大群风云人物。被共产国际代表称为“老头子”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来了。他一改往日的长袍马褂，穿着专门在上海买的一套旧西装。被誉为“农民运动之王”的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和彭湃来了。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彭述之、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项英、向忠发、罗亦农、任弼时、张太雷、谭平山、刘少奇、恽代英、罗章龙、方志敏、杨匏安、王荷波、向警予……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大多数都来了。除共产党人以外，国民党要人徐谦、谭延闿、宋子文也来了。客人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

他们中有来自苏联的老资格的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多次来中国的维经斯基，第一次来中国的罗易，还有来自英国、法国、美国的客人。这些客人来到这里，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的。

然而，还有一些应该出席的人，如李大钊、邓培、周恩来、陈延年，这天却没有来。因为李大钊这时正被关押在北京西交民巷奉系军阀的京师看守所。邓培和萧楚女、熊雄等人已在12天前的广州反革命政变中惨遭杀害。周恩来、陈延年和赵世炎还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刚刚过去半个月的上海同敌人周旋。

中共五大开幕式为什么选在武昌第一小学？目前没有档案可查，但有几点可以肯定，一是这里在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后成为公开的革命活动中心，学校的负责人是“同志”，住在校内的都是比较可靠的教师，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一些小型会议也经常在这里召开；二是学校出入人多，不会引起外界注意；三是不远处的农讲所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学员，便于警戒和保卫。

当代表们手持印有镰刀斧头图案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字样的圆形出席证走进会场，顿觉耳目一新。特别是那些参加过一大、二大、三大、四大的代表，更感今非昔比。

据当事人回忆，中共五大开幕式会场悬挂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标，主席台正面张贴马克思、列宁和孙中山画像，两侧挂着很长的红色横幅标语，墙上还有许多用毛笔书写的红、黄、绿三种颜色的标语，内容有“耕者有其田”“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同盟万岁”“无产阶级紧密地团结起来”“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等等。这些都是大会秘书长蔡和森的杰作。

大会第一次设置主席团。但开会时，台上只有大会的执行主席和担任记录的工作人员。他们面前摆放一个铃铛，如果代表发言超时，大会执行主席就摇动铃铛提醒。

会场内有约170个座位，前两排是来宾坐的木靠椅，其余都是长条板凳。为了方便代表喝水，会场后面备有几个大水壶和数十个茶杯。

按照大会安排，湖北代表团坐代表席第一排，其他各省代表团依次往后坐。坐在正式代表后面的是列席代表，再往后就是大会工作人员和经大会同意参加大会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及各省有关人员。

陈独秀穿着笔挺的西装走上主席台，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全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接着，全体代表起立，高唱《国际歌》。

大会第一项议程，由罗易代表共产国际讲话。这位到武汉不久的共产国际驻中国首席代表在中共五大的筹备过程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他来中国的主要使命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所作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案》。接着，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讲话。随后是外国来宾代表致贺词，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少年先锋队代表先后致贺词。

在下午选举大会主席团的议程中，湖北代表团的罗章龙首先站起来提出主席团名单。经过几位代表提议和一番热烈的讨论，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苏兆征、顾顺章、李维汉、向忠发、张金保、彭述之、张太雷 15 人为主席团成员，蔡和森为秘书长。在全体代表和来宾的热烈掌声中，主席团成员依次走到主席团席位就座。

开幕式的第二天，大会休会。瞿秋白和他的妻子杨之华再次来到会场，以墙上的几幅宣传画为背景，留下一张合影照。照片印出来后，瞿秋白在照片两侧写下几行字，右上方是“青天白日中山装，赤色大会已是五次！”左下方是“最可纪念的一日，一九二七.四.二八，武昌会议”。



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中共五大会场上的合影



武昌第一小学”。

激烈争论后九个决议案及新党章通过

面对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政局，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五大半公开召开，即开幕式公开举行，讨论党内事务时秘密进行。公开的会议在武昌一小举行，秘密的会议则移到汉口召开。

为什么要移到汉口呢？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和全国群团组织机关都在汉口，秘书处胜利街，中宣部在辅义里，中组部在铭新街，中央军委在黄石路一带，中央工委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友益街，共青团机关在原俄租界。同时，大会代表大部分住在尚德里，共产国际代表也住在汉口。为期十几天的大会要在一江之隔的武昌召开，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很不方便。因此大会开幕之后，就转到了汉口济生三马路（现自治街）的黄陂会馆。

据郑超麟回忆：“黄陂会馆呈长方形，一头开着大门，一头立着三开间平房，中间是大厅，布置成会场，右边房间是秘书处办公的地方，油印也在里面。左边房间没有用场。从大厅至大门隔着一个长方形院子，当中一条石路，两旁草地，草地之外就是围墙。大门旁边有一间或二间房子，那里住着几名卫士。”20世纪80年代，郑超麟在接待文博人员访问时，还凭着记忆草绘了一幅黄陂会馆的内部结构图。

4月29日，中共五大在黄陂会馆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馆大门没开，代表们从侧门进去，凭口令入场，这一次会议的口令是“冲锋”。从这次会议开始，大会进入秘密状态。所以，“时刻防卫着反动派来袭击。门外，荒地上，天天有唐生智部队兵士操练机关枪。”郑超麟后来回忆时如是说。

上午，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当宣布陈独秀作报告时，会场一片肃静。陈独秀滔滔不绝地讲了六个小时。

陈独秀在报告中回顾了1925年1月党的四大以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和统一战线工作，汇报了党内目前的情况，着重论述了革命形势及其发展、党的策略、资产阶级的作用、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土地问题、无产阶级

领导权、国民党问题，讲到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土地、军事、政权、财经等问题。

陈独秀在报告中极力为自己对中山舰事件的决策错误进行辩护。谈起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陈独秀则颇有微词。他说：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有革命方法的错误”，“是冒险地举行胜利的暴动”。在谈到党内情况时，陈独秀用很长的篇幅批评了中央的工作。

尽管陈独秀的口才极佳，代表们对这个报告却十分不满。他们希望陈独秀对过去的错误有所检讨，对当前的局势进行明确分析。然而，他们失望了！报告内容面面俱到，但没有明确具体可行的答案，缺乏一种除旧布新、振奋前进的决心和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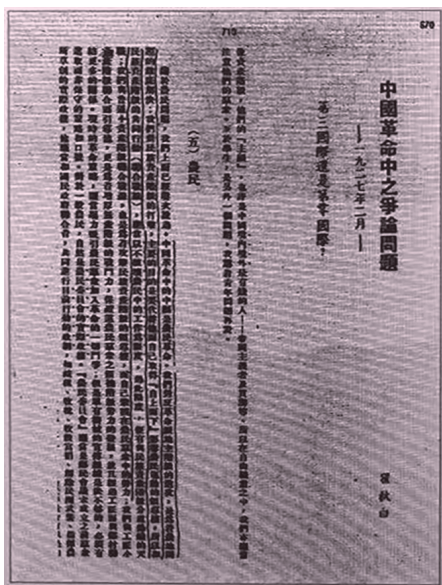
大会休息时，代表们三三两两，在会场四周议论着。罗亦农来到主席台后面的休息室，走到瞿秋白面前，咧开大嘴连声说着：“糟糕！”瞿秋白则抽着烟，长久地沉默着。

回到汉口辅义里 27 号中宣部机关，工作人员羊牧之向瞿秋白汇报他在会场看到叶挺等人对陈独秀报告的反映。瞿秋白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口一口地抽着香烟，沉思着，最后才说了一句：“要相信中央！”

尽管不少代表对陈独秀的报告不满，也提出了一些看法，但最终还是举手同意了。这就意味着同意联合汪精卫去反蒋介石，去挽救革命。待陈独秀六个小时的报告讲完，已经到下午了。

接下来，由罗易向大会作《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报告》。这是他在中共五大的第一个报告。罗易要向全体与会代表通报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总的政治方针，说服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案》。因为他认为，对共产国际决议案达成共识，是完成今后一切议题的前提。

4 月 30 日，也就是陈独秀作报告的第二天下午，恽代英走进会场，发现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署名瞿秋白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扉页上印着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恽代英用手抬抬他那副标志性的银丝边眼镜，一边笑，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一边对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话没说完，头已埋进了小册子里。

代表们被这本小册子醒目的题目吸引住了，很有兴趣地翻看着。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了，出现了笑声和议论声。

瞿秋白泰然自若地走进会场，看到怒气冲冲的彭述之正重重地拍打着他的小册子，愤激地说：“这是见了

鬼！”瞿秋白当然理解彭述之的冲动，因为这本小册子点了彭述之的名，把他的主张称为“彭述之主义”。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本小册子，是瞿秋白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前后写的。当时，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有关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着原则性的分歧，他觉得有责任促使这些争论得到正确的解决。

在这本小册子中，瞿秋白从理论到实际，系统批判了党内的右倾观点，如关于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权问题，并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应该是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得到胜利，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

在农民问题上，瞿秋白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他指出，陈独秀、彭述之等“抑制农村阶级斗争”，错误地“规定农民武装‘不可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对“农民政权的要求，也没有明了爽快的指定行动的方针”。

对瞿秋白的小册子，陈独秀很不满意，但瞿秋白对彭述之的批评得到党内不少同志赞同。李维汉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在党的五大上，秋

白把小册子散发给出席大会的代表团。我也得到了一本。小册子指名批的是彭述之，实际上批的是陈独秀，因为这两个人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我和湖南代表团的同志表示赞同秋白的观点。”

除瞿秋白以外，向陈独秀的报告“开炮”的还有蔡和森、任弼时、谭平山、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罗章龙、陈乔年、彭湃、维经斯基等人。据史料记载，当时一共有 38 位代表签名要求发言。

蔡和森在发言中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虽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还保留有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分子，这些分子是随时可举行 3 月 20 日及 4 月 12 日的大屠杀来对付我们的；富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店主、厂主等）亦时有武装暴动反对我们之可能。

任弼时是以团中央书记的身份出席党的五大的。他对陈独秀的报告同样很有意见，他称陈独秀报告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他还批评陈独秀赞成“到西北去”的主张是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这位年仅 24 岁的团中央书记，如此直言不讳地批评年长资深的 48 岁的“老头子”陈独秀，可以想象当时引起的轰动。

在出席中共五大的所有代表中，毛泽东的住处离武昌会场最近。他在都府堤 41 号的家离武昌第一小学仅一路之隔、百步之遥。然而，“近水楼台”并不“先得月”，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反而受到冷遇。中共五大前，毛泽东对于党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很不满意。他向大会提出农民运动决议案，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意见被陈独秀否决了，根本未提交大会讨论。他感到非常沮丧和无奈。

或许是受到瞿秋白散发小册子的启示，毛泽东也想把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给代表讨论。他把《报告》交给大会秘书处后，秘书处油印了 300 份。5 月 2 日分组讨论时，秘书处负责人周唯桢安排余义明发给代表。余义明找来一个藤提篮，将《报告》装在提篮中，刚发了二十几份，就被彭述之发现了。彭述之命令余义明立即停发，并将他带到陈独秀跟前。陈独秀大为恼火，彭述之勒令立即如数收回。余义明赶紧找来龚士希帮自己一起收回了已发出去的《报告》，全部交给了彭述之。

毛泽东失望了。迷茫中，他登上蛇山，心情苍凉。回首北伐以来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对中央在农民运动上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忧心忡忡。生平第一次，毛泽东有一种回天无力的凄楚。烟雨苍茫之中，毛泽东站在蛇山的黄鹤楼遗址前，极目四野，心潮澎湃，万千思绪化作词句，一首《菩萨蛮》从胸中喷涌而出：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几十年后，毛泽东如此追述这首词的写作背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

至于罗易，他在中共五大上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思想，但由于他所依据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案》在很多问题上自相矛盾，很多决策不适合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他的这些思想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正如蔡和森所说：“鲁易（注：即罗易）同志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次开会都会像上课一般，只空空洞洞地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

经过热烈的讨论以至激烈的争论，大会在5月9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因为会期正值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还发表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

根据中共五大“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党章”的决定，五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对原有党章进行全面修改，并于6月1日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共12章85条，约9000字，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一个党章。

利剑出鞘——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

郑超麟从上海来武汉，坐的是英商怡和公司的轮船。近70年后，他仍

然对一位装扮成渔行老板的代表记忆犹新：“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子，携带着他的老伴儿以及四五个儿女，说是到汉口做生意的，他在南京什么地方开渔行。我们问他鱼的市价，问他哪种鱼味道最好。他就是王荷波。他的第三个弟弟王震东在船上不同他打招呼，铺位隔得远远的。我同王震东在甲板上散步，我说：‘你的哥哥真像渔行老板。’”就是这位戴眼镜的“渔行老板”，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首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机制的建设。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正式文献——中国共产党纲领，虽然只有15条700余字，却对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机制作出了严格规定：新党员在入党前必须同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党处在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到其他地区工作的党员，一定要受当地执行委员会最严格的监督；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都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党员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

中共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对于党纪的规定比中共一大更详细，也更严格。党章明确规定，党员言论行动违背党的宣言章程及各执行委员会议决案、无故连续两次不到会、欠缴党费三个月、无故连续四星期不为本党服务、泄露党的秘密等六种违反党纪的情形，必须开除党籍。从中共二大到中共五大的党章，都专门设有“纪律”的章节。

如此重视纪律监督和作风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在建党初期就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而是直到建党六年后，才在中共五大上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呢？

这绝非偶然，是党组织和革命形势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需要和必然产物。

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数不足千人，一无政权二无经费，连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和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都要靠教书、当编辑和写作来维持生活，东奔西走为党筹集经费。由于党员人数少、质量高，党的

组织长期处于秘密状态，机构精干且纪律严明，违纪现象较少，因此没有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而由党的各级委员会直接维护和执行党纪。在执行党的纪律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毫不含糊的。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上海早期党组织发起人之一沈玄庐等赫赫有名的建党元老，都因为违反党纪、蜕化变质而被开除出党。

虽然没有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却严格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便是这个堪称“一穷二白”的无产阶级政党始终能保持立党为公本色和清正廉洁作风的重要原因。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深入和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到来，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党的力量也迅猛发展。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革命军人纷纷入党，使中共党员人数从四大召开时的 994 人猛增到五大召开时的 57967 人。至此，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第二大政党。新党员的急剧增加，党员教育的滞后，加上少数投机分子的混入，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面临严峻考验。

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国共合作以后。大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军队和政府内任职。这些跨党任职的党员时刻面临着权力地位、金钱美色、灯红酒绿等各种诱惑，加上革命阵营内部分化日益加剧，少数意志薄弱的党员抵制不住高官厚禄的诱惑，出现了追求享受、贪污腐化、思想动摇甚至叛党变节的现象。尤其是在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相继发生，新老军阀不约而同地制造白色恐怖镇压革命的危急情况下，脱党、自首甚至叛党投敌等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在这种形势下，在党内设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就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1927 年 5 月 9 日，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 7 人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 3 人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王荷波、杨匏安分别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正、副主席。这些当选的监察委员会成员，都是在工农运动和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在群众中拥有崇高威望的党员领导干部，其中 6 人出身工人。

对于中共来说，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因此，根据中共五大决议，中央政治局在第三次修改的党章中不仅增加第八章《监察委员会》，对中央和省监察委员会的选举方式、职责范围、工作机制作出规定，而且在第九章再次修订党的纪律，规定对违纪党员分别给予警告、党内公开警告、临时停止工作、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处分，对违纪党组织分别给予警告、改组、解散组织重新登记处分。新党章还规定中央和省监察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省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对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监察委员会可“依合法手续审查之”。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决议，但这些决议必须得到中央及省委员会的同意才能生效与执行。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督权，有利于开展党内监督和党风廉政建设。这些条款与苏共十大、十二大党章关于监察委员会的规定有不少相似之处，显然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影响。

中共五大选举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中共纪检监察工作的光辉起点和良好开端。中共五大铸造的这把维护党的肌体健康的利剑，对于即将迎来白色恐怖考验和土地革命战争洗礼的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监督，严肃党的纪律，巩固党的组织，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和队伍纯洁，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信仰、严明的纪律和严格的党内监督，苏联托洛茨基和中国的“托派”们关于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会蜕变成“流寇”和“山大王”的预言，最终成为杞人忧天。而一次次血腥屠杀和残酷“围剿”，也始终无法扑灭共产党人点燃的“星星之火”。

中共五大闭幕后三个月，王荷波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即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王荷波来到天津，调查处理顺直省委组织纠纷，撤销了坚持右倾错误、拒不执行八七会议方针的彭述之的省委书记职务。接着来到河北玉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部署武装暴动。几天以后，玉田暴动取得成功，王荷波却在北京因叛徒出卖，落入敌手。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却始终严守党的机密，留下的唯一遗嘱是请求党组织教育他的子女，不要让他们走上和自己相反的道路。1927年11月11日，



北京安定门外，王荷波高呼“打倒军阀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中共五大选举产生的 10 名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除王荷波以外，还有 7 人先后牺牲在刑场或战场上，却无一人叛党投敌。这些党的纪检先驱，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为鲜红的党旗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烟雨苍茫

一直以来，无论党内还是学界，对中共五大的评价不高，认为它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没起过什么作用。事实果真如此吗？

随着大批苏联秘密档案的公布，随着一些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中共五大的全貌也逐渐显现出来。

首先，五大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大会首次提出集体领导并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指导原则写入党章；大会选举大批优秀党员干部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等进入党中央领导机构，从组织上保证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第一次采用“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称，并且选举产生了党的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大会还首次确立了中央、省、市（县）、区、支部的组织体系和领导体制。这种组织体系和领导体制大体上一直沿用至今。

其次，中共五大揭开了批评纠正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右倾错误的序幕，这在党以往的历次会议上还无先例。为三个月后的八七会议最终结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

最后，中共五大提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一些正确原则，研究探讨了中国革命的若干基本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是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有新的贡献。中共四大曾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行使对革命的领导权，但并未认识到这种领导权要同资产阶级斗争才能取得，而是存在“天然领导权”的思想。正是在中共五大上，提出了

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二是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的问题。中共五大以前党的领导人及党的领导机关很少注意土地问题。而中共五大不但重申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完整的《土地问题议决案》。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没能公布和执行，但它的理论影响在大革命失败后仍存在，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实践作了准备。

中共五大提出的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原则，被以后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是正确和可行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这些原则在后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重要会议上也多次被肯定，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中共五大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危急关头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而进行的一次艰苦努力和艰难尝试，虽然它未能提出具体有效措施解决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但它依然在那段烟雨苍茫的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彩。

（周 敏）



平定夏斗寅、杨森叛乱

幕后黑手密谋策动叛乱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革命阵营内部分化日益加剧。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中已显露出反共倾向的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军事实力和政治野心都日益膨胀，尽管他仍旧虚伪地打着“总理信徒”“革命左派”的旗号，但其军事独裁和反动倾向已暴露无遗。

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后，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汉期间，掌握军权的蒋介石出尔反尔，违抗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汉决定，于1927年2月挑起“迁都之争”，企图以南昌为中心建立他个人的军事独裁统治，遭到了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各界群众强烈反对，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公开批评他专横跋扈，结果“迁都之争”以蒋介石失败而告终。但蒋介石自恃羽翼已丰，加快了反共、反革命步伐，笼络投靠北伐军的各路军阀，伺机发动反革命政变，阴谋实施反共“清党”，并夺取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蒋介石占领江浙后，于1927年4月3日至5日，与汪精卫、吴敬恒、张人杰、李煌浪、蔡元培、陈果夫、古应芬、李济深、黄绍站、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上海莫利爱路孙中山遗宅连续举行秘密会议。会上，蒋介石未能与汪精卫达成一致，但却取得了因工农运动利益受损的各路大小军阀支持。会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蒋介石的支持和唆使下，驻防鄂、湘、川地区的刘湘、杨森、何键、夏斗寅等反动军官也磨刀霍霍、蠢蠢欲动。

身为国民革命军军官的杨森本就有叛变革命之心。早在1927年3月31日，中共重庆地委在重庆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

革命，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四川军阀卖国，支持北伐战争，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四川军阀王陵基、蓝文彬等派来混入群众队伍的便衣武装向赤手空拳的群众乱打乱砍，并举起手枪向主席台射击。当场打死 137 人，伤千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三一惨案。

三三一惨案的幕后主使是长期主政四川，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二十一军军长的刘湘。惨案发生后，刘湘于 4 月 4 日致电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声言：“联俄容共，虽为总理遗策，然宾主之间，固已明定界说；跨籍党员，亦有其应守之分际，今则喧宾夺主，渐走极端。”他提出：以三民主义为依归，严定范围；一致拥护蒋介石。8 日，川军将领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出兵进攻武汉，公推杨森为总指挥。9 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七人联名通电，攻击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所谓提高党权者，乃提高异党之权，而非提高本党之权。”电报同时攻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表示“必以自决之精神，作救党国之运动”。至此，曾经竞相归入北伐军麾下的四川军阀都亮出了反共旗帜。

夏斗寅原为鄂军军官，1926 年任鄂军第一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隶唐生智第八军。1927 年初，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仍任师长，驻防宜昌。四川军阀开始反共后，在蒋介石的唆使下，夏斗寅与刘佐龙、杨森、刘湘等密约“合力讨共”，并试图乘武汉国民政府派出主力北伐，武汉防务空虚之机发动叛乱，抢先攻占武汉，迫使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共同反共。

对于指使夏斗寅、杨森进犯武汉，开展所谓“清党反共”之事，蒋介石毫不讳言。1927 年 5 月 22 日，蒋介石在向日本东方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时，公开承认刘湘、杨森、夏斗寅等人举兵反共是奉他命令行事。

夏斗寅、杨森合谋进犯武汉

关于进犯武汉的具体军事部署，夏斗寅、刘佐龙、杨森、刘湘等经过密谋策划，在“合力讨共”的密约中约定如下：

首先由刘湘等通电反共，杨森则率部以“拥蒋反共”的名义，向夏斗寅驻防的宜昌进军；夏斗寅佯装战败，将宜昌让给杨，自己以收缩防线的名义向武汉方向移动。

随后夏斗寅所部自宜昌原驻防区顺流东下，至嘉鱼登陆后，沿粤汉铁路经蒲圻、汀泗桥、咸宁，直逼纸坊、武昌。

然后杨森所部由万县东下至宜昌、荆门、沙市，沿长江北岸东进，集结所部于岳口、天门、汉川之线，由驻仙桃镇的刘佐龙部配合，向汉川、蔡甸、汉阳压迫进取。

最后夏斗寅所部与杨森所部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武汉，迫使武汉国民政府投降或采取反共政策。为避开外国在华利益集中的汉口，对武汉的夹击将主要从西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完成。

1927年5月，杨森、夏斗寅、刘湘等开始实施其“讨共”计划。4月9日，刘湘等发表反共通电。5月4日，杨森下达动员令，翌日，杨森命范绍增率先遣队出发。同日，杨森亦率部乘坐包括夏斗寅供给的20只船在内的大批船只，沿长江东下占领宜昌。夏斗寅则按密约约定，率部于5月7日撤离宜昌，沿长江逼近武汉。夏斗寅撤离宜昌后，杨森部于次日毫无阻挡、形同接防般到达宜昌。一到宜昌，杨森立即派部捣毁各级共产党组织和有共产党人参与的国民党组织、解散宜昌总工会、农会等各种群众团体，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5月9日，杨森在宜昌发出拥护蒋介石、讨伐武汉国民政府、消灭共产党的通电。随后，杨森继续进犯荆门、沙市，将部队推至嘉鱼、洪湖，兵锋直指仙桃镇，从西面直逼蔡甸、汉阳。

夏斗寅则率部于5月13日在嘉鱼登陆，随即响应杨森，发出反共、讨伐武汉国民政府的通电，诬蔑湖北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攻击诋毁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借总理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乱我两湖”，扬言推翻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重建新政。5月14日，夏斗寅为了表示反共决心，枪杀了与自己有旧交的武汉政府代表任剑若，所部由公安、石首、监利沿长江南岸向蒲圻、汀泗桥、咸宁进军，逼近武昌。5月17日，夏斗寅部与其他小军阀、土匪武装汇合后，逼近离武昌仅20多公里的纸坊，从

东南面直逼武汉。同杨森一样，夏斗寅进犯武汉的过程中一路解散党部，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屠杀农运骨干，抢掠、奸淫，无恶不作。与此同时，黔军将领李巢亦率所部由巴东到达宜都、松滋等地，协助夏斗寅、杨森叛乱；湖北境内刘佐龙、张联升等接受改编的军阀部队也蠢蠢欲动。潜伏在武汉的各路反革命分子乘机造谣破坏，一时间武汉三镇谣言四起，商店停业，货币挤兑，人心恐慌，不少市民纷纷逃进租界避难。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是惊慌失措，一些要员甚至也买好了船票准备出逃。

武汉国民政府对杨森、夏斗寅的叛变缺乏思想准备，显得进退失据。4月9日刘湘通电反共后，武汉国民政府成立由汪精卫、谭延闿、吴玉章、孙科等七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予以应对。4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根据吴玉章的提议，命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等查办刘湘与赖心辉，同时任命高语罕为杨森的第二十军党代表及四川特派员。但高语罕在赴川途中，发现杨森已经举兵反共；至于夏斗寅叛变，高语罕则是在电讯不通的情况下，经过多方调查后才得知的。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已将军队主力调入河南准备继续北伐，面对夏斗寅、杨森的进犯，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领导层严重动摇，拿不出任何平定叛乱的坚定主张和有效办法，甚至极力为夏斗寅辩护开脱，试图将夏斗寅的叛变淡化成其对“增饷扩军”的不满，幼稚到以增加其预算、扩充其军队为条件劝其放弃叛乱。但这些条件岂能让夏斗寅善罢甘休，5月15日，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与夏斗寅接洽的包惠僧行至嘉鱼时即被夏斗寅软禁，武汉国民政府劝夏斗寅放弃反革命的努力失败。

革命军队击溃夏、杨叛军

在这个黑云压城的危急时刻，在中共五大上刚刚入选中央委员会的毛泽东、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恽代英等人和在国民党内任职的吴玉章、苏兆征、董必武等共产党人挺身而出，成为了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蔡和森与李立三态度坚决，提议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兜剿夏斗寅。他们



还提出广泛发动工农武装，“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采纳了蔡和森、李立三的建议，于5月18日发表了《为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号召“无产阶级武装起来枕戈待旦，保障革命”“削平夏斗寅的反叛！打倒反国民革命的一切封建军阀！”，动员民众投入平叛斗争。第二天，武汉三镇数十万民众举行讨夏大会。武汉国民政府也接受了中共建议，宣布夏斗寅“称兵谋叛，罪状昭著”，下令“褫职拿办”，同时任命北伐名将、共产党员叶挺为武汉卫戍司令和前敌总指挥，抽调驻防武汉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和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五团讨伐叛军。武汉国民政府还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与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部分学员临时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由师长侯连瀛、党代表恽代英率领开赴前线平叛。其第一团随叶挺赴前方作战，第二团卫戍武昌，女生则组织宣传救护队配合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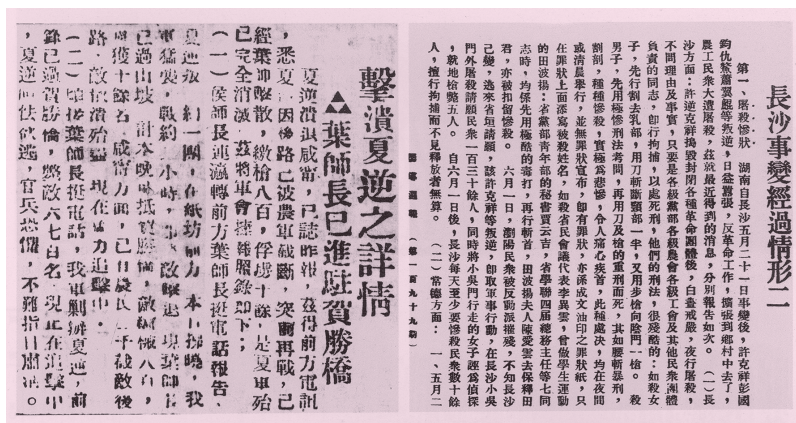
政治方面，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玉章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名义，召集总工会、农协、学生会等团体举行会议，负责对群众宣传，以稳定人心。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迅速召开联席会议，向各界发布讨伐夏斗寅的通电。在5月19日武汉三镇的讨夏大会上，董必武以武昌讨夏大会主席团的名义向各界严正指出：“夏逆为蒋介石的小走狗”，“讨夏便是讨蒋的一部分”。这些政治工作动员起了武汉各阶层的力量，使武汉三镇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声势。

社会方面，武汉地区工人阶级决心用生命保卫革命果实。他们迅速武装起来，数千人报名参加省总工会组织的工人义勇队，随时准备上前线应战。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为前线部队保障了武器弹药的供应补给。武汉工人纠察队则填补了卫戍部队开赴前线后留下的空白，在武汉三镇及近郊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维持通往前线的交通线通畅。

经济方面，湖北全省总工会向各行业发出通告，打击投机倒把，稳定金融商业秩序，确保经济活动正常开展和武汉市民生活保障，以稳定民心。至5月21日，武汉市社会秩序基本恢复。

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这一系列措施下，反击夏斗寅叛军的革命军

队有了坚强的保障。5月19日晨,叶挺率领的平叛军与夏斗寅部在纸坊遭遇。七十二团团长、共产党员许继慎一马当先,指挥部队抢先占领纸坊镇。共产党员、第七十五团三营营长练国梁身先士卒,不幸在战斗中牺牲。许继慎也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由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组成的各部队争先恐后发起猛攻,给予叛军迎头痛击,一举击溃了兵力占优势的夏斗寅部主力。平叛军乘胜追至江夏土地堂,合围夏斗寅部。被合围后,夏斗寅继续率部顽抗,叶挺则亲临前线,就地正法怯战士兵以儆效尤。此后,平叛军士气大振,继续猛攻。夏斗寅部则畏惧叶挺威名,只得沿小路向咸宁方向逃窜。经过一日激战,平叛军夺回交通要地土地堂车站。



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击退夏斗寅叛军的报道(《汉口民国日报》)

21日,平叛军击溃夏斗寅部,进抵咸宁。夏斗寅则玩起了政治把戏,开始软化态度。他留函称“本人并非反抗中央”“完全是要驱逐武汉的赤化分子”“希望武汉方面自己有觉悟,不使党成赤化”云云。但武汉政府不为所动,叶挺指挥部队继续穷追猛打,横扫叛军,在共产党员聂鸿钧指挥的2000余名农民自卫军配合下顺利收复咸宁。几天前还气势汹汹的夏斗寅叛军被打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逃往鄂东。武汉解除戒严,转危为安。夏斗寅残部在溃退途中继续捣毁党部、农协及人民团体,土匪、青红帮、地痞等闻风而起,屠杀革命群众的事件此起彼伏。6月10日,夏斗寅在蕲水接受蒋介石任命的新编第十军军长职务,正式投靠蒋介石,随后移防安庆。

武汉国民政府在取得击溃夏斗寅的战斗胜利之后，随即开始解决杨森叛乱。5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杨森。命以程潜为总指挥，以第二军为主力，第六军、第八军各出一部组成西征军，前往兜剿。29日，第二军鲁涤平部戴岳师与李云杰师进攻襄河杨森部。6月4日，第六军占领天门。6日，杨森分三路自仙桃镇、潜江、天门进攻，拟截断京汉路，途中与西征军相遇，双方激战于仙桃镇。9日，杨森败退，其前敌总指挥范绍曾受重伤，杨森本人匆忙中拉了一条毛驴，仓皇逃命。据报道，杨军所过之处，“十室十空，惨不忍睹”。15日，西征军占领沙市。

正当杨森在仙桃镇惨败之际，刘湘以出兵助战为名，派人率兵进驻万县，攫取杨森原驻防地。同时，唐生智也派代表到达成都，策动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乘机袭取重庆、万县。26日，杨森率范绍增及军部人员逃回万县，保住了川东大部防地，但与重庆邻近的江北县已为刘湘所占。

至此，夏斗寅、杨森叛乱给武汉国民政府造成的危险解除。

在平定夏斗寅、杨森叛乱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相当强的社会组织、社会动员能力和一定的军事斗争能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参加平叛战斗，也为日后的工农割据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但客观而言，尽管反击夏斗寅、杨森的军事斗争取得了胜利，保卫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安全，但此时的武汉革命局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危机。夏、杨所部虽被击溃，但是湘、鄂地区的反共屠杀自此接踵而起，武汉国民政府日益右倾动摇，为大革命失败留下了隐患。

（张翼鸥）

从郑州会议到徐州会议

冯玉祥成为“香饽饽”

1927年6月6日，汉口火车站热闹非凡，汪精卫、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和孙科5位武汉国民党政府要员行色匆匆地穿过人群，快步走上开往郑州的火车。

这些武汉国民政府的要员们匆忙赶去郑州所为何事？事情还要从前一段时间说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党中央立即谴责和声讨蒋介石的罪行，声明免除蒋介石本兼各职，国共两党在武汉掀起声势浩大的讨蒋浪潮。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公然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形成了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和北京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三个政权相互对峙的局面。此时，手握重兵、雄踞西北、虎视中原的冯玉祥，自然就成了宁汉双方竭力争取的“香饽饽”。

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后，在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人 and 苏联顾问的帮助下，重整旗鼓，誓师五原，被推选为国军联军总司令。1927年5月又就任武汉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之职，配合北伐军出兵潼关，攻入河南，实际上控制了陕西、甘肃及河南部分地区，拥兵约25万之众。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下，冯玉祥的立场举足轻重，汪精卫等五人此次前往郑州，就是为了与冯玉祥会晤，争取他的支持，此次双方召开的一系列会议被称为郑州会议。

郑州会议在郑州陇海铁路车站附近的陇海花园举行。会议由汪精卫主持，两天当中一共开了6次会，就政治、军事、党务、农工运动等问题进

行了讨论，并作了相应的决议。

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目的有二：一是反共，竭力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工农运动，指责鲍罗廷破坏国民革命，要求冯玉祥一起清党、分共；二是反蒋，指责蒋介石独断专横、目无政府，想联合冯玉祥反对蒋介石。冯玉祥同意清党、分共，但在共同反蒋问题上却持有异议，他不赞成讨伐蒋介石，主张双方“息战”。

冯玉祥希望调停汪精卫集团和蒋介石政权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他害怕宁汉之间一旦开战，奉军一定会乘机卷土重来，到时候他就孤立无援，势必失败。

冯玉祥提出要求：第二次北伐新取得的河南省应由他统治；武汉政府必须付给他一大笔津贴作为他的部队正式参加国民革命军的费用；征伐北京的指挥权必须交给他；武汉汪精卫集团必须立即同南京蒋介石集团就联合问题进行谈判。

汪精卫同意了冯玉祥的部分要求，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政治分会，由冯玉祥担任主席，在河南各部队都由冯玉祥指挥，从武汉北上的国民革命军唐生智、张发奎部队一律撤回武汉；实际上就把豫、陕、甘三省的党军政大权交给了冯玉祥。会议开了两天，汪精卫接到一个电报，说冯玉祥已经同蒋介石勾结，要把他们扣留在郑州，吓得汪精卫等立刻返回了武汉。



于右任、谭延闿、孙科等与冯玉祥在车站合影

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中取得了不小的收益，不仅地盘扩大了，兵力也扩充为七个方面军，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倒向武汉一边，依然在宁、汉之间摇摆，基本对宁汉双方保持等距离。

在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6月16日蒋介石抓住时机赶往新近攻克的徐州邀请冯玉祥会面。冯玉祥觉得在郑州会议上他能捞到好处，徐州会议自然也不例外，又可劝说蒋介石与汪精卫息战，便欣然应允。6月19日，蒋介石和冯玉祥举行了第一次会面。晚上，蒋介石在徐州花园饭店宴请冯玉祥。宴会上，蒋介石赠送了冯玉祥50万元，并且答应从7月份起由南京政府每个月拨给冯玉祥军队250万元，还许诺说将山东交给冯玉祥控制。

6月20日，徐州会议中蒋介石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反汪”，希望冯玉祥向武汉进兵，一起夹击汪精卫政权；二是“清党”，要冯玉祥在军队和管辖区内驱逐共产党。冯玉祥一方面依然坚持宁汉息征，不同意向武汉国民政府出兵，另一方面同意了蒋介石“清党”的要求。

徐州会议结束后，冯玉祥和蒋介石发表联合宣言，表示要共同出兵北伐。这次会议，让他们在反共基础上实现了暂时的联合，冯玉祥也从对宁汉中立的立场转向倾向蒋介石。这使汪精卫集团受到空前孤立，加快了其反共清党的步伐。

北伐不能变“白伐”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蒋介石阴谋策动下，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仇视工农运动、反对国共合作的反动军官也开始兴风作浪。1927年5月13日和21日，夏斗寅和许克祥相继在湖北嘉鱼和湖南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

消息传到武汉之后，蔡和森和李立三向中央建议：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全部武力立刻占领粤汉铁路，兜剿夏斗寅；



蔡和森



鲍罗廷

如果唐生智的军队全部叛变，就沿着粤汉铁路夺取湖南作为根据地，再进攻湖北和广东；同时发动一切工农群众起来与反革命军队殊死作战；扩大工人纠察队武装，开赴前线助战。

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立场，指导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也认为当时的

中心问题是处理与国民党左派之间关系的问题，对于夏斗寅、许克祥的叛变只是当作临时发生的事变应付。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蔡和森和李立三的建议只被部分采纳。随后叶挺率部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军迎击夏斗寅并将其击退，此事便不了了之。对于马日事变，则根本没有用武力解决，而是静候武汉国民政府处理，这种妥协退让进一步纵容了反动派的气焰。

接二连三的反革命政变和叛乱让蔡和森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因此他主张“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早在4月1日，蔡和森就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组织的欢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中央委员谭平山的大会上提出过这一观点。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发展，第一注重的是农运问题。他说，农民运动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就可以得天下。反之，不解决农民问题，国民革命是不能成功的。第二应该注重的是革命的社会基础，革命的社会基础不可能面面俱到，国民党是保护资产者还是保护农民，这个分歧关系到革命的成败。第三应该注重的是革命的同盟军，革命基础应该建立在农民上，并联合工人而不是资产者。第四应该注重的是革命武装问题，虽然目前军事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军事领袖随时可能叛变革命，应该加强农民武装，这样革命的基础才不会动摇。第五应该注重的是革命的经济问题，其中主要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此外，还要注重理论问题，

包括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等。

就在汪精卫等人去郑州与冯玉祥开会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三次重要的会议。其中一次会议还是讨论继续北伐的问题。

鲍罗廷主张北伐，避开蒋介石在东南的锋芒，在西北建立根据地；陈独秀、李立三和瞿秋白则主张东征讨伐蒋介石；谭平山和罗易主张南伐夺取广东；蔡和森主张先解决两湖问题。

眼看着反革命势力日益猖獗，武汉国民政府右倾动摇，而党内右倾错误继续滋长，蔡和森按捺不住焦虑之情，决定直言不讳，据理力争。

他在会议上慷慨陈词：“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别人做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我们必须坚决的自觉的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这便是指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问题应首先解决。许克祥的反革命，任他在湖南延长的发展，我们所在地的湖北，自夏斗寅叛变后，已有四十三县的农民和农协处在土劣军阀的白色恐怖之下，死的农民已达三千以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反革命大暴动不解决，而高唱东征、南伐，只是一句空话！”

蔡和森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国民党右派纷纷叛变的情况下，我们党不能再为国民党军阀做嫁衣了，不能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工作了，要坚定地、自觉地、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力量，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在大声疾呼的同时，他还拿出已经在常委会通过的湖南、湖北决议案，



鲍罗廷公馆



要求政治局讨论确认。

决议案内容大致为：一、号召农民群众以自己的势力抵抗地主、土劣、军阀的反攻。二、在斗争中积极发展农军和工人纠察队，扩大工农武装力量。三、自动没收土地。四、不要相信和依赖国民政府来解决反革命势力。五、准备推翻土劣的国民党中央机关。这份决议号召发动农民武装力量，联合工人，实行土地革命，与国民政府划清界限。

就在此时，共产国际也发来电报，斥责中共中央对于土地革命态度不坚决，指示迅速反攻解决许克祥叛变，自动没收土地。

罗易看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蔡和森的主张与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相符合，于是完全同意蔡和森的意见。第二天罗易要求国民政府讨伐朱培德，同时中共派五十名军事同志去江西准备发动暴动，推翻朱培德。蔡和森用常委的名义发了一个推翻朱培德的训令给江西省委。

这时的中共中央总算有了一点“进攻”的新空气。然而，随着局势恶化和党内右倾错误的发展，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主张很快又被新的妥协退让政策取代。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27年6月，中国的政治局势也和初夏天气一样阴晴不定，风云变幻。早在徐州会议前夕，冯玉祥就于6月18日以国民党开封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指示豫、陕、甘三省政府“清党”，还公开发表了《敬告全国同胞及革命同志书》，说在中国只有国民革命，断无阶级斗争。提出让共产党退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停止工农运动之阶级斗争。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与蒋介石达成“清党”共识。他开始用所谓的“礼送”出境的名义驱逐共产党人。他将自己军队中的共产党员以及他管辖地区内的地方党员共二百四十多人调到郑州，先请他们吃饭，然后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很好，但是你们都是反蒋的，但我不能反蒋的。”他送给刘伯坚一千元，科长以上的一百元，其余每人50元，用一个闷罐车把这二百四十余人一股脑拉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到6月底，冯玉祥更是

变本加厉地把所有共产党员从他所管辖的党部、政府和军队中清理出去。

在徐州会议期间，1927年6月21日，冯玉祥给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闿等



徐州会议参与者合影

人发出了一封电报，攻击武汉地区工农运动是“店员胁迫店主，职工胁迫厂主，佃户胁迫地主，甚至利用打倒土豪劣绅标语，压迫出征军人之家庭，前方苦战奋斗之将士，不足以保其在乡父兄”，肆意诬蔑共产党人“彼等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怖之毒……以致社会根本动摇，四民无一安宁”，并以浓厚威胁意味的语气敦促汪精卫等立即驱逐鲍罗廷回国，清党分共，要求武汉政府自动取消，与南京政府合并。

这封电报加快了汪精卫分共的步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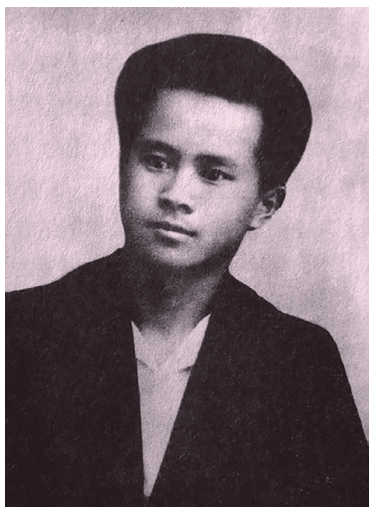
在冯玉祥遣送共产党人离军或出境后，中共对冯玉祥的幻想破灭了。但还是没有放弃对汪精卫等人的幻想。

陈独秀、鲍罗廷依然以压制工农运动、屈从汪精卫为工作指导方针。6月28日，中共中央为避免给反动军官以反共政变的口实，不得不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交出，解除武装。

6月29日，三十三军长何键发布反共训令，要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唐生智申明与共产党决裂。

在汪精卫集团反共趋向日益明显的严重时刻，由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导致局势日益恶化，以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张太雷、任弼时等为代表的党内有识之士不禁忧心如焚。

6月23日，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批评陈独秀的错误，要求公开共产国际的指示，遭到陈独秀的指责。在此期间，团中



任弼时

央召开会议，任弼时请陈独秀参加。陈独秀坐下来，读着任弼时和其他团中央同志一起起草的《政治意见书》，读着读着，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意见书》批评了他的退让政策，责问他为什么不实行土地革命。陈独秀怒气冲冲地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的总书记，究竟是党领导团还是团领导党？”任弼时没有气馁，说：“团中央的同志还在二楼等着你呢，准备向你陈述意见。”

陈独秀无奈，在任弼时陪同下到了二楼。任弼时又当着大家的面把《意见书》读了一遍。陈独秀没等任弼时读完，就生气地拂袖而去。

25日，蔡和森致信中共中央，指出反动派态度已经明朗，我们不能坐此静等人家来处置，建议党中央即刻检查自己的力量，作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但这一建议也未被陈独秀采纳。6月30日，陈独秀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中，依然坚持妥协退让。蔡和森提议今后的任务不是退却而是进攻，但陈独秀却说，革命现阶段的问题既不是退却也不是进攻，当前形势是复杂的，必须有一种复杂的政策来应付，但这“复杂的政策”陈独秀也拿不出具体办法来。当任弼时在中央会议上再次向陈独秀面呈团中央的《政治意见书》时，陈独秀竟愤然将《意见书》撕得粉碎，扔在地上。

7月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对汪精卫集团做了最大的让步。这个《两党关系决议案》包括十一条款，除承认中国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还承认工农群众和工农武装均受国民党领导，指示共产党员以“请假”名义退出政府，以“避免纠纷”。这实质上是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结果反而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

1927年7月14日夜間，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秘密集会，

策划“分共”。会议接受了汪精卫“分共”的主张，提出了《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并决定提交国民党中央常务扩大会议通过实行。

7月15日下午4时，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十次扩大会议，汪精卫在会议上做了题为《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的报告，正式提出“分共”主张，借口就是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汪精卫报告说：“上（六）月五日，就是主席团到郑州的头一天，中央名誉主席、第三国际中央委员会鲁易同志约本席去谈话，拿出第三国际首领斯大林拍给他同鲍罗廷同志的电报交本席看。本席看过以后，就说这件事很重要，要交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再说，当时主席团只有谭平山同志和宋子文同志没有看见，近来宋同志已经看见了。这个电报是训令中国共产党同苏俄在中国工作人员的……，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电报中有五层意见，都是很厉害的……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对于本党内的 CP 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

这次“分共会议”，通过相关决议和命令，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此后不久，汪精卫集团就撕下了“和平分共”的面纱，开始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民众。

（朱蔚青）



黄冈烟苗案

1927年5月，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反动面目日益暴露，革命形势发生逆转。面对夏斗寅、杨森、许克祥等发动的反共浪潮，汪精卫集团以黄冈烟苗案为借口，下令解散“党务工作素著成绩”的国民党湖北省黄冈县党部和湖北省最大的县级农民协会——黄冈县农民协会。以共产党员董必武为首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为了反击反动派的进攻，领导黄冈县革命派与汪精卫集团肆意摧残农民运动的反动行径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黄冈县农民协会的发展

黄冈县农民协会成立于1925年。早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董必武、陈潭秋主持的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就在黄冈县发展了胡亮寅和陈防武等一批最早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1925年，董必武指派优秀共产党员、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陈荫林到黄冈发展共产党组织，筹建国民党县区党部，并发展农民运动。6月，黄冈秘密成立了共产党人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县党部，接着又秘密建立了县农民协会。黄冈成为湖北农村最早建立农民协会的三个县份之一。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黄冈地区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农民运动一日千里，共产党组织和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地方组织人数迅速增加，各级党组织相继建立。这一时期，黄冈农民协会由秘密状态转变为公开活动。经济上，农协领导广大农民反抗投机倒把，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财产，实行减租减息；政治上，对土豪劣绅地主分子进行个别镇压，打击地主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树立农民和农协的权威；武装斗争上，反抗土匪武装、

残留的旧军阀势力、地主武装力量——民团。除此之外，黄冈县农协关注的对象开始向整个农村社会延伸，农协开办的消费合作社一度发行流通券五万串，以缓解金融梗塞。黄冈县农协组织有开始向农村基层政权转变的迹象。

到1927年春，黄冈县共有农民协会16个，乡农民协会300多个，会员24万多人。国民党黄冈县党部（主要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共产党员魏梦龄为常务委员）和县农协领导广大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打击惩办土豪劣绅，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成绩卓著，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革命力量的大发展引起国民党右派和地主豪绅的极大恐慌和仇视，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和捣乱。

1927年5月，在武汉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域先后发生夏斗寅、杨森叛乱和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捣毁地方党部和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武汉国民党中央也日趋右转，寻找各种借口，解散农会组织，压制农民运动。5月20日，国民党中央向各级党部发出“纠正农运”的训令和“制裁越轨行动”的训令，指责“各种民众运动往往于中央决议案有所出入，尤甚者或至背离”，宣布“中央为矫正此种现象计”，决定在武汉国民政府管辖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亲赴各地“切实执行中央决议”，对“越轨行动”加以严厉制裁。黄冈烟苗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是国民党中央借机镇压农民运动、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一个典型案件。

误铲烟苗引起轩然大波

鄂东黄冈一带种植烟苗的历史比较悠久，许多地方具有种植烟苗的良好条件，包括土壤、气候、技术等，烟叶收入成为当地农民的一项重要收入，也是黄冈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税源。据1927年春的统计，黄冈县每年生产烟叶11.2万石，价值20万大洋，是全县畅销的大宗商品之一。

农民运动兴起后，许多农协提出禁烟禁酒的口号。当然这个禁烟是禁止吸食售卖鸦片。1927年春，黄冈县黄家坳（在今黄冈市团风县）一带有

农会会员看到禁烟禁酒的标语，由于文化水平较低，误认为是禁止纸烟而不是禁止鸦片烟，既然是禁止纸烟，那么，烟叶当然就毫无用处，赚不到钱；而且，种植烟苗还要用去很多肥料，花费大量的劳力，很不划算，于是，便自己把种植的烟苗铲掉了。这是个别农民的个人认识和行为。当地农会发现后，担心引起连锁反应，立即上门作解释，迅速制止了这种行为。

也就在此前后，黄冈县第十一区有4个乡的农民协会组织合作社全体会员为招待插禾雇工，集资由合作社酿酒，再以原价卖给出资的合作社农民，主要是减轻农民的负担，节约费用。为此，合作社向团风镇烟酒局请求免税。团风镇烟酒局根据农会要求，批准免除合作社的酒税。但事后发现少数投机商人假借合作社名义不缴纳酒税，偷税漏税，此事也被国民党黄冈县党部和县农协及时制止。

其实，这是两件很小的事情。谁也没有料到这两件小事发展演变成成为当时湖北武汉有影响的重大事件。黄冈县国民党右派和土豪劣绅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造谣惑众，诬蔑陷害，企图扩大事态，借机打击农民运动。1927年5月下旬，黄冈县烟草公卖处处长罗承泽向湖北全省烟酒公卖处报告，称烟叶税为全县的大税，占全县税收的四分之三，但“烟苗甫经萌芽，多被当地党部农民协会铲挖，无法制止”，诬告该县农会会员“铲挖烟苗，妨碍国家税收”。省烟酒公卖处处长华煜立即向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报告。

汪精卫集团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未作任何调查，便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呈文，对于铲挖烟苗一事未说明是什么地方、是什么人，没有提出任何事实依据。但国民党中央利用这个机会借题发挥，极力压制农民运动。

6月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二十六次会议，汪精卫大肆攻击诬蔑农民运动，称黄冈县党部、县农协“真比蒋介石要厉害，简直要饿死靠烟酒吃饭的人，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被打得跑光了”“像这样逼得无路可走，也难怪许克祥他们要起来反抗，试问究竟是什么主义”，叫嚣农协是“上不要中央，下不要农民”，“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这次会议悍

然作出解散国民党黄冈县党部和县农协的决定。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对于黄冈县党部和农协不许人民种烟叶及酿酒之决议案》。《决议案》训令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省农民协会立即解散黄冈县党部及县农民协会，通令全省党部严行制止此种行为；通缉黄冈县党部及县农协全体执行委员，按反革命罪惩办；通令各县党部及农民协会以后若有不顾中央训令之事件发生，亦照此案从严办理。这一杀气腾腾的决议，目的是要取缔黄冈县的农民运动，摧毁黄冈的革命力量，震慑湖北各地农协组织。

戳穿国民党右派诬陷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攻击和诬蔑，董必武领导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坚决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6月3日，省党部派执行委员、省农协执委会副委员长陈荫林前往黄冈调查。6月5日，董必武召开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委会常会，明确表示对此事要等陈荫林调查清楚后再作处理。

6月6日，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属会遵即委派陈怀瑾同志为黄冈县党部筹备员，前往该县办理一切改组事宜”。6月7日，湖北省农民协会也呈国民党中央，决定派员前往黄冈县改组县农民协会。

黄冈县农民协会对国民党右派的诬蔑十分气愤，在回电中指出：“烟叶大半为属会穷苦会员自行栽种，若谓会员铲挖烟苗是自绝自己之生路，于情于理决不至此。该局所云实属绝无其事，显系反动派捏造谣言，冀图离间政府与人民团体之感情，以为破坏革命之地步。”要求国民党中央撤销原案，登报申明，“使奸人诡计无所得施，革命前途利赖多矣”。黄冈县农协要求省农民协会速向国民党中央党部为之辩白，并要求撤销原案，登报声明。

在此之前，五六月间，省农协执行委员郭树勋（即郭述申）陪同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苏联顾问洛卓莫夫到黄冈县考察，深入了解农民运动发展情况，也到了团风镇。他和黄冈县党部常务委员魏梦龄亲自到团风镇烟酒局调查询问。该局负责人说：铲烟苗一事曾在黄家坳发现，但不是县党部

和农协的主张，而是一两个流氓与农民有矛盾，乘黑夜之机偷偷地铲去，第二天就被当地农会驱逐走了。

陈荫林按照省党部指令，乘船赴黄冈。6月6日上午，陈荫林召开黄冈县党部全体执行委员会议，下午召开黄冈县农协执行委员会议，公布国民党中央训令，宣布撤销国民党黄冈县党部和黄冈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县党部常委魏梦龄、县农协委员长陈防武辞去职务。当时，黄冈地区土豪劣绅及国民党右派到处造谣惑众，大肆宣扬县党部和县农协被解散，并许以重金企图杀害县党部和县农协负责人，全县人心浮动，形势骤然紧张。

解散黄冈县党部和县农协对于黄冈县的革命斗争是一个重大打击。陈荫林认为，县党部和农协既已解散，群众运动顿失重心，四乡工作人员均无保证，反动分子必乘机暴动，以图报复，已是一发千钧，革命前途堪忧。为维护和发展黄冈地区党务和农民运动，陈荫林一方面将黄冈局势向省党部报告，另一方面采取措施，力图挽救，重振人民群众的革命信心。

8日，陈荫林召开县党部全体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组建黄冈县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以共产党员陈学渭为县党部常务委员；同时组建县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吴履松为县农协委员长，继续领导农民开展斗争。并开始进行相关工作，准备召开全县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新的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和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

在组建新的黄冈县党部和县农协的同时，陈荫林还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包括下乡作切实调查。在查明真相后，陈荫林致函国民党中央和湖北省党部，指出所谓的农会会员铲挖烟苗、抗纳酒税一事完全是子虚乌有，是反动派故意中伤。后来，陈荫林准备到案发地黄家坳去作全面深入的调查，但由于夏斗寅叛乱被叶挺击败后，大批叛军逃向浠水、黄冈等地区，沿途烧杀抢劫，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形势十分紧张，陈荫林再作进一步的调查是不可能的，于是匆匆返回武汉。湖北省党部拟派出工作人员会同黄冈县党部、县农协的工作人员一起进行深入调查。

6月8日，黄冈县党部发表《国民党黄冈县党部为接收中央党部训令宣言》。《宣言》肯定了黄冈县党部和农协的革命斗争，指出“以革命观

点看，有了斗争，才可以夺取封建阶级的政权；有了斗争，才可以颠覆封建阶级的经济基础；有了斗争，才可以使农民认识到有组织的必要。”强调山地农民以种植烟叶为生，“岂有挖掘烟苗，自绝其生命之理？本党为农民利益奋斗，亦决不忍坐视农民走上死道路，更不能下令禁止，以见绝于农民。”“至黄冈各镇酒商，间有因连年饥谨，粮食缺乏，自行歇业，各地民众并未干涉烧熬。事实俱在，未可诬也。”表示“同人等于凛受中央命令之余，实深恶痛恨造谣中伤之反动派，誓愿率全县同志，猛勇奋斗，不惜牺牲，将一切阴谋反动分子铲除净尽，以完成本党之使命，不徒使本部之委屈得以大白于天下而后快。”

董必武十分重视黄冈烟苗案的发展情况。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训令后，县党部常委魏梦龄随同陈荫林来到武汉准备接受国民党中央的处分（县农协委员长陈防武重病在家）。董必武十分关心魏梦龄的安全，担心汪精卫集团乘机杀害魏梦龄，乃决定魏梦龄暂时不要到武汉国民党中央去，将魏留在湖北省党部，保护了魏梦龄。后来，魏梦龄在省党部秘密接替了组织部长、共产党员陈卫东的工作。同时，董必武根据调查结果，对国民党右派进行反击。6月13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董必武报告了事件的真相，严肃指出黄冈县党部和县农民协会并无铲烟挖苗一事，当面戳穿了国民党右派的诬陷。担任大会主席的汪精卫面对董必武的慷慨陈词，理屈词穷，只好说“再着财政部派人去查看就是”。

6月25日，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呈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黄冈县党部和县农协提供的材料、实地调查情况和到团风镇烟酒局探查询问的结果等，就黄冈烟苗案调查一事作出报告，强调黄冈县党部和县农协“对于维护国家税收曾三令五申，通告下级切实遵守，尚有通告可供复按。”批评财政部的呈文中没有指明何地、何人铲挖烟苗。明确提出团风烟酒局“虽指明黄家坳地方有此类事件发生，但非党部、农协主持，与烟酒公卖处所呈不无歧异。”这就是说黄冈县烟酒公卖处提供的情况与团风镇烟酒局的说法是不一致的，是虚假消息，是无中生有。呈文还指出：“窃念铲挖烟苗必有其地，擅打酒瓮必有其人，一经详查不难水落石出。”要

求国民党中央“另派专员前往查明实情，彻底根究，俾免反动分子信口造谣，借端生事”。并附上陈荫林提供的5份材料，特此说明。

武汉国民党中央当然不会派人调查，因为这本是子虚乌有之事，在铁的事实面前，汪精卫不得不妥协。6月2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召开，谭延闿攻击湖北省党部给中央党部的呈文，称“其意不外为负责人申辩”。汪精卫怒气冲冲地说：“照省党部呈文中所说，黄冈县党部一点错误也没有，完全是禁烟处长捏造事实，该当夺拿禁烟处长！”当詹大悲提出“中央可以派人到黄冈黄家坳秘密去调查，小地方的事是瞒不住的”时，孙科竟然说，还调查什么？“中央到湖北来，就是冤枉解散一个县党部，也没有什么关系！”汪精卫说：“湖北省党部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中央，本席认为是很不对的。”事实证明，以董必武为首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据理力争的做法，已经深深刺痛了国民党右派的神经。最后，会议被迫作出决议：黄冈县党部行为，系在中央训令之前，该党部常委魏梦龄着党部从轻发落；关于人民铲除烟苗等文件证据，由财政部着黄冈禁烟分处处长呈报。

7月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致函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重申了第三十三次会议精神，此事不了了之。汪精卫集团借黄冈烟苗案打击压制农民运动的企图破产了。

（陈磊）

马日事变的处理

唐生智“贼喊捉贼”

1927年5月21日，湖南长沙城内，枪声大作，火光四起。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等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指使下悍然发动反革命叛乱，调集军队突然袭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机关和工人纠察队，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因当天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故这一事变被称为“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震动了武汉和河南前线。事变发生后，幕后主使何键便率先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5月23日，他从信阳发出通电，指责湖南农会、工会“截车扣米，残害军人，拘杀亲属，抄没田产”“扰及职军后方”。何键的表态使湖南反动军官反革命气焰愈发嚣张。

作为二次北伐总指挥的唐生智对事变的态度比较复杂，经历了一个由表面反对到暗中纵容，从“联共”到“分共”的转变过程。

5月24日，正在河南前线督战的唐生智获悉马日事变消息后，心急如焚，焦灼不安，因为他的主力部队都在河南北伐前线与奉军作战，面对突如其来的“后院失火”，他既害怕湖南驻军脱离其控制，倒向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又担心共产党领导工农“造反”推翻他的湖南政权。于是，他急电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张翼鹏，命令长沙周围许（克祥）团各军留守处军队，及八军、三十五军教导团、驻省各连，概归其统一指挥，非得命令，不许有任何举动。同时要他们以长沙各界的名义张贴“拥护国民政府、拥护三大政策、打倒叛党叛国的蒋中正”等标语，并发还全部收缴的工农武装的

枪械。当天晚上，唐生智将马日事变情况报告武汉国民党中央，表示对许克祥越轨行为的不满，立誓要继续遵守孙总理的三大政策，并向武汉政府“自请处分”。

应该说，披着“革命外衣”的唐总指挥上述“义正词严”的“革命言行”颇具迷惑性，蒙蔽了当时一些人。但是，仅仅时隔一天，唐生智就上演了川剧式“变脸”。他在5月25日致电湖南省党部、省政府时，就攻击污蔑湖南农协“侵害抢掠”，下令要严惩“暴徒”，“以安军心”。

当唐生智主力部队从河南前线班师回汉，他本人亲自到湖南去处理这一事件时，他仇视工农运动和包庇纵容许克祥的态度也就进一步暴露无遗。

6月13日，唐生智抵达汉口，一下车就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湖南问题要持平处理，不正当的军事行动必须制止，农民运动的鲁莽行为必须纠正。”

就在此时，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派唐生智“查办长沙事件”。6月20日，唐生智在公开演说中表示：“湖南这次事件，原因非常复杂，民众运动固然的确有错误，但军人也未免头脑太不明瞭、太简单，我对这次事变，实在觉得非常痛心！”但6月22日他却在电文中嘉奖许之“忠直”，“士兵起而自卫，自是正当。该副师长秉性忠直，固知实有苦衷。”

6月26日，唐生智以武汉政府授予的特殊权力赴长沙“查办”马日事变，他一到长沙就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恶毒攻击湖南工农运动，将马日事变的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身上，并公开枪杀了两位革命者，叫嚣谁要反抗，则将谁“以反革命罪从严究办”。此等“查办”，其结果可想而知。最终虽决定将仇鳌、张敬兮“开除党籍”，但同时又决定“党部及各民众团体，着即停止活动”。而对叛乱祸首许克祥，处理结果却仅是“激于义愤，实误触纪律，……记过一次，留营效力。”

其间，时任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唐生智的亲信周斓奉唐命令执行所谓“革命纪律”，先是发出通缉李维汉、夏曦、郭亮等湖南共产党组织领导人的通电，后又命公安局以扰乱治安为罪名，逮捕张贴标语的学生、工人等数十人，并立即枪杀了其中的五个人，由此开始了“合法化”大规模清党反共屠杀。

《申报》长沙6月28日通讯“湘省共产党又遭迫害”一文中，直言不讳指出：“据政府中人言，唐生智之反共态度，至此业已表明”。

马日事变发生后，唐生智出现前后矛盾，表里不一的言行，究其原因，不仅仅有等候观望，见风使舵的因素，更有其视自身力量消长变化而“再做决定”的考量。对此，蔡和森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指唐生智，笔者注）在当时极力向我们卑词下礼，常常从前方直接打电报于我们的中央表示他的忠实，常常在前方故意公开讲演拥护三大政策，反对许克祥否认湖南农民运动过火，总括一句，他的言论，比汪精卫、谭延闿任何一个都左很多。”可以说，从最初的高呼“联共”，进而在“分共”的边缘反复试探到最终的“分共”，唐生智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自身的利益得失为权衡标准，唐生智在“革命”和“左派”面具伪装下，自编自导了一幕“贼喊捉贼”的戏码。

汪精卫集团“避重就轻”

汪精卫集团作为国民党内以地主、资产阶级、军阀、官僚、政客为主体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本质上仇视工农运动，“总是害怕民众”。而作为集团首脑的汪精卫则一向以国民党“左派”面目示人。中山舰事件后，汪虽然被迫出国，但其在国民党内的影响犹存。为阻止蒋介石日益加速的右倾步伐，遏制其不断膨胀的军事独裁，武汉国共两党掀起了“迎汪复职”运动。1927年4月，在各方“翘首以盼”中回到国内的汪精卫，摇身一变又成了“左派领袖”，取得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但其阶级立场决定了他骨子里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敌视。

随着武汉政治、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要员们异口同声地把武汉的困境归咎于工农运动“过火”造成的，在武汉政府内部出现了一股诋毁农民运动的逆流，他们不断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妨碍税收、阻碍北伐，叫嚣“不能为了农民断送北伐”。马日事变加速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动摇和反动，汪精卫等人对马日事变的纵容庇护成为其最终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催化剂”。

事变发生后，汪精卫等人一方面对叛军采取妥协、安抚政策，一方面加紧压制工农运动。他们千方百计为许克祥的叛变辩护，把事变原因说成是工农运动“过火”，庇护反革命罪行。他们装作公正的样子，歪曲事变的叛乱性质，不但不对许克祥之流的叛变行为予以谴责，还多次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会议，甚至发布电令、训令，歪曲叛乱性质和事实，肆意指责中国共产党没有及早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导致马日事变发生。

5月25日，武汉政府根据唐生智的建议，下令特派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及唐生智的代表周鳌山、邓绍芬五人为特派员，组成特别委员会，奔赴长沙查办马日事变。当代表团于25日晚行至岳阳时，湖南反动军官密电岳阳驻军将代表们“就地拿获处决”。查办团闻讯，狼狈逃回武汉。“查办”的闹剧使湖南反动派的气焰愈加嚣张，汪精卫集团对许克祥之流也愈加纵容庇护。

5月2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在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扩大会议上就长沙事件训令全体党员，强调什么“误会必须免除，错误必须纠正”，又训令“无论何项团体及个人间，如有纠纷……不得各逞忿怒，轻启衅端”。

6月1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公然指责：“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也难怪许克祥他们要起来造反。”同时，他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表示：“有两个办法，可令军事委员会，并电湖南省政府：（一）制止军队不得有越轨行为；（二）制止农工不得有过分举动。”

6月3日，国民党中央决议：一是湖南省政府暂维现状；二是湖南省党部及农民协会省工会均应改组；三是长（沙）岳（阳）一切部队归副军长周斓指挥；四是军队及农民武装团体均应即行停止军事行动；五是其他一切事宜均归特别委员会办理。

6月1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汉口中央党部政治委员会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长沙事件，交由唐生智总指挥去湖南根据中央历次的决议案全权处理。”会上，湖南省市县党部及民众团体请愿代表

团前去请愿，强烈要求“明令讨伐许克祥、枪毙许克祥等、恢复湖南省党部、解散湖南伪省党部、恢复省总工会、救恤被难的同志”等。汪精卫等人却公然拒绝这些合理的正义要求。汪精卫表示：“同时农工自己也须承认在过去的行为中多少有些错误。如果农工以为自己毫无不是之处，那就不得了。”同时，汪精卫在会上还转达了湖南反动军官的要求：“周斓同张翼鹏报告，说是农民协会反对政府，请派兵剿灭”。显然，武汉国民党首脑们已经在与湖南反动军官合力上演“双簧”。

6月15日，《汉口民国日报》刊登“中国国民党致中国共产党书”指出：“至关于湖南事件，本党已两度遣派负责同志赴湘，严行查办……然有两项原则可以先为贵党告者，（一）对武人越轨行为，必须制裁；（二）对农协幼稚行动，必须纠正。”

6月2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召开第三十一次会议，在会上，汪精卫等人对许克祥的叛变已从暗中庇护转为公开赞扬，公然称许克祥为“许青天”“救主”，称赞他是“为国民解除痛苦”。

汪精卫等人对许克祥等反动军官的包庇纵容，还表现在他们控制的武汉政府一直拒不明令声讨许克祥。6月27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当孙科宣读了唐生智报告处置湖南事件所拟办法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提出“对于许克祥未免处置得太轻了”，汪精卫却说“可以照准”，“应该公布”。

马日事变加速了武汉国民党当局叛变革命的步伐。汪精卫等人对马日事变和许克祥“避重就轻”的处理，是他们公开叛变革命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距离马日事变不到两个月，汪精卫就悍然发动七一五“分共”，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苍白无力的口诛笔伐

马日事变既是反动军官精心策划、充分准备、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一次反革命叛乱，也是两湖地区土豪劣绅疯狂进攻的一次严重表现，更是

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分共”的开始，决不是某些国民党“要员们”口口声声所说的“误会”。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政治局势，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坚决反击，一再拒绝采纳党内同志的正确主张，一味以妥协退让来避免统一战线破裂，最终导致对马日事变的处理沦为苍白无力的口诛笔伐。

对于如何处理马日事变，不仅中共党内存在分歧，而且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意见也不一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农民运动确实存在着“过火”的情形，认为“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为”。鲍罗廷与陈独秀看法基本一致，认为“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向“左派”汪精卫等人让步是换取国共合作继续的条件，是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

以蔡和森等为代表的党内有识之士则主张对许克祥之流的反革命行为必须坚决回击。蔡和森提出利用叶挺部队控制湘鄂边界的有利条件，以暴制暴，把反革命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他对中共中央静候武汉政府解决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指出：“静候政府解决绝无出路，决扩大权力，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他极力主张在唐生智返回湖南前，发展十万农民武力与乡村自治，集中力量在乡村打击反动势力，反击许克祥叛军。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他决定向党中央推荐一个“为一切敌人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所欢迎的”得力干部，去湖南担任省委书记，这个最佳人选就是毛泽东。

蔡和森还曾向中央提交了自己拟定的两湖问题决议案，关于湖南决议案的大要是：“（一）坚决的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以自己的势力来解决许克祥，向长沙围攻封锁之势；（二）绝对的不要相信和依赖国民政府合法的解决，他是故意纵容许克祥的，即使有所谓合法解决之日，他不过是用法律手段来代替许克祥暴烈手段，即合法的来取消农民运动；（三）自动的没收土地，农民势力到那处即将那处的敌人杀尽，土地没收，并建立乡村政权，实行赤色恐怖；（四）在此反许争斗中，应发展农军至五万以上；（五）在最

短期间应发展国民党群众至三十万以上，准备推翻现在代表土劣的国民党中央。”蔡和森的决议案一针见血地切中要害，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且上报中央常委通过。但终因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犹豫不决，态度不坚定，该决议案未能付诸实施。

毛泽东在马日事变发生后即主动向中央请求去湖南工作，经蔡和森推荐，中央同意了毛泽东的请求，任命他为湖南省委书记。他随即推动全国农协发出声讨通电，要求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

在武汉，毛泽东与李立三、郭亮还召集由湖南来汉向国民政府请愿愿办许克祥的共产党员和工农干部，要求他们回去拿起武器，“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毛泽东到湖南上任后，立即风尘仆仆地奔走在长沙、衡阳等地，召集党组织负责人和工农武装骨干开会，制订了《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他用铿锵有力的语言明确要求：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担任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也投入了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中。他决心乘唐生智部队主力留在河南来不及回师湖南、湖北之机，利用叶挺平定夏斗寅叛乱后驻军湘鄂边界的有利形势，迅速组织湖南农军发起暴动，反击许克祥叛军。

6月17日和20日，周恩来两次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关于湖南暴动计划的报告。他指出：现在浏阳、平江一带农军还有8000支枪，军事部已派了军事干部10人（其中有营长3人）到那里去。计划先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全力攻下反动势力薄弱的城池，而在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则到各处打土豪劣绅，在有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周恩来还提议在长沙设省委，下设军委，准备另派150人到各地做农军及地方工作。按照中央常委会决定，他甚至准备等人员到齐后亲自到湖南去指挥这次暴动。

然而，周恩来为湖南暴动计划所做的一切精心准备和周密安排，却被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代表毁于一旦。他们先是动摇不定，将暴动计划一改再改，暴动经费拖延不发，随后又道听途说，认为湖南党的力量已经瓦解，

索性否决取消了暴动计划。从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忍无可忍，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大吵了一场。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张太雷对如何应对马日事变，挽救革命危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太雷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公开发表文章，呼吁面对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和强固我们的队伍”，有组织地进行抵抗。他领导的中共湖北省委提醒全省共产党员注意：“暴风雨来了，我们要随时准备应变。”为了贯彻整军经武、准备应变的指导思想，中共湖北省委明确提出了“招兵”、“募夫”、“上山”和争取土著武装的策略。这对于保存革命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张太雷提出的“上山”思想，与毛泽东的主张是英雄所见略同。

遗憾的是中共中央指导机关却没有采纳这些党内有识之士的正确主张。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误以为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去处理马日事变，就可以挽留汪精卫的所谓“左派”国民政府一起挽救国民革命，挽救国共合作。

中共中央最终对马日事变采取了和平解决方针。5月26日，全国总工会、农协电告湘工农团体“为避免冲突，静候解决”。随后，鲍罗廷同国民党特别委员会赴湘调查马日事变，意在一面查办许克祥的叛变，一面查办农运的过火，结果未到长沙便被反革命派势力逼回，不仅无功而返，更是“丧失了国民党及老鲍的威信，反革命愈益张目”。

6月4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关于政局的公开信”中提议采用以下行动削平湖南的反革命：“一、国民政府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二、解散叛徒的委员会，另委合法的省政府。三、火速派兵讨伐叛乱，与唐总指挥以派兵之权削平之。四、取消叛徒窃据之省党部，另由国民党中央下令改选新省党部行使职权。五、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得享完全的自由。六、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之发生。”同时，还指出“当反动份子以公开的反叛行动集合他们的力量时，国民党和国民政

府倘不果决的领导劳苦群众向反革命势力作殊死的革命战斗，则一切反革命势力得有更多机会放胆集合发展其势力向革命进攻，革命前途将陷于危险！”这封信虽然表达出讨伐许克祥之流的正义要求，却把叛乱的解决控制在“合法”范围内，寄希望于武汉国民政府和唐生智“主持公道”，而这对于日益右倾的武汉国民党当局来说，无异于“与虎谋皮”，其最终结果可想而知。

6月15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指出：“我们当前的任务是，纠正‘过火’，没收土地，揭露反动派的夸大宣传，消除军官和左派国民党员的经济恐慌，克服妨害农民运动的障碍。”6月20日，陈独秀发表《湖南政变与讨蒋》，其种种言行依旧是在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进行辩解。

仅靠苍白无力的口诛笔伐显然无法挽救国民革命，随着汪精卫集团“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逐渐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

（周 静 徐冰娜）



赤都卫士——武汉工人纠察队

从纠察团到纠察队的蝶变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中，武汉三镇街头巷尾，时常可以见到一支身穿制服、手戴臂章、肩扛木棒或枪支的工人武装巡逻市区。这支被武汉人民亲切称为“杠子队”的红色武装就是武汉工人纠察队。

武汉工人武装最早起源于 1923 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2 年 10 月 10 日，在武汉党组织的领导下，武汉工团联合会成立（后改名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这是中国成立最早的一个地方总工会，加入这个工团联合会的有二十八个工会，会员共计三万多人。湖北工团联合会成立之后，党一方面通过它来和各工厂、商号的工人建立广泛的联系，以进一步推动他们去组织工人团体。另一方面，又借它的合法名义，并以它为总机关来领导武汉工人运动，通过各种罢工斗争去教育和锻炼工人。武汉工人的罢工斗争，在 1922 年不断推高，一直延续到 1923 年 2 月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

就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前，武汉工人纠察队的前身——工人纠察团应运而生。1922 年 6 月，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会最先开始组建工人纠察组织。随后，按照长辛店的模式，京汉路各地工人俱乐部也相继秘密组织了工人纠察组织，武汉的工人纠察团也是这一时期初具雏形的。

工人纠察组织的工作通常是秘密进行的。工会先找较可靠的人当纠察组织负责人，再由负责人发展队员。队员必须要勇敢，“敢干”，且负责人要能够掌控得住队员。“年轻力壮”“斗争勇敢”“不怕牺牲”是这些

工人纠察组织成员的共同特征。这些工人纠察组织成员平时正常做工，下班后一般到工人俱乐部或指定的地点操练武艺，拳师通常是由一些练过功夫的工人充任。他们的武器通常是劳动工具，如木棒、刀斧、铁棍及锤子等。此外，工会还有少量从秘密渠道获取的手枪可供工人纠察组织骨干力量使用。

工人纠察组织的活动通常分成几支小分队，每队由小队长统领，由工会统一指挥领导。工人纠察组织在平时主要是协助工会开展日常工作，如调查登记会员、征收会费及排解工人之间的纠纷等。在罢工期间，工人纠察组织往往发挥着维持秩序、打探消息及冲锋陷阵的重要作用。为保证罢工的顺利进行，他们还常常采用截车、卧轨、破坏铁道等激烈方式来达到罢工目的。在大罢工前夕，武汉的工人纠察队组织又进一步扩充完善，正式成立了以曾玉良为团长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工人纠察团”，准备应对大罢工后各反动势力的武力镇压。

京汉铁路全线大罢工开始后，吴佩孚、萧耀南等军阀在威逼利诱不成的情况下，于2月7日命令反动军警在长辛店、郑州和武汉江岸等地向罢工工人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2月7日，反动军警开始突然袭击罢工工人，曾玉良率领纠察团成员，佩戴红袖章，手执齐眉木棍，站岗放哨，保卫工会机关。下午，罢工进入生死关头，5时许，反动军警从江岸火车站、头道街、福建街向总工会包抄过来，发动了对总工会的进攻。此时，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在总工会指挥防御，曾玉良则扛着“工人纠察团”的大旗，和100多名团员毫不畏惧地站在总工会门前严阵以待，准备与反动军警开展殊死搏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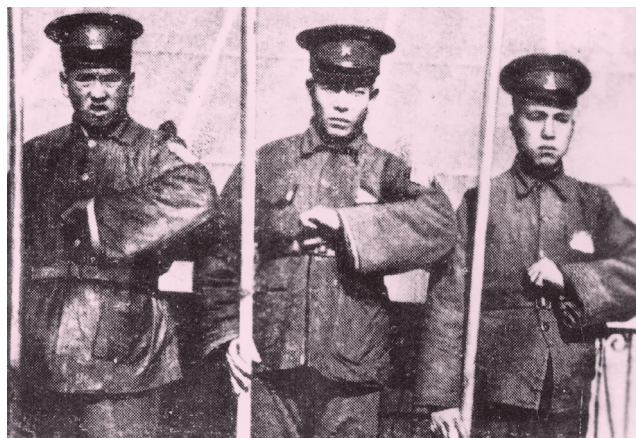
反动军警面对仅有木棍、锤子等简单自卫工具的工人纠察团和罢工工人，竟然直接使用步枪、手枪射击，工人纠察团团员和罢工工人纷纷倒在血泊之中。面对反动军警的血腥屠杀，曾玉良把团旗交给工人梅大龙，冲在队伍最前面，带领工人们挥舞着木棍、榔头和锤子向反动军警冲去。他凭借身高力大、有武术功底，用铁棍接连打落五六个敌人手中的枪支。就

在这时，一颗子弹向他射来，曾玉良中弹倒地，不幸牺牲。工人纠察团也终因武器简陋、寡不敌众遭遇失败，很多团员被屠杀和打成重伤。随后，反动军警强迫工人停止罢工，大罢工不幸失败，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施洋惨遭杀害。

据事后统计，二七惨案中江岸地区牺牲的30多人中，有一半左右都是工人纠察团成员；受伤的200多人中，工人纠察团成员也在占很大比例。

二七惨案血的教训证明了建立革命联合战线和发展强大工人武装的重要性，为此后武汉工人纠察队发展壮大提供了历史经验。

1926年9月至10月，随着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国共两党中央和国



武汉工人纠察队

民政府相继迁移至武汉，武汉成为国民革命中心。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后，在刘少奇、李立三、项英等党的工运领导人组织下，武汉工人阶级再次成立了自己的武装——武汉工人纠察队。

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部设在湖北全省总工会办公室一楼入口右侧。作为湖北省总工会直接管辖的工人武装力量，武汉工人纠察队在成立时就充分汲取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时期工人纠察团组织不够严密、训练不够充分、没有制式武器的缺点。在成立之初它设有一个总队，下辖两个大队，每个大队下面设三个支队（小队），另有一个女工纠察队。总队最早的负责人是项英，后来相继由朱菊和、蒋先云、陈赓担任总队长。

武汉工人纠察队的队员从单身、做工两年以上、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中产生。为了培养纠察队的骨干，加强纠察队的政治建设和军事技能，中国共产党曾在汉口新市场（今民众乐园）举办工人纠察训练班，

刘少奇、邓中夏、项英等工运领袖和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曾到训练班讲课，大批工人纠察队骨干在此受到严格的政治培养和正规的军事训练。据武昌泰安纱厂女工、厂纠察队长张金保回忆：

“进入训练班时，队员都是留长辫的年轻姑娘，每人都穿着蓝色的连衣裙，戴一顶圆顶宽边布帽……在训练班，不论男女都要穿军装，打绑带，戴军帽。这样，我的耙耙头和姑娘们的长辫子都不行了，训练班要求大家都剪成短发。”

张金保对纠察训练班紧张的学习训练印象尤其深刻。她记得每天早上6点就听号音起床，穿衣、整理被褥和冷水洗脸一共只有十分钟时间，然后听到集合军号声就要赶紧上操场集合跑步，风雨无阻。吃饭也只有十分钟时间，一天三操三讲两顿饭，晚上9点熄灯睡觉。学习内容主要是政治和军事。政治课由政治教官讲时事和各地的罢工斗争等。军事课分为室内和室外课，室内由军事教官讲步兵操典，讲兵器分类，讲枪的构造和原理；室外课就是学习枪的使用等等。

除了对纠察队骨干进行严格的政治军事训练外，武汉工人纠察队还规定了严格的纪律。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布的严肃工会纪律的通告第十五条就规定：纠察队应绝对服从纠察队总部规定之纪律，不得有任意打人抓人及其他违反纪律之行动。1927年4月下旬，项英主持召开各级纠察队长会议，议决对违反纪律者开除其会员籍，“任意放枪一声拘狱一月”。

在共产党人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等人的努力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的大力支持下，武汉工人纠察队在政治上有了坚定的革命性，组织上实现了正规化，经费上有了武汉国民政府的保障，武器装备上分批接收了国民政府调拨的枪支，实力大幅提升。到1927年5月，武汉工人纠察队发展到5000余人，拥有2000多支枪，成为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武装力量。

危难之中显身手

武汉工人纠察队在大革命时期武汉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曾叱咤风云，发



挥过重要作用。

在1927年1月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反帝运动中，武汉工人纠察队作为30万参加反英示威大会民众的先锋和骨干，在示威民众占领汉口英租界，迫使英帝国主义放弃汉口英租界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一三惨案发生当天，英租界当局“以武装车冲散海关附近之群众”，但在武汉工人纠察队带领下，“群众不为所动”。在英租界当局用刺刀捅死示威海员李大生，捅伤示威码头工人宿明生、市民祝香山等几十人后，群众“在工人纠察队的带领下，集体冲进英租界”，使得“几十个英国水兵陷入十几万人的伟大群众包围中”。面对英租界当局的暴行，1月4日、5日更多闻讯而来的民众涌入了英租界，武汉工人纠察队队员扛起卸货跳板供群众越过障碍进入租界，继而拆除电网、沙包，有部分队员则沿江迂回登陆配合，占领了江汉关大楼。

英租界巡捕为了阻止游行队伍深入租界，挥舞警棍企图驱散群众，工人纠察队员则与巡捕搏斗，赶走了巡捕。随后，身穿蓝布中山装的刘少奇率领工人纠察队员包围巡捕房，他们在寒风中顶着英巡捕消防水枪的冲击，一举占领了巡捕房。随后，工人纠察队开始担任治安管理工作，维护租界社会秩序，最终将租界管理权移交给中国军警，为武汉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4月27日，位于武昌都府堤的武昌第一小学迎来了许多身穿各式服装，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宾客，他们并非学生家长，而是来自全国各地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为了确保这次隆重热烈的大会安全顺利召开，武汉工人纠察队奉命参加了会场的警戒工作。在大会开幕式致词完毕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湖北全省总工会组织主任项英率领数十名威武雄壮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员进入会场，向代表们行礼。纠察队员们列队走上主席台，将工人纠察队制服送给被授予工人纠察队荣誉队员身份的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罗易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罗易即席讲话，强调建立工人纠察队的意义，认为这支队伍一定是未来红军的第一个基层单位。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1927年5月，夏斗寅、杨森等反动军官发动叛乱，在革命危急的关键时刻，武汉工人纠察队挺身而出，投入了平叛战斗。由于叶挺率武汉卫戍部队开赴前线，武汉城防空虚，武汉工人纠察队走上街头，担任警戒任务，填补了卫戍部队开赴前线后留下的空白，并在武汉三镇及近郊打击反革命分子和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秩序等破坏活动，维持了武汉市区的稳定和通往前线的交通线通畅。面对叛军进攻武汉和革命形势恶化的不利局面，5月15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发表《巩固北伐武装工友宣传大纲》，号召工人“用武装势力去回答敌人”“一致侦察敌情”，大批工人加入了工人纠察队，还有的纠察队员直接上前线配合叶挺部队平叛作战。

据武汉工人纠察队队员李景明事后回忆，面对夏斗寅、杨森的叛军兵锋直指武汉，“武汉纠察队配合叶挺部队的前方作战，警卫南湖一带地区，还负责维持武汉后方的治安”，“上街维持秩序，日夜站岗值勤，直到前方部队胜利归来”。一方面，武汉工人纠察队在二线进行防御准备以及在三镇戒严，保证了叶挺部的退路，也为之后防御其他叛军的进攻提供了预备队；另一方面，武汉工人纠察队也通过有力的后勤，保障了弹药、人员的补充，使叶挺部能集中主力一举击溃夏斗寅所部。

除此之外，在武汉成为“赤都”的大革命时期，武汉工人纠察队还参与了1927年4月应对汉口日租界四三惨案、3月至5月的“肃清反革命”事件等革命活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城市反动分子。

折戟江城

从1927年5月开始，汪精卫集团压制工农运动、破坏国共合作的反动倾向日益明显。随着革命形势恶化，武汉工人纠察队这支红色武装就成了武汉反动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开始向武汉国民政府诬告武汉工人纠察队“借纠察之力量，以压抑异己”“对于店主或厂东有恐吓、罚款及擅自逮捕”，并造谣“最近纠察队之横暴已达极点”。5月下旬后，武汉国民政府发出了庇护地主、诬蔑农民协会的通告，并解散湖北省黄冈和黄陂的农民协会。与此同时，驻扎在汉口的李品仙部队有中下层军官已开始



占领某些基层工会，向工人纠察队挑衅。

6月中下旬，唐生智将主力部队从北伐前线撤回武汉，名义上是拱卫政府，实际上是要控制局面，以便先发制人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控制的革命团体发动袭击。其主力部队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等反动军官公开要求解散一切工农武装，并把他的军队由汉阳移驻汉口，气势汹汹地准备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进行大屠杀。为了寻找借口，何键等人竟造谣说武汉工人纠察队要缴三十五军的枪。这和长沙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前制造的谣言如出一辙，表明何键马上要发动反革命政变。

面对危急事态，中共中央决定作出最大程度的努力，力图尽量减少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共借口，以期避免反革命政变的到来。

6月23日，武汉工人纠察队执行湖北省总工会的命令，先将583支步枪还给了受中国共产党影响较深的第四军，并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查核备案。

6月28日，中共中央得到了反动军官何键企图以“工人纠察队要缴三十五军的枪械”为借口，蓄意与工人纠察队冲突，在武汉制造第二个马日事变的确切情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召集周恩来、张太雷、蔡和森、谭平山、张国焘等领导人连夜在鲍罗廷的住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武汉工人纠察队将自动解除武装，以避免遭到何键反动军队屠杀。为了尽可能保存力量，中共中央决定立刻将武汉工人纠察队中政治素养过硬的队员秘密调动至武昌，加入与共产党关系较好的张发奎部队。为避免引起注意，过江行动中武汉工人纠察队队员“不着纠察队衣服，也不携枪”。

中共中央和湖北省总工会作出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这一痛心的决定，实属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6月28日《湖北全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布告》称“现在武汉反动派企图挑拨工兵之感情……影响工兵联合战线。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并递交报告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有前此领枪弹，已交存管理汉口卫戍事宜办公处”。7月2日的《汉口民国日报》刊登了《湖北全省总工会告军士同志》：“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自动停止了。停止的意义是为了顾全

革命利益，消灭反动派的借口，而使兵工联合更加巩固起来。”至此，武汉工人纠察队正式宣告交枪、解散。

但武汉工人纠察队留下的革命火种，并未随着交枪、解散而熄灭。

从可信的史料来看，武汉工人纠察队转移到南昌起义部队的人员应有数百人。据南昌起义亲历者谭天渡回忆，当时“在武汉工人纠察队及两湖农民自卫军武装多被缴械的情况下，党把大批党员和工农骨干派到二十军中，这样既保存了革命力量，又为二十军补充了新鲜血液。”而二十军是南昌起义的重要力量。此外，曾任武汉工人纠察队大队长的刘力劳在6月下旬转移到了贺龙所部担任特务营第一连连长；武汉工人纠察队队员杨松青也曾带领革命工人参加了南昌起义。时任二十军军长的贺龙为此十分高兴，称“我带了多少年兵，但从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队伍和武器；现在不同了，共产党给我们补充，工农同志愿意编到我们这里来。”

武汉工人纠察队在交枪、解散时，也努力保存了一部分枪支用于革命斗争。当时湖北省总工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许白昊所直接掌握的一部分枪支，就没有交出去而被保留下来。据贺龙所部警卫连长黄霖事后回忆，南昌起义前，“有一天午夜，我连又遵照命令到一个地方去取过好几百条枪。这些枪当然是工人同志藏起来的”。多种史料证明，在公布交枪、解散后，武汉工人纠察队还保留了相当数量的枪支，而这些枪成为了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武器来源，或用于了南昌起义，或在秋收起义后被输送到农村，用以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

（张翼鸥）



红色黄埔

恽代英主持军校

在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南段武昌实验小学内，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它在清朝末年曾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而在大革命形势高涨的一九二七年，它曾是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下简称武汉军校）。

由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在广州创立后，不少中国共产党人参与过办校工作并担任过教官等职务。武汉军校曾是黄埔军校的分校，是黄埔军校的继续和发展，基本沿袭了黄埔军校的制度。

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势如破竹，先后取得了两湖战场、江西战场和福建战场的胜利，大革命迎来了新的高潮。当时有大量的军阀部队前来归附。中国革命的中心开始由广州转移到武汉。1927年元旦，临时联席会议宣布国民政府在武汉开始办公。加上国民政府着手准备第二次北伐打到北京，迫切需要更多的军事政治人才来改造旧军队。此时在武汉开办军校一方面可以聘请转移到武汉的军事政治领导人来授课，另一方面也可以广泛从全国各地招收学生，十分具有优势，武汉分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立起来的。

武汉军校的创办经历了四个阶段，从政治训练班筹备处到政治科再到武汉军校，最后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经过近四个月的紧张筹备，1927年2月12日，武汉军校与总司令部学兵团在武昌两湖书院举行开学典礼。宋庆龄、董必武、于树德、孙科、詹大悲等来宾200余人出席典礼，吴玉章、邓演达、徐谦、顾孟余相继发

表演说，学生代表宣读了誓词。1927年2月14日，武汉军校正式上课。

武汉军校最初实行校长制，由蒋介石任校长，邓演达任代理校长。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为遏制蒋介石军事独裁，武汉军校领导体制改为委员制，最高领导机构是常务委员会，由恽代英、邓演达、谭延闿三人任常务委员，主持校务工作。在三名常委中，谭延闿主要在国民党中央和军事委员会工作，在武汉军校是挂名不管事的；另一名国民党员邓演达忙于总政治



恽代英

部和中央农民部的工作。因此，武汉军校的工作实际上由共产党员恽代英主持，武汉军校实际上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

恽代英生于1895年，祖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湖北武昌，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后任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曾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新文化，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曾参加新文化运动，参与创办互助社，在进步青年中影响力很大。

1926年3月，恽代英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在党内，他还担任中共黄埔军校党团的主要负责人和中共广东区委青年部部长，主要负责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11月，恽代英奉调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主任教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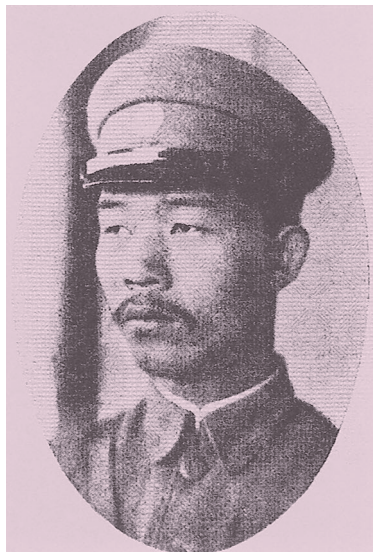


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旧址

在恽代英主持下，武汉军校在办校宗旨和教育方法上，坚持孙中山“主义建军”的办学宗旨和在广州黄埔行之有效的政治教育方法，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并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日益恶化，后期更强调“军事科加紧政治教育，政治科加紧军事训练”，使每个学员尽快地锻炼成思想进步、政治素质高和军事知识丰富、技能娴熟的合格人才。

在课程设置上，恽代英十分注重政治教育，将开设的政治学科由 8 门增加为 26 门，包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政治经济学》《国民革命军历史及战史》《军队中政治工作实施方案》及《中国的农民问题》等课程，恽代英还注重邀请陈独秀、瞿秋白、吴玉章、苏兆征、彭述之、向忠发、毛泽东、董必武、宋庆龄、谭延闿、孙科、徐谦、甘乃光、吴稚晖、谢持、郭沫若等国共两党领袖和社会名流来校报告和演讲。

课堂之外，恽代英还十分重视学生对当前政治形势的认识与思考，他组织指导员参阅中国共产党办的《向导》和《中国青年》，联系当前形势和学生的思想编写辅导材料，组织学生开展对当时政治形势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创办《革命生活》月刊刊登军校师生的文章，从而指导政治讨论和斗争。



邓演达

邓演达随军北伐后，每周一上午的“总理纪念周”就由恽代英来主持。恽代英对学生们说：“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党，要学习先烈不怕牺牲为革命奋斗的精神，要以俄为师，彻底解决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要把中国工人组织起来与世界工人联合起来，向资本家作斗争。特别是中国工人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最深，应与帝国主义作斗争。要从半殖民地解放出来，作中国的主人。”

除了重视政治教育之外，恽代英还很重视军事训练和纪律教育，为了适应革命

需要于1927年5月20日提出了加紧培养军事人才计划。武汉军校学生的生活纪律也十分严格，比如禁止在校内随便吃零食，不和作风不正派的人来往，周日按时返校等等。

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期间，恽代英对武汉军校的军政建设和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

反蒋斗争与清党运动

武汉军校开办的1927年，正处于大革命后期革命阵营内部急剧分化，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时期。军校内部占据优势的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

在武汉分校开办之前，广州黄埔军校的炮、工、政治三科学生正陆续向武汉迁移，蒋介石担心三科学生会脱离自己的控制，就突然下令停止迁移。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持下，迁移终于还是完成了。

武汉军校开办之初，蒋介石依然企图控制学校、分裂学校的革命势力。他委派心腹周佛海以当武汉军校的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为名，对武汉军校的学生进行监视，并向他汇报。蒋介石还让武汉军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张治中把武汉军校的学生带到江西。张治中不愿帮蒋介石监视邓演达，于是提出辞职，周佛海也趁夏斗寅叛乱逃离武汉军校，蒋介石通过亲信控制军校的计划破产了。

之后，蒋介石又利用黄埔同学会对军校进行破坏。1927年1月，蒋介石到武汉之后第二天，要求



汉口血花世界

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与其同行，并在汉口血花世界召集两百多名黄埔学生训话，要他们“服从领导”、“效忠党国”，用冠冕堂皇的话来欺骗纯洁的革命青年为他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效劳。

蒋介石还指派曾扩情对武汉酝酿反蒋运动进行“调解”，曾扩情在黄埔同学会武汉分会会议上提出写联名信“警告”邓演达不要反对“校长”蒋介石。由于军校中的共产党员信念坚定，进步势力占据优势，“调解”和“联名信”均告失败。

4月8日，蒋介石的死党倪弼手下的几个反动分子书写秘密信，企图策划武汉军校的右派学生进行破坏活动。信中要右派学生拉拢中立派分子加入反动工作。

蒋介石对军校策划的破坏阴谋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激起了武汉军校中革命师生的无比愤慨。武汉军校政治部主办的刊物《革命生活》发表了评论文章揭露了蒋介石破坏革命的真面目。

3月10日，湖北省总工会在汉口血花世界召开宣传会议，揭露蒋介石搞军事独裁的行径，场内工人高呼“打倒军事独裁！”“提高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气氛正热烈时，武汉军校政治大队少数反动学生竟闯入会场，非法逮捕四位工人，押送到武汉公安局及总司令部武汉行营。公安

局和武汉行营拒绝接收之后，他们又把工人押送到军校。这就是军校内部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斗争集中表现的三一〇事件。

这一性质恶劣的事件引起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关注。当时正在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邓演达在会上报告了这一事件，决定由林伯渠、陈公博到现场调查真相。恽代英以大会主席团名义起草了对军校和省总工会的训令，明令禁止挑拨工人学生之间的感情，防



林伯渠

止再有挑拨煽动致使事态恶化。经过调查发现，反动学生此次行动是有预谋有组织的，早已准备好了鸣笛、捆绳，这显然是有人挑拨煽动希望学生工人之间发生冲突，从而破坏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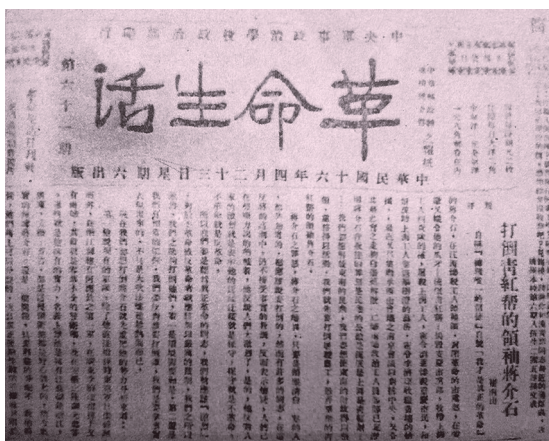
武汉军校广大革命师生十分愤慨，他们决定坚决回击反革命破坏工兵联合的行为。

武汉军校行动迅速，在三一〇事件发生的第二天、第三天接连召开两次各党部及校属部处直属组长联席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决议决定：一方面派出代表前往总工会表达歉意，并声明此事是少数反动分子所为，不代表武汉军校的立场，慰问并欢送被捕的工友回到江岸，对受伤工友慰劳并给予抚恤费；另一方面组织审查委员会复查各反动学生的反动事实，未判决前扣留一切反动分子，组织审查委员会调查并惩办肇事者，开除他们的党籍学籍，发表宣言声明此次事件的原委，致电蒋介石要求澄清误会。

武汉军校这次对反动分子的查办，随即发展成了一次清党运动。4月9日，武汉军校公布处分决定，共计开除党籍学籍通缉归案的十三人，开除党籍学籍撤销职务拘留并告知部队官署不得任用的十五人，开除党籍学籍的十八人，停止党籍记过的八人，留党察看三个月的二十二人，警告及解除党内职务的三十八人，由公安局依法审讯的一人，由学校警告的有两人。

这次清党运动惩治了少数的反动分子，沉重打击了右派势力，巩固了武汉军校的革命堡垒地位，军校内的革命氛围异常浓厚，真可谓大快人心。且由于处置妥当及时，包括工人在内的革命民众与武汉军校的关系不但没有受到坏的影响，反而更加亲密了。

然而，一次清党运动真的就能把军校内的反动分子全部清除干净吗？一位军校学生发表的《谨防变态的反革命派》一文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文



武汉军校政治部主办的《革命生活》日刊



章指出，军校半个月没有出现反动分子的原因在于反动分子们吸取了上次逮捕工人事件的失败教训，转而改变策略了，他们伪装成革命派，偷偷摸摸地在暗地里继续策划和实施着反革命的行为。这篇文章提醒人们要时刻留心伪装起来的反革命。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军校果断对右派势力发起新的攻势，军校召开联席会议向国民党中央呈请将一批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并通缉。之后，又于4月22日、4月28日、5月3日陆续开除十几个反动学生的学籍。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和武汉军校的清党运动，使军校师生队伍发生了奇异的双向流动现象。一部分国民党右派分子和立场亲蒋的学生离开武汉军校投奔蒋介石，而各地逃亡来武汉的革命者却纷纷进入武汉军校。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由此成为革命者和进步势力聚集的大本营，军校师生也被国民党右派恶毒咒骂为“赤子赤孙”。

不爱红装爱武装

1926年冬天，武昌斗级营胡同热闹异常，人们在公告栏前议论纷纷，这里传出了一则爆炸性的新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要招收女生！

妇女当兵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妇女一直被认为只能在家相夫教子，她们柔弱的肩膀不能扛起保护家园的枪炮。妇女上正规军事学校，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仅在中国史无前例，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武汉军校此次招生，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女兵。红极一时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不仅因为革命性、战斗性、纪律性强而政治上“红”，这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生队，更是为这所“党纪似铁、军令如山”的学校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线。

武汉军校原计划招收女学生100人，但因为各地来报考的女青年太多，竞争太过激烈，校方最后录取195人，实际入学213人。

在开学典礼上，213名女生穿着与男生一样的深灰色军装，戴着军帽，打着绑腿，与男生队并肩站立。从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到肩扛钢枪的女兵，

这一转变不可谓不大。

女兵们的生活极有规律，每天早晨军号一响，10分钟之内要马上起床、穿衣、梳洗，叠被子，然后到操场进行操练。操练之后是上课，紧凑的课程之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紧接着到饭堂吃午饭，这些平时习惯了细嚼慢咽的女兵们来到这里都学会了狼吞虎咽，因为在军校只要队长吃完饭，筷子一放，学员们必须全体起立，没有吃完饭的就要受到批评。下午继续上课，到晚上9点半就寝。女兵们的一天忙碌而充实。

女兵们都是追求男女平等的觉醒女性，她们不接受任何特殊照顾。军校的训练十分艰苦，为了照顾女生，军校发给女生一人一个印着字母W的红袖章，W是英文单词woman的简写，当女生来了例假，只要戴上袖章就可以不出操。但是女生们坚决不戴，她们表示要和男的一样不怕累、不怕苦、不怕死，她们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在这批女生中，有4位后来经常被提及，人称“黄埔四女杰”。她们分别是胡筠、赵一曼、游曦和胡兰畦。

胡筠，出身于一个小康人家，曾嫁给地主的儿子为妻。五四运动之后，受到新思想的洗礼，她冲破封建家庭罗网投身革命。在革命浪潮中，她坚持斗争，表现突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军校学习和参加反击夏斗寅叛军的战斗之后，她被派回平江从事武装斗争，成立了游击队，在幕阜山一带打土豪、分田地，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后与地主家庭彻底决裂。她曾任平江游击司令部总指挥，打击敌人，保护群众，被彭德怀称为“难得的女将”。1934年被错误杀害，后来平反昭雪，被迫认为革命烈士。

赵一曼，原名李淑宁，出身于一个封建地



女生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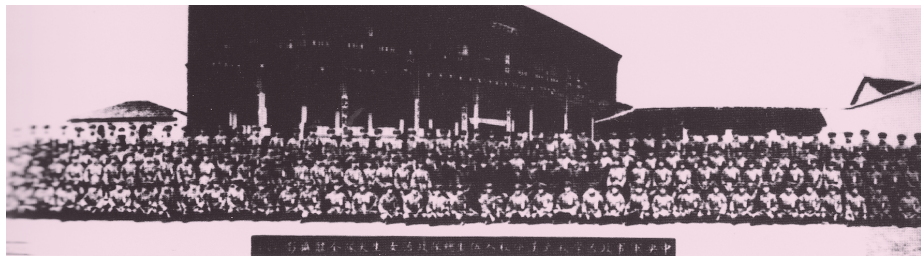
赵一曼

主家庭，她在读书时就先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之后又进入武汉军校学习。她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秘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被调到东北在沈阳工厂中领导工人斗争。她兼任东北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穿着红棉衣，手持双枪，骑着白马，被日军称为“密林之王”。在受

伤被俘后，面对日本人的酷刑，她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31岁。

游曦，出身于一个穷苦的家庭，家里耗尽积蓄送她去上了学。游曦在学校里接受了进步思想，带头闹学潮，支持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了共产党，成为重庆妇联的宣传主任。在武汉军校学习之后，她跟随叶挺率领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前往了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由于跟总指挥失去联系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女兵们坚守街垒两天两夜，游曦在子弹射尽之后第一个冲上去与敌人拼刺刀，最终因敌众我寡壮烈牺牲，年仅19岁。

胡兰畦，1901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北门内酱园公馆街，家庭环境优越，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从成都毓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川南师范学校读书，在教务长恽代英的影响下加入在泸州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3年发起组织四川妇女联合会，并参与筹备川南女界联合会、成都



武汉军校女生队合影

妇女工会等活动。1930年，她在欧洲考察社会救济事业，结识了宋庆龄、何香凝，并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外漂泊了多年后回到上海，于1937年成立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做宣传鼓动和战地救护工作，作为战地服务团团长，被国民党当局授予少将军衔，她利用这个特殊的身份，为共产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红色将星摇篮

武汉军校的师生中，也有不少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杰出军事领导人才。

开国元帅陈毅和徐向前都曾经在武汉军校工作过。

陈毅来到武汉分校的经历十分曲折，他曾经受党派遣在四川合川川军第三师陈书农部任组织科长，以此作掩护从事兵运工作。1927年4月2日，国民党右派、合川驻军代理师长王学姜打算杀害陈毅，于是陈毅连夜离开，经铜梁、璧山、重庆辗转到达武汉。他找到湖北省委组织部，但组织部的同志不认识他，让他到叶挺部队当兵，之后陈毅在街上偶遇中央军委的颜昌颐，五月，中共中央军委分配陈毅到武汉军校做党的工作，以准尉文书的身份作掩护，实际上负责武汉分校党的工作，和政治总教官恽代英、政治部主任施存统一起组成军校党团。之后参加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立下卓著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外交部长等职务，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作为黄埔一期毕业生，徐向前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政治上受到周恩来、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影响，以共产党员蒋先云作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参加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并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与国民党



陈毅



徐向前

右派分子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多次开展斗争。

在军事上，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理论知识 and 技能，接受严格正规的军事训练，形成了较高的军事素养，为日后领导军事工作、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先后参加过平定商团叛乱、东征讨伐陈炯明、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等战斗，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他被派遣到国民军第2军第6混成旅，先后担任过教导营教官、参谋、副团长等职务。

在这支旧军队中，徐向前对旧军队骄奢腐败以及军阀混战给国家、人民带来的痛苦有了直接感受和深刻认识，于是他离开国民军回到家乡。当他听说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武汉的消息后，便辗转来到当时国民革命中心武汉，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先在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不久又被分配到武汉军校一队任少校长。由于他军事知识丰富，军政素质过硬，又有带兵和实战经验，因此深受学员们爱戴。

在武汉军校工作期间，徐向前受到共产党人影响和革命思想熏陶，结合他自身对军阀混战、国民党腐败等现实的亲身体会，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有了进一步深刻的认识，最终他坚定地选择了信仰共产主义，于1927年3月经樊炳星、杨德魁介绍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他终生为此奋斗。他率领军校学生参加西征，在实战中教学，击溃杨森叛军。大革命失败后，他放弃军队中优渥待遇，脱离张发奎部队回到武汉，在白色恐怖下四处寻找党的组织，随后辗转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被派往广州，领导工人赤卫队参加广州起义。此后戎马一生，为党和人民立下赫赫功勋，成为开国十大元帅之一。

许光达也是武汉军校学员的一名杰出代表。他1925年5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

后转到武汉军校学习。19岁的许光达在当时的“赤都”武汉接受了革命的洗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各界成立“反蒋委员会”，在武昌阅马场举行声势浩大的30余万人“讨蒋大会”，通过了《反蒋宣传大纲》《告黄埔军校各期全体同学书》等文告，许光达作为代表参加。5月夏斗寅发动叛乱，进攻武汉。



许光达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证书

武汉军校师生奉命组成中央独立师，由叶挺率领，讨伐夏斗寅。纸坊之役是许光达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他在战斗中负伤，也因作战勇敢获得了第一次嘉奖。1927年7月，许光达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炮兵营见习排长。南昌起义爆发后，他脱离了张发奎部队，主动从九江南下，沿途追赶，加入南昌起义军。此后他在党的领导下驰骋疆场，南征北战，为民族解放立下赫赫功勋，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罗瑞卿于1926年在四川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辗转来到武汉，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作为黄埔六期学生被编入政治第一大队第二队，完成了由青年学生到革命军人的转变，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1927年5月，罗瑞卿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进攻武汉的战斗。7月，赴南昌参加起义，行至九江，得知南昌起义已经撤退，遂返回武汉。

在土地革命时期，罗瑞卿曾参加开辟闽西苏区和龙岩、白沙等战斗。参加中央苏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反“围剿”，置生死于度外，因工作出色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在革命战争中，罗瑞卿出生入死，屡建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于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陈伯钧也是一名来自四川的青年学生，在武汉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为黄埔第六期第1大队学员。5月参加平定夏斗寅叛乱，他凭借英勇的作战表现在咸宁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



总指挥部教导团，开始了他戎马倥偬的一生。他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追击国民党军谭道源师，反击国民党军公秉藩师，攻坚克难取得胜利。在湘江战役中，陈伯钧率红十三师掩护整个方面军渡过湘江，在红军高级将领中获得了“铁屁股”的美誉。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从武汉军校走出的，还有徐彦刚、张赤男、张宗逊、杨至成、郭天民、程子华等一大批人民军队优秀将领。在这所有“红色黄埔”之称的军校中，中国共产党人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当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到来之时，这些红色火种点燃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星火，成为中共建军的骨干和栋梁，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了卓越功勋。

（朱蔚青）

“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1926年10月，经过40天血战和围困，北伐军终于攻占了武昌城。战斗的硝烟还未散尽，一位年轻军人来不及等城门完全打开，就翻过沙包堆成的工事，随先头部队抢先进城。他就是中共广东区军委特派员聂荣臻。他随北伐军从广州进军到达武汉，此时急于进城又是为什么呢？

军委迁汉 以变应变

原来，聂荣臻急着要进城，是要与城内的中共湖北省军委取得联系，建立军委办公场所。他进城后，发现城内到处乱哄哄的，还有散兵游勇在抢掠财物。聂荣臻多方寻找，终于找到湖北省军委，了解了城内情况。随后，他通过湖北省军委找到武昌城内一条名叫中和里的弄堂，这里没有居民，属于应该没收的军阀财产。于是，聂荣臻把整个巷子全部作了标记占据下来，把湖北省军委机关设在了这里。随后，他被党组织任命为湖北区委军委书记。不久，湖北省委、团省委都陆续进驻这里。独立团团长叶挺带着家眷也在此居住。中共中央军委迁到武汉后，这里又变成了中央军委办事处，负责对外接待联络和派遣军事干部。一时间，这个毫不起眼的普通弄堂成为将星云集之地。

在聂荣臻进入武昌城之前，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军事部主任的张国焘已被任命为中央驻汉代表，于1926年9月先行到达武汉，成为第一个到达武汉的中央领导成员和中央军事负责人。

此后，随着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武汉，中央军委成员和工作人员也陆续抵达武汉。第四届中央军委委员任弼时于1927年4月中旬来到武汉，但他在汉期间却主要从事共青团中央领导工作。5月下旬，留在上海应对四一二



周恩来

反革命政变的中央军委委员周恩来在处理完善后事宜之后，搭乘一艘英国商船到达武汉。中央军委另一委员王一飞及工作人员颜昌颐等人也于1927年5月前后来到武汉。至此，中央军委完成了由沪迁汉。

在汉期间，因工作繁忙，中央军委（军事部）成员变更频繁。1927年5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周恩来任军人部（军事部）部长，并参加政治局常委会会议。6月20日决定张国焘参加军事部部务会议。

6月24日决定彭湃为中央军委委员。6月30日决定顾顺章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仑为中央军委委员。在此前后，中央决定聂荣臻为军委委员，贺昌到军委工作。7月下旬，因周恩来被任命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赴南昌领导暴动，由军委委员王一飞代为参加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8月9日，新成立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因周恩来率南昌起义军正在南下途中，中央又决定由王一飞代理部务。8月底，王一飞离开武汉赴鄂北组织秋收暴动，不久又被派往长沙领导暴动。8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由罗亦农任中央军委代理部长。

在中央军委迁往武汉前后，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和时局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方针也发生了几次转变。起初，由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革命战争和掌握军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等把党的军事工作重点放在帮助国民革命军开展政治工作和做国民党上层的工作上，甚至要求在国民革命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的事”。因担心影响国共合作，中共中央也曾要求各地党组织对从事工运、农运的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军校”，且不允许在国民革命军中发展党组织，对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工农武装发展也加以限制。1926年12月，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关于军事问题仍然强调“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只对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作出决议，并没有提出扩大掌控正规军队问题没有抓住机会去设法掌握更多军队。因此，从北伐开始到1926年底约半年时间内，中共直接领导掌握的正规军队只有一个叶挺独立团。

从1926年底开始，在中共中央向武汉迁移过程中，党的军事工作方针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开始“采取了加强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的方针”。从1926年12月起着手在国民革命军部队中组建党支部，并提出从共产党员中为国民革命军培训指挥人员和造就中国军事工作干部等问题。1927年1月21日，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维经斯基在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中，就清楚地表明目前党在对军队的影响问题上的基本任务：一是掌握中下级指挥职务；二是明确提出我们在军队中的党的工作，改变过去不在国民革命军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做法，“决定转为通过军队中的共产党支部来开展工作”，采取吸收下级军官和士兵入党的方针；三是着手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工会招募工人入伍，通过农会招募农民入伍。这是党的军事工作方针在武汉发生的第一次转变。

此后，随着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接连发生，血的教训让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党内一些有识之士要求调整转变党的军事工作方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的第四天，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六人就从上海联名向武汉的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呼吁党中央以武力进行反击。然而，在共产国际影响下，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唐生智等所谓国民党“左派”身上，强调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在党和革命万分危急的关头，中共五大也没有将军事工作列入大会议程，没有形成军事问题决议，只是由陈独秀在大会报告中提出要改组旧军队，使旧军队革命化，不光是把共产党员派到军队中做政治工作，还要让大批工农加入军队，改变军队的社会成分，军官不能从地主阶级中选择。但这种军事方



针显然无法应对日益恶化的局势。

中共五大闭幕后，拥有丰富军事工作经验的周恩来从上海来到武汉，立刻被中央委以重任，列席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三天后周恩来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可在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此后，周恩来开始出席中央常委会议，不久又代理张国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从此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便在实际行动上开始加紧掌控、扩大受党领导和影响的军队，周恩来到达武汉主管中央军事部之后，这一进程进一步加快。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发出紧急指示，明确要求中共“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中共中央于6月1日收到这一指示后，尽管陈独秀认为它脱离实际无法执行，拒绝接受，但党内如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任弼时等领导人已经认识到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党内谋划独立建军呼声更加高涨。在此前后，党的军事工作方针再度发生转变。

1927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议》，决定“用派我们自己人参军的办法来扩大叶挺和陈嘉祐领导的部队，在六个月之内把他们的几个师扩大为几个军”。还决定利用第二军、第六军同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之间的矛盾，用派遣大量工会会员和农会会员进去的办法，把第二军和第六军掌握到我们手中。同时还主张弄到大量的武器，并且把它们分发到各个战略地点，把工人和农民组织所拥有的武器隐藏起来，等待第二次北伐攻占郑州后，联合第四军、第十一军回师南方，收复广东，东山再起。此外，5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十一次常委会议也决定在国民革命军中发展党团组织，在总政治部建立党团，以加强党在军队中的力量。中共中央这几项决策，标志着中共军事工作方针已开始转向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面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将革命力量保存下来成为当务之急。在如何保存革命力量，建立革命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等问题上，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张太雷等在这一时期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重要建议。1927

年6月，毛泽东在汉口接见由湖南逃亡来汉的工农干部，要求他们回去拿起武器：“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上山”的思想。在中央派遣毛泽东赴湖南担任省委书记后，他又在长沙、衡阳等地召集党组织负责人和工农武装骨干开会，明确要求：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

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烈呼吁党要建立自己掌握的革命军队，他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必须坚决地自觉地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

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则积极着手进行武装斗争准备。1927年6月17日和20日，周恩来两次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关于湖南暴动计划的报告，并派出了包括3名营长在内的10名军事干部前往湖南领导农军。后因共产国际代表犹豫和阻挠，这一计划未能实施。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张太雷按照整军经武、准备应变的指导思想，通过湖北省委明确提出“招兵”“募夫”“上山”和争取土著武装的策略。

在1927年7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保存农民武装的策略：一是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二是上山或者投入军队中去。他再三呼吁：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会后，毛泽东与蔡和森经过反复商议考虑，由蔡和森抱病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写信，提议中央及军事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这些重要建议虽然当时没有被中共中央完全接受，但对中共转变军事工作方针还是起到推动作用，并为随后中共独立建军、领导武装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这些党内有识之士推动下，“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逐步提上了中央议事日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曾开会讨论补充工农作为叶挺部队兵员；还肯定叶挺的第二十四师教导大队“可办”，认定其办得“成绩很好”，并决定设法为其解决经费问题。7月初，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将工农群

众“送入军队”作为党的军事主要任务，陈独秀也认为将工农送去当兵最好。从1927年5月下旬到7月初，党的军事工作方针在武汉完成了第二次转变，加快了掌控和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扩充革命武装力量的步伐。

1927年7月12日，按照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离开了中央最高领导岗位，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主持工作，中共党内主张独立建军开展武装斗争的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了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面对蒋介石的“清党”和汪精卫的“分共”，被国民党血腥屠杀逼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人，除了拿起武器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已是别无选择。因此，新的中央五人常委会迅速作出了举行南昌起义和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以及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三项重大决策。随后，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明确将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确定为全党的总方针。至此，党的军事工作方针在武汉完成了第三次转变，作出了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人民军队，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重大决策，开辟了中国革命新的道路。

叶挺独立团由一变五

武昌街道口洪山南麓，在车水马龙的武珞路大街旁边，有一座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北伐战争攻打武昌城牺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191位烈士。

第四军独立团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1925年11月，由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团、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及从黄埔军校抽调的部分人员，在广东肇庆编组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全团2000余人，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力量，由叶挺任团长。这支部队名义上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实际上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独立团内建立了中共支部，团部直属队和各营均建立党小组。上至团长叶挺，下到营长、连长、排长、班长，甚至战士，都有党员、团员作为骨干。它还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听从党的领导和指挥，是一支为理想信仰而战的军队。

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勇担北伐先锋重任，在不到4个月内，占攸县，克醴陵，攻长沙，扫平江，勇夺天险汀泗桥、贺胜桥，一路所向披靡，从广州一直打到武昌城下。在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独立团在共产党员、团长叶挺率领下，在枪林弹雨中架起云梯，奋勇攻城。第一营营长曹渊、一连连长莫奇标，三连连长高超等共产党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英勇牺牲，血染武昌城下。战后，独立团将牺牲的191名将士安葬在武昌城内洪山脚下的独立团烈士陵园中。

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屡建奇功。1927年1月，武汉人民赠给第四军一面刻有“铁军”字样的铁铸盾牌，“铁军”由此名扬天下。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各部队陆续开始扩编。叶挺所在的第四军扩编为两个军。12月23日，叶挺在武昌南湖宣誓就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独立团被改编为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团参谋长余增生、第一营营长符克振、第二营营长卢德铭（后为周子昆）、第三营营长蒙九龄均为中共党员，下层的连排长也大多为中共党员，中共依然直接领导掌握这一个团。

1927年春，因支持南昌战役，大批国民革命军从武汉调走。叶挺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继续贯彻为党培养锻炼军事干部的任务，在武汉组建新的部队，“由独立团调一批干部为骨干，组建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他亲赴广东、湖南，负责筹建第七十五团的工作。他收集留在广东、湖南的独立团伤病人员，组成了第七十五团的三个营，由中共党员孙一中担任第一营营长。还有一部分下级干部和新兵，是广东区委和湖南区委帮助解决的。后来中共党员张堂坤调任该团副团长，中共党员周子昆、蔡晴川分别接任第二营和第三营营长。这样，第七十五团的副团长、三个营长以及若干连排长均为中共党员，部队实际为中共掌控。因此，南昌起义前聂荣臻亲赴马回岭，向该团党支部书记、第一营长孙一中下达党的命令，孙一中、张堂坤、蔡晴川、周子昆等毫不迟疑地将七十五团三个营拉出来参加了南昌起义，同时行动的还有第七十四团参谋长、共产党员王尔琢与第七十四

团机枪连。

1927年3月，叶挺调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由于该师大多军官离职投蒋，因此等于重新组建。团长以上主要干部都由第四军兼第十一军军长张发奎任命。张发奎大胆启用共产党员，他在口述自传中说：“我钦佩共产党员的热忱与战斗精神。”“我只好提拔叶挺任二十四师师长，在围攻武昌之役后，他已立功扬名。”“周士第继叶挺任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长。我对周士第印象不错，他作战很勇敢。”此外，担任第七十二团团长的共产党员许继慎也因为英勇善战而得到张发奎重用。第七十二团副团长廖运泽、第一营营长宛旦平、第二营营长黄克健等也都是共产党员。

尽管如此，张发奎还是对中共党员有所戒备，他安排了第二十四师副师长方玮、参谋长黄庆藩及第七十团团长古勋铭、第七十一团团长欧震等亲信军官，甚至亲自过问营长一级军官的任命。第七十团的三个营长中，只有第一营营长董朗是共产党员，第七十一团也只有团参谋长刘明夏、第二营营长廖快虎是共产党员。据肖克回忆，第七十一团第一营和第三营的营长都是张发奎派来的。不过，这两个团的连、排下级军官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虽然这两个团的指挥权并不在共产党员手里，但因叶挺个人在第二十四师中威望很高，他按照中央军委的意图，每个周末在南湖师部和家中与第四军、第十一军中的团、营级共产党员碰一次头，分析部队的动态，研究布置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下级军官习惯对他绝对服从，不敢违抗。在平定夏斗寅叛乱前，第二十四师师部实际已由共产党人掌控，师参谋长徐光英、秘书长彭干臣、师政治部主任陈兴霖均为中共党员。第二十四师不少非中共军官也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党员同非党人员相处融洽，后来这些非党军官都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多数人作战表现还好”。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各地亲蒋势力纷纷响应，向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举起屠刀。这时，党交给叶挺二十四师一个新的任务，让他收容在两湖“清党”中幸免于难，历经千辛万苦逃到武汉的1000多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将他们保护起来，编成一个教导大队，培养他们

成为下级军事干部，以应党的急需。

叶挺接到任务后，高度重视教导大队的编组训练，通过大队长李树成、副大队长申朝宗，在该队推行编练四军独立团时采用过的“四操三讲”，以求适应形势，速学速成。为办好这个教导大队，叶挺和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等中央领导人相继来队向学员们报告政治形势。叶挺亲自上阵，常常检查学员们的起居内务、作风养成和各种操练。在党组织教育和叶挺严格要求下，这支由党、团员为骨干组成的新部队很快成为一支精锐的革命武装。

到1927年6月，叶挺独立团在武汉由一个团扩充发展到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团、七十一团、七十二团和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七十五团共5个团，再加上由共产党员蒋先云任团长的第十一军二十六师七十七团（蒋先云牺牲后团长由共产党员胡公冕接任）和由共产党员范萇任团长的第十一军十师三十团，在铁军中共产党人足足掌握了7个团和一个教导大队的兵力。这支在武汉崛起的红色铁军成为中共直接掌握的最为强大可靠的武装力量。

张云逸力荐卢德铭

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参谋处长张云逸经王志仁、廖乾五介绍在武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为了便于工作，张云逸一直未暴露身份，在北伐军中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张云逸后来回忆：“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34岁），在军中职位不低，薪俸也相当高，我是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才入党的”。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决定组建总指挥部警卫团，为掌握这支武装，党组织想推荐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参谋长、共产党员卢德铭担任团长，但张发奎不同意，因卢德铭不是广东人，他不愿让大权旁落。在这种情况下，党就把说服张发奎的任务交给了张云逸。

张云逸和张发奎是广东陆军小学堂的同学，两人长期在粤军和国民革命军中共事。在北伐战争中作为张发奎的下级，张云逸协助张发奎指挥战斗，

打了许多胜仗，张发奎对张云逸很信任，但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张云逸对张发奎晓以利害，说卢德铭虽是四川人，但毕业于黄埔军校二期，曾任叶挺独立团连长、营长、团参谋长，是一个带兵好手，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可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样一位作战勇敢，有勇有谋的军事人才，正是出任警卫团团长的最佳人选。如果只因他不是广东人而不任用，容易授人以柄。经张云逸一再力荐，张发奎最终任命共产党员卢德铭为警卫团团长。

卢德铭任警卫团团长后，在团里大量安置共产党员。这个团是一个加强团，有四个营。团长卢德铭，共产党员，黄埔二期毕业。参谋长韩浚，黄埔一期毕业，当时是共产党员。团指导员辛焕文，共产党员，北师大毕业。第一营营长宋文彬，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原是铁路工人。第二营营长李腾芳是国民党左派。第三营营长余洒度，共产党员，黄埔二期毕业。第四营营长黄巨川，保定军校毕业。除黄巨川是张发奎指派的以外，其余都是通过党组织介绍来的。团里连、排长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营、连的指导员几乎均为党内同志，全团士兵大多是经农协选送来的农民协会会员。另有一个 300 余人的学兵连，都是思想进步的大学、中学或高小毕业生。何长工、宛希先、何挺颖、伍中豪等人民军队将领都曾在警卫团任职。因此，这个团从上级军官到基层士兵，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倾向革命，具有浓厚“红色基因”，是党领导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与叶挺独立团性质相同。

1927 年 7 月 15 日，汪精卫集团公然叛变革命。张发奎一面跟随汪精卫“分共”，同时也参与“东征讨蒋”。

卢德铭指挥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也接到张发奎的命令随部东征。由于该团有一个半营的新兵刚从广东、湖南招收，正在运往武汉途中，卢德铭见形势恶化，想多为党聚集一些力量，便请求留守武汉，待接收新兵编组后再出发。张发奎同意了卢德铭的请求，还将宪兵营交给他统一指挥，同时接收宪兵营的新兵。

1927 年 7 月下旬，张发奎率部到达九江后，提出回师广东，不再继续东下。警卫团当时驻扎在武昌，正准备出发。8 月 2 日深夜，警卫团收到

两份电报：一个电报是张发奎从九江发来的，命令警卫团用船舶输送，到九江待命。另一个是共产党员周逸群从南昌发来的，电报说：“我们八一起义了，脱离了张发奎的部队。”卢德铭看完电报后，便把韩浚、辛焕文等找来共同研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对张发奎的电报不予理睬，迅速响应南昌起义，打出党的旗帜。为稳妥起见，警卫团决定派一个参谋立即出发，坐船到九江沿南浔路至南昌，同南昌起义方面取得联系，把响应南昌起义和向南昌行动的路线告诉起义大军，并希望他们在行进路线上来接应。



卢德铭

警卫团完成紧急集结后，迅速从武昌登船出发。由于事态紧急，卢德铭已经无法再等待补充的新兵营赶到。在出发前夕，警卫团却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临时收编了属于叶挺所部的第二十四师新兵营。

第二十四师新兵营是二十四师后方留守处在武昌新组建的一支部队。1927年6月，周恩来在武昌黄土坡二十四师留守处成立了新兵训练处，亲自委派中共党员陈树华为训练处负责人，打算“以两周时间将新兵训练到能作战，计划训练两个快速师。”具体训练计划是由张云逸核定实施的。后来由于政治形势急剧恶化，这一计划没有完成，只组建了一个新兵营。营长陈浩，连长黄瓚、伍中豪、金文生和副连长张宗逊、排长杨立三等都是共产党员，士兵主要由安源工人、湖南湖北因白色恐怖逃亡来武汉的工会、农会骨干和青年学生组成，不少人当时已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张宗逊就是其中之一。他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后，曾被分配到唐生智部队第八军三师九团二营担任政治指导员，七一五汪精卫“分共”后，由党组织重新分配到第二十四师新兵营任副连长。

在作出响应南昌起义决定的同时，卢德铭还让韩浚联系武汉中央军事政



治学校师生一致行动，以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双方约定共同乘船出发，开船后以吹号为联络信号，同时叮嘱军校方面要对南昌起义的消息绝对保密。

8月初的一个傍晚，警卫团以“东征讨蒋”为名乘船从武昌出发，同时东下的还有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改编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机警的卢德铭指挥警卫团中途巧施“金蝉脱壳”之计，没有去九江而是在湖北阳新黄颡口登陆，改道从陆路去南昌与起义军会合。他们等待教导团乘船来到时，按约定吹号联络，不料因长江中风急浪高，教导团没有听到号音，顺江流疾驶而下，结果到九江后被张发奎率部包围缴械。

警卫团在黄颡口登陆后，卢德铭经过侦察发现张发奎部两个团的兵力已沿江布防，严密封锁了去南昌的通道，遂接受韩浚建议，命令部队改道，沿武宁、靖安一线急行军直达南昌。部队经数日急行军，于8月8日到达靖安，休息一夜后开至南昌附近的奉新县城。

部队到达奉新后，卢德铭才知道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已于8月3日撤走，南昌又被张发奎部重兵占领。而此时，张发奎也得到卢德铭率部进抵奉新的情报，即令两个团的兵力向警卫团扑来，企图堵截围歼警卫团。

卢德铭深知部队已处在险境之中，必须及早撤离，问题是撤往何处？他盯住作战地图沉思，最终决定：“把部队拉到修水、铜鼓一带去，先休整部队，同时派人去找省委请求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修水、铜鼓为湘鄂赣三省交界之地，是“三不管”地区，且多崇山峻岭，回旋余地大，部队在此休整，既隐蔽又进退便利，辛焕文和韩浚一致赞同。他们立即集合部队，迅速撤离奉新，向修水前进。沿途还有不少青年农民军成员和一些起义失散人员找来，警卫团兵员得到补充。部队在经过武宁时，还遇到由余贲民所带的平江农军，也一同去修水再图发展。卢德铭又得悉在修水桃树港有一支由罗荣桓带领的通城、崇阳农军在活动，便派人去把他们接到了修水，改编为警卫团特务连，由罗荣桓任指导员。至此，这支隐蔽在青山绿水之间的红色武装已经蓄势待发，只等党的召唤。

为明确部队的下一步行动目标，卢德铭设法找到了湖南省委机关负责人夏曦，夏曦指示卢德铭去闽粤一带找南昌起义部队，说那里更需要军事

干部。卢德铭回到修水，指定由余洒度暂时掌握部队，他同辛焕文、韩浚前往武汉，找到了在武汉的党组织负责人向警予。向警予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要他们立即回去发动群众，协助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

卢德铭和辛焕文、韩浚遵照向警予的指示，带着向警予派给他们的6名青年干部踏上了归途。路上，为了安全起见，由辛焕文带着两个干部走在前面，韩浚带着两个干部走中间，卢德铭带着两个干部断后，分成3组拉开距离往回赶。当他们走到崇阳大沙坪时，走在前面的辛焕文组与敌县警备队遭遇，辛焕文不幸中弹牺牲，韩浚被匪兵抓住。两名干部冲出来后，找到断后的卢德铭，报告了出事的经过，卢德铭当即决定改变路线，带着4名干部离开了崇阳，很快回到了修水。

卢德铭回到部队后，立即向部队传达了党的指示，宣布成立两湖农军总指挥部，由他担任总指挥，并开始集结各地农军，准备整编。此时，毛泽东也已奉中央政治局指示来到了安源，主持召开了部署秋收起义的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正式建立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时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作为秋收起义的主力。

会后，毛泽东赶到铜鼓找到了卢德铭，同他商量秋收起义的具体军事行动计划。在秋收起义中，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在卢德铭的陪同下，毛泽东去修水检查了部队准备起义情况，并将部队进行了重新编组，将所有武装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4个团，警卫团编成第一团，成为秋收起义军主力。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

叶剑英暗护教导团

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组建成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也是党在武汉掌握的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组建于1926年底，是为北伐培养军事干部的一个基地。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任代理校长，恽代英任常务委员和政治部教官，实际主持军校工作，陈毅任该校中共党团负责人，军校内部有众多党员、团员，革命气氛极其浓厚。

随着汪精卫集团日益反共，国民党反动派把武汉军校师生称作“赤子赤孙”，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对此，军校的党组织采取了应急措施。党的领导人恽代英迅速离开了学校，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也离开武汉，一些已暴露的共产党员先后撤走，党的活动则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有许多拥蒋的学生跑往南京投奔蒋介石，仅剩下的第六期学生也是人心涣散。

就在汪精卫发动“分共”的当天，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突然下令军校师生到洪山进行野外演习。天还没亮，三千多名学生就向洪山进发，只带枪，不准带弹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竟然是一个罪恶阴谋。唐生智事先已密令其嫡系军长何键、李品仙、刘兴等率军埋伏，将军校师生包围在洪山之上，企图一举全歼。

就在军校师生大难临头，险遭围歼的紧急关头，中共秘密党员、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伸出了救援之手。他得知洪山演习与唐生智的阴谋后，即刻去找张发奎，劝他趁机解围，把军校这股武装力量收编过来以壮大第二方面军的力量。

叶剑英这个提议正中张发奎下怀。于是，张发奎亮出了“左派”领袖的招牌，亲自出马，向各方施加舆论压力，声色俱厉地宣称：“武汉中央军校是北伐的种子，这部分学生是属于我的，谁要向他们开枪，我就给他个厉害看看！”在解围后不久，张发奎宣布解散武汉军校，将师生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这支革命武装总算被保存下来了。

由军校改编的教导团还有许多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全团编成三个营，另有炮兵、工兵、辎重、警卫各一连，以及一个女生队。军校女生大队 300 多名同学在改编时，被迫遣散，但是有 30 多人坚持不走，被编入教导团。另外，还有以崔庸健为首的朝鲜学生 100 多人。教导团团长由第二方面军参谋长谢膺白兼任。全团的教育、行政均由国民党党部领导，但这个党部实际上为中共党组织所掌握，团党部执行委员和各连（队）执行委员多是中共党员。为了保护这支革命武装，叶剑英以第四军参谋长身份到教导团讲话，回答大家关心的时局问题，坚定大家的革命信心。

七月下旬，张发奎突然下达“东征讨蒋”命令。教导团离开两湖书院，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一道乘船顺江而下，当晚停在黄石港。八月初，满载教导团师生的船队在长江江面与警卫团失去联系，抵达九江后突然接到张发奎的命令：所有船只一律停泊江心，收缴船上所有武器。只见九江码头布满了部队，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对着船只架起了机关枪和大炮。教导团的师生们齐集船头，手持钢枪，决不示弱。双方对峙着，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傍晚，教导团党部最终作出决定，暂时交出子弹，保存革命力量。于是师生们只得整装持枪上岸，到一所大院落的广场上就地坐下。这时，张发奎宣布：国共分家了，我们这儿也分一下，共产党站一边，国民党站一边。他要求共产党员限期离开军队。

根据张发奎要求，作为教导团内中共党组织负责人的陈毅马上召集委员们开会，对党员们提出了三条办法：一是可以回家搞革命运动；二是连夜出发到南昌去找叶贺部队；三是未暴露身份的可以留下。大家认为陈毅的身份早已暴露，此刻太危险，让他立即离开团部转移到特务连去，让身为共产党员的连长肖劲掩护。陈毅到特务连连部后，连长肖劲说自己也太红，随时可能有危险。陈毅想来想去，感到不便于再留下去，于是连夜和肖劲两人化装离开，南下追赶南昌起义的队伍。他俩最终在临川附近追上了叶挺部队，陈毅被安排在第七十三团担任了团政治指导员。

此时已被解除武装的教导团仍未摆脱险境，许多学生怕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屠杀，而南昌起义军又已经南下，在形势险恶、前途渺茫之时，不少人纷纷离队。

这一切叶剑英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深知教导团是党掌握的重要武装力量，南昌起义后这支红色武装还没有暴露，无论如何不能叫敌人吃掉，也不能让它自己垮掉，要想方设法把它保存下来。于是，他利用机会几次来到教导团，找师生谈话，做了许多鼓励工作，安抚大家的情绪。

一天，他见到团长谢膺白，谈起教导团的问题。谢膺白满腹牢骚地抱怨：“这个教导团不好管，我早就不想兼这个团长了。”叶剑英立即顺水推舟：“你不当教导团长我来当，怎么样？”谢膺白早就想甩掉这个“烫手山芋”，



当即同意，于是叶剑英就去找张发奎。

这时，张发奎也在为教导团的事苦恼。他明知教导团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是难得的队伍，但又怕管理不好出乱子。叶剑英摸透他的矛盾心理，就劝他留下教导团，稳住军心，日后好派用场，并且告诉他谢膺白不愿再兼团长，表示自己愿意接替，来了个毛遂自荐。张发奎一听，满口答应了。

听到叶剑英要来当团长，焦急不安的学生们精神马上为之一振。上次洪山打野外，是叶剑英出面救了大家，此事教导团内已人人皆知。这次他来当团长，教导团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况下，肯定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得到了正式任命，叶剑英马上就到教导团内看望官兵。教导团师生一向关心政治，他们虽然不知道这个新任团长是共产党员，但都知道叶剑英是在江西放弃师长职务、通电反蒋的国民党左派将领，又是广东军队中著名儒将，大家对新团长都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叶剑英上任后，立刻召开大会小会，劝导大家安定下来，要干部带头坚守岗位，带好部队。根据新任团长要求，各营连干部都找学员们谈话，劝大家不要走，留下来形成一个集体，让反动派不容易对付我们。至于武器，叶团长会替我们要回来。如果单个跑出去，不仅很危险，就是一个人跑回家乡也难成什么大事。叶剑英还几次在大会上向官兵们发表讲演，使全团稳定情绪和树立信心。

为了把这支红色武装安全保存下来，同时也劝阻张发奎从背后追击南昌起义军，叶剑英再次主动向张发奎献上了一条“妙计”。他向张发奎分析说：叶、贺撤离南昌，势必南下广东。占据广东的李济深必不相容，肯定会派兵迎击，广州城随之空虚，这不正是我们南下广东，占领广州的大好时机吗？如果我军打着“援师讨逆”的旗号，直奔广州，这不比跟着叶、贺屁股打，弄得两败俱伤要好多了！

张发奎一听，觉得叶剑英的分析很有道理。南昌起义军虽然拉走了他的部队，但并没跟他张某人翻脸成仇。不如让共产党率领这支部队南下吸引李济深、黄绍竑主力，让他们斗个两败俱伤，自己乘虚而入，直取广州，

取而代之，控制广东政权。想到这里，张发奎决定采纳叶剑英的“妙计”，借口“追击叶、贺叛军”脱离武汉国民政府，南下广东。

鉴于张发奎要挥师南下广州，叶剑英考虑到这一路多有危险，教导团没有武器不行，他马上又找张发奎说：“还是发给他们一些武器吧。既然是军队，路上宿营站岗也得有支枪。”张发奎想了想，同意每个班发给三支步枪，可是又说每支枪只能给5发子弹。旁边的黄琪翔也帮忙说：“不能再少了，不然他们遇到土匪都没有办法。”

既然张发奎同意发还部分枪支弹药，叶剑英立即出面交涉，并向第四军通融了一下，把差不多半数的枪支要了回来，只是子弹给得不多。教导团总算有了部分武装自卫能力。

1927年8月8日，教导团随第四军部队乘火车进驻南昌。城内的朱培德正在大肆搜捕共产党，当他听说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就是原来的武汉中央军校学生，知道里面有好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后，马上找到张发奎，让他清共。张发奎再次动摇起来。叶剑英见情况危险，马上又去找张发奎说：“好不容易把这批学生安定下来，不要再变卦了。‘第二方面军教导团’这个牌子太红，外面都知道，不如把它改名为第四军教导团，归我们军的建制，这样不仅便于加强管束，还能缩小目标，缓和与朱培德的矛盾。”张发奎听了叶剑英的建议，马上同意，下令要教导团改名为“第四军教导团”，归于第四军建制。

9月中旬，教导团到达韶关，眼看广州就在望了。此时听说叶挺、贺龙部队已到了粤东潮汕一带，教导团的同志又兴奋起来，许多人摩拳擦掌，准备到广州以后就大干一场。可是教导团周围都是张发奎的嫡系部队，而且有意与教导团“插花”驻扎，防备森严。这一天，第三十六师师长许锐突然向教导团下令，称奉总指挥之命，在此地要收缴教导团的枪械武器。由于是第二次遇到这种事，加上南下途中经受了一系列磨难，教导团内官兵们虽然激愤，但大家毕竟比过去沉着多了。党部负责人、共产党员叶镛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多数人认为还是应该暂时忍耐，会议最后决定：每个共产党员立即找自己负责联系的对象，劝导大家抑制感情，再一次交



出武器。

这时，团内党的秘密组织也加紧进行思想教育，要求大家紧密团结，准备应变，谁也不要离队。教导团内 1300 多名官兵在历尽坎坷，几经考验后，更加沉着冷静地等待着新的革命时机到来。

教导团安定下来后，先期回到广州的叶剑英很快就与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黄锦晖取得了联系。叶剑英汇报了教导团的情况以及在广州暴动的设想，黄锦晖肯定了叶剑英前一段工作，同时代表省委交定了三项任务。

几天后，叶剑英又去了一次香港。在那里与叶剑英接头谈话的是刚刚在潮汕失败后渡海到达的恽代英。恽代英作为省委委员和原武汉中央军校的领导人，他非常关心教导团的命运，嘱咐叶剑英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支武装保护好，并设法让其进入广州。

得到了党的秘密指示，叶剑英回到广州后就找到了张发奎、黄琪翔。此时张发奎正在发愁，因为盘踞广州的李济深拿出 5 万元，想送老部下张发奎出洋。而野心勃勃的张发奎一心想取而代之，收了钱却不走人。黄琪翔正在建议张发奎以武力解决李济深和黄绍竑，一场国民党新军阀大战即将爆发。

叶剑英摸准了张、黄的心理，就提出是否可将教导团调进广州来打李济深。张发奎开始犹豫地说：“教导团是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丢出去可以炸别人，可是搞不好又会在手里炸了自己。”叶剑英则说：“如果要打李济深，你部下的多数军官和部队都是李济深的老部下，恐怕靠不住。恰恰教导团同李济深没有任何历史渊源，可以用来打先锋。”接着，叶剑英又一再表示教导团只要好好驾驭，完全靠得住。

经过一番劝说，张发奎、黄琪翔总算同意把教导团调入广州。考虑到自己屡屡为那些“赤子赤孙”说话，会引起张发奎怀疑，为避嫌起见，叶剑英主动提出辞去教导团团团长之职，专任第四军参谋长。

经过一番努力，教导团终于进驻广州，更换了新军服，而且发放了枪支弹药重新武装起来。这支再次武装起来的教导团，后来成为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的主要力量。

贺龙心向共产党

“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在旧军队里身居高位，但自从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后，便积极追求光明，一心向党。北伐战争时期，贺龙来到武汉，在这里经历了革命腥风血雨的考验，终于在南昌起义后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立下不朽功勋。

1926年春，身为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的贺龙闻知广州国民政府准备出兵北伐，立即派代表与广州政府联系。7月，广州国民政府任命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8月，贺龙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这时，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出以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长、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宣传队，来到贺龙部队，开展政治工作，受到贺龙和官兵们的热烈欢迎。贺龙就各种困惑虚心地向周逸群请教，周逸群的详细解答，使贺龙心里豁然开朗。第三天，贺龙约周逸群密谈，开门见山地提出：“我要参加共产党，你介绍我加入。”当时，中共中央规定，在国民革命军内部不准吸收高级军官入党，周逸群无权决定是否接受贺龙，只得告诉他：“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一到，一定会有人找你。”

贺龙诚恳地请求周逸群帮助改造部队，希望宣传队全体人员留在第一师工作，还希望广州方面从黄埔军校派一批人来。周逸群认为，革命形势高涨，各军都缺干部，广州方面不可能派人来。他建议贺龙开办政治讲习所，自己培养干部。是年9月，贺龙在部队创办政治讲习所，聘请周逸群担任政治讲习所第一任所长，并把大部分宣传队员留在第一师。应贺龙的要求，中共湖南区委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到一师工作。讲习所的政治教官和军事教官都是共产党员，贺龙经常亲自到讲习所和学员们一起听课，政治觉悟迅速提高。

1926年底宜昌战役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将贺龙部队编为独立第十五师，负责鄂西警备。1927年春，贺龙率部移师汉口。在赤都武汉，贺龙受党的影响，政治态度更加鲜明，成功抵制了各种诱惑，贺龙部队成为

党影响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在周逸群的支持下，贺龙在部队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安排了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使独立第十五师成为共产党倚重的武装。目睹赤都武汉的反帝浪潮，贺龙深有感触地说：“这才叫扬眉吐气。北伐军一到，老百姓就起来了，要求收回英租界。共产党鼓动民众还是很有办法的。英国人那么凶，还是给撵跑了。共产党有办法，中国人有骨气！”

2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对北伐军进行整编。北伐军中有的一个军扩编为两个军，而贺龙部非但没有扩编，反而还被限编为五个团。整编后，独立第十五师辖五个团，三个直属营，总兵力1.1万人。贺龙部不是唐生智和张发奎的嫡系，在北伐战争还在进行之时居然被裁减过半，贺龙对此心知肚明。另外，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左右两派的斗争在不断发展，并且已经影响到自己的部队。

贺龙部队虽被裁减，但在当时他手握重兵，仍是各方争相笼络的对象，蒋介石率先向他抛出了橄榄枝。1927年3月初，蒋介石秘密派遣秘书长李仲公来汉策动一批军事将领反对武汉国民政府，反对共产党。这一消息被周逸群提前侦知。

1927年3月12日（农历二月初九），贺龙在家中与亲眷好友相聚庆祝自己31岁生日。周逸群对贺龙说：“明天你会碰上一位客人，他是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公，他带了好多钱来。”贺龙问：“他来搞什么鬼名堂？”周逸群说：“像是专门来运动军队的。”贺龙说：“那你莫操心了，那些说客，我见得多了，有的是办法。”3月14日，李仲公拜访贺龙。3月15日，李仲公宴请汉口的军事将领，透露了蒋介石的意图，并约请贺龙当晚到秘书长严仁珊家打牌谈心。贺龙很明白“谈心”是什么意思，心中暗暗发笑。李仲公一到严仁珊家，贺龙就把他逮捕，押送到了唐生智的总指挥部。后经邓演达作保，唐生智才将他释放。

蒋介石并没有因为李仲公的碰壁而放弃拉拢贺龙。1927年4月，贺龙部队整装待发进行二次北伐前夕，突然发生闹饷事件。贺龙多年的老部下陈图南趁机献策，大胆告诉贺龙：“蒋介石坐镇南京，手握上海，兵多钱

多，就是缺少猛将良帅。南京方面表示，只要你在武汉举兵，事成之日，把你的师扩编成军，加委你为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把汉阳兵工厂交给你，还送你一笔丰厚的酬金。”贺龙不动声色地问陈图南：“事成之日，你有什么好处？”陈图南说，让他担任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和汉阳兵工厂厂长。

弄清了陈图南的意图，贺龙立刻把周逸群请来说：“患难之交遇到大是大非也要分道扬镳啊！”他把和陈图南的谈话内容详细说了一遍，然后说：“你向共产党中央报告，如何处理，我都照办。”周逸群激动地说：“云卿同志，我们感谢你！”同时，贺龙还告诉周逸群，据他的消息，驻长沙的许克祥可能叛变，请中共中央迅速通知湖南党组织早作准备。

周逸群很快向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也告诉了由共产党员吴德峰任局长的武汉市公安局。吴德峰派出武装在武汉大智门大陆旅馆逮捕了陈图南等人。后经过审讯，陈图南等被处以极刑。

在北伐军向河南进军过程中，反共“清党”的逆流愈演愈烈，在恶劣情势下，贺龙诚恳地对周逸群说：“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所有在我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放心大胆地继续工作。”

7月初，从河南北伐战场凯旋的贺龙在武汉见到了周恩来。得知贺龙一心向党，周恩来说：“疾风知劲草，我们对你是很钦佩的。”贺龙说：“钦佩不敢当，我一直追求能让工农大众过上好日子的政党。最后，我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最好的，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我就别无所求了。”周恩来说：“贺龙同志，我们当然是相信你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呢？”贺龙说：“我很清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帮王八蛋拼到底。”贺龙和周恩来的这次见面，奠定了他们之间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深厚友谊。

进入7月，武汉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汪精卫在撕下“左派”的假面具，暴露出镇压工农大众、背叛革命的反动嘴脸的同时，与蒋介石争权夺利，打出“东征讨蒋”的旗号，下令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率领包括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等在内的各部队，沿江而下，东征



讨伐蒋介石。

在革命危急关头，作为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坚决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他趁部队尚未离开武汉之际，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共产党人的措施。7月8日，贺龙派第二十军船只护送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少奇离开武汉。7月10日，贺龙接受中央军委的建议，将正在遭受迫害的鄂城、大冶等地武装工人纠察队秘密编入第二十军教导团。7月15日，贺龙派人在武汉三镇许多共产党机关和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上挂出第二十军旗帜，派兵站岗，阻止反动派搜捕，并将各地因遭迫害、处境危险而逃来武汉的共产党员300余人保护起来，其中不少人在第二十军担任了政治工作。

就在贺龙率领位于武昌崇福山街的第二十军军部准备出发离开武汉的前夕，7月9日，他突然收到了武汉国民政府送上的一份“大礼”：任命他的堂弟贺锦斋担任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贺龙本人兼任第二师师长。贺龙的上司、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还约贺龙第二天见面详谈，显然想进一步拉拢贺龙。不料贺龙收下了“大礼”，却没有赴约理睬唐生智，直接率部离开了武昌前往鄂城，从此踏上了跟着共产党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征程。

7月17日，贺龙在第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怒斥汪精卫的反动嘴脸，表达了革命到底的决心。在这风云变幻的时刻，作为北伐军高级将领而且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展现出超强的革命坚定性。

7月23日，贺龙率领第二十军以“东征讨蒋”的名义抵达九江。刚到九江，贺龙就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谭平山向贺龙透露了党准备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贺龙激动地说：“平山同志，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你这样重大的机密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贺龙的态度让在九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深受鼓舞，他们提议由贺龙率第二十军、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以及其他部队于28日在南昌集结，28日晚在南昌举事，随后他们派人请示在武汉的中共中央。

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领导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五

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也来拜会贺龙，通过各种套近乎的手段来动员贺龙靠拢汪精卫，参加反共，均未能说服贺龙，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紧接着，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从庐山发来电报，要归他指挥的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开会真假，剥夺贺龙、叶挺的兵权是真。

在千钧一发之时，得悉这一阴谋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中共秘密党员叶剑英连夜下山找到叶挺、贺龙，通知他们到九江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以划船赏景为掩护，共同商议对策。在甘棠湖的一个小划子上，叶剑英将他在山上听到的汪精卫、张发奎密谋要解除叶挺、贺龙兵权的消息和盘托出。经过商议，与会众人作出三项决定：一是不上庐山；二是不能接受张发奎调遣赴德安集中，部队立即开往牛行车站，乘火车去南昌；三是叶挺部队先行，贺龙部队紧随其后。

7月26日，叶、贺部队次第转移，沿南浔铁路线开往南昌。接着，张发奎数次电催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但二人已到南昌，拒不从命。27日，贺龙第二十军全部集中到南昌，军部驻在中华圣公会。到南昌后，贺龙立即同参加起义的共产党人李立三、谭平山、朱德、恽代英、刘伯承、吴玉章、徐特立、高语罕等碰面，磋商起义计划。有人主张南昌起义要争取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参加，贺龙表示反对，指出张发奎和汪精卫关系亲密，不会参加暴动。此时中共中央已确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前委决定于7月30日起义。

7月29日，汪精卫、孙科、朱培德与张发奎在庐山召开针对南昌形势的反共会议，命令贺龙、叶挺限期率部撤回九江，并在军中“清共”。由于中央代表张国焘于7月30日赶到南昌传达共产国际指示，阻挠拖延了起义的举行，直到7月31日，前敌委员会才最后下达起义命令。

7月31日，贺龙列席了前委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的会议，决定8月1日凌晨4时起义。不料，第二十军的一个副营长突然叛变，前委迅速将起义时间提前到凌晨2时。当天下午，贺龙召开第二十军营以上军官会议，传达前委决定，宣布作战命令。入夜，贺龙命令负责封锁道路、断绝交通



的部队进入战斗状态。他们颈上系着红布带，左臂扎着白毛巾，马灯、电筒上贴着红十字，口令是“河山统一”。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2万余人的革命武装在南昌发动起义，正式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画卷。起义胜利后南下途中，贺龙在周逸群、谭平山介绍下在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心向党的贺龙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陈 磊）

江城惊变

五月紧急指示与罗易泄密

1927年初夏的江城，天气已经有些燥热。一封绝密急电从莫斯科发给了此时正在武汉的苏联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共产国际首席驻华代表罗易以及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三人，这就是著名的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

此时，湖北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国革命中心的赤都武汉暗流滚动，杨森、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等人相继叛变，汪精卫集团也日趋右倾反动。

远在莫斯科，在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斯大林等人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仍然相信汪精卫还是左派，围绕他中国革命还有回旋余地。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开展农村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群众、发展国民党而坚决反对退出国民党、积极参加武汉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等项任务与政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结束的当天即5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发出了致鲍罗廷、罗易和柳克斯三人的密电。

“五月指示”在经济上坚决主张通过农会，从基层实际占领土地，并对手工业



罗易



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必要让步，强调“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在组织上应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同时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在军事上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5万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

“五月紧急指示”在总体原则与具体措施上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正确的，但共产国际要求“五月紧急指示”的贯彻执行，是以国共双方保持党内合作为前提，并且是在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领导下来进行，而当时汪精卫集团的反共倾向已经日益明显，通过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合作来执行这一指示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在收到指示后，鲍罗廷立刻抱怨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形势，唯一的办法就是暂缓执行这份指示，他致电莫斯科：“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而罗易虽然认为应该执行这个指示，却也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陈独秀担心执行这一指示会导致国共联合战线破裂。6月7日，在有鲍罗廷、罗易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无奈地说道：“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自成立（农民）部以来，局势非常严重。多数国民党领导人摇摆不定，他们不想听有关土地革命的任何意见。最好是非常巧妙地、小心谨慎地谈及这个问题。”“共产国际建议由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形势瞬息万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如何执行五月紧急指示的讨论也是意见不一。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蔡和森提出客观形势要求党必须采取进攻的策略，任弼时建议中央公开发表宣言向汪精卫等表明态度。但是会议最终通过罗易提出的两点建议：一是武汉全体工人总罢工，反抗国民政府纵容许克祥；二是发表反对朱培德、冯玉祥、许克祥的宣传大纲，要求罢免朱培德的职务，讨伐朱培德。鲍罗

廷得知这一计划后，极为生气，谭平山也认为罗易是“左派幼稚病”，要求取消原案。

6月15日根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情况，陈独秀再次致电共产国际：“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委婉地表示无法执行“五月紧急指示”。

眼看鲍罗廷、陈独秀等人不愿执行“五月紧急指示”，在汉的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罗易心中焦虑万分，但他却“病急乱投医”，犯下了一个重大历史错误。

罗易被汪精卫的左倾言论所迷惑，错误地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中国共产党人保持友好关系的人”。而且，汪精卫从欧洲回国途经莫斯科时，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都答应给他以全力支持，况且莫斯科的电报分明是要求共产党依靠武汉国民党执行那些具体的指示。因此，罗易想直接找汪精卫，依靠汪精卫来执行莫斯科的紧急指示。

在罗易的心目中，汪精卫此时正处在进退两难之际，是“站在正在下沉的民族民主革命船上一个绝望的悲剧人物”，他虽然已与右派进行了接触，但仍不甘心与共产党决裂。6月5日，罗易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竟私自将联共（布）中央的“五月指示”的电报副本送给汪精卫看。

汪精卫看到电报的副本后，惊出一身冷汗：“这些指示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实行，因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汪嘴上敷衍罗易“日后再说”，心里却打起了如何加快分共的算盘。罗易的泄密，使汪精卫找到了“分共”的借口，加快了背叛革命的步伐，“分共”阴霾已经笼罩江城。

汪精卫集团“分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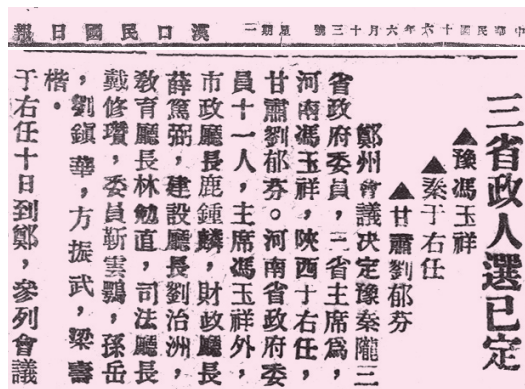
汪精卫读了电报副本后，非常吃惊，觉得“严重的时期已到了”，因此对罗易表示“这件事很重要，要交给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以后再说”。次日，汪精卫急匆匆赴河南参加郑州会议，与冯玉祥会谈。

冯玉祥于1926年9月自苏联回国后，在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帮助下，举行五原誓师，被推选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1927年出兵潼关，进攻河南，与北伐军形成南北夹攻北洋军阀之势。但随着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和国民党右派叛变活动加剧，冯玉祥受到反革命势力影响日益右倾动摇，开始不满意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对宁汉冲突，他始终认为是私人政见的分歧，一直站在中立的立场。宁汉分裂后，冯表示对双方不存薄厚之成见，并一直想在双方间充当调停人。

6月10日至12日，冯玉祥、汪精卫等在郑州举行会议，决定唐生智等部由河南撤回武汉，河南防务由冯玉祥军队担任；同时交换了对工农运动和共产党的意见。汪精卫集团想通过郑州会议联冯反蒋的目的并未达到，却与冯玉祥在压制工农运动和“分共”问题上达成了共识。6月20日至21日，蒋介石、冯玉祥等在徐州举行会议。会议主张宁汉双方应在共同反共的基础上继续北伐。冯玉祥完全倒向蒋介石，使蒋介石的地位大为增强，这就加大了对武汉政府的压力，促使汪精卫集团加快了反共的步伐。

郑州会议后，在河南的唐生智等部从前线撤回武汉，名义上是拱卫武汉政府，实际上是要控制局势，以便先发制人，镇压两湖工农运动和“制裁”共产党。虽然在此前后汉口召开的太平洋劳动大会和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所制造的革命气氛一时也振奋了人们的革命精神，但武汉的局势却是一天比一天紧张，汪精卫集团已由限共、抑共发展到要公开“分共”和反共了。

汪精卫放言要“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办法，并在7月14日夜召开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精心策划他们的反共计划。会议接受了汪精卫的“分共”主张，并决定将“分共”的议案提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



郑州会议决定

议通过，决定将《统一本党政策案》和《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实行。

7月15日，汪精卫冒天下之大不韪，召开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以“分共”为主旨的报告。汪精卫在会上宣读了共产国际5月紧急指示，并就其内容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借口共产国际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由下级没收地主的土地，违背了国民党关于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他指责共产国际提出要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多增加工农领袖”，“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他还攻击共产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的指示“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并诬蔑说，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就是“让国民党做刽子手”。

汪精卫声嘶力竭地诋毁“五月紧急指示”，把它说成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他提出对于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应有处置的办法，对于有违反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的共产党员应予以制裁；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国共应该分家了。

这次以“分共”为主旨的会议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规定：（1）凡名列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中有职务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2）在国民革命时期内，共产党员不得有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做共产党之工作。（3）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至此，汪精卫等人已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公开同共产党决裂。

在汪精卫授意下，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军事委员会亦随之发表训令，要求“各军长官务必于最短期间，查明所属军队中军事负责及政治工作各人员，其有共产党员已经知名者，分别切实劝导即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专心致志为本党忠实武装党员，否则即行停止职务。至于共产党之未知名者，应随时留心查察，禁止一切秘密会议，并考核其言论行动，如有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立予惩办，切勿瞻徇玩忽，以致酿成巨祸。”



至此，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于7月16日发表后，汪精卫等人凶相毕露，遂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于19日发表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对于本党厚诬丑诋，无所不至；并声称中共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这是共产党破坏党容共之最大表示”。接着，就气势汹汹地宣布说，共产党既宣布退出国民政府，而“国民革命军及各政府机关，都属于国民政府的系统，既然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

在摇唇鼓舌进行所谓“和平分共”后不久，汪精卫集团就同蒋介石集团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了极为残酷的逮捕和屠杀。

事实上，在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之前，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发布镇压工农运动的禁令，解除工人武装，解散农民协会。汪精卫集团正式宣布“分共”叛变革命时，还假惺惺地发布什么《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令》《关于农工政策令》，标榜所谓“和平分共”，实际上他们早已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两个月前，湖北乡村的白色恐怖就已经开始。据中共湖北省委统计：牺牲在反革命屠刀下的革命者“有五千七百四十人”，其中共产党人牺牲“在二百以上”。

7月13日，武汉卫戍司令部就在汉口新市场公开杀害中共硚口区委宣传部长宋继武，揭开了在中心城市武汉血淋淋大屠杀的序幕。此后，武汉三镇几乎每天都有共产党人和工会、农会干部被杀害。湖北省委在报告中说：“自此以后，几乎每日武汉三镇均有枪决共产党员的事。”

7月29日，汉口人力车夫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举行罢工和游行，惨遭反动军警镇压，当场被打死2人，打伤10余人。7月30日，武汉全市戒严，禁止开会和游行。

8月1日，汪精卫宣布对共产党员“应明正典刑”“下令讨伐贺龙、叶挺”。8月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杀气腾腾地宣布对共产党“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捉一个杀一个”“把他们一个个抓来枪毙”。8月初，

反动军警即开始在武汉街头不停地巡逻，以各种借口挨家挨户清查户口，便衣暗探在大街小巷盘查行人。与此同时，武汉国民党当局公然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武汉报纸报道的在刑场上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就有 100 多人，没有报道的或用其他方式杀害的更是不计其数。武汉三镇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据后来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从 1927 年 3 月到 1928 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31 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 26000 多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 6 万人锐减到 1 万多人。工会农会被查禁解散，工农运动遭到摧残。随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中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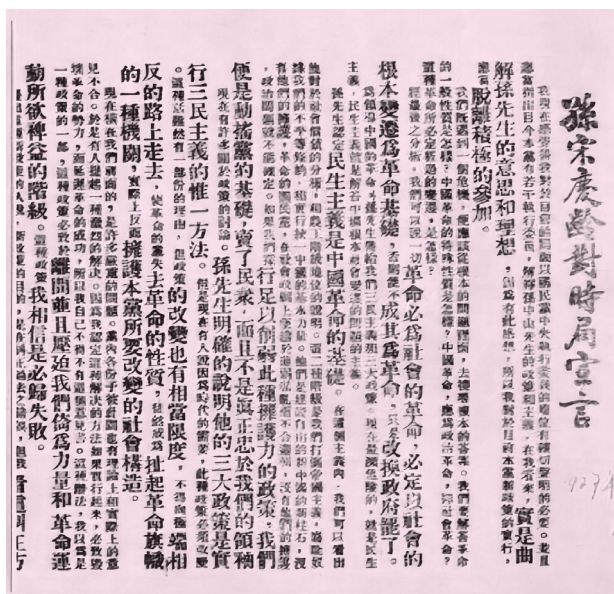
国民党左派反对“分共”

汪精卫反动集团的“分共”行动，遭到了国民党内少数真正的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7 月 14 日，宋庆龄见汪精卫“分共”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革命已面临失败，当晚奋笔疾书，写成《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于 18 日在汉口公开发表。

这是一篇痛斥反动派的檄文，这是一篇与反动势力决裂的檄文，这更是一篇坚决拥护和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政治宣言。

文章直言，“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党也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成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文章声明，“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背弃了孙中山领导群众和加强群众的政策”，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只有暂时隐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



宋庆龄声明

文章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

这篇充满浩然正气的声明，在宋庆龄的美国友人雷娜·普罗梅的帮助下，于7月18日发表在汉口英文版的《人民论坛报》及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上，中文稿则印成传单，遍贴在武汉的大街

小巷，并刊登于7月24日的《晨报》上。

孙中山亲密战友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要求汪精卫不要背信弃义，不得肆意残害留在武汉的共产党员及工农群众。在汪精卫进行大搜捕的日子里，何香凝挺身而出保护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分子。她甚至写信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说：“我是妇女部长，若认为妇女都是‘共党’和‘准共’。我是她们的头头，有事找我，不准为难她们！”她还派人送船票帮助在汉口的革命同志脱离虎口。

邓演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战友”。在革命即将流产的日子里坚定地捍卫三民主义，维护国共合作。6月下旬，邓演达曾两次登门向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进言，劝其坚持革命立场，不要动摇。汪精卫拒绝接受邓演达的劝告，要走反革命道路。邓演达打算抛开汪精卫等反动分子，与吴玉章、宋庆龄、彭泽民、陈友仁等酝酿改组国民党，组建革命行动委员会，继续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由于汪精卫的破坏，邓演达的计划没有成功。

这时，邓演达感到已无法挽回大革命失败的局面，于6月29日最后一次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6月30日，他毅然写了留别信《告别

中国国民党的同志》，在信中坚决反对歪曲和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谴责蒋介石屠杀农工群众的罪行，并且谴责汪精卫的反革命行径。

7月13日，邓演达公开发表《辞职宣言》，再次宣称：“中国革命之目的，在以三民主义为基础，而期完成农工政策。不意同志中有故意对此曲解者；有无视此旨而对农工阶级加以压迫者；有于倒蒋及实行北伐工作中，由中央执行委员中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者。”若按此发展下去，“则此次革命势将重蹈民国元年失败之覆辙。此殊与予素愿相违，故不得不辞职让贤”。《宣言》中还表示：“倘将来诸同志能翻然觉悟，遵奉先总理遗嘱，根据三民主义努力作真正之革命，则予仍当乐归从事，而与诸同志合作也。”

邓演达在怀着沉痛心情辞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后，化装成检修电线杆的工人秘密离开武汉，前往欧洲，开始他的流亡生活。临行前，他还给鲍罗廷、总政治部全体人员和总政治部编纂委员兼总务科长郭冠杰各留下一信，以表明其心迹，嘱咐其他同志继续坚持革命并给在广州遇害的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熊锐家属汇款。他还特地提醒在汉的共产党人：“希望 C.P. 注意汉口马日事变之来到。”“何键一定开刀无疑。”

谭平山、苏兆征愤然辞职

作为国共合作的标志之一，武汉国民政府于1927年3月增设了农政部和劳工部，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劳工部长，谭平山担任农政部长。

随着时局恶化，6月27日前后，谭平山、苏兆征先后向武汉国民政府递交了辞职书。谭平山以有病和政局复杂、不能使农运走上正轨为由辞职，离开了农政部。他在呈请病假书中说：“职能力薄弱本难胜任，又值时局紧张，农民运动，颇多非难，就职以来亟思有以改正，俾得趋于轨范，勉力从事，操劳过度，以致旧病复发，不能支持，拟即迁入医院，稍事修养。”苏兆征说自己未能为工人谋福利，不愿继续任职。

6月28日晚上，发生了武汉驻军非法强占并搜掠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

北省总工会的严重事件。苏兆征不顾危险，挺身而出，就这一非法行为向当局提出抗议，严正要求立即下令撤走军队。尽管后来军队撤走了，但整个武汉形势并未改变，苏兆征对此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当时正在武汉采访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就军队非法强占全国总工会一事征求苏兆征的看法。苏兆征冷静地回答说：“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办公，谁晓得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为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紧急疏散在汉党员干部，以多种途径进行妥善、周密安排。

苏兆征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与有关同志一起，紧张地部署应变的各项工作。当时，广东方面有不少干部、党员先后撤退至武汉，苏兆征及时妥善地安置了他们，据一位干部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和李仁华、古柏三人步行经江西上武汉，到汉口中华全国总工会找到苏兆征同志，他介绍我们住党中央两广区委会所主办的逃难同志招待所……后来便由中央军委派回东江。”6月间，一支由周其鉴等率领的农军500人从广东北江撤退至武汉，驻在徐家棚。谭延闿主张将这支部队“归并第四军”。张发奎则要将他们肢解补充第四军各部缺额。为了保存这支革命力量不受肢解吞并，



周其鉴

经过苏兆征的努力，决定将这支队伍暂编为陈家佑第13军所辖补充团。不久，这支队伍便开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成为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三师的一部分力量。

鉴于武汉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的迹象日益显著，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要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示威式地退出国民政府”。陈独秀并未将此事告诉苏兆征，只是简单地询问他：“形势如此，你意如何？”苏兆征回答说：“我要将已起草的《劳动法》提交国民政府讨论；国民政府必不能通过，我们发宣言，退出国

民政府，领导群众反抗。”

7月1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宣言，痛斥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行径，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持领导中国人民将革命坚持下去，宣言还声明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以示抗议。

苏兆征、谭平山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7月18日《向导》第201期发表《谭平山、苏兆征辞职书》，严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所作所为已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与扶助工农的革命政策，揭露他们的一系列反革命行径“使革命转入反革命的途径”，宣布辞去劳工部长和农政部长职务。

《辞职书》指出：共产党员之加入政府，即为国民党承认群众运动为国民革命中之伟大动力的表示，并以对抗南京政府所依赖之买办封建资产阶级。强调最近以来，“国民政府领域之内屠杀之事迭见不鲜，党部则被捣毁，工农团体及其自卫之武装则被解散”，“国民党中央委员之中，竟有人敢于与民众运动宣战，甚至与国民党历史上之革命的主义及政策宣战”，“共产党员同意加入政府之基础已经消失”，故“在此种状况之下退出政府”。并表示今后将继续遵循孙中山之革命遗训，为国民革命而努力奋斗。

在此关键时刻，谭平山受中共中央指派与李立三、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委员和军事干部赶赴九江，组织北伐军的一部分力量重返广东，继续革命。而苏兆征则在全国总工会内采取一系列紧急应变措施，及时将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干部转移到外地工作，同时当机立断地将劳工部门的10余万元存款全部取出，尽数送给武汉失业工人救济所，以免落入国民党反动派手中。

（芮 鹏）

五人临时中央临危受命

陈独秀离职隐身花楼街纸铺

七月的武汉，正值盛夏，位于汉口闹市区花楼街的亚东书局，来了一位年近半百、学者模样的客人，他进入书局后便不再露面。这位神秘的隐士，就是叱咤风云、名噪一时、连任五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

1927年7月5日，陈独秀参加了最后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当时急剧恶化的时局，共产国际自相矛盾的政策指示和日益增加的政治压力，以及党内对右倾妥协退让越来越多的批评指责，都让他感到心力交瘁。于是他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建议陈独秀和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被陈独秀拒绝。在愤懑和无奈之中，陈独秀索性提出了辞职。

7月中旬，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共被迫转入地下，陈独秀成为国民党当局悬赏1500元通缉的头号要犯。为逃避追捕，他扮作苦力与秘书黄玠然一同隐居在武昌一个偏僻的工人住宅区内，随后转移至花楼街一间由地

下党开办的纸铺。

这个名叫亚东书局的纸铺，是一个不太大的二层楼，楼下摆着一个柜台，柜台后面堆满各种纸张。为了掩护陈



汉口租界戒严情形

独秀等，纸铺“老板”汪源放把纸的价格标得特别贵，纯粹是为了将顾客吓跑，以求得门庭清静。

秘书黄玠然扮作纸铺伙计，每天坐在柜台里“照看生意”。此外，还请了一位农村妇女来做饭、打扫卫生。当着这位妇女的面，陈独秀和黄玠然两人几乎不打招呼不说话，她只知道楼上住着纸庄老板的熟人——一位从乡下来汉口养病的有钱人。陈独秀住在楼上，从不下楼，他的房间原是存放书籍的地方，里面摆放的许多图书很合陈的胃口。

陈独秀在这里隐居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发生了七一五“分共”。汉口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军警动辄戒严查户口，到处抓人。陈独秀终日沉默寡言，苦思冥想，黄玠然在楼下经常能听到他在楼上徘徊的脚步声。

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又该何去何从？陈独秀在号称火炉的武汉苦熬炎炎夏日，在苦闷中进行反思。过了些日子，陈独秀的情绪似乎稳定了些，开始不停地翻阅楼上的藏书，还研究起中国的文字改革。陈独秀在这里最苦恼的是与世隔绝，外面的情况、时局的变化一点都不清楚，像南昌起义这样重大的事件，也是在八七会议之后才知道的。他在这里既不可能订报纸，也不可能出去与人联络，就连纸庄老板汪源放也极少来纸庄。

黄玠然心里也很苦闷，也有许多解答不了的问题，很想同陈独秀谈一谈。有一天，他趁保姆不在，便上楼去向陈请教三个问题；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会落得这样的结局？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今后应该怎样去做？陈独秀听完黄玠然的话，凝视了对方许久，最后露出一丝苦笑，却未讲一句话。

中央机关“打游击”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彻底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江城，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从7月中旬开始，中央机关各部门相继迁移办公地点，在武汉三镇“打游击”，中央领导人和身份公开了的共产党员陆续更换住所，继续领导挽救革命的斗争。

当时，中央机关在武汉的“阵地”有几处。

一是汉口四民街 61 号。这是中央常委会和秘书厅迁汉后的第一个办公处，在此办公的时间是 1927 年 4 月中下旬至 6 月下旬。陈独秀来到武汉后，中共中央秘书厅和他的办公室即设在汉口四民街 61 号（今胜利街 165-167 号）。这里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办公的地方，它是中共中央最高机关所在地，部分党中央领导人在此居住和办公。当年党内的同志们亲切地称之为“61 号”。“61 号”因此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代名词。中央常委会议在这里召开，一些重大决策在这里作出，许多重要人事安排在这里决定。

四民街 61 号是栋中西结合式的三层居民住宅楼砖木结构，红墙赤瓦。这里有一栋主楼，一栋副楼，均为三层，中央秘书厅和中宣部有一个时期均在此办公。当时设在这里的有文书处、警卫处、发行处、财务处等办公机构。一楼是警卫室，住着七八个中央特科的警卫人员；二楼较大的房间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室；陈独秀、蔡和森居住在三楼；彭述之、王若飞、陈乔年等居住在二楼，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邓中夏、刘少奇、李立三、李维汉等党的领导人曾在此开会或居住，从事革命活动。

在“61 号”的背后还有一栋楼，也是三层，建筑风格与“61 号”一样，当年中共中央的图书馆设在这栋楼内，中共中央秘书厅和中宣部的部分工作人员在此居住和办公。后来，中宣部人员增加，规模扩大，房屋不够用，就搬走了。



汉口四民街 61 号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现胜利街 163-165 号）

在中共中央机关的东侧是一栋三层西式洋楼，此房原为英商怡和洋行高级职员公寓，为三层砖木结构的西式近代住宅（另地下一层），主立面为非对称式，左侧平展，中部为八方形，右侧退后，设有二十多

级半圆形室外楼梯。外墙一段是麻石，转角为清水墙，后部外墙为水泥拉毛墙到顶，前有小型院落，红瓦多坡房顶造型别致。1926年后成为我国著名矿业冶金专家王宠佑的公寓。当年在中共中央机关与王宠佑公寓中间的巷道里停放着中共中央工作用的小汽车。

历尽人间沧桑，汉口四民街61号原址房屋得以保存下来，1988年12月25日被列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3月，市委、市政府决定依托旧址筹建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2016年9月30日，武汉中共中央旧址纪念馆建成并开放。

二是武昌啸楼巷。啸楼巷在武昌粮道街胭脂山，这里原是湖北省委机关所在地。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武昌建立中央常委会和秘书厅办公机关，并派蔡和森于当晚到武昌；蔡和森在武昌布置好机关后，29日黄昏陈独秀、张国焘和瞿秋白等就迁至武昌办公。6月30日，中央常委会讨论常务委员会、秘书厅办公地点及负责人问题，决定办公地点：7月3日以前在1号办公，4日迁入啸楼巷4号。

此后，为应对日益恶化的形势，周恩来和张国焘一起主持党的机关和党员的紧急撤离和隐蔽工作。在武昌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撤退部署的报告后，迅速将党的各级组织转入地下，并把聚集在武汉的共产党员派往各地，掌握工农武装力量，以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还将从事军事工作的中共党员集中到南昌、九江一带，做联张（发奎）返粤的准备工作。

三是汉口德林公寓。德林公寓坐落在武汉市江岸区天津路和合作路的交会处，是一幢四层楼的欧式风格建筑。该公寓1925年由华侨王光投资兴建，结构为3层正楼和一层气楼，共有5个单元，底层为商店，上层为公寓，是当时英租界内最豪华气派的高档公寓之一。汉口英租界在1927年由国民政府正式收回后，被设为外交部汉口第三特别区。由于是“特区”，国民党的势力还未延伸至此，因此比较安全，离当时设在胜利街的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也较近。

1927年7月上旬，中央常委会和秘书厅从武昌搬回汉口。由于党的活动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之前住在余记里中央军委机关的周恩来和夫人邓



汉口德林公寓（现天津路 12 号）

颖超秘密搬入德林公寓隐蔽。随后，瞿秋白、李维汉和党中央秘书邓小平等也陆续搬迁至此居住。德林公寓因此成为中央常委会开会地点，也是中央秘书厅的办公处。

在德林公寓办公期间，周恩来白天奔波于长江两

岸，晚上回到公寓后继续为建立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而紧张工作，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一些准备工作也是在这里进行的。党中央作出南昌起义决策后，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就是从这座公寓出发，秘密乘船东下，经九江赶往南昌领导起义。

八七会议前夕，瞿秋白在这里冒着酷暑，连夜翻译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准备会议文件。时至今日，德林公寓一楼还有一块武汉市人民政府于 1983 年设立牌子，写明此处是“1927 年中共领导人驻地”。

四是武昌三道街。中共中央也曾短期在武昌三道街 1 号和 11 号驻留。此外，据中央有关文献记载，中央也曾于 6 月 27 日决定将中央机关集中到汉口文华里、辅义里。

“五人常委”做出三大决策

“五人常委”是在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时期，党中央经历第一次大改组后形成的过渡性领导集体，也是党的历史上存在时间最短的一个领导集体。但这个新组建的年轻领导集体，在它存在的短短二十七天里，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为挽救中国革命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1927 年 7 月 12 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鲍罗廷主持下，中共中央

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会议。中央决定让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未让他参加会议。陈独秀拒不服从这一决定，向党中央提出了辞职要求，从此离开了中央最高领导岗位。会议遵照共产国际指示，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

7月13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成立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正式发表了义正词严、令人荡气回肠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一扫过去妥协退让之风，严厉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背叛孙中山的主义和政策，指出他们不实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拒绝公布土地问题决议；限制工农运动，放任反动派自由地进攻革命，致使反动军官进攻民众运动的反动运动陆续掀起，造成“工农的血流遍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消灭”。

《政局宣言》明确指出：“最近几月的政局，使中国一切人民大大的失望。”“国民党的许多领袖消极动摇犹豫得不堪言状”，“其结果，使反革命在武汉首都，也筑下巩固的基础。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和政策”，“国民革命将陷入湮灭”，“使武汉同化于南京”。使旧军阀统治一变而为“新式军阀伪国民党之统治”。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政局宣言》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这个宣言公开揭露了国民党从动摇到反动的过程，宣布共产党人退出国民政府，不与镇压工农的反动政权同流合污。这实际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新政策的开始，



李立三



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作用。

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颁布《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目前形势的决定》，指示中共党员宣布立即退出武汉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开展土地革命，有系统地武装工人和农民等等。“七月指示”内容虽然有不彻底性，但标志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转变。改组后由五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临危受命，毅然肩负起领导全党应对生死存亡危机的重任。随着中共党内主张独立建军开展武装斗争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中共中央初步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为挽救中国革命作出了三项重大决策。

第一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将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决定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干部前往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中的一部分力量，重回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老军阀。中央还决定由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任书记，提前先去九江，通知党内同志做好起义准备。

随后，因军事形势变化，敌情紧急，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举行谈话会商议后，建议中央改变原定的“依张返粤”计划，抛弃依赖张发奎的政策，采取独立军事行动，与贺龙第二十军一致行动，在南昌实行暴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这一建议征得在庐山的瞿秋白等人同意后，由瞿秋白连夜返回武汉向中央临时常委会汇报。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与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讨论后，同意了这一建议，最终确定了南昌起义的计划和行动方案，派周恩来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与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共同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发动南昌起义。

第二是独立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这是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后至七月下旬这段时间里决定的。根据这一决定，中央草拟好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草案。随后中央农民部还根据《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草案，为中央草拟

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8月3日，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发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明确要求四省组织秋收暴动，并规定了秋收暴动的战略，还成立由夏曦、郭亮、毛泽东、任卓宜组成的湘南特委，毛泽东为书记。

第三是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革命运动的方针和政策。中央紧急会议原来准备在7月28日举行，并由瞿秋白、张太雷和李维汉与国际代表一起进行筹备。但由于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交通困难，28日未能集会。直到8月7日，出席会议的人仍不能到齐，中央委员到了不过半数，各地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的新任书记邓中夏。在这种情况下，便只有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人开会。因此这次会议既不叫中央全会，也不叫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是叫中央紧急会议。

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做出的这三大决策，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发挥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

筹备建军一波三折

从蒋介石武力清党，到汪精卫所谓“和平分共”，被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逼入绝境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从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提出中共要“建立自己可靠的军队”以后，党内要求独立建军开展武装斗争的呼声日益高涨，建军已是刻不容缓。对此，毛泽东形容说：“我们是被逼上梁山。”直到几十年后，他在接见外宾时回首往事，还感慨万端地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

1927年7月一个闷热的夏日，位于汉口贯中里的暂编第十五军副军长黄慕颜家中忽然来了几位客人。这几位客人的身份都非同寻常，其中有中

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曾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吴玉章、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以及被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礼送出境”来到武汉的朱德。这个将星云集的秘密聚会，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中共究竟应该在哪里建军与举行武装起义。

关于起义地点，贺龙、叶挺最初曾提议在武汉发动兵变。但周恩来经过考虑，认为在武汉暴动行不通。因为武汉无险可守，武昌虽然有叶挺部队，但汉口方面何健、李品仙部队力量也很强，暴动并无获胜把握。

在这次会议上，暂编第十五军副军长黄慕颜主张把党掌握的武装退回四川，东山再起，再搞武装起义。但刘伯承、朱德认为，四川形势险恶，再谋发展很困难。武汉形势紧张，搞不好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周恩来也认为武汉不可久留，目前有东征讨蒋和南下广东两种选择。四川形势险恶，封建军阀力量强大，日益反动，怎么可能依赖要打倒的对象来发展革命力量？不如在湘、鄂、赣一带动员群众，凭借党能控制的军队做一番举动。朱德则提出可以到江西发展革命力量。

经过精心酝酿，加上1927年7月中旬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初步决定，利用武汉国民政府“东征讨蒋”之机，以党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北伐军为基本力量，联合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再举行第二次北伐，这就是被称为“依张返粤”的计划。

为此，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特派常委李立三率领秘书长邓中夏、中央军委参谋长聂荣臻先行去九江筹划其事。其时，由共产党员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接受共产党影响的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等部队，以及拟议联合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所部，均驻扎在南昌和九江铁路沿线。

不料，李立三等人到九江后发现，张发奎已深受汪精卫影响，不仅公开支持汪精卫“分共”，并且要求在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于是他们与在九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商议对策。

1927年7月20日，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聂荣臻、叶挺等齐聚在叶挺第24师师部，秘密举行谈话会。鉴于张发奎已经倒向汪精卫集团，要求叶挺等共产党人离开军队或脱离共产党，并准备在军队中“清党”，显然中央原定的争取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参加起义，重返广东建立根据地已经不可能实现。经过讨论，他们决定向中央提议：“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聂荣臻

绰号“坦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性格刚烈急躁，在九江谈话会上见大家意见一致，都同意不依赖张发奎，独立举行南昌起义，便急不可耐地提议立即动手，举行起义。不料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却坚决不同意，说他来九江之前，周恩来同志明明白白交代过，何时发难要等中央的命令。

李立三焦急地说：既然已经向部队传达了，起义工作已经组织了，下个命令就行了。当时也有几位同志表示赞同。而聂荣臻却坚持说要等中央命令。李立三一气之下，说：“你这是奴隶主义，胆小怕事。我是中央委员，你要听中央委员的。”聂荣臻反驳说：“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个中央委员的？就是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

经过一番争执，最后大家都同意先向中央提出建议，取得中央同意再行动。会后，李立三、邓中夏立即向正在庐山的鲍罗廷及瞿秋白、张太雷介绍了情况。瞿秋白、张太雷完全赞同。瞿秋白立即动身前去汉口，向中共中央汇报。

7月23日，谭平山前往位于江西九江的第二十军军部，争取贺龙参加暴动。贺龙热烈响应这一提议，当即表示武汉政府既然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那自己就要跟随中国共产党反蒋反汪，愿意听从党的指示率

部参加起义。

瞿秋白到达武汉转达九江谈话会意见后，中共中央采纳了李立三等人的建议，决定抛开张发奎，独立领导起义。7月24日或25日，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任命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具体领导这次起义。随后，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连夜秘密乘船离开武汉，前往南昌领导起义。出发前，严守党纪的周恩来连对妻子邓颖超都守口如瓶。对当时分别的情景，邓颖超一直记忆犹新，她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以南昌市中心的洗马池江西大旅社为起义指挥中心，并立即按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前委书记，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等为前委委员，筹划起义，并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了暴动的部署和时间。

几乎与此同时，张发奎根据汪精卫意见，妄图消灭叶挺、贺龙所部。他一面电令叶挺、贺龙所部集结德安待命，一面密谋以召集叶挺、贺龙到庐山开会名义，解除他们的兵权。时任张发奎所部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获悉后，以与叶挺、贺龙到九江市区甘棠湖游湖的名义，向叶、贺告知了张发奎的阴谋。贺龙、叶挺商定应对之策：不去庐山开会，不执行张发奎将部队集中德安的命令，部队立即向南昌开进。7月26日至27日，叶挺、贺龙率所部先后抵达南昌。

起义最初定为7月28日举行。但因部队刚刚抵达，准备工作来不及展开，所以7月27日，前委会议决定将起义时间改在7月30日。28日，周恩来当面向贺龙介绍了举行起义的计划，征求贺龙的意见，并任命贺龙为此次起义的总指挥。贺龙听了，感激万分，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党

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张发奎获知叶、贺部队动向后，在7月29日与汪精卫、朱培德等在庐山召开针对南昌形势的反共会议。他们决定严令贺龙、叶挺限期率部撤回九江；并决定在第二方面军中“清共”，逮捕在该军任职的共产党员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叶剑英立即把这些情况告知恽代英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连夜从庐山赶到南昌向前敌委员会报告情况。

正当起义箭在弦上之时，共产国际的一份来电又平添波折，险些使起义夭折。共产国际在电报中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指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

29日上午，张国焘从九江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先后给前敌委员会发来了两封密电说“暴动要慎重”。

7月30日，张国焘到达南昌，他向前敌委员会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后，强调：“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但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认为：“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由此，双方发生激烈的争论。周恩来还为此拍了桌子。20多年之后，周恩来在谈到南昌起义时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

李立三、谭平山等也十分气愤。李立三质问张国焘：“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重新讨论？”谭平山极为愤怒地大骂张国焘“混蛋”，说：“假使这次我们军中的同志还不够干，那么以前一切军事工作，都不算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周恩来也气愤地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罢。”

前敌委员会经过激烈讨论，终于否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举行起义。面对严峻的形势和前委会多数人的强烈要求，张国焘终于表示：鉴于南昌的实际情况，暴动计划不能改变，个人同意举行暴动，作为中央常委和周恩来负责向中央和共产国际说明。张国焘又以修改宣言为借口，



继续阻挠起义。谭平山本来要求午后改好，张国焘却拖延到了晚上。最后还是周恩来果断地表示：“宣言由我来改！”由于这一意外波折，原定30日起义的计划因此无法实施。31日，前委会议决定8月1日凌晨4时举行起义。

8月1日，起义的枪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诞生。

（芮 鹏）

八七会议力挽狂澜

“传教士”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1927年7月23日，两名高鼻深目的外国人来到汉口，当天就住进了黎黄陂路上的基督教青年会。乍一看，似乎是两个虔诚的神职人员“传播福音”来了，但实际上，这两个人是共产国际新派来的驻华代表和其助手，来传播的并不是基督教的教义，而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其中为首者名叫维萨里昂·罗明纳兹，格鲁吉亚人，联共（布）党员，来华前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另一位是诺伊曼，德国人，为罗明纳兹的助手，他曾参加过德国工人起义，与罗明纳兹一起来华，主要是为了协助中国共产党发起城市武装暴动，“以武装的革命对抗武装的反革命”。

早在一个多月前的6月下旬，汪精卫集团反共反革命的面目愈发明晰，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联共（布）于7月8日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并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发来指示信，要求“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最好是秘密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以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而就在罗明纳兹和诺伊曼抵汉前的一周，汪精卫集团发动七一五



罗明纳兹（左）与诺伊曼（右）

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完全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到处都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屠杀，很多地方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时间党内思想混乱、人心不安，仇恨、愤怒、伤心、困惑、迷茫等情绪交织，缠绕在每名党员心头。在这样的危急时刻，确实需要召开一场紧急会议来总结教训、纠正错误、打开局面、凝聚人心。

然而，紧急会议的筹备进行得并不顺利。罗明纳兹在到达汉口的第一天晚上就约见瞿秋白、张国焘等党的主要领导人，“态度异常严厉”地传达共产国际指示。7月26日，罗明纳兹召集瞿秋白、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等人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一是决定发动南昌起义，二是决定筹备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在此次会议上，对召开紧急会议的议题，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最主要是担心罗明纳兹要通过紧急会议贯彻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指示来清算党之前的错误并改组中央，会对党的威信造成负面影响。蔡和森后来对此分析说：“常委只知道接受国际训令，处罚中央及首领，将于党有危机，而不知不接受国际训令，不宣布新方针，于党及革命的危机更为重大。”为此，瞿秋白协助不通中文也不会讲汉语的罗明纳兹做了大量翻译和起草文件、草案等工作，将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决议精神和指示向党内作出传达，在较短时间内，“使中央经过一个散乱的状态”后，在思想上初步达成了共识和统一。

8月3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瞿秋白主持，李维汉、张太雷、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林育南、苏兆征等参会。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应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中央政治局应纠正之前的机会主义政策并改组。此次会议还确定了中央紧急会议的具体议程。

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秘密筹办会议

在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抵汉之前，一个操着浓重四川口音，名叫邓希贤的小个子年轻人也从西安坐闷罐车来到武汉。这位23岁略显稚嫩青年，

实际上是一名已有5年职业革命者经历的共产党员。邓希贤原本在冯玉祥部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不料冯于4月跟随蒋介石一起反共，将共产党员统统“礼送出境”。于是邓希贤来到武汉，由党组织安排任中共中央秘书。鉴于武汉的革命形势已明显恶化，为适应秘密工作需要，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从此开始，这个光辉的名字伴随了他的一生。

七一五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后，邓小平从武昌三道街搬到了汉口天津路的德林公寓（党中央领导人的秘密住所），和瞿秋白、李维汉等人住在一起，秘密地开展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经过周密考虑，最后会址选在了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这是一座英国人建造的中西结合式公寓楼，名为“怡和新房”，是苏联驻武汉国民政府农业顾问洛卓莫夫和夫人洛卓莫娃的住处。该公寓楼附近的住户外国人较多，还有一家名叫惠罗公司的洋行，专卖昂贵的高级消费品，中国人很少来买，街上往来行人也较少，对会议安全保卫工作有利。此外，该房屋后通小巷，屋顶的凉台也与邻家的凉台相连，一旦出现情况，也方便疏散撤离。据参会者陆定一回忆，由于武汉白色恐怖严重，为了以防万一，会议上还特地交代，如果有反动军警闯入，就说是开股东会会议。

在会议正式召开前3天，邓小平就进入会场开始做会务工作。他向代表们发出通知，并特地嘱咐熟悉汉口街道的代表自行前往，其他人则由交通员带入会场，对谁从前门进，谁从后门进，都专门做了安排。1980年，邓小平重返八七会议会址时回忆说：“李维汉是秘书长，会议代表有二十几个人，



八七会议会址

我是中央秘书……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三批进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打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小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

到8月7日，参会者们化装为商人、农民等不同身份，分批次全部进入会场。由于年代久远，后来邓小平、李维汉、陆定一等亲历者在回忆参会代表数量时都只能说出一个概数。通过现在珍藏在中央档案馆的“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才明确参会代表共21人，其中：

中央委员10名：罗迈（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候补中央委员3名：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中央监察委员2名：杨匏安、王荷波；

共青团中央委员3名：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代表1名：彭公达；

湖北代表1名：郑超麟；

中央军委代表1名：王一飞。

另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他的助手诺伊曼参加会议，中央秘书邓小平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按照罗明纳兹和中央常委最初的计划，应在7月28日召开。但因为时局紧张，各地反动当局盘查甚严，交通困难，加之会议准备工作和统一党内高层干部的认识都需要时间，只能延至8月7日。而且即便如此，到会的中央委员仍不足半数，地方党组织只有湖北、湖南代表参加，很多地方代表要么未收到开会通知，要么收到通知但无法成行或不能按时赶到，所以无法称为中央全会，只能称为中央紧急会议。

开会期间，所有人都要留在会场里不得离开。为了保密，尽管在盛夏时节天气闷热，但门窗全部关闭以防声音传出。中午休会时，代表们都在会场里吃房东莫卓洛娃准备的干粮。出于安全原因考虑，会议的时间很短，仅开一天。据陆定一回忆，散会时天还是亮的，但为了防止引人注目，每

半小时才出去一人。他离开会场时，太阳都没下山。但有些人是等到了第二天或第三天才走。

罗明纳兹的长篇大论与毛泽东的妙语连珠

会议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的李维汉主持并致开幕词。随后第一项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不满 30 岁的罗明纳兹善于辞令，侃侃而谈，他每说一段，就要停下来由瞿秋白翻译，因此这个报告耗时很长，占用了几乎整个上午的时间。罗明纳兹的报告重点有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严厉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右倾错误，指责“四月一直到七月底，党的指导都是照着改良主义去决定他的策略。他不但对小资产阶级即对反动的小资产阶级也有很大的让步，对国民党的让步，甚至失掉了我们党自己的独立性”，“拿中央的理论及实际来看，他简直是少数派（指孟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的，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党”。他重点批评了过去在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无原则妥协退让的机会主义路线，放弃革命领导权的表现和危害，还强调要加强党内民主生活和集体领导，“党的指导要集体化，不要族长化，党的问题要使群众知道。”

二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要实行土地革命。罗明纳兹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经验少，但“其他任何阶级却不能及它的力量之大”；中国资产阶级是非常薄弱的；中国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虽多，但没有独立政策，也无法领导革命，“农民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求得自身之解放”。他强调：“目前中国已进到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可以引中国革命到另一新的阶段。”他还承认中国共产党有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经验，认为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才能胜利。同时，他还肯定了武装斗争，说：“直到八月初南昌事变（八一南昌起义）起，于是才开始有一坚决的转机。如此，我们可以断定以后的情形一定与过去不同了，这是因为我们能坚决照革命路线上走。此次事变，我们多少有点武器。”

三是为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上的决策进行辩护。罗明纳兹强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遭到的挫折没有责任，责任是在于中国共产党贯彻落实共产国际的指示、训令不力。他声称：“国际无一天不打算将中国党的路线引上正轨的。过去最大的错误是中央未将国际的指导达到群众中去。”“国际有时自然也是有错误的，但我们相信他有许多争斗的经验，我们应诚意接受他的指令，不然必遭失败。”

罗明纳兹长篇大论的报告，全面批判了当时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入了土地革命的新时期，肯定了武装斗争。这个报告扫清了之前不断妥协退让造成严重后果给党内带来的阴霾，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下一个时期开展革命斗争的方向。不过，这个报告也存在明显瑕疵和不合实际之处。如报告竭力推卸共产国际应负的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责任，把右倾错误全盘归咎于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没有执行好共产国际指示和训令。事实上，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很多决策、指示和判断，同样也有不少失误。最明显的就是斯大林先是对蒋介石判断错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直认为蒋是可以拉住的“中派”；蒋叛变革命之后，斯大林又把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与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和1917年十月革命前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暂时得势的情况进行不恰当地类比，还寄希望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不断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拉住“国民党左派”。

尽管如此，罗明纳兹的报告在当时起到的正面作用还是主要的。会间休息结束后，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彭公达、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瞿秋白等先后发言讨论报告，都一致赞成报告中的主要论断，表达出明确支持的态度。会议记录显示，李维汉作为主持者，在大家热烈发表意见后，说“国际代表提议停止讨论。我意：1.过去党的指导错误问题大家同意；2.指导机关改选大家也是同意。所以可以停止讨论，由国际代表作结论。”这充分说明，发言者们都认同这个报告对过去路线错误的批判和作出的结论，表达出了自己的心声和愿望。

在讨论阶段，在中共五大上曾饱受压抑而沉默寡言的毛泽东第一个发

言。他的发言比喻生动形象，批评深刻犀利、论述妙语连珠，成为整个会议的亮点和经典。

在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生动地比喻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批评了党把革命统一战线领导权拱手让给反动派的错误。

在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问题上，毛泽东痛批之前党内限制农民革命，且无视正确意见的错误，辛辣地指出：“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谈到军事问题，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就是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光辉论断的最早出处。

最后，毛泽东还提到了组织问题，建议“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这表明他对之前中央主要领导者不注意听取下级组织和基层党员群众意见，甚至固执己见拒不采纳中央委员



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画照）



正确意见的做法感到痛心疾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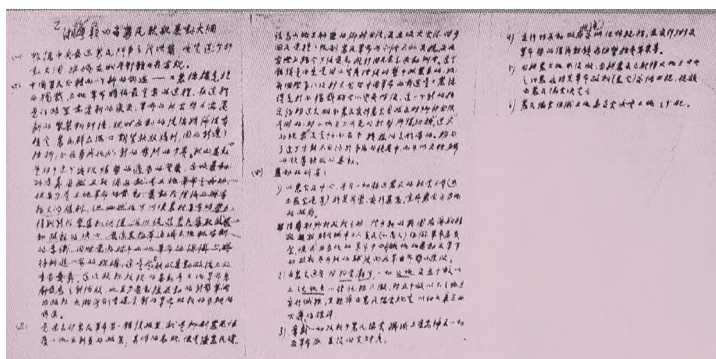
毛泽东的发言，点出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领导权、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也是他日后提出的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的思想发端。后来在延安时，毛泽东与斯诺在谈话中专门提到：“对这个决定（八七会议决定），我是积极出了力的。”到了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还专门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对《菩萨蛮·黄鹤楼》中“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一句写下批注：“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

毛泽东酣畅淋漓的发言，总结了大革命失败血的惨痛教训，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引起了会议代表广泛共鸣。蔡和森在发言中也直言不讳地批评陈独秀是以几个国民党上层领袖的意志为转移，一味退却，一直反对所谓“过火”行动，简直和国民党一样。他还提出家长制非打倒不可。邓中夏、任弼时的发言也很激烈，集中批判陈独秀不发动群众、不实行土地革命的错误。

惊雷乍起力挽狂澜

代表们对罗明纳兹报告的讨论结束后，罗明纳兹又就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错误问题、党的领导机关工人成分问题、当前形势估计问题和民族革命中的几个矛盾问题，发表结论性意见，并请代表们对瞿秋白在开会前一天连夜翻译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进行表决。

表决通过后，瞿秋白代表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他用热情洋溢的语言，明确提出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帮助土地革命。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武装，要利用好这些机会和力量，点燃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瞿秋白还表示已与中央军委的王一飞商议，在军队和士兵中开展工作，请求中央临时政治局注



《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意此项工作。随后，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文件。

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临时政治局。罗明纳兹提出了一份候选名单供大家讨论。蔡和森、李维汉、陆沉提议应将毛泽东加入政治局，但毛泽东一心要领导发动秋收起义，谢绝了这一提议。会议最终选举产生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九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七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在八七会议后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当选为常委，受命于危难之际，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并主持中央工作。

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大批干部到各地指导工作，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恢复、重建和整顿各级党组织，建立秘密机关和秘密交通网，出版刊物和印刷品，并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对敌人重新发起攻势。按照会议提出的实施土地革命和武



广州起义旧址纪念馆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先后组织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近百次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和工农暴动。这些起义和暴动的地区，分布于国内 12 个省、140 余个县，参加人数高达 200 万余人，使得反动派势力大为震惊和惶恐。从此，正如毛泽东在诗中所言，“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革命进入了建立红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广大群众在党的带领下，不畏牺牲，顽强斗争，开始了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砸碎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初步尝试，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伟大历史转折。

（孙 勤）

中央特科的起源

血的代价催生红色利剑

1927年5月下旬，一艘从戒备森严的上海码头驶出的英国轮船徐徐停靠在武汉，在熙熙攘攘的下船乘客中，有一位乔装改扮的29岁青年，他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反动当局悬赏二万五千元通缉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秘书长、中央军委委员周恩来。

周恩来是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血雨腥风中，留在当地处理完工人纠察队善后事宜后才到达武汉的。此时武汉这座号称“赤都”的革命中心，也正面临。夏斗寅叛乱和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的严重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一连串反动军官叛乱和反革命政变给党造成严重威胁和巨大损失，周恩来一到武汉，就着手创建党的政治保卫与情报机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威震敌胆的中央特科的前身。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起，就在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的严酷镇压下长期处于秘密工作状态。在斗争中，党开始逐步探索建立保卫组织，开展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1925年五卅运动中，为了对付少数明目张



白色恐怖下革命者遭逮捕

胆地破坏罢工、不听警告捣乱作恶的工贼，上海党组织从工人纠察队中选拔少数政治可靠、会射击的同志，专事镇压流氓、工贼。1926年秋，党在上海组织工人准备武装起义时，在工人纠察队中建立“红队”。“红队”由从苏联学习特工工作归来后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的顾顺章负责，主要成员有李剑如、杨福林、姜维新、王四、王大、陶三、谢德君、张明、钱福海、王阿根等人。但这些探索，主要是针对党领导下的工人队伍内部出现的内奸、工贼，而针对反动军阀和国民党高层的情报工作，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有效地开展起来，这也导致日后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残酷的斗争中频频遭受敌人秘密策划的突然袭击，付出了血的代价。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的亲信、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新编第一师党代表、赣州警备司令倪弼策动阴谋，借口赣县县政府要开会，派手下胡启儒等带兵突然闯入西津路广东会馆总工会会议室，在众目睽睽下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陈赞贤绑架至县署，逼迫其解散工会。陈赞贤痛斥敌人：“我从事工农运动何罪之有？你们镇压民众，破坏革命，才是大罪弥天！”“头可断，血可流，解散工会的字我不签！”最后被一伙反动军官残忍杀害。在这起血案前，倪弼和反动县长郭巩等人就在赣州大肆进行反共活动，甚至联合发出通缉令，公开出动军队包围和搜查赣州总工会，妄图逮捕陈赞贤。江西省党组织虽对倪弼有一定警惕，但由于没有内线情报，无法及时准确获知对方密谋，最终还是导致敌人袭击得逞。陈赞贤的壮烈牺牲，敲响了政治保卫和情报工作的警钟。

仅仅一个月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紧接着广州反动当局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前一周，张作霖在北京派出军警袭击苏联大使馆，抓捕李大钊等革命者60多人，并于4月28日绞死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各地党组织在毫无防备、准备不足或叛徒出卖的情况下突遭敌人的袭击，大批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猝不及防而被捕牺牲。

特别是在上海，因为没有掌握准确情报，加上陈独秀、汪精卫联名发表宣言所带来的政治麻痹，导致上海党组织在事前对青红帮假扮工人发动

袭击，随后二十六军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对工人纠察队缴械的阴谋一无所知，也没有防备；中共江浙区委（上海区委）常委、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汪寿华在4月11日晚坚持独自一人去赴青红帮头子杜月笙的鸿门宴，被对方手下流氓围殴打晕后装入麻袋，残忍活埋于沪西枫林桥。在同一时间，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也借口“商谈重要问题”，邀周恩来去师部。在情报不足的情况下，周恩来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毅然前去，结果被斯烈软禁。到12日凌晨，与上海党组织保持联系的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闻讯赶来，下令斯烈立即释放周恩来，周恩来这才虎口脱险。谁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恩来脱险后潜藏在较为僻静的浦东贫民区，然而天亮后二十六军第七团在该区大肆搜捕“赤色分子”，周恩来遭十多名士兵逮捕并被押往团部。幸而该团团长鲍靖中是黄埔四期生（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倾向进步，他冒险让昔日的老师、首长便装离开浦东，才使周恩来脱离了敌人魔爪。

在南北反动派挥舞屠刀的前夕，党中央虽事先得到了少部分内线的零星报告，但没有敌人核心层的决策情报，临机又缺乏紧急应变决心，致使各地党组织遭到敌人有预谋有组织的致命突袭，一大批党的优秀领导人、忠诚的党员和大量革命群众壮烈牺牲，党的事业受到严重损失。凶恶的敌人、残酷的斗争和血的代价提醒全党，没有专门的政治保卫和情报机构，没有政治保卫和情报工作的有效开展，党的组织和党员连生存都难以保证。

周恩来创建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

1927年4月，党中央在正式迁汉后进一步重视政治保卫和情报工作。5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周恩来任军事部（军人部）部长，并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很快，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这个时候，反动派掀起反革命政变狂潮的惨痛教训以及汪精卫集团日益右倾动摇、武汉地区形势加速恶化，引起周恩来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党在革命的实践中，特别是在革命失败中吸取了深刻教训，开始懂得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敌人，了解它的军事、

政治动向,才能有效地争取主动、保卫自己,才能准确地攻击敌人、战胜敌人。出于保卫自身安全,有效开展政治保卫和情报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特务工作处。

特务工作处的负责人是顾顺章,下设4个工作机构:保卫股,负责中



林育英

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负责人李剑如;情报股,负责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报搜集工作,负责人董醒吾;特务股,负责镇压叛徒、内奸和敌方特务,兼办中央给的其他特殊任务,负责人张浩(林育英,先)、李强(后),特务股主要就是做“红队”的工作;匪运股,负责联系各种帮会组织,打击、收编和争取、改造那些被称为“土匪”的民间武装和散兵游勇,把他们改造收编到革命军队里来,负责人胡步三(又名胡谦之、胡子)。



李强

特务工作处主要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是随中央迁汉的上海和江浙部分工人武装人员,包括“红队”成员、参加上海工人起义的部分人员,如蔡飞、王竹樵、陈莲生、阮锦云、姜维新,“红队”队员是分两批来汉的。二是中央军委从武汉地区军警界和地方党组织中抽调来的人员,如张浩(林育英)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官兼特务队队长,负责警卫武汉国民政府,维持社会治安;董醒吾对外公开身份是武汉国民政府侦缉

大队队长;蔡书彬是工会执行委员;陈声煜是汉阳人,留欧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特工处还有一支武装,负责执行各项工作任务。

特工处工作人员一部分在中央军委办公地汉口友益街尚德里10号,负有警卫中央军委之责;一部分在汉口前花楼,这里比较隐蔽,不在街上,

特工处工作人员杨福林回忆说，他住在汉口前花楼，同顾顺章住在一起，顾顺章住在楼下，他住在楼上；还有一部分在鲍罗廷公馆和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安全保卫和警戒工作。



前花楼（现黄陂街从江汉路到民生路段）

中共五大后，湖北省委设立特务科，由陈声煜负责。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撤离武汉后，有些工作交由湖北省委特务科完成。

神秘的红色卫士

特务工作处在武汉虽然仅运转了三个多月，但不少工作卓有成效。

首先是保卫中央机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及苏联顾问团的安全。

汉口四民街 61 号当时是中共中央秘书厅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办公地，61 号的安全就由特务工作处负责。特务工作处派出六七名卫士常驻于 61 号机关。他们身体健壮，身着布褂便装，24 小时值班，对来访者进行询问盘查，确定安全后才放行。时任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的妻子陈碧兰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一座相当宽大的西式楼房（即四民街 61 号），除了住着陈独秀、蔡和森夫妇以及述之和我外，还有几个武装守卫的同志。这座房屋差不多成为当时党的领袖和上级干部联络的中心和会议场所。”

特务工作处还对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负责。中央领导人外出，有武装工作人员警卫。1927 年 7 月下旬，周恩来等人从武汉到江西准备发动南昌起义，陈赓就带着特工处武装人员一直跟随保护其安全。中宣部原工作人员郑超麟回忆说，他奉命到鲍罗廷处办事，特务工作处派警卫人员随行。

八七会议的成功召开，军委特工处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八七会议召开时，特工处和中央秘书厅作了安全保卫部署。会场布置得很隐秘；所有代表都

不知道开会的地点，都是由交通员带到会场，只能进不能出；会议结束后，疏散代表用了2天时间，几个小时出去一个，而且多数是天黑后才出去。武汉国民党警察密探对党的这次重要会议一无所知，说明特工处和秘书厅的工作做得很好。

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公馆位于汉口原德租界，机构庞大，人员复杂，除鲍罗廷自己的工作人员外，一楼还设有一个通讯社、一个印刷所，国共两党高层人员往来频繁，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向这里派驻警卫人员负责安全。鲍公馆警卫人员与党中央机关警卫人员的着装不同，他们穿的是直领学生装，比较西式。汪精卫集团“分共”前夕，鲍罗廷被武汉国民政府解除顾问职务，中央军委抽调30人组成卫队，护送鲍罗廷回国。这批人大多身强力壮，训练有素，他们护卫着鲍罗廷，行程数千公里，最后安全到达莫斯科。完成任务后，这批警卫人员留在苏联学习保卫工作。

二是收集情报。该工作由特务工作处情报股负责，具体内容是收集军事政治等情报，了解各种势力的政治动向。在马日事变、汪精卫参加郑州会议、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开会谋划分共、罗易泄密等事件中，情报股都使得重要情报，及时报告党中央，使党能提前做好应对突变的准备。

为了收集情报，特务工作处人员利用了多种社会关系。梅中林是武汉地区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其家境特殊，堂兄梅龚彬是中共党员，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父亲梅宝矾曾是共进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后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与多方上层人士熟悉。特务工作处的李强等人与梅中林很熟悉，并通过梅宝矾的特殊身份，了解国民政府等方面的情况，获得多种信息，及时将情报转达到党内。共产党员吴德峰利用武汉市公安局局长身份之便有意接触国民政府要员陈公博，通过陈公博接触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经常以公私名义出入汪精卫公馆，观察汪精卫的动向。他的情报及时准确，为保卫党的活动和党员安全起到重要作用。他还在武汉公安局里安插了一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后，吴德峰向周恩来请示何去何从，周恩来指示他“不赶不走”。后来汪精卫展开“清党”，武汉局势危险，吴德峰接受党组织的

指示，撤离武汉市公安局，担任中共湖北省军委书记，赴鄂南组织秋收暴动。

七一五汪精卫“分共”前夕，中共中央掌握汪精卫集团即将背叛革命的动向和情报后，立刻做机关转移的准备，并于7月12日前撤离汉口四民街61号。党中央各部门也迅速作应变准备，转移办公地和住地，隐蔽起来。7月下旬之前，中共党组织基本转入地下状态，开展斗争。当敌人的军警密探按之前的地址搜捕时，所有地方均人去楼空。及时有效的情报工作保护了党组织和大批党团员，避免了再次出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那样惨重的组织遭破坏，领导人遭逮捕、杀害的极端被动局面。

三是惩治叛徒奸细。此项工作由特务股负责。1927年5、6月以前，特务股执行过两次锄奸任务。一次是处决一名企图接近苏联顾问团的英国间谍。据李强回忆，执行者是董醒吾（当时特务工作处人员的工作有时会交叉）。一次是惩处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奸细尤金·皮克。此人来中国并非真正支持中国革命，而是暗中向日本人出卖情报。特务股奉命去惩处他，但是执行任务的人过度紧张，枪没打响，当拔出匕首准备直接刺杀时，尤金·皮克抓住空子跳窗逃跑，一路逃到日本军舰上躲藏起来。这件事让特务股的人很遗憾。

七一五汪精卫集团“分共”后，中共党内出现了公开投敌、出卖同志的叛徒，给各级党组织造成严重威胁。特务股负责惩处这些败类。李强曾处决了一个姓万的叛徒，此人下定决心投敌，李强找到他，假意一起去找敌人“自首”，在汉口找了一艘“划子”（用桨拨水行驶的小船）过江到徐家棚。李强事先做了布置，划船的也是党员，船在过江途中把叛徒直接掀进长江。

为了增强力量，中央军委派人到湖北省军委训练指导如何惩治叛徒和锄奸。李强曾经领着省军委的陈声煜带着手枪上街练胆量，还在青年团中锻炼培养了一些能



陈声煜



在恶劣环境下对敌斗争的人才。中央军委迁回上海后，李强的一些工作就交给了陈声煜。

特务工作处在中央机关迁回上海期间还处理一些善后事宜，如退掉中央秘书厅等机关租用的房子，清理被封闭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场所，接受被国民政府解聘返回苏联的军事顾问们留下的枪支，并将这批武器送到武昌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军队中，将中共中央未用完的债券兑换成上海可用的中央券和银元，等等。当中共领导人筹划领导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时，中央军委部分工作人员完成了这些平凡、琐碎又需要保密的工作。

中央特科的起源

1927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而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于1927年8、9月间结束在武汉工作。1927年11月，周恩来向党中央建议成立中央特科，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新成立的中央特科继承了武汉时期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传统，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组织机构。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就是中央特科的前身和起源。

特务工作处虽然只活动了三个月，但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特务工作处从一开始就完全受党的领导，隶属于中央军委（军事部），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特务工作处内部设立有保卫、情报、行动和开展帮会土匪联络工作等部门，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密切配合，所有人员都能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纪律。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现时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强调“极严格的秘密规律，是秘密状态中党的工作之基本条件”，“严守党的纪律尤其为秘密党之必要条件”。特务工作处作为一个秘密工作机构，必须更加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定。李强说：“那时特科（指特务工作处）工作是比较隐蔽的，在军委内部知道的人也不多。”杨福林担任过周恩来的保卫工作，但他并不知道周恩来的住宅地址，只知道友益街军委办公地。不仅

如此，就是同属于特工处的工作人员，有的也互不认识，如杨福林回忆说他不认识陈莲生。

特务工作处在武汉的秘密工作时间不长，但积累了十分宝贵的隐蔽战线斗争工作经验，培养锻炼出了一批隐蔽战线的人才。1928年在上海建立的中央特科的骨干力量大多是从武汉过来的。原在中组部工作的洪扬生担任中央特科总务科科长，陈赓任情报科科长（后任行动科科长），李强任通信联络科科长。吴德峰长期从事政治保卫和情报工作，1929年任中央交通局（处）长，建立了通向全国乃至国外的交通总干线，制定了一套适合当时情况的秘密工作纪律、原则和方法，为隐蔽战线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陈赓在搜集情报、营救同志、惩处叛徒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李强建立了党的第一个电台；李剑如从苏联回国后被派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红六军第十七师政委等职，1932年牺牲。

（孙 劭）



组织工作有了组织

位于汉口繁华闹市区的铭新街13号，有一座饱经历史沧桑的二层楼洋房，尽管岁月的风雨让它失去了当年的风采，但作为192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汉办公地旧址，它见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那段风起云涌的红色历史。

1927年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到武汉，中央组织部于4月随中央机关迁汉，10月上旬又由武汉迁回上海。党中央及中组部在汉期间，中国革命经历了由大革命高潮到失败的严峻考验和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面临严重危机的关头，党加强了组织建设，中组部在党中央领导下积极贯彻落实党的政治路线与中央决策部署，建立组织工作机构、健全组织工作制度，按照中共五大确立的组织体系、领导体制来设置和改组党的组织机构，推动干部工作规范化和党的力量发展。在白色恐怖下整顿、恢复、重建全国各地党组织，转入秘密工作，保存红色火种，为党的中心工作——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中共中央和中组部在汉期间党的组织工作大发展和组织建设新突破，是党的组织工作走向规范化的起点和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为大革命深入开展和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奠定了组织基础，提供了组织保障。

中组部终于有了新“家”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由于党员人数较少，中央机关工作机构不健全，没有成立中央组织部，党的组织工作主要由中央局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分管组织的委员直接承担。中共三大后，党对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和加强组织工作的必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三届一次

执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决定：“中央及区亦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责任”，“秘书兼组织部，组织部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出建立中央和地方的组织部。根据这一决议，中央局秘书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成为中央组织部第一任部长。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明确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四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局决定，由总书记陈独秀兼中组部主任。1925年2月，中央调尹宽到中组部工作，不久调离。1926年底，中央决定周恩来赴中组部工作。不久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需要，周恩来调中央军委，中组部又只剩下总书记陈独秀一个人兼部主任，具体工作由中央秘书处代办。

1926年7月至1927年春，随着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和革命形势高涨，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革命中心由广东向武汉转移。为就近指导革命，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工作机构陆续迁往武汉。1927年4月中旬，总书记陈独秀及留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工作人员先后到达武汉，中组部也随之迁到武汉。

中组部迁汉之前，在上海并没有单独的办公场所和下设机构。迁到武汉后，中央组织部终于有了新“家”。汉口铭新街13号成为了中组部机关所在地，1927年6月下旬至7月中旬，中组部和中宣部都设于此。这是一座带天井的二层楼房，中宣部在楼下，中组部在楼上。陈乔年、罗严等工作人员在这里办公和居住，部长李维汉常去那里。另外，在汉口



汉口铭新街13号中共中央组织部旧址

贯中里还有单独的党员登记处办公地，洪扬生等人在此做党员登记工作。在武汉期间，中组部第一次设立秘书处、组织科、党员登记处等工作部门和机构，并配备了罗严、米夫、石炳乾、张逸凡、洪扬生、朱孔阳等专职工作人员。

小机构的大作为

中组部在汉期间机构虽然极其精干，但在建立完善组织工作制度，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推动党的组织工作发展和党的组织建设创新方面，却是大有作为。

中组部在汉期间，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确立了党对组织工作的领导体制，加强了党的全面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了《组织部条例》、《组织部工作计划》和中央组织部长人选，并设置中组部秘书，在部长外出时主持中组部日常工作，参加常委会议，参与重大决策。还参与筹备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盛况空前、创造多项“第一”的大会，比如第一次半公开地举行开幕式；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有国民党领导人出席的中国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第一次把党的组织系统划分为中央委员会、省委、市（县）委、区委、支部，这一体系一直沿用至今。这些制度的确立，体现了党中央对组织工作的高度重视，保证了党对组织工作的全面领导。

中组部在汉期间，在制度建设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建立了党员登记制度、审查党员干部制度、任免干部制度和干部调派制度等。如中共中央在汉期间，中组部对来汉的党员进行了全面登记，党员数量统计工作成效显著，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公布全国党员人数为 57967 人，对全国数万党员人数统计已精确到个位数。

在中央选派任命各省委组成人员和调派党员干部的过程中，中组部负责对拟定的干部人选进一步审查。1927 年 5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讨论建立四川（临时）省委时，提出“派郑鼎勋、黄达全、张鸿次、刘荣简、赵世兰等 5 人到四川工作，但要先查清身份”。会议决定“交组

组织部查清，再决定派否”。6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十七次会议，决定“罗易的新翻译由组织部调查。”中央任免各部（委）部长（书记）、秘书，各省委书记、常委和委员，一般要按照一定程序，由中组部考察审查干部，提出拟任干部人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最后由中组部办理相关手续。如国民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党团书记人选就是由中组部拟定后，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6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汪（泽楷）罗（亦农）对调工作，去人，交组织部”。各地来汉党员干部的工作分配和全国党员领导干部的调动工作，多由中组部办理，基本形成制度。

中组部在汉期间还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积极参与中央党校筹建工作。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和党员人数增加，党中央把建立中央党校、加强党员干部教育也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央组织部积极参与了中央党校筹建工作。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中央党校在武汉未能办成，但中央组织部为创立中央党校所做的大量筹建工作，在党的建设史上也是一个重要贡献。

大革命失败前后，中组部在中央临时常委会的领导下，紧急开展党员干部疏散撤离工作。首先将一部分在武汉已公开身份的党员干部调往外地，又从外地调干部到武汉工作。如湖北省委一批重要干部陈潭秋、刘少奇、许白昊等调离武汉，由罗亦农接替张太雷任省委书记。其次将凡能秘密回原地原籍工作的便回原地原籍；不能返回原地原籍的，派到其他地方工作。据宋侃夫和刘淑琴回忆，宋当时去浙江和刘当时去上海都是由中组部工作人员罗严负责安排的。中组部派宋侃夫到浙江杭州，部长李维汉亲自做工作。另外还安排一批干部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1927年9月至10月上旬，一批干部和工作人员随中央机关迁到上海，另有部分干部和工作人员迁广东。还有一部分党员干部在武汉坚持斗争。

对于不能撤离武汉的本地党员干部，中组部则安排他们隐蔽，继续坚持地下斗争。如五大代表张金保就没有离开武汉，而是回到泰安纱厂隐蔽起来。中组部同其他部门通力合作，紧急疏散转移集中在武汉三镇的大批党员干部，及时部署全国各地党员转入秘密斗争，在历史危急关头保存了

革命力量。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组部还大力整顿恢复和重建党组织。1927年8月至10月，中共中央先后成立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和广东省委、满洲省委，整顿和改组湖南、湖北、江苏、浙江、江西等省委。中组部根据中央要求，及时调配干部、办理手续，通过秘密交通网向各省、市派出干部，恢复重建各省党组织。

此外，中组部还承担着派遣党员干部赴苏联学习和工作的任务。1927年7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三十四次会议，瞿秋白提出“孙大（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招收”问题，会议决定“交组织部查明答复”；关于“东大（即莫斯科东方大学）招生之李德昭工作”，决定“交中组（部）”。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在疏散撤离党员干部的过程中，选派一部分党团员和军校学员赴苏联学习。这批干部学习归来后，大多数成为各个方面的骨干力量，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八七会议后，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部署，把发动农民武装暴动作为中心工作。中组部和各省委组织部在这个历史重大转折关头，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派出干部及时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同时选派党员干部参加武装暴动。秋收暴动期间，湖北省委和组织部、军委陆续从武汉派遣400多名党团员下到农村，广泛发动农民，先后举行鄂南暴动、鄂西暴动、黄麻起义等，为后来建立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中共中央和中组部在汉期间是党的组织工作大发展和组织建设新突破时期，是党的组织工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起点。

功亏一篑的中央党校

早在建党初期，中共中央就强调要加强党员干部教育。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指出“党内教育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这是目前所看到的党的文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设立党校。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决议再次强调要设立党校对党员进行系统的教育，

以培养党员“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1925年9月，中共四届二次执委会扩大会议要求各地开办两种党校，一种是“地委之下的普通党校”，任务是训练工人；一种是“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训练政治知识较高和有工作经验的党员。根据中央精神，1925年9月，中共上海区委党校成立；10月，中共北方区委党校成立，罗亦农任校长；1926年1月，中共湖南区委党校成立；1926年9月，中共广东区委党校成立。

1926年7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在《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之“地方报告问题”中，要求各区委、地委每月按期报告“党校成绩（如办理各种训练班及教材、办法、成效等）”。1926年10月，张国焘在给中央的信中谈到湖北党组织的状况：“党务仍然涣散，因同志过去未受训练，许多同志比较更重视民校（国民党的代称）。”颜昌颐11月初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甚感工作人材缺乏之苦”。随着革命中心由广州向武汉转移，在武汉创办两湖党校，加强对两湖地区党员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党员素质，培养党员干部，对于促进两湖工农运动高潮的兴起，推动中国大革命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1926年9月26日，《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中明确要求：“沪、粤、湘、鄂四区都须设立普通党校以养成党的及职工运动的下级干部人才。”在此前后，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两湖党校。两湖党校是在1926年11月开学的，1927年1月底毕业，学期2个多月。虽然只有2个多月时间，但为党组织培养了一批优秀党员干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到1927年4月，全国中共党员发展到57967名。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和党员人数增加，建立中央党校、加强党员干部教育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而各区委党校的建立特别是中央两湖党校的建立和发展，为创办中央党校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1927年4月下旬党的五大上，陈独秀在报告中指出“党内教育跟不上党的发展”，鉴于党的发展和组织状况，“我们党目前需要成立党校”，“中央有个计划，打算成立一个设立两个部并拥有500人的党校”，即是建立中央党校。



按照中共五大精神，1927年5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九次会议，讨论成立中央党校有关问题——教（务）长、教务、庶务会计、地点、经费等。决定米夫任教育长，并起草中央党校计划，米夫的妻子任教务，庶务会计由湖北省委去找人，地址设在武昌，人数300人，学期半年，7月30日开学。中央党校筹建工作开始进行，包括确定中央党校领导，选调中央党校教员，确定学员资格和学员构成，分配学员名额，筹措和安排党校经费等。为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党校委员会，瞿秋白任书记；建立中央党校筹备处，由米夫、张秋人、任作民、陈潭秋等人组成。

6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十六次会议，讨论中央党校学生（员）名额分配、学员构成等问题，决定“由组织部改正，成分三分之二为学生”，并发通告。6月23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讨论党校问题，决定中央党校开办费49700元，每月14200元；人数分配不变，学生资格四条；主任为俄同志，副主任尹宽，事务主任张秋人，翻译李德昭、刘国庄，开学时间7月30日。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武汉政治形势发生逆转，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决定撤退疏散在武汉的大批党员，中央党校未能办成。但五届中央决定创立中央党校，在党的建设史上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

武汉，成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发源地。

热血忠诚誓言无声

中组部在武汉既经历了大革命由高潮走向失败的重大挫折，又经历了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险恶环境下，中组部工作人员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定的党性原则，严守政治纪律，创新组织工作，尽职尽责，负重前行，在武汉建立了建党以来组织工作的辉煌业绩，谱写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光辉篇章。与此同时，一大批共产党员壮烈牺牲，陈乔年、罗严等就是这一时期优秀组工干部的代表。

陈乔年是陈独秀次子。1919年12月同兄长陈延年一起赴法勤工俭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法国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1923年入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先后任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组织部部长、北方区执委会组织部部长，在三一八惨案中负伤。1927年4月中旬，从上海来到武汉，出席中共五大并当选为第五届中央委员，先后任中组部秘书、代理中央秘书长、湖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长江局常委兼湖北省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在中共五大召开前夕，陈乔年以政治委员会委员身份参与了党的代表大会筹备工作。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陈乔年出席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中央常委会决定张国焘（6月下旬为李维汉）任中组部部长，陈乔年任中组部秘书。

陈乔年在中组部工作期间，为党的组织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从5月中旬到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先后任命了中央各部部长（书记）和秘书，改组和建立了湖北、湖南、河南、山西、陕西、顺直、江苏、浙江、江西、四川、安徽、山东等12个省委，任命了各省委书记和委员。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干部任免及改组建立各省委等重要组织人事问题时，陈乔年基本上都参加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干部任免事宜交中组部落实，主要是由陈乔年负责组织实施，包括提出领导干部人选，审查领导干部身份，办理相关手续等。如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组部提交的安徽省委问题议题，决定成立安徽（临时）省委，由5名委员、2名候补委员组成；同时决定安徽宿县、凤阳划入江



中共五大会址

苏省委管理，由中组部通知江苏省委。6月4日，根据中组部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各党团书记人选。这其中很多工作就是陈乔年组织进行的。如1927年5月14日，中央召开第二次常委会议，在讨论组织人事问题时，陈乔年多次发言。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各地党组织缺少干部、人手紧张的情况十分突出，纷纷请求中央调派干部和工作人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决定后，交中组部办理相关手续。大革命失败前夕，为应对即将到来的白色恐怖，恢复发展全国党组织和领导开展各地武装斗争，急需将云集武汉的大批党员干部迅速安全疏散、派遣到全国各地。李维汉和陈乔年按照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的要求，快速制定工作方案，发出文件，紧急开展党员干部疏散撤离工作，及时布局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斗争。

据李维汉回忆说：“那时我和陈乔年任中组部正副部长，我们按照中央规定的三项办法进行安排：凡能秘密返回原地原籍工作的便派回原地原籍；不能返回原地原籍的，派到其他地方工作；其中大部分（包括一些党外进步人士）派到南昌参加起义。”李维汉、陈乔年紧急疏散转移集中在武汉三镇的大批党员干部，及时部署全国各地党员转入秘密斗争，在历史危急关头保存了革命力量。1927年7月下旬，陈乔年调任湖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8月7日，参加八七会议，对父亲陈独秀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严肃的批评。

10月初，陈乔年任湖北省委书记。11月，派符向一、吴光浩等成立黄麻区特委，符向一任书记，刘镇一任鄂东革命委员会主席。陈乔年和省委要求黄麻特委尽可能地发动黄麻农民群众起来斗争，夺取唐生智败军的武装，占领县城。并派原省委秘书长马俊三到鄂东黄蕲及大阳（大冶、阳新）两区巡视，加紧该两区内的斗争，后来因武汉政局变化、交通阻隔而未成行。在省委领导下，192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正式爆发，2万余名群众包围并占领黄安县城，成立黄安农民政府，组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1月下旬，根据中央精神，省委改组，陈乔年继续担任省委书记。在领导黄麻起义的同时，陈乔年和省委加强对黄冈等地武装斗争的领导。11月，省委任命陈

卫东、罗四维为省委特派员到黄冈恢复重建县委，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农民武装。12月底，黄冈县委率农民暴动队300余人举行暴动，在烽火山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六军。

1928年1月，陈乔年调任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月16日，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主持江苏省委所辖各区委组织部长联席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始终坚贞不屈，于6月6日牺牲于上海龙华，年仅26岁。



陈乔年

罗严是湖南常宁县太坪乡（现柏坊镇）周家桥人。早年在家乡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出任湘南学联干事。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5月间，罗严和聂洪钧被党组织作为农民骨干选派南下广州，参加第五期农讲所的学习。学习期满，罗严被讲习所推荐到上海中央农民部担任秘书。当时，农民部部长李立三是党负责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工作繁忙，农民部日常事务实际上由罗严主持处理。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和称赞。

1927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罗严随之到武汉，任中央组织部秘书。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黑云压城，血雨腥风。4月下旬，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罗严列席了大会。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分共”，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当时在武汉的党中央机关被迫疏散，罗严虽参与了疏散分配工作，但他却主动要求留在武汉从事地下工作。据宋侃夫回忆，



罗严

七一五之后，蔡和森通知他说中组部找他谈话，他到汉口铭新街中组部秘密机关，是罗严同他谈的话，告诉他中央机关要紧急疏散，就工作去向征求他本人意愿。

在白色恐怖之下，罗严以在汉口后城马路长江书店卖书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7年8月中旬，罗严被反动当局逮捕。反动派通过调查核实得知罗严身份后，先是以高官厚禄利诱，继而严刑拷打，想从他口中获得中央机关和组织工作的秘密。罗严虽然掌握了大量党的机密，也认识不少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党员干部，但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至死都没有吐露半个字。中组部机关和李维汉、陈乔年等均无恙，从容撤离武汉。

1927年8月26日，武汉汉口后城沿途军警林立，气氛肃杀。罗严被绑在卡车上押送刑场，他身形消瘦，满身血迹，但神色自若，毫无惧色，行人莫不为之起敬。罗严在武汉英勇就义，时年26岁。

（周 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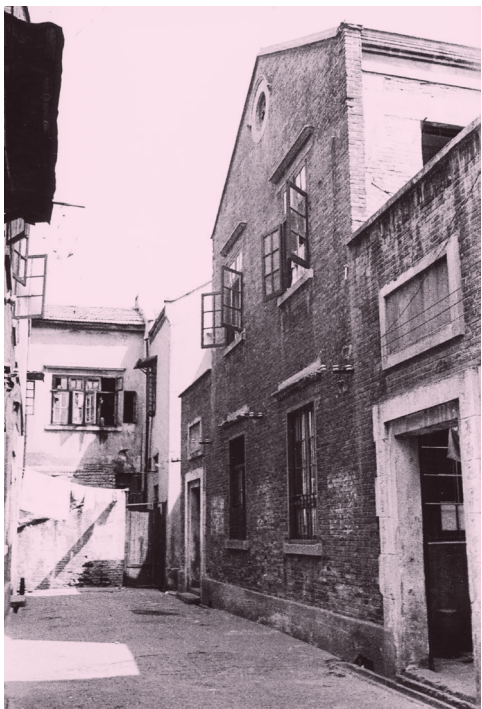
宣传鼓动谱写新篇

辅义里的“文学家”

1927年3月中旬的一天，烟雨蒙蒙的长江上驶来一艘轮船，一生长衫、戴着眼镜的瞿秋白正站立船头，他坚毅的目光似要穿破那层层叠叠扑朔迷离的江雾。船靠岸后，他收回远眺的目光，大步踏上江汉关码头，穿过一条条纵横狭窄的街巷，拐进辅义里，来到一栋灰墙红门的两层小楼前，确认了门牌号是27，便轻轻叩响了门。来开门的是他在上海时的中宣部同事羊牧之。

羊牧之引他进屋，向他介绍说，这里是我们中宣部在武汉的办公地，一共两层，每层两间。楼下中间是吃饭的地方，左面一间的后半间是收藏书籍及资料的地方，前面半间放了一张木架床和一张写字台，是我办公的地方。楼上是为你留的办公室，里面可当作你的卧室。瞿秋白欣然应允，经过短暂的休整后，便全身心地投入紧张忙碌的工作中。

从1926年9月开始，中共中央机关陆续抽调大批干部到武汉工作。1927年2月中旬，黄文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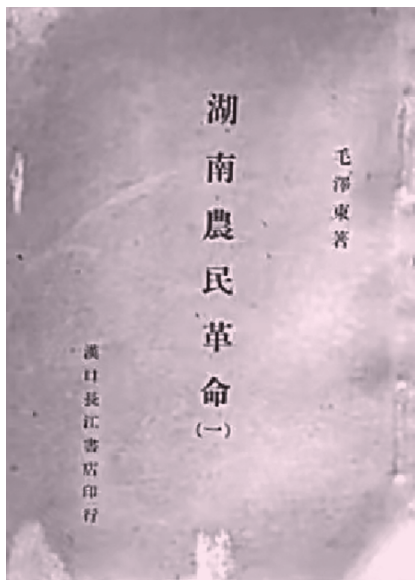


汉口辅义里中共中央宣传部旧址暨瞿秋白故居

羊牧之作为中宣部最早一批由沪抵汉的工作人员，率先开始了中宣部在武汉的工作。中宣部委员瞿秋白和蔡和森分别于3月中旬和4月3日到达武汉。中宣部主任彭述之于4月9日到汉。其他委员、大部分宣传人员以及文件资料于4月上旬先后抵汉。4月25日，最后一批中宣部工作人员随同其他中央机关人员一行二三十人乘坐怡和公司的轮船到汉，中宣部才全部迁至武汉。

瞿秋白到武汉时，武汉正处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夹击、革命高潮与危机并存的动荡局势之中，瞿秋白身兼数职，既要领导党的宣传工作，又要参与中共中央的工作，还要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师。他有时穿西装，有时穿长衫，有时身着中山装，甚至身穿国民革命军军装，每日奔走于中共中央各个机关与武汉国民政府之间，奔走于工农群众之中。但不管白天工作多么繁忙，他始终笔耕不辍，每晚奋笔疾书到深夜。

瞿秋白才华横溢，写文章从不打草稿，一旦思想成熟，文思泉涌，提



1927年4月，瞿秋白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改名为《湖南农民革命》，亲自作序，印发单行本

笔就写，一动手写，就像瀑布一样地直泻下来，势不可当，非一口气把文章写完不可。因此，他每年的著述平均有30多万字，一生著述高达500万字。

他观察敏锐，才思敏捷，善于抓住时机，对各种政治局势和政治事件条分缕析，去伪存真，最后以凌厉尖锐又不失明白晓畅的语言见诸报端，令人读之有拨云见雾之感，极具宣传鼓动性。

1927年4月11日深夜到第二天（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那天）的凌晨2时，瞿秋白激情洋溢地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序言。这篇文章精彩地描述了“民权政治”“农民自

己的政权”与封建政权、神权、族权、男权的对峙，工农“自己的国家”与“土匪头儿”的国家的对峙，热情讴歌农民运动，号召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五卅二周年前夕，瞿秋白于5月26日撰写了《五卅二周年纪念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揭露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仅“脱离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而且“决然的破坏革命势力，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如今日益变成中国的白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两年中从赤化变成非赤——黄色，从黄色又变成白党”，是一种“‘化学作用’的变色”。三言两语便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转变过程及转变原因，又富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1927年5月21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农协等机关、团体，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史称“马日事变”。6月5日，瞿秋白强压住满腔怒火撰写了《长沙政变与郑州开封的克复——革命之胜利与危机》，反驳许克祥以农民运动过火为由进行反革命政变。他说：“请问，许克祥的所作所为，尤其是摧残教育、解散党部、推翻省政府，背叛国民政府而独立，任意屠杀一般民众，虽女子亦所不免，如此行动，难道可以农民运动过火为借口，便了事吗？况且省政府、女学校等，与农民运动有何关涉！”通过分析湖南农民运动发展的自身困境，说明“即使说农民有幼稚而无组织的行动，也决不是许克祥的方法所能解决”，并进一步阐明湖南省农民协会“正在开始整顿民众之无组织行动”，最终揭露许克祥的反革命面目。通过郑州、开封的克复，鼓舞“湖南的农民工人，全国一般平民及革命将士”：“奋起斗争，以实力颠覆蒋介石第二的许克祥，和东南的平民及将士对于蒋介石一样！”

瞿秋白的文章似抽丝剥茧般，一层层剥去蒋介石等反革命势力的伪装；又似指路明灯般，照亮中国革命胜利的方向；更为难得的是，他的语言风格贴近百姓，深受工农群众欢迎，也受到其他文学家的充分肯定。鲁迅曾称赞他的译著“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论文“足以益人，足以传世”，

杂文“尖锐、明白、晓畅，真有才华，真可佩服”，茅盾则夸赞他与鲁迅各有千秋。1926年，瞿秋白在上海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常任副代表，工作人员在做会议记录时直接以“文学家”的代号指称瞿秋白，可见其文学成就之深入人心。

牢牢握住笔杆子

中共五大召开前，瞿秋白在武汉代彭述之负责宣传工作。中共五大召开后，瞿秋白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主管宣传部工作并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中央党校委员会书记，全面主持党的宣传工作。

牢牢握住笔杆子，加强党内外教育，大力宣传鼓动群众，是中央宣传部的重要职责，也是瞿秋白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他的领导下，中宣部主要完成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扩充机构和人员配置，使中央宣传部更加坚强有力；二是加强中央宣传部和地方宣传委员会之间的联系，收集各地重要信息以供中央参考；三是抓好报纸的发行工作，充分发挥报纸的舆论影响力；四是翻译并出版发行大量进步书刊，扩大党的宣传力度。

中共三大以前，党员人数较少，党组织处于创建阶段，中共中央未设专门的工作机构，宣传工作由中央委员分管。1924年5月，中共第三届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提出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始设立宣传报刊部、宣传教育委员会，后来又增设出版部。1925年1月中共四大后，中共中央继续设宣传部、出版部。

中共五大召开后，5月22日，党中央决定对中央宣传部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中宣部下设宣传科、鼓动科、出版科三科，每科各设主任一人、秘书一人、干事若干人。宣传科主管党内外宣传教育，拟定宣传方法，科长是尹宽；鼓动科主要是针对各种纪念节、具体运动或事件、群众组织等做鼓动工作，科长王明；出版科主要任务是编辑出版发行各种书刊，科长王步文。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是中宣部顾问。其他工作人员还有宋侃夫、李德昭、朱自牧、汪海若等二十余人。黄文容、羊牧之来汉时从上海带来的图书资料被用来建成了中宣部的图书室。陈伯达曾在中宣部管理图书资料。

在汉期间，中宣部积极引导地方宣传部门密切与中央宣传部之间的联系。

中共五大后，中央宣传部发布第一号通告，指导各地建立地方各级宣传部。1927年6月，江苏省委宣传部依照通告规定，设立了部长、秘书、宣传科、鼓动科、出版科，并规定省委宣传部下设区委宣传委员会，区委宣传委员会下设支部宣传队或支部宣传委员会。各支部宣传队队长每日向区委宣传委员会报告工作并接受新的工作指示，然后为队员分配工作，区委宣传委员会每日到省委宣传部报告工作并接受指示。此外，还组织有特别服务队，其指挥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上总宣传部、上总组织部、军部各派一人合组委员会管理。

在武汉，担任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向警予从工会会员里挑选了两百名骨干，以总工会的名义成立了一支宣传队。宣传队下设几十个小分队，每天上街宣传，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她还组织举办训练班对宣传队员们进行突击培训，邀请瞿秋白等共产党人为宣传队员们授课，提高了宣传队员们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

中宣部还注意在各地工人农民中发展通讯员，这些通讯员提供各地新闻报道，地方宣传工作人员把它们分类收集起来，编辑汇总，刊印成《每日通讯》，分送给中央领导及各部门领导批阅。黄文容从宣传部调任陈独秀的秘书后，他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收集汇总各类会议信息以供陈独秀批阅。

党的报刊也多由各地通讯员供稿。如《汉口民国日报》，它的编辑部没有记者，消息的来源主要靠党政机关及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供给，而且材料很丰富，譬如工运的消息就有全国总工会、湖北省工会、汉口市工会三个来源，还有一些大的工厂企业的工会也会来稿，所以编辑部只要派两个人经常到这些单位去走动征稿即可。此外，武汉市还有三个通讯社——人民社、血光社、一德社，也经常给报纸提供消息，血光社是党领导的通讯社。1927年6月15日，《向导》周报也刊登了一则由上海总工会供稿的《上海之五卅二周年纪念》，通讯员言辞恳切地说：上海今处帝国主义新走狗统治之下，我们工人没有公开的言论机关；这次五卅二周年纪念的情形我

们极想发表，知道只有共产党的机关报能够替我们做喉舌，特此寄上这一通讯。

中央宣传部非常重视报纸的发行工作，充分发挥报纸的舆论影响力。

据《武汉民国史》统计，1927年上半年，武汉地区的报纸有三十余种，其中由共产党员实际掌管的进步报刊就有十余种，包括《向导》《汉口民国日报》《楚光日报》《革命军日报》《武汉民报》《群众》《武汉评论》《工人导报》《湖北农民》《农民运动》《前敌》《革命生活》等，瞿秋白对这些报刊非常重视和关心，把它们当作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反革命的重要武器和阵地。

《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个机关报，创刊于1922年9月13日，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出版201期。1927年4月，《向导》编辑部随中共中央机关一同迁至武汉。瞿秋白是《向导》周报的第三任主编。

1927年3月21日，上海八十万工人和革命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起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军阀势力被消灭，上海临时革命政府成立了。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瞿秋白异常激动地说：我们应该感谢恩来、亦农、世炎等同志，我们更应该感谢上海的工人阶级，是他们在上海的上空树起了红旗，为我党添了光辉。中宣部要尽一切努力，为上海的武装起义，大造舆论，并严重警告那些北方南方的新老军阀，如想镇压，则无产阶级必将以革命的武力对反革命的武力加倍奉还。

4月6日，《向导》周报一连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世界工人阶级书》《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上海总工会告世界工人书》《上海工人三月暴动记实》4篇文章，报道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盛况，号召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号召中国工人起来学习上海工人，保卫起义成果，扩大革命斗争，又在“寸铁”专栏发表《青天白日旗下之上海新闻界！》的短评，并刊登周恩来的来函，纠正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相关报道中的不实之处。

《汉口民国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际上直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领导，是以共产党人为主创办的以国共统一战线

面貌出现的大型日报。创刊于1926年11月20日，社长董必武，经理毛泽民，主编先后为宛希俨、高语罕、沈雁冰（茅盾），20多位编辑、记者除了一个石信嘉是国民党左派，其他都是共产党员。其办报方针、宣传内容、斗争策略、经营管理等，都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

1927年4月上旬，刚到武汉的《汉口民国日报》主编沈雁冰去辅义里27号向瞿秋白请示工作。瞿秋白指示他今后办报应注重三个方面：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没几天，蒋介石就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遵照瞿秋白的指示，《汉口民国日报》一方面整版整版地刊登讨伐蒋介石、号召东征的消息和文章，推动武汉反蒋讨蒋怒潮；一方面开辟专刊对各地反动势力骚动和农协反击的消息据实报道，推动了工农运动发展；此外，还注意报道各种纪念活动，如纪念李大钊、蒋先云、五一、五卅、济难日等，激发革命群众的斗志和决心。

中共五大后，汪精卫采取两面派手法，口头上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实际上却指责工农运动“过火”。陈独秀亦提醒沈雁冰说：《汉口民国日报》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报上还是少登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沈雁冰因此去请示瞿秋白。瞿秋白说：你就按照五大决议的精神去办。

瞿秋白还强调，在以报刊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时要讲究斗争的策略。一次，他在汉口南洋大楼参加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休息时，汪精卫的秘书告诉他，军长何键的父亲被戴高帽子游斗了，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摸出当天的《湖北农民》给他看。瞿秋白看了说：何老太爷养尊处优惯了，能走走跑跑也有好处。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斗争应当讲究策略，当时国民党的反动军官们仇视农民运动，仇视革命政权。报纸宣传如果处理不当，反会给人以口实。为此，他在召集的报刊编辑人员座谈会上告诉大家：批斗地主恶霸，重点报道他们鱼肉乡民的罪恶、农民的义愤、斗争的场面和会后的反响，不必点出被斗者的儿子姓啥名谁，担任什么职务。点了，容易给人钻空子，既不利于联合，也不利于斗争。针对国民党右派人士反映的报纸登载工农

群众运动的消息太多，火药味太浓的问题，瞿秋白又说：我们的报纸理应面向群众，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不要怕多，今后还要多揭露反动派的反共阴谋和分裂阴谋。到那时，他们肯定跳得更高，叫得更凶。如果国民党右派先生看你们的报纸没兴趣，那我建议你们多编登一些他们卖官受贿、纳妾宿妓、私设公堂、拷打革命群众的报道。说得编辑们既哄堂大笑，又心领神会。他们心里明白，瞿秋白这是在告诉他们利用报纸进行革命舆论斗争的技巧。

瞿秋白提醒报社工作人员要非常注意报纸的文字宣传形式。他说：中国现在识字的人不多，因此报纸的文字要口语化，通俗明了，具体切实，使工人农民看得懂。文章中不要夹杂之、乎、者、也，卖弄典故。比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有几个工人农民能懂？如果改为“黄鼠狼给鸡拜年”，他们一听就明白。他还建议，群众喜欢看武侠章回小说，我们何不把一些地区的农民斗争事迹也用这种形式写小说，编故事？但他告诫报社的工作人员，不要宣传封建色情的东西。

在中宣部的领导下，以《向导》周报和《汉口民国日报》为代表的武汉进步报刊在宣传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政策，支持工农群众运动，揭露帝国主义、新老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反革命言行等方面，旗帜鲜明，战斗力强，在全国及国际上颇有影响。

在汉期间，中宣部领导出版工作，翻译并出版发行大量进步书刊。

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对中央宣传部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中央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传工作，宣传工作中又属出版工作做得最好。党的中央机关报《向导》按期出版，且份数日益增多，中共四大时仅发行七千份，至北伐时已增至五万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仍保持在五万份；还翻译了《共产主义ABC》《民族问题和共产主义》《农民问题》等十六种书籍。鼓动材料出版了很多，如江苏、湖南、广东和浙江等省，出版了许多鼓动小册子，其数量由九万册增加到了四十万册。

在武汉时期，党的出版发行工作主要是由汉口长江书店负责。长江书店专门经售一切有关革命的书籍，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

是在汉口长江书店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

1927年3月5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首先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第35、36期合刊上发表。3月12日，《向导》周报第191期却只刊登了《报告》的前七部分，后八部分由于受到陈独秀、彭述之的反对，没能继续发表。瞿秋白到武汉后读到了这篇报告，立马把它带回中宣部，连夜指示羊牧之单独刊印。

据羊牧之回忆，一天深夜，瞿秋白开完会回来，在楼下把他叫醒，交给他一份厚厚的文件，说了声“单独刊印”就上楼去了。第二天一早，羊牧之翻开一看，原来是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羊牧之不理解单独刊印是什么意思，便跑上楼去请示瞿秋白。瞿秋白沉重地对他说：“目前党内，特别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这篇文章是亲身下去做了几十天实地调查写出来的，是很有说服力的，文章里痛斥了党内外一切怀疑、否定农民斗争的论点。”说着问羊牧之：“看了没有？”羊牧之老实答道：“翻了一下。”瞿秋白说：“这不行，我们中宣部同志，对党内任何同志送中央的报告文章，都要认真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羊牧之接受了瞿秋白的批评，赶紧下去联系报告的出版事宜。

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名出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第一个单行本。瞿秋白原计划要连续出版一套关于农民运动的著作，但后来由于局势的变化，这一出版计划未能实现。

长江书店生意兴隆

1926年11月，经中共中央决定，长江书店在汉口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百花世界（今民众乐园）下首正式营业。这是在武汉地区最早设立的出版发行机构。书店由瞿秋白直接领导，苏新甫负责具体业务。其创办宗旨是经售向导社、新青年社、中国青年社和一切关于革命的书报。

由于武汉革命形势高涨，长江书店开业后，生意异常火爆。所有上海、

广州运来的书刊，三天之内完全卖罄，因添配的书接应不上，曾经一度“拉铁门”。

汪原放目睹了长江书店的销售盛况后写道：“我们去时，上海到书有十几大箱，又有不少大书包，各家的书都有。正在开箱时，旁边已有不少人在等。箱子开开，来不及上架，只好就凑在箱边卖。不一会儿，来买的人更多了，想必是闻风而来的。有人看一看书上的定价，付了钱便拿了书走了。可以说是一抢而光。”

朱其华在《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中也记述了长江书店的火爆情景：“书店里挤满了顾客，这种热闹的情形是上海四马路各书店所没有的，我们挤了半天才找到一个店员，但当我们向他说明我们要买最近的《向导》周报时，他立刻就给了我们失望的答复：‘对不起！已经卖完了，这一期第五版明天早上就可以出版，你明天早上来买吧。’他一面对我们说，一面已在和别人做交易了。”

因此，长江书店一边设法从上海、广州添购书刊，一边加大书籍发行量，但仍供不应求。为解决书源问题，长江书店于1927年3月在汉口济生三马路福生里开办了长江印刷厂，大量重印、出版有关书籍。

1927年5月1日，由于营业异常发达，店面太小，不敷应用，长江书店搬迁至后城马路济生路口（今中山大道831号）中南旅社对门三层楼洋房，店面由原来的一个开间扩大到五个开间，所有书报大减价一个月，以答谢读者。此后，长江书店出版和销售的书更加丰富，一度成为全国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中心。

至1927年7月，长江书店共印刷、发行革命书刊50余种。这些书刊大致可以分为五种：

第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译著。如1927年2月出版的瞿秋白翻译的斯大林著作《列宁主义概论》，系统介绍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方法和理论。此外还有《共产党的计划》（布哈林著）、《资本主义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布哈林著，陆定一译）、《共产国际党纲草案》（王伊维译）、《经济科学大纲》（普格丹诺夫著，施存统译）、《农民问题》（布哈林著）、《马

克思主义者列宁》（布哈林著）、《马克思》、《资本主义浅说》（山川均著，施存统译）、《共产主义 ABC》（布哈林著）、《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等，为广大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种是无产阶级理论著作。如《社会科学讲义（全四册）》（瞿秋白、安体诚等著）、《社会进化简史》（张伯简编）、《唯物史观浅释》（刘宜元著）等。

第三种是研究、介绍中外革命运动的书籍，如 1927 年 4 月出版的毛泽东著《湖南农民革命（一）》。此外还有《青年工人问题》（钟恭著）、《不平等条约》（《向导》社编）、《中国共产党五年来的政治主张》（《向导》社编）、《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向导》社编）、《这一年》（中国青年社丛书）、《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彭述之著）、《保护劳动法》和《现代的公民》（高宇罕著）、《民族革命运动史大纲》（萧楚女编著）、《劳动运动史》（施复亮编）、《世界劳工运动现状》（《新青年》社编）、《俄国革命运动史（第一册）》（瞿秋白著）等。

第四种是通俗读物，如《革命日历》《革命歌集》《青年平民读本》等。

《革命日历》出版于 1927 年 1 月，它采用日历的形式进行革命的宣传，在每一页的日历上，上半部分印载着月、日，左边是阳历，右边是阴历、节气；下半部分印载着当日国内外革命大事，并配以简短的评介。如 1927 年 11 月 26 日那一页，就印着：1961 年——俄国农民暴动首领拉辛被杀、1848 年——罗马暴动、1917 年——俄罗斯人民权利宣言公布、1919 年——日本浪人在福州毆杀学生、1926 年——上海工人领袖陶静轩被杀，并在下面印载着陶静轩烈士的事迹。

《革命歌集》是目前革命歌曲汇编书的最早一本。十六开，铅印，红色封面、红色封底，李求实作序，共收录革命歌曲十五首，分别是《国际歌》《少年先锋歌》《国民革命歌》《马赛曲》《进行曲》《反帝国主义歌》《农工歌》《赤潮曲》《二七纪念歌》《纪念五一歌》《五七国耻纪念歌》《追悼中山先生歌（其一）》《追悼中山先生歌（其二）》《劳动儿童团歌》《童子团歌》。每首歌曲配有五线谱、简谱两种。有些歌曲还加文字说明，

如第六面有国际歌歌词二、三段，第七面有少年先锋简介，第十面有少年先锋（少年国际歌）三至四段歌词，第十二面有马赛曲简介，第二十八面有二七纪念歌简介。

《青年平民读本》是各地平民夜校的教材，全书 1300 余字，皆为平日生活常用字，采用发票、借据、记账、故事等生动实用的形式进行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历史等方面的教育。一共 4 册，每册 24 课，每日一课，3 个多月即可学完。这类书籍深受广大工农群众的欢迎。

第五种是革命刊物，如《向导》周报、《中国青年》、《群众》周刊。此外，长江书店还新创刊《赤女杂志》。《赤女杂志》是我国第一本指导妇女运动的革命刊物，创刊于 1927 年 3 月 8 日，由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妇女部代理书记杨之华主编，现仅创刊号存于上海市档案馆，其余均散佚。陈独秀的《我的妇女解放观》、瞿秋白的《中国妇女之白化与赤化——中国妇女运动恭贺新禧》、杨之华的《中国“三八”运动史》、奋牺的《一九二六年广东车衣女工奋斗之经过》及其他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文章均为其创刊号登载的作品，它们既介绍指导了各地女工运动的情况，又阐述论证了妇女运动的发展，受到了广大妇女的欢迎。

长江书店出版的书籍不仅种类丰富，形式多样，而且能紧密贴合党的斗争需要，极大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吸引广大工农群众参与党的斗争事业。如 1927 年 1 月 3 日，英国水兵在汉口登陆，刺死刺伤多名中国群众，导致 1 人死亡，80 余人受伤，史称一三惨案。惨案发生后，长江书店积极翻印发行《省港中英谈判》《省港罢工概况》《帝国主义讲授大纲》《全国工人阶级目前行动纲领》《工会经济问题》《工会组织法》《工人导报》等书刊，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罪行，推动工人运动迅猛发展，为收回汉口英租界斗争作了舆论准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长江书店及时发行《讨蒋周刊》《觉声·打倒蒋介石专号》《中国青年特刊》等，为反蒋、讨蒋贡献力量。

长江书店在出版、发行书刊时，十分注意新书宣传。它的宣传广告文字简洁明了，但又打动人心。如介绍《共产国际党纲草案》时说：“共产

国际是世界革命的总指挥机关，我们要知道共产国际所要的是什么并怎样行动，那么我们就应该读读这本共产国际党纲草案。”又如介绍《革命歌集》时写道：“告诉读者一个新消息——《革命歌集》出版预告：我们知道踽踽在凄漠般生活中的青



长江书店旧址

年，正需要热烈的、雄壮的歌曲来灌溉枯燥的心灵，振奋颓唐的精神，使勇敢地向革命的路前进！因此，我们愿意把她献给我们亲爱的读者。”

长江书店的书刊不仅深受武汉民众喜爱，还远销全国各地，广州、成都、重庆、长沙、南昌、安庆、万县、九江均设有分店，各类书籍“到一批卖一批”，成为那里革命先进分子的案头读物。

就在长江书店大有作为之际，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分共”，武汉大批革命者遭到逮捕，革命机关被关闭。7月20日，长江书店也遭到查封，印刷厂被查抄，印刷机器、纸张被抢，厂长被抓。7月3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军官士兵对长江书店进行了检查，查抄了很多书籍，并禁止出售一切出版物。8月4日，长江书店不得不刊登停业启事。

在8个多月的时间里，长江书店始终勇立民族民主革命的潮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思想、扩大革命声势、提高群众政治觉悟、推动工农运动发展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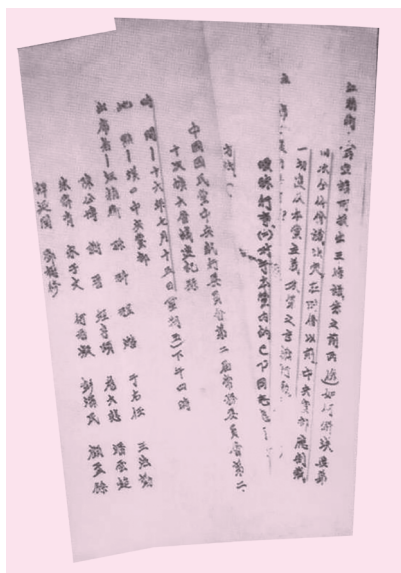
（刘宇洁 汪梅梅）



长风破浪会有时

血雨腥风中果断应变

1927年7月，中央宣传部秘书处兼鼓动科干事宋侃夫来到中央组织部办公地，接受党组织新的工作安排。中央组织部秘书罗严征求宋侃夫本人对工作去向的意见。宋侃夫提出想回故乡江西，坐在旁边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笑着问道：“回江西当少爷去呀？”一语提醒了宋侃夫，他不愿再回到在江西老家的官僚地主家庭，于是当即表示还是去浙江杭州，回到他参加学生运动投身革命的起始地。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即七一五“分共”会议）记录

随着武汉形势急剧恶化和国共合作破裂，中共中央组织部几乎每天都要安排像宋侃夫这样的党员干部前往外地疏散。这是中共中央做出的紧急应变部署，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聚集在武汉的大批党员干部以不同途径和方式安排疏散和隐蔽，中央、省委和各级党组织都要迅速转入地下，中央办公地点也由汉口暂移武昌。

与此同时，汪精卫集团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分共”和“清党”。7月1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向国民党各级党部发布“分共”训令。7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训令军事委员会在军队中清党，通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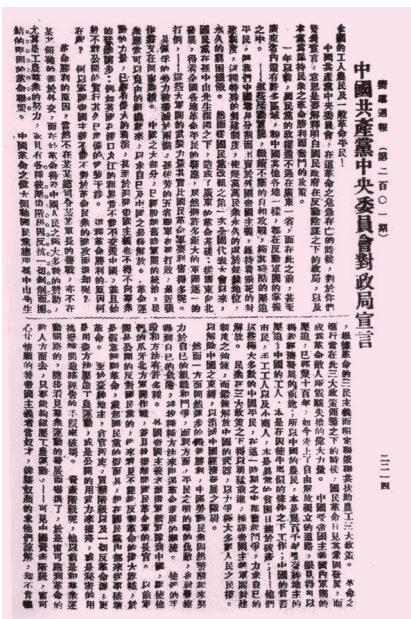
各军务须在最短时间核查军队中的军事负责人及政治工作人员，对已知名的共产党员“切实劝导与共产党脱离关系”，未知名的共产党员“应随时留心查察，禁止一切秘密会议，并考核其言论行动，如有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应予惩办，切勿瞻徇玩忽，以致酿成巨祸”。7月2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统一本党政策案》，宣布：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中有职务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在国民革命时期内，共产党员不得有碍国民革命的活动，并不得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的工作。7月25日，汪精卫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恶狠狠地说：“再要闹，只好捉人了！”7月2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统一本党政策案》，宣布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7月2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通令各省党部、省政府、军部，对共产党活动“加以注意，严加防范”。7月28日，国民党中央又发表《告中国共产党》，声称要对共产党“执行相当的纪律”。

不久，汪精卫集团就撕下了“和平分共”的伪装，展开了血腥的武力“清党”。8月2日，武汉国民政府明令：

“共产党员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绝不宽恕。”8月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杀气腾腾地叫嚣，对共产党“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捉到一个杀一个……把他们一个个抓来枪毙”。

8月初，改组后的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卫戍区司令部等联合成立“镇反”委员会，开始在武汉地区大肆逮捕、屠杀党员、团员和革命群众。

由于武汉反动当局实行严厉的反共



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



“清党”政策，武汉的共产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基层党组织被打散，不少共产党员脱离，与组织失去联系，一些不坚定的共产党员或投机分子纷纷叛离共产党，有的甚至成为可耻的叛徒。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提出：“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武汉党部转入秘密状态的关键，因为此处有好几千党员而大半都是没有经过秘密状态的，中央应当帮助湖北省委进行这种改组的工作而直接督促他”。

在险恶形势下，中共中央通过几个途径将武汉的党员干部紧急疏散撤离。一是将在武汉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调往外地，又从外地调干部到武汉工作。如湖北省委一批重要干部陈潭秋、刘少奇、许白昊等调离武汉，由罗亦农接替张太雷任省委书记。二是凡能秘密回原籍工作的便回原籍，不能回的，则派到其他地方工作。由中央秘书厅与中组部密切配合，筹集经费，为疏散的党员干部解决交通、住宿等问题。三是安排一批干部随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四是留下部分党员干部转入地下，在武汉坚持斗争。如五大代表张金保就没有离开武汉，而是回到泰安纱厂隐蔽起来。五是选派一部分党团员赴苏联学习。如：肖劲光被派到苏联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聂洪钧受湖北省委派遣赴苏联学习，赵一曼及其他党团员数十人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等院校学习。还有不少党员干部被安排到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中去工作。这些工作，大多由组织部和军事部来安排实施。

虽然党中央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党组织还是遭受了严重损失。据1927年9月下旬统计，武汉地区的共产党员人数，由大革命时期的8000人骤降到1296人。与此同时，原来生气勃勃的工会、农会有的被改组，有的被解散或被查禁，武汉革命群众团体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八二总同盟罢工

汪精卫集团在武汉的叛变，使武汉工人运动遭受了严重摧残，但是具有革命精神的武汉工人阶级并没有被武汉国民党当局嚣张的反动气焰所吓倒，而是凭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怀着对敌人的极端仇恨和冲破失败

局面迅速复兴革命的强烈愿望，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顽强抗争。1927年8月2日武汉工人举行的总同盟罢工，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次英勇斗争，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武汉工人总同盟罢工是党的五人临时中央常委会重要决策之一。为了牵制敌人的兵力，保证南昌起义胜利进行，五人临时中央常委会在决定南昌起义的同时，决定在武汉举行同盟罢工响应南昌起义。7月下旬，湖北省委开始筹划这次总同盟罢工。

罢工的准备工作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在七一五“分共”之前，汪精卫集团就开始限制工农运动，摧残民众组织。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武力镇压，到7月底，武汉工人运动出现召集不起各产业负责人会议、群众示威连动弹都不可能的消沉局面。为了动员和组织武汉工人总同盟罢工，省委多次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培训骨干。在酷热的暑天，刚上任的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奔走于大江两岸，终日“舌敝唇焦，汗流遍体”，进行鼓动宣传，“消沉者多被其鼓动，遂能举行武汉三镇总同盟大罢工”。省总工会制定了《武阳夏总罢工密令及行动经济风潮之计划》，并进行了总罢工的具体部署。

正当武汉工人积极准备总同盟罢工之时，中共湖北省委这一行动计划被武汉反动当局侦悉。7月30日，武汉三镇戒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告戒严期间不准自由开会或群众游行，各游戏场、戏园至夜间11时一律停止开演。并宣布凡不遵守以上各条者，以军法从事。这一意外变故使得八二总同盟罢工面临流产的危险。

正当湖北省委为如何发动工人群众参加总同盟罢工感到焦急万分时，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成为了点燃八二总同盟罢工的导火索。

1927年7月29日下午4时，汉口华界人力车夫工会会员戴玉卿、彭银堂、张德胜等3人运送铜元到车夫工会，帮助车夫以国库券兑换铜元，便于购买日用必需品。当他们走到汉口张美之巷青莲阁总商会门前时，卫戍司令部的几名士兵强行以国库券换取车夫所拉的铜元，这让车夫们感到十分为难。



当时汪精卫政权财政状况恶化，财政赤字惊人，通货膨胀严重，金融异常混乱。汪精卫政府强令发行的国库券早已失去信用，急剧贬值，离开武汉便无法流通，人人视国库券为烫手之物，很多商家、银行都拒绝用国库券兑换现洋。当时武汉市面上不但缺银元，也缺铜元，只有大面值的国库券充斥。由于铜元缺乏，无法找零，每次购物非用一元不可，仅靠微薄工资勉强维持生计的广大劳苦群众深受其害，苦不堪言。

面对蛮横无理、巧取豪夺的士兵，刚开始车夫们想息事宁人，万般无奈地给士兵换了一些铜元，不料士兵贪得无厌，要求多换，因此与车夫发生冲突，最后士兵竟出手殴打车夫，并将车夫数人拘送卫戍司令部。这时，正值武汉工人失业救济局在总商会前散发失业工人救济费，又有士兵想拿国库券兑换铜元，再次与工人发生冲突。许多车夫闻讯后从四面八方赶来，将几百辆人力车拉到汉口市警察第七署前抗议，晚7点左右已聚集了数千人。车夫们群情激愤，包围并捣毁了警察第七署，打伤巡官、署长、巡察等数人。武汉卫戍司令部和市公安局急调军警镇压，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两人，伤十余人。30日，华界车夫5000人为反抗压迫宣布罢工。31日，租界车夫3000人也举行了同情罢工。

人力车夫罢工是一次自发性的抗暴斗争。事件发生后，中共湖北省委因势利导，以此作为突破口来推动八二总同盟罢工。省委召开了工会活动分子会议，决定“为抵抗国民政府的叛变革命，扩大此罢工为政治的反抗大罢工，于8月2日实行。”除电灯、自来水工人外，其余各业一律全体总罢工，并提出了“罢工打倒国民政府！打倒汪精卫、唐生智！反对滥发货币！反对逮捕工人！要求工资发现（即发银元或铜元）！要求抚恤死伤！”等口号，同时发动群众募捐，救济罢工的人力车工人。

8月2日，在党组织统一部署下，声势浩大的武汉工人总同盟罢工爆发。参加这次罢工的在武昌方面有震寰、裕华、一纱等纱厂工人及纱布丝麻四局的职工和许多商店的店员等；汉口有印刷、染织、邮务行业的工人；在汉阳有兵工厂工人、车夫、码头工人等，罢工总人数在7万人以上。

汉阳兵工厂罢工是这次总同盟罢工的重点。汉阳兵工厂原本党组织基

基础很好，有共产党员 800 人，共青团员 700 人，设有特别支部，直属湖北省委领导。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第 35 军一部进驻兵工厂，改组了工会，从 7 月 19 日起大肆开除、逮捕共产党人，至 7 月 28 日，被开除的党团员达 200 多人。党的特别支部书记、委员均被迫逃亡，党与群众的联系中断。8 月 1 日，党组织找到 28 个失业的兵工厂的党团员工人，议定了发动群众罢工的两个步骤：一是由被开除的党团员工人在厂门口以“反对发国库券”的口号鼓动工人罢工；二是入厂后拉汽笛，组织党团员呐喊助威，宣传罢工。

8 月 2 日早晨，当失业工人党团员正在宣传国库券已不能使用时，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到，按照党组织计划，几名共青团员在厂内强行拉响了汽笛。笛声一响，全厂工人都停工聚集到空场上，厂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胡锡泰跳上由三张方桌搭起的台子上讲话，宣布召开全厂工人大会。这时驻厂的反动军队架起机关枪包围了会场，共青团员和工人也将厂内的机关枪抬出架起，双方形成对峙。在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中，工人们无所畏惧，坚持开会。会议决定组织罢工委员会，宣布立即罢工。汉阳兵工厂罢工完全是政治性罢工，罢工一开始，即宣布这次罢工“目的是在反对国民政府的反革命”。罢工领导人胡锡泰拒绝了厂方提升他当领工（领班工头）的利诱，坚持率领工人群众罢工，坚持斗争。

八二总同盟罢工遭到敌人残酷镇压。8 月 1 日，敌人破获了码头总工会的秘密机关。汉阳、汉口码头工人的罢工计划因此未能实现。车夫总工会因车夫领袖大批被捕，失去了核心。8 月 2 日的罢工未能举行，在反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其他各行业工人罢工一天后被迫陆续复工，剩下汉阳兵工厂工人孤军奋战。南昌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曾想答应兵工厂罢工提出的一两个条件，企图从速结束罢工，但是工人坚持不肯复工。而人力车夫的复工对罢工全局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敌人对工人队伍采取了分化政策，8 月 10 日，唐生智从长沙子弹厂调来 500 名工人，宣布另招新工人。厂方让工人登记，不登记的就开除，引起了群众的恐慌，党团员也只得跟着群众一起登记。8 月 15 日，汉阳兵工厂工人忍痛复工，八二总同盟罢工宣告结束。

在此次罢工斗争中，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牺牲的党团员和群众达100人以上，其中包括汉阳兵工厂工会委员长胡锡泰等人，以及码头总工会关明轩，店员总工会朱枕戈、徐佑根等工会领导人和工运骨干。

八二总同盟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它显示了武汉工人阶级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政治上有力地揭露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反革命面目，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达到了牵制敌人兵力、破坏敌人军火供应，响应南昌起义的目的。但是，八二总同盟罢工的失败也说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党在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不应当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而应当争取群众聚集力量，等待时机开展斗争。

组织四省农民暴动

1927年7月20日，一张署名“安中原”和“宗容明”的秘密通告从武汉悄然发往全国各地党组织和农民协会。这份《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阶段。实现土地革命，“必有夺取政权的争斗”，“就是要建设农民的革命民权”，即农会政权；而建立农会政权与开展土地革命“必需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因此要“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阶级和一切反动派的武装”。

这份不起眼的通告，实际上是一份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重要指导意义的党内文献。署名中的“安中原”就是中共中央的代号，“宗容明”则是中共中央农民部的代号。它首次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土地革命新阶段，并把土地革命、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联系在一起，指明了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发展方向。它还提出了建立和保存农民武装的三种形式：一种是以“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等合法名义存在；一种是平时分散，秘密训练，战时集中的形式；还有一种就是“上山”。

在这份通告发出之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在国民政府领土内今年秋收时，积极做广大的减租抗租运动以鼓动农民悉起夺取政权”。

组织农民暴动，建立农民武装，建立农民政权，必须制定一个行之有效的区域暴动计划。这是当时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最为迫切的想法。

历史的重任落在中共中央农民部的肩上。7月下旬，中央农民部集中制定出《最近农民斗争议案》，提出了组织农民暴动的一些基本要求。

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后，立即同李维汉、张国焘、张太雷等商议，指示在《最近农民斗争议案》的基础上，确定在农民运动开展得比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具体研究拟定农民暴动的总体方案，作为党长期的斗争指导文件。

中共中央农民部没有辜负中央的重托，迅速组织人员，认真具体分析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的具体情况，于8月初提出了一个宏观议案——《中共中央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大纲》。

8月3日，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在汉的中央临时常委会委员审议通过了四省农民暴动大纲。大纲指出：“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漠克拉西独裁（即工农民主专政），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要求四省农民暴动要“以农会为中心”，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都应团结在它的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除夺取乡村政权以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农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并“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由农会通告，对一切公地及50亩以上的大地主一律不缴租，对50亩以下的地主实行减租，自耕农土地不没收；农民协会土地组织委员会决定土地分配，并号召全党“勇往直前地领导秋收的暴动”。

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省委也在积极制定各自的农民暴动纲要。8月初，毛泽东制定了《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这个大纲提出湘南农民暴动，主要是考虑到广东农民起义队伍和南昌起义队伍驻扎在粤北、湘南地区而制定的。大纲提出“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支唐政府对抗，与湘西的反唐部队取得联络”。

8月4日，罗亦农、任弼时、任旭等拟订出《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



罗亦农

随后，广东和江西两省也都制定了农民暴动计划。

计划纷纷制定出来了，但执行党的计划，指导农民暴动，需要坚强而有经验的党的干部。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指出要把发动农民总暴动作为中国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决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党团最积极、最坚强、最有斗争经验的同志派到各主要省份去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陆续派遣一批又一批干部前往四省，开展组织动员，切实推动农民暴动。

瞿秋白十分赞赏毛泽东，主动邀请毛泽东和他一起去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则快人快语：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身体力行地这样去做了。

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在汉口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毛委员”的由来。8月12日，毛泽东离开武汉秘密回到湖南。这个身着长衫，身材颇长，握惯了笔杆子的书生拿起了枪杆子。

随即，张太雷被派往广东，王一飞、李富春、陆沉等被派往鄂北襄阳、枣阳、随州。

湖北省委选派大批党团干部离开武汉，指导武汉周边农民暴动。符向一、吴德峰、黄赤光至鄂南，刘植五、张计储到鄂西，肖仁鹄、王平章去鄂中，张浩、吴致民到鄂东。与此同时，湖南、广东、江西等地也派出许多得力同志到工厂，到农村，到军队中去组织武装暴动。

9月15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了给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政治报告》，明确指出：“目前我们的政策是暴动政策，主要的是要引导工农

群众暴动。”随即，中共中央根据各地暴动实际情况，决定取消八七会议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决定，进而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号召起义部队建立红色的苏维埃政权。

中国共产党在生死考验的历史关头，毫不妥协，选择勇敢地站起来，承担起组织领导农民暴动的责任。

郊县农村武装暴动

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这个计划将全省划分为鄂东、鄂南、鄂北、鄂中、鄂西、武汉、京汉路等7个暴动区域。由于武汉是大革命中心，党在这个地区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在这里举行农民暴动，既可以得到农民的支持，又可以直接打击国民党的反动气焰。因此，湖北省委把武汉单独列出，作为一个独立的暴动区域——“武汉区”，并要求与其他六个暴动区一样，也要成立党的特别委员会加以领导，保证秋收暴动的胜利。

省委提出秋收起义的具体步骤是：首先组织农民游击队，破坏水陆交通，断绝敌军运输及米粮供应，阻止燃料出境，镇压地主阶级的复仇气焰，恢复和振奋农民群众的斗争勇气；然后，健全并扩大农民武装和农协组织，发动乡村大暴动，攻打县城，建立革命政权和军队。

当时，武汉特别委员会领导汉口、武昌两市委和汉阳县委，由于汉口、武昌两个市委的中心工作是领导工人罢工，而汉阳县委管辖范围主要在农村，所以工作任务是领导农民举行秋收暴动。

湖北省委对汉阳县的秋收暴动非常重视，实际进行了直接领导。汉阳县委接到省委指示后，迅速清理整顿了汉阳农村党组织，把全县划分成4个暴动区域：蔡甸、鹦鹉洲、城陵矶、荻障口。

省委分析后认为，蔡甸区在大革命时期农运搞得轰轰烈烈，大革命失败后，那里的党组织几乎没遭受过破坏，而且群众基础好。更重要的是，武汉工人纠察队被迫解散交枪时，蔡甸工人纠察队听到了消息，立即把15支完好的驳壳枪埋在了工会办公楼的后院，这是蔡甸以外其他暴动区域没



有的优势。因此，省委专门致函汉阳县委，催促汉阳县农委书记邓耀加紧蔡甸区的工作。

9月初，邓耀来到蔡甸，与原蔡甸区委书记一起秘密筹划暴动，邓耀兼任汉阳县第一区特委书记，并把当地 50 余名党员、团员和农民代表编成了 4 个小组。经过实地考察，邓耀发现蔡甸的实际情况与省委认知不完全一样，准备工作也与预期有距离，但为了全省暴动大局，蔡甸区必须执行省委的部署，举行暴动。

9月中下旬，武汉党的地下印刷机关秘密送来几百张标语和传单，让蔡甸党组织连夜分发给其他各组。一夜之间，号召农民起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传单、标语出现在蔡甸和附近的集镇上。土豪劣绅和反动当局立即警觉起来，加强了防备。第二天深夜 11 点，在邓耀的带领下，暴动队伍挖出埋藏的 15 支驳壳枪，前往笔架山、天子山发动农民反抗地主收租，张贴“杀尽土豪劣绅”“佃农团结起来”等标语，制造声势。当地的土豪劣绅闻风丧胆，有的连夜逃亡。

这次行动骚扰了敌人，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党团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士气。汉阳县委因势利导，决定在七萧大湾再次举行武装暴动，拿七萧大湾的头号土豪劣绅萧洪林开刀。

11 月的一天晚上，暴动开始前邓耀进行了广泛动员，宣布了萧洪林的罪状。暴动队员们听了，个个义愤填膺，同声高呼：“坚决铲除萧洪林！”

为了保证暴动顺利进行，邓耀带领蔡甸的暴动队在太山寺附近警戒，监视蔡甸方向的敌人，另一人带领暴动队进击萧家大湾，包围萧洪林住宅。萧洪林见势不妙，紧闭大门，凭借着高墙深院，负隅顽抗。暴动队员们无比愤怒，撞破大门，冲进住宅，拖出萧洪林就地枪决。随即张贴标语，暴动队员撤出战斗。暴动队随后又处决了几个土豪劣绅。还歼灭了反动团防，暴动队没收了浮财，缴枪 30 余支，武装力量得到壮大。

后来，蔡甸的暴动队受到国民党新军阀特务队的突然袭击，共产党员舒法震等 5 人被逮捕。次日凌晨，5 人均以“土匪聚众抢劫杀人”的罪名，被斩首于蔡店镇轮船码头，并悬首示众。此后敌人更是疯狂地进行“梳篦

式清乡”，以彻底扑灭暴动烈火。

除汉阳县农民暴动外，武昌县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于9月份组建了一支数百人的农军，响应了鄂南暴动。新洲地区（当年为黄冈西乡）的党组织领导了冈西暴动。这些农民暴动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下，最终都宣告失败，但是革命的火种深深植入了群众心中，为以后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党中央离汉返沪

1927年9月中下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由于力量悬殊等原因，先后遭到了严重挫折。南昌起义部队被打散，鄂南起义军遭受伏击，湖南秋收起义部队被迫转移，鄂西鄂东农民起义军也损失惨重。此时，武汉的形势更加严峻，中共中央时刻都处于可能倾覆之中，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中共中央能否继续留在武汉的重大问题之一。

9月19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的德林公寓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在汉的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召开会议，提出如果湖南、湖北暴动没有大发展，中共中央机关先迁移上海，等广东的形势有了发展，再从上海迁往广东。21日，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再一次讨论中共中央机关迁移问题，决定先派戴琨到上海，安排布置住房，着手建立机关。

9月28日，在汉口一间并不引人注目的公寓里，瞿秋白又一次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是1927年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武汉召开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有两个议题，一是正式决定中共中央迁往上海。瞿秋白指出整个迁移要安全第一，由军委的同志统一安排负责。政治局常委撤离顺序是，苏兆征当天启程去上海，瞿秋白29日或30日去上海，李维汉最后走，待任弼时由湖南返回武汉后，由李维汉召集顾顺章、罗亦农、任弼时等开一次会，最后安排一下中央离开武汉以后的有关事项，再启程赴上海。二是决定在武汉设立长江局。瞿秋白说，中央撤走后，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管辖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

徽和陕西7省，由罗亦农、陈乔年、任旭、王一飞、毛泽东人组成，罗亦农担任书记。他还特地指出：“泽东能来，必须加入，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当天，苏兆征即在中共中央军委的周密安排下，离开武汉乘船东下，前往上海。

10月1日，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在郑超麟陪同下，乘坐一艘开往上海的日本客轮离开武汉。

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特务股负责人李强是坐普通船走的，到上海时已经需要穿夹衣了。据李强回忆，罗亦农是乘隆和号货轮走的。从汉口到武汉，有一条秘密的党内交通线，英商祥泰木行的隆和号货轮就是这条线上一个重要的流动交通站。祥泰木行，又称山打木行、中国木材进出口有限公司，总行总栈设在上海杨树浦路80号，董事是以阿诺德为首的英商。阿诺德是英商安利洋行老板，是当时在沪的英商头面人物。木行鼎盛时期，在全国16所中大城市均设有分行，尤其以上海、南京、汉口、天津四地的营业最为发达。隆和号载重一千多吨，专门从上海拉木料到武汉。顶多只能带一两人。船上的舵手姓陈，宁波人，共产党员。隆和号属英国人所有，又是货轮，可以不受检查，十分安全。

李强说：“手枪也是这条船带到上海的。一部分手枪送给叶挺部队的颜昌颐。还有一部分手枪放在汉口兴（协）隆北里地板底下。这船还带文件。



上海杨浦滨江祥泰木行工业遗存

他到上海后有专人同他接头。机关里的一切用具，包括床板、痰盂，我通通都送回了上海。”迁离武汉由军委的人负责扫尾，做善后工作。军委的人将金子、银子、首饰（秋收起义打土豪的）都用这条船带走。银元交给叶挺，钞票也

带到上海。这条船还从上海带米、油、盐到武汉。党组织一直使用这艘船运人运物，直到1931年顾顺章叛变，供出了这条船，舵手也被捕，党才失去了这个据点。

李维汉作为最后一位留汉的政治局常委，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次会议，宣布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罗亦农担任书记。这是中共中央离开武汉过程中一项最为重要的善后工作。

把一切重要的善后工作处理后，10月上旬，李维汉也乘坐一艘轮船离开武汉。至此，中共中央及其机关全部迁离了武汉。

中共中央在武汉的这段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党在这一时期肩负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光荣使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高潮，经历了大革命从高潮到失败，再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伟大转折，经受了血雨腥风的严峻考验和艰苦卓绝的斗争洗礼，走上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征程。

中共中央迁离武汉，并不代表中国革命彻底失败，并不代表中国革命事业就此结束，并不代表中国共产党人从此隐居南山。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将其领导机关迁往上海，领导土地革命战争，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的篇章。

（刘桂芳）

（本书个别图片源于网络，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